

目 录

- 1 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实践 (1905—1912)
..... C·齐赫文斯基 丁如筠译 邹宁校
- 28 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资产阶级..... 白吉尔
黄庆华译 胥森校
- 67 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 巴斯蒂
王刚译 张振鹑校
- 95 辛亥革命在东三省..... 西村成雄
傅仲译
- 139 1928年中国革命新战略的出现..... 索顿
林海译
- 168 1900年中俄满洲冲突事件新探..... 郭玫瑰 辻伸久
吕其苏译 吕浦校
- 206 军部与第一次大战中的对华政策..... 北冈伸一
郑基译 赵明杰校
- 271 瞿秋白与彭述之论中国革命问题..... И·捷柳辛
曾宪权译 陶文钊 邹宁校

资 料

- 294 关于孙中山的一份未发表过的电报
..... C·胡谢伊诺夫 曾代伟译 林荫成校
- 297 沙俄通过修筑东省铁路掠夺我国东北
煤矿资源的几则材料..... E·尼鲁斯
陶文钊译

- 306 威廉二世关于沙俄占领旅顺口…… JI·捷列舍瓦
陶文钊译

争 论

- 317 共产国际对华政策…… B·格鲁宁
吴永清译 邹宁校

动 态

- 356 法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最近动向的考察…… 巴斯蒂
刘存宽 张振鹞译

简 介

- 369 苏联远东研究所简介…… 吴永清
385 稿约

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实践

(1905—1912)

C·齐赫文斯基

义和团起义以后，清廷在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以及外国资本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某些改革，以推动国内近代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然而，中国资产阶级并未因此停止反满和排外。

1905年间，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十分活跃。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它在国内外已有四十个分会），以及“光复会”、“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

鉴于国内反满情绪不断增长、革命思想在旅居海外的华侨当中日益广泛传播，以及俄国爆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孙中山遂认为，必须联合一切反满团体，共同为推翻清王朝而奋斗。1905年7月30日，中国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在东京召开，会上孙中山倡议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与会代表一致拥护这个倡议。

为保密起见，代表们将“革命”二字删去，定名“中国同盟会”。与会者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同盟会”纲领是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制定的，^①它集中体

^① 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是孙中山1905年在布鲁塞尔中国留比革命学生会上阐述的。他根据当时的情况，把它具体化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现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口号中。1905年9月18日，在东京举行“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领导机关，通过了《军政府宣言》，《宣言》中阐明了“同盟会”的政纲。大会还根据孙中山的倡议，制订了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其中包括《安民布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对外宣言》等等。^①

本文只论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外交活动，不拟详细分析“同盟会”的整个纲领。

《对外宣言》是孙中山当时起草的主要外交文献。《宣言》说：“中华国民军奉命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民之福祉。”^②

《宣言》以国民军的名义提出革命党人起义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遵循的七项原则：

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二、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

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③

《宣言》想说服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革命期间保持中立，并且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它们倒向满清政府一边。在“同盟会”的这个官方文件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反帝口号，以及恢复被列强践踏

① 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重庆1944年版），第1篇，第44—104页；又见《辛亥革命》（上海1957年版），第2卷，第3—93页。

② 《辛亥革命》（上海1957年版），第2卷，第33页。

③ 同上

了的中国主权的的要求。可见，“同盟会”的对外政策完全服从推翻清朝专制制度这一目标的需要，具体说来，就是要破坏满人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盟。

1906年4月5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民报〉的六大宗旨》，对“同盟会”的对外纲领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六大宗旨是：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护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①

前三点是人所共知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三点是首次提出来的。《民报》编辑部对“维护世界真正之平和”这一宗旨作了如下的解释：“……平和为人类之福，犹一国之安宁秩序，是故扰世界之平和者，为人道之贼。……今各国鹰麟鸷视，竞逐于世界之舞台，相惮莫敢后，相顾莫敢先者，何为也？曰：为均势问题也。均势问题，不在弱小之邦，而在强国，若英、法、俄、德、美、日本，皆其倚著之重点也。然尚有中国以其位置资格，决然不当后于六强而萎靡不振，几徒供他人鼎俎之资，此远东问题，所以极促世界之注目，而终以均势之难而不解决也。”^②

文章指出，俄日战争没有解决远东问题。《民报》编辑部在阐述孙中山1904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的思想时指出：

“欲求真正平和，当始于中国为独立强国之日。中国为独立强国，则远东问题解决，均势问题亦解决也。

“……故曰：吾人所以倾覆政府者，直接为国民幸福，间接为世界平和也。”^③

文章猛烈地抨击了1902年英日协定，《民报》认为，这项协定无助于中国的富强，因为它把中国，以及与保持远东“均势”有关的其他大国排除在外。《民报》编辑部尖锐地批驳了日本政客小

① 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重庆1944年版）第2篇，第446页。

② 同上第2篇，第450—451页。

③ 同上，第451页。

熊重信对英日同盟的评价，他认为，同盟的“使命是实现‘均势’原则，并且可以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使中国国情发生变化”。

《民报》编辑部在阐述“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这一宗旨时指出，日本国内对中国普遍持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侵略中国；另一种是主张中国向日本“靠拢”。《民报》认为，对中国及其四亿人民的不平等态度，乃是这两种观点的基础。编辑部文章指出，日本国民应当明白，满清政府和中国人民是势不两立的。

《民报》之所以主张中日两国国民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社均设在日本，再则侨居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迫切希望日本当局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关照。

《民报》的第六宗旨“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实际上是再一次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当前中国人民反对满清政府的斗争保持中立。反过来，革命党人将保证尊重洋人在中国的利益。文章指出，推翻满人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将继续履行清政府所签订的一切国际条约和协定。其实，《民报》的第六宗旨，和上面所分析的《对外宣言》的精神完全一致。

《民报》所阐述的“同盟会”对外纲领，实际上全面重申了孙中山早在1904年《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所提出的基本原则。

从《对外宣言》和《民报》编辑部文章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及其战友对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反动政府结盟的性质缺乏认识，他们以为，只要给列强以种种许诺和保证，它们就不会干涉反对满清的革命。

他们的对外纲领的这种局限性，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不敢依靠劳动群众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和伊朗、土耳其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解放思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对他们的实际活动有着极大的影响。中国的革命报刊广泛报道了俄国1905—

1907年事件，在这方面表现积极的，当首推《民报》，它大力宣传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经验，并号召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经验。^①

中国革命党人撰文赞扬俄国各族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文章说：“俄国革命之大风潮震动全球，……世皆知为俄国社会党之力。特其民未获自由，则其对内政策不得不异于列国，而未尝不为吾国改革方针之一助也”。（《民报》第4号）俄国革命“为他国革命未逮者，……”（《民报》第6号）。“今以露西亚之国，其专制政治组织之完密、强固，宜非满洲政府所敢望，然其国之革命志士，牺牲流血，犯难而与之争者，至今不屈。此支那革命党所赞叹而呼为同调者也。”^②（《民报》第11号）

虽然孙中山本人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是，大部分文章，而首先是刊登在《民报》上的文章，都经过他本人亲自审阅和认可，因此，这些文章实际上是集体创作的成果。^③

然而，必须指出，无论孙中山或者“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

① 荣孟源：《俄国1905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载《历史问题》1955年第6期，第98—104页。这期间，《民报》刊登了以下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文章和新闻资料：《尼夫阿利亚（即拉脱维亚）之独立》（第2号）、《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3号）、《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第3号和第7号）、《俄国革命党之日报》（第4号）、《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5号）、《俄国立宪后之情形》（第6号）、《虚无党之小史》（第11号和第17号）、关于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的短篇小说的译本，等等。《民报》第2号刊登了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的肖像，第3号刊登了米哈伊尔·巴枯宁像。以及行刺巴库总督拉加希芝的现场画片，第11号刊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照片，第14号刊登了西伯利亚某监狱中俄国政治犯的两幅合影照片，第15号刊登了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Γ·该鲁学尼的照片，第19号刊登了莫斯科总督于1908年被炸毙的现场画片，第22号刊登了俄国革命党人秘密集会和哥萨克士兵驱散示威游行群众的画片，以及其他画片。每一幅插图都附有简短的说明，从说明文字中不难看出，《民报》编辑部是同情俄国革命的。

Л·丘扎江（Л. С. Кюзалджян）：《论1905—1907年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影响》（载《世界文化史通报》1959年第6期第29—44页），对《民报》论述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系列文章作了分析。

② 引自《历史问题》1955年第6期第99—101页。

③ 见斯卡拉皮诺（R. A. Scalapino）和史扶邻（H. Schiffrin）：《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载《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第3号（1959年5月）第324页。

都对俄国革命营垒内部的阶级构成，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列宁布尔什维克派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粹派，以及工人运动中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展开的尖锐的政治斗争，缺乏明确的认识。

《民报》把俄国革命营垒内部的所有活动家，统统说成是“虚无主义者”。必须指出，“虚无主义者”这个词主要指民粹派，他们的观点和孙中山本人及其战友的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①

“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和民粹主义者一样，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懂得工农群众的创造性的革命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先锋队——革命政党的作用。他们常常混淆革命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两者的界限。为了和俄国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他们接触的多半是侨居国外的民粹主义者。1905—1907年，在日本避难的俄国政治侨民人数大为增加，其中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民粹主义者。^②孙中山曾会见1906年刚从西伯利亚的阿卡士监狱逃跑出来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的首领P·该鲁学尼，^③以及老民粹主义者H·苏济洛夫斯基（侨居国外时化名鲁赛尔，俄日战争结束后，曾在长崎出版过《民意报》）。

孙中山和鲁赛尔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之间友谊的基础是共同的革命目标。^④在他们相互探讨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最能说明孙中山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对华政策所持的外交观点。对于鲁赛尔提出的中国应吸引外资和外国专家来进行经济建设的方案，孙中山有所保留。^⑤他在1906年11月8日信中写道：“看来，您是如此坚

① 关于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成员的思想影响，中国史学家谭彼岸曾对《民报》刊载的资料作过分析（见谭彼岸：《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第35—44页）。

② A·赫菲茨（A. H. Хейфец）：《二十世纪初期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载《历史问题》1956年第12期第96页。

③ 《历史问题》1955年第6期第99页。

④ 扬森（M. B. Jansen）：《日本人与孙中山》，第124页。

⑤ H·鲁赛尔（H. K. Руссель）和孙中山的来往信件，是苏联史学家A·赫菲茨在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发现的（全宗5825，目录1，卷宗199），后来在其《二十世纪初期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一文中加以发表。

决地主张美国资本家和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可是您真的相信，许多人都会接受您的劝告投身到这项高尚事业中来吗？

“我深恐中国问题是绝不能引起欧美人士注意的，但是我希望由于您的善意号召，全世界大公无私的人们将会逐渐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①

在1906年11月26日的信中，孙中山更加明确地指出外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奴役性，他说：“也许，我错看了您对美国资本家的呼吁，但如果不是出于真正利他主义动机的话，那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不至于笨到这般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我们不指望外来的援助（不管这种援助的愿望如何），它如果不是出于真正利他主义动机的话……”。^②

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道，并不是中国革命党人了解俄国1905—1907年事件的唯一消息来源。著名的布尔什维克B·库尔纳托夫斯基原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后来逃了出来。1907年辗转来到长崎，并且在横滨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提到，据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说，孙中山于1905年在巴黎结识了Г·契切林，并与他就革命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③

日本社会党人的活动，对中国政治侨民和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日本社会党机关报《平民新闻》（1907年1月20日）有几句话，足以表明他们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的态度。

① A·赫非茨：《二十世纪初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第97页。

② 同上。

③ Л·丘扎江：《论1905—1907年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影响》，第38页。

该报说：“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深表同情，并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他们进行斗争，同时，我们期望他们在日益宣传共和与统一税收的基础上逐步前进，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①

《民报》的文章十分重视宣传日本社会党人的经验，尤其是幸德秋水^②和片山潜的思想。孙中山周围的革命民主派，通过日本报刊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朱执信在《民报》第2、3号上发表了德国社会党人的传略，其中有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有《共产党宣言》译文片断。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民报》第5号），朱执信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提出了阶级斗争必然要在中国发展的问題。^③

这期间，“同盟会”与在日本避难的印度政治侨民建立了联系，《民报》经常刊登他们的文章。中国革命党人一向维护和提拉克拥护者的友谊。^④他们还和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潘佩珠（1905年抵达日本）过从甚密。^⑤

在日本社会党人的倡议下，许多国家的政治侨民在东京成立

① 引自斯卡拉皮诺和史扶邻：《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第341页。

② 幸德秋水（1871—1911）系日本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10年6月，幸德及其二十五名战友被诬告“密谋”反对天皇而被捕，1911年1月24日被处决（见《日本近代史纲（1640—1917）》（莫斯科1958年版））。

幸德的活动对当年侨居日本和聚集在“同盟会”周围的中国革命党人的反帝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06—1910年间，幸德这位赫赫有名的政论家和演说家，在日本社会党人以及侨居日本的亚洲各国革命者中享有盛名。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促使日本广大民众关心俄国革命运动（他对这个运动的国际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③ 见斯卡拉皮诺和史扶邻：《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第329—333页。

④ 兀·丘扎江：《论1905—1907年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影响》，第41页。

⑤ 有关中国革命党人和越南革命志士交往的详情，参看兀·丘扎江：《亚洲觉醒时期越南与中国的革命联系》，载《历史问题》1961年第1期第86—102页。

了“东亚和亲会”。^① 它把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侨民中的革命者同日本社会党人联合起来。“亚洲和亲会”的宗旨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和亲会”要求会友“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凡愿意入会者，皆可入会，“支持帝国主义侵略者除外”。^② 《约章》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在“和亲会”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随着日本反动派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展开进攻，“和亲会”也因违背日本军阀和统治集团所鼓吹的沙文主义与泛亚细亚主义信条，而被当局取缔。1908年10月在东京成立的另一个革命侨民组织——“东亚同盟”，也是同样的下场。它总共只有五个月的寿命。据潘佩珠证实，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有朝鲜人、越南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和十几个日本社会党人。由潘佩珠发起，1908年在日本成立了“云南-广西-越南同盟”，入会者有越南革命志士和与越南接壤省份的中国留日学生。该同盟仅成立三个月，即被日本当局应清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请求而取缔。^③

孙中山对东方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斗争深表同情。1905年，他在东京会见潘佩珠时曾向其保证：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则举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④

1906年12月21日^⑤ 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

① 扬森 (M. B. Jansen) 在其《日本人与孙中山》一书中称之为“亚洲和亲会”(见扬森：《日本人与孙中山》，第124页。日本现代知名的史学家平野义太郎教授在其《反战运动的参加者》(东京1955年版)一书中，专辟一章来探讨日本社会党人(尤其是幸德秋水)同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平野教授援引了幸德家中收藏的档案资料，内有幸德用日文和英文书写的《亚洲和亲会约章》。

② 平野义太郎：《反战运动的参加者》，第149—150页。

③ 作者在此谨向A·巴里诺娃致谢，感谢她提供潘佩珠：《自我批评》一书的译稿，本文即引自该译稿。

④ 引自潘佩珠：《自我批评》一书译稿。

⑤ 关于《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开会的时间，记载不一，据《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记载，为12月2日。——译者

怀着深切的同情，向与会人员叙述了德兰士瓦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以及菲律宾人民坚决抗击美帝国主义者的事迹。他猛烈地抨击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不正义与极不完美的国家制度，并且断言：“……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①而且，他相信，只要中国人自己齐心协力推翻满清王朝，那么，“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②

1908年，孙中山在新加坡时，曾在当地华侨创办的《南洋中兴日报》上发表《论惧革命召（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论证中国人民反对满清政府的斗争，可以防止中国继续为列强所瓜分。他写道：中国革命党人无意于驱逐洋人，他们一心想使国家沿着进步和文明的道路发展，这样一来，列强就不敢来瓜分了。^③

虽然孙中山深切同情亚非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痛恨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侵略政策，但是，他却并没有认识到，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整个殖民制度，也要反对暗中支持中国反动清政府的帝国主义列强。

无论是当时，或者是尔后，我们都没有看到孙中山公开发表过任何反帝的文章。湖北省反满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杨玉如，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被迫避难于日本和毗邻中国的英、法、荷属远东殖民地，因而他们不能恶化与允许他们避难的国家或殖民当局的关系。杨玉如介绍了1911年春他和“同盟会”执行部干事刘仲文的一次谈话，他直截了当地问刘仲文，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刘仲文答道：“同盟会”东京本部领导人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同盟会”的对外政策务必审慎持重，因为满清政府早就和帝国主义列强秘密勾结，而且，列强假清廷

①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77页（中文版）。

②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75页（中文版）。

③ 《总理全集》（上海1930年版）第2卷，第104—106页。

之手推行其压迫中国人民的政策。刘仲文说：“所以，我们姑且含垢忍辱，这个——打倒帝国主义——工作为时尚早，只有等待第二步去办了。”^①

杨玉如对“同盟会”在筹划辛亥革命期间没有提出反帝口号的原因所作的说明，未必全然可信。我们认为，孙中山的对外方针和“同盟会”的指导思想，确实为以下因素所左右：深刻的社会与经济根源，首先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同盟会”的阶级成分，以及“同盟会”和那些害怕中国人民采取大规模反帝行动的华侨资产阶级的联系。

满清朝廷对国内声势浩大的反政府行动深感恐惧，乃于1907年1月照会日本政府，请求他们对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本部”采取措施。

自从清廷同意俄日朴茨茅斯和约的一切条款，并于1905年12月22日签订了中日条约和补充协定（日本因此获得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和优惠）以后，日本当局开始改变对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在日本本土的活动的态度。^②由于清政府俯首贴耳的投降行径，日本统治集团便不再支持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

日本当局在接到清廷的照会以后，以孙中山在某次演说中曾攻击“日本的友邦满清政府”为口实，把孙驱逐出境。事隔不久，日本当局又把日本参谋本部的一名军官“塞进”“同盟会”东京分会中去。从此，“同盟会”东京分会便为日本人所控制，它拒不执行孙中山的指示，例如，不执行把收藏在东京“同盟会”仓库里的武器转移到印度支那的命令。1907年7月，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报》。^③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1957年版），第39页。

^② 马克漠（John V. A. MacMurray）编《与中国缔结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894—1919）》（纽约1921年版）第1卷，第549—553页。

^③ 据《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6页记载，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报》的日期为1908年10月。《民报》自创刊至此，共出二十四号。——译者

孙中山和“同盟会”的许多领导人乃移居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早在1903年即开始打孙中山的主意，希望通过向中国革命党人“送秋波”，迫使满清当局作出新的让步。^①1903年，他们邀请孙中山赴河内参观工业博览会；1906年，法国总参谋部派出一批法国武官到远东，援助“同盟会”推翻满清朝廷；法国驻印支总督韬美、法国殖民大臣，以及法国其他许多权威人士，也都表示要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后来回忆道：“一日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②

然而，不久，法国政府进行了改组，新内阁不赞成前政府的做法，下令从中国召回法国武官，开始实行支持中国满清政府的政策。

1907年7月广西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曾专门从越南派出人马前去增援），法国当局要孙中山离开印度支那。自1907年年底起，法国当局完全拒绝援助中国革命党人，并且开始对他们实行镇压和积极帮助满清军队破坏革命党组织。

列宁密切注视着中国反满运动的发展，他于1908年8月写道：“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表现得非常强烈。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计，因为关于这个

^① 谢诺 (J. Chesneaux):《孙中山》(巴黎1959年版),第104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176页(中文版)。

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骚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某些参加殖民掠夺的人这一回已经感到惶惶不安，这可以从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举动中看出来：他们竟帮助中国的‘历史政权’镇压革命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属地担心。”^①

在武昌起义前的近两年中，孙中山联络了欧美各大城市的华侨，向同胞们宣传了反满思想，为革命募集了经费，购买了武器、弹药，并将这些东西秘密地运回国内。他不失时机地争取各国舆论支持中国革命党人。1910年5月底，“同盟会”通告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团团长，将准备起义推翻清朝，呼吁各国保持中立。俄国公使于1910年5月20日收到来函，内称：“满清王朝自建立以来已有二百余年，对黎民百姓实行压迫政策……我们没有其他出路，只有起来反对满清王朝，现在，我们选定了起事的日子，我们誓要推翻满清王朝……我们担心，在斗争激烈之时，难以分清友与敌。倘若贵国臣民不阻挠我们的军事行动，我们必将保护他们的利益；倘若他们盲目听信满清王朝的花言巧语，并自愿站在它一边，那我们会本着对邻邦的友谊不予计较，不归罪于他们，因为我们人数众多。务请阁下将我们的通知告谕贵国臣民。”^②

各国对上述通告没有作出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反应。“同盟会”成立初期，孙中山得到了某些国家的帮助，可是到了1909年，中国革命党人不仅得不到它们的支持，反而遭到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度、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殖民当局的迫害。清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就监视孙中山及其战友的活动事宜达成了协议。据俄国驻香港领事报告，当地的秘密警察日夜监视着孙中山追随者的

① 《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59页。

② 《舍金给萨宗诺夫的信（1910年5月24日于北京）》。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卷宗，目录852（第2卷），第77—78页。

活动。这份报告说：“早在1902年1月20日，香港总督就下达了‘驱逐令’，指控孙中山犯有危害殖民地治安罪，限他七天之内离开香港，五年内不得入境。期满后，香港当局于1908年又将期限延长了五年，结果，孙中山至今仍不得在香港居留……”

“今年5月30日，两广总督袁树勋询问香港当局，孙中山到达香港的传闻是否属实，同时，他提供了许多现住香港、与孙中山有来往的人的名单，以利港英当局侦查。”^①在沙俄驻香港领事1911年5月29日的报告中，引用了有关满清政府与英国当局进一步勾结以对付中国革命党人的资料。^②

外国报刊偶而披露有关孙中山的活动的消息。比如1911年3月25日英文报《中国论坛》（在中国出版）刊登了日本某报记者关于他与孙中山在温哥华晤谈的新闻报道，在这次晤谈中，孙中山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中国形势的看法，高度评价了革命力量对清政府采取重大行动而作的准备，并且表示，他完全相信起义必然成功。他对记者说：“吾人唯一耽心者，乃列强之干涉也。”关于列强对他的态度问题，孙中山的回答是：英、美、法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物质上的援助或保护，它们只给予他以个人行动的自由。他对于日本政府对待中国革命党人的态度深表不满。不过，孙中山打算取得日本舆论界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同情，并期望日本人能在经济上与中国密切合作。他强烈谴责移居加拿大的英国人与法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歧视，强烈谴责加拿大政府歧视亚洲各国侨民的政策，并且号召亚洲各国人民实行自治。他积极支持日本某些政治家提出的召开亚洲各国会议，以建立亚洲各国同盟的计划，并且呼吁日本率领亚洲各国反对英、美、法、德和沙俄，强调要“唤醒亚

① 《俄国驻香港领事1910年6月19日呈帝俄驻北京使团报告》，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卷宗，目录408，第154—156页。报告提到两广总督袁树勋的活动（总督府设在广州）。

② 《俄国驻香港领事1911年5月29日呈俄国驻北京使团报告》，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卷宗，目录409，第87—89页。

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孙中山说：“唯有中国发生革命，印度亦从沉睡中觉醒，亚洲各国方能联合起来，实行亚洲门罗主义。”^①

在这次晤谈中，孙中山企图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它们破坏即将爆发的中国革命的阴谋不能得逞。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了反对清朝的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满清政体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1911年夏秋之间，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政府已无招架之功，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加剧——凡此种种，决定了各国在武昌起义初期采取观望的策略。它们一方面使军队作好战斗准备，另一方面密切注视革命事态的发展，暂且不向满清政府积极提供武器装备，当然，不用说，它们是同情这个政府的。不能不承认，孙中山和“同盟会”在革命准备期间以及在革命进程中的全部对外措施，对各国的举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武昌起义一开始，湖广总督瑞澂立即向英国驻汉口领事求援。因为根据《辛丑最后议定书》的规定，各国不得单独对华采取行动，故此，使用武装力量镇压起义者的问题，便提到汉口领事团会议上进行讨论。英国总领事主张武装干涉，但是，俄国与法国的总领事反对插手事变。10月18日，他们接到北京外交使团的有关指示后，即宣布中立。^②

其实，洋人早就千方百计地援助清政府了。比如京汉铁路的法国工程师下令把所有列车偷偷地调到北边，以免落入革命党人手中，成为他们用以进攻汉口和汉阳的工具。^③同时，洋人的增援

① 《中国革命领袖会见记》，载《中国论坛》（1911年3月25日），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卷，目录171，第120页。

② E·别洛夫（E. A. Белов）：《1911—1913年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载《苏联东方学》杂志1957年第2期第66页。

③ 《驻北京公使呈外交大臣涅拉托夫的报告》（1911年10月5日〔俄历18日〕于北京），载《红档》杂志1926年第5卷（总第18卷）第62页。

队伍也陆续开往汉口。帝国主义列强驻中国其他各城市的代表亦相机行事。

据沙俄驻香港领事报告，辛亥革命前夕，美、英、法、德、日等国的八艘军舰集结在广州江面上待命。^①俄国驻上海总领事报告，驻上海的外国兵力总数为四千三百九十五人，英、美、德、法、日、奥、荷等国的总领事，各自掌握一至三艘军舰。^②1911年10月底，中国水域内的外国军舰达五十一艘，舰上人员计一万九千人。^③

沙俄外交官在秘密报告中提到，中国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格外客气，不过问租界的管理事务，洋人在起义者占领的城市里可自由来往，通行无阻。^④

武昌革命军都督黎元洪正式要求外国领事保持中立。他向驻沪领事团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⑤武昌起义后不久，各国驻京代表即收到从旧金山寄来的三份革命党人宣言文本^⑥。在每一份宣言中，革命军都督要求各国代表严守中立，并在新的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敦促各国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第二份宣言中^⑦，阐明了中国革命党人在其活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

一、革命政府将承认条约中确定下来的外债数额、应付的利息以及预定的用途；

二、革命政府不承认清政府违反上述条款规定的、非国家急

① 《俄国驻香港领事呈俄国驻北京使团的报告（1911年10月12日）》，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卷宗，目录409，第142页。

② 《驻上海总领事报告（1911年12月1日）》，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卷宗，目录355，第111页。

③ 《新生活》1911年11月2日（俄历15日）。

④ 《驻北京公使1911年10月5日（俄历18日）密电》，见《红档》杂志1928年第5卷（总第18卷）第63页；《1911年10月5日（俄历18日）发自北京的急电》，同上，第62页。

⑤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中国卷宗，目录355，第112页。

⑥ 上述宣言译本保存于俄国外交使团档案馆（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属东方学家档案馆，全宗42，目录1，卷宗33）。

⑦ 宣言署名“孙文”。

需的外债；

三、革命政府考虑到外国贷方的利益，要求各国代表预先通知曾向清政府贷款的资本家，及时取得革命政府对他们贷款事项的许可证；

四、革命政府要求各国代表告谕各该国领事、传教士及其他国民：革命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违令者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

五、革命政府向各国代表重申：它将万分感谢予以帮助的一切国家，俟新政权建立，将力求与其建立友好邦交；

六、待联邦共和政体建立，中央政府将与各国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和建立友好邦交，消除一切误解与冲突事端。

在这个宣言中提到，对真正援助民国的国家，将给予种种优惠与荣誉。

第三个宣言是针对地方当局写的，要求它们竭尽全力支援革命党人。

武昌起义消息传出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起义成功，国内正急需他回去领导“同盟会”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孙中山另有考虑。他深信，革命将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发展，因而，他认定，首先必须提防外国干涉。根据《辛丑最后议定书》规定，在任何事关中国的情况下，各国都应采取联合行动，因而，孙中山不必耽心某个国家会单独采取行动。他认为，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将首先取决于英国的立场。因此，与其回国并立即就任临时大总统，不如尽快赶到英国去，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董事会就停止对满清政府的一切借款事宜进行谈判。早在武昌起义以前，银行团就与清廷签订了两项为数一亿元的借款协议（分别用以修建川汉铁路和整顿币制）。第一项借款债券已经发行，按照债券收集的款子应交给满清政府。孙中山到达伦敦后，要求停止支付这笔款子，并停止发行第二项借款债券。

银行团董事会让孙中山直接和英国外交部交涉，它说，此事

不能由它作主。孙中山会见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代表中国革命党人提出了以下三点要求：一、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二、阻止日本援助清政府；三、撤销不准孙中山进入英属远东领地的各种禁令。

得到英国政府对上述要求的肯定答复以后，孙中山再次找银行团，提出借款给革命党人的问题。然而，银行团董事长拒绝了这一个要求，据孙中山说，董事长宣称：“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①

向英国借款未成，孙中山乃动身往比利时，然后去法国，企图说服两国政界与银行界人士在物质上援助年轻的中华民国。孙中山在《自传》中写道：在巴黎，他受到新任总理克里孟梭和各社会团体代表的热情接待，他们答应在道义上声援中国革命党人。^②可是，他向法国和比利时借款之事均落空了。

孙中山十分清楚，他面临的任务十分复杂，他对帝国主义列强长期以来和清政府紧密勾结在一起有足够的认识。孙中山在伦敦的一位亲密战友1911年12月8日和《新世纪》杂志驻伦敦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革命党人十分清楚，满清政府得到“欧洲外交人士的支持，而后者的一举一动却不能违背欧洲商人和银行家在中国的利益。这些商人和银行家希望维持现有的于己有利的租让制，他们担心实行新制度后，中国人将自行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③

外国报刊广泛报道了孙中山企图争取外国银行给予财政援助的消息。如《哈尔滨消息报》^④1911年10月29日报道：“远东报界

①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184—185页（中文版）。

②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185页（中文版）。

③ 《新世纪》[1911年11月30日（俄历12月13日）]，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卷，目录171，第9页。

④ 原文《Харб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译者

正在分析……谁在向中国革命党人提供如此急需的资金。日本报刊首先注意的是美国。”^①柏林《每日报》10月14日刊登了孙中山给英国金融界代表的信。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企图在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来亚等地为中国革命党人筹措经费。为了在伦敦得到约五百万卢布的借款，他请中国的一家银行，还有曼谷三大碾米厂的老板、新加坡的几个商人，以及马来西亚的三个矿山经理作担保。

孙中山致函英国银行家时承诺：“共和国承认清政府给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让权，将严惩一切侵犯欧洲人的生命与财产者。中国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一切外债照旧偿还。”^②

1911年11月21日在北京发行的法文版和英文版《北京政闻报》上，刊登了《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关于孙中山与几位英、美银行家的通信报道。该报发表了孙中山的两封信和其中一封信的附件——中国革命党人告各友邦书。^③

外国报刊指出，中国的反满革命运动博得了华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上海，受到上海民众的热烈欢迎。^④他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⑤他相信，中华民国不久即为列邦所公认。^⑥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正式宣告

①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卷，目录171，第5页。

② 《俄罗斯报》(1911年10月5日〔俄历18日〕)，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卷，目录171，第121页。

③ 《北京政闻报》(1911年11月21日)，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卷，目录171，第127—128页。

④ 撰写孙中山传记的美国作者沙曼(L. Sharman)认为，孙中山抵上海的时间是12月24日(沙曼：《孙中山的生平及其意义》〔纽约1934年版〕，第132页)。

⑤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185页(中文版)。

⑥ 《中华日报》(1911年12月27日)，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卷，目录171，第131页。

成立，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隆重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在就职宣暂时保证：“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①

在发表誓词的同时，还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提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内政与外交方针。内政方针是：实现全国领土之统一，民族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在外交方面，孙中山对各国恪守中立表示感谢。《宣言》说：“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②

当时，孙中山的南京革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就彻底废除满清帝制问题与袁世凯取得协议。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力争各国承认共和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目前为英国人控制的海关税收。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正式发布《告各友邦书》，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并且向它们说明了中华民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告各友邦书》说：清政府曾蓄意阻挠中国与各国交往，制造事端，在对外贸易等方面设置重重障碍。至于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它“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它将奉行下述方针：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

^① 《辛亥革命》第8卷，第8页（中文版）。

^②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83页。《宣言》英译文全文载1912年1月9日上海《华侨时报》，《宣言》摘要载1912年1月4日《字林西报》。

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

四、凡各国之人民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五、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中国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①

在《告各友邦书》结尾，孙中山希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

可见，《告各友邦书》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殖民政策没有提出任何批评，而把洋人对中国人的奴役仅仅归咎于满人；总而言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千方百计防止列强支持清廷和争取它们承认民国。

然而，孙中山这个要求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各国驻北京代表继续注视中国事态的发展和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谈判。各国照旧通过它们所控制的海关和按照原先签订的种种借款契约资助清政府（实际上是资助袁世凯）。

英国驻华报界对《告各友邦书》的反应极其冷淡。《北京每日新闻》发表文章，题为《共和政府发表宣言。谋求各国的承认。宣言未达目的》，对南京政府为争取各国的承认所作的努力提出了异议。文章说：“宣言的影响不大，因为人们认为，共和政府尚须用事实证明，它是否有资格取得国际法惯例范围内的认可。”^②

① 《告各友邦书》曾分送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和报刊编辑部。其英译文载1912年1月6日《字林西报》（见濮兰德〔J. O. P. Bland〕：《中国最近的事变与目前的政策》〔费城、伦敦1912年版〕，第55—56页）。

② 《北京每日新闻》（1912年1月11日），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使团卷，目录171，第137页。

各国代表目睹满清帝制行将垮台，便无保留地支持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在这之前，美国就首先提议任命袁世凯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英、法、德对此予以大力支持，它们劝清廷把政权交给“实力人物”。^①1911年12月初，袁世凯得到四国银行团白银三百一十万两的借款。早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各国就无所顾忌地插手南北议和，并于1911年12月20日照会双方代表，要他们尽快停战。^②

帝国主义列强担心“叛乱有可能持续下去，或者可能具有排外性质”，从而严重威胁它们在华的经济与政治的利益。^③可是，列强各行其是，因为日本和沙俄没有加入四国银行团，它们对美、英、法、德等国的活动格外注意，耽心这些国家会从袁世凯那里获得新的特权，从而排斥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和蒙古的权益。在南北交战期间，日本和德国公然违背各国宣布的“中立”原则，向袁世凯军队提供武器和派遣教官。^④

帝国主义列强因反帝运动有可能象义和团起义一样席卷全国而产生的恐惧心理，与它们想乘中国内部困难重重之机，大肆掠夺中国财富的企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最终决定了它们的立场。“泰晤士河与易北河一带，以及其他地区的欧洲兵工厂代理商、造船厂经理和军事工程师”这伙冒险家，一获悉中国爆发革命，便又蜂涌而至：有的前往清王朝京城北京，有的逐扑民国首府南京。“急忙从欧洲回国的外商，惶恐不安地直奔上海；然而，有的人却指望来个‘第二次义和团起义’，好大发横财，为此，他

① E·别洛夫：《1911—1913年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第67—70页。

② E·别洛夫：《1911—1913年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第71—72页。

③ 《驻北京公使1911年10月31日密电》，载《红档》杂志1926年第5卷（总第18卷），第68页。

④ 《远东国际关系》（莫斯科1956年版），第240—243页。

们匆匆云集北京，唯恐错过抢夺各种珍品的大好时机。”^①

苏联政府1926年公布的沙俄外交官的秘密通信，揭穿了帝国主义列强于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耍弄的种种阴谋诡计。它们就是靠这些手段在满清帝制垮台以后扶植袁世凯上台的。

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1912年1月23日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说：“与中国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国驻北京代表认为，承认袁世凯政府是可以的，但条件是：必须保证各国在华的权益。预计袁世凯将不得不对上述要求作一定的让步，因为他的政府不可能指望全体中国人民毫无保留的支持，它首先需要的是钱，即需要靠外国的借款来镇压内部叛乱，因此，它的地位能否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列强对它的态度。”^②

至1912年春，各国对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以及对他们所提出的中国主权不容帝国主义侵犯的要求，越来越持敌视态度。沙俄驻北京代办在急电中写道：“孙中山的追随者为了寻求外国人的同情，曾经十分明确地宣布，他们打算实行门户开放，可是，现在又说什么：‘当然，这里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废除治外法权’。”^③在另一份急电中，这位代办谈到各国代表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敌意有增无减，他说：“那些对中国革命表示欢迎的幼稚的人们曾经以为，共和派对洋人甚为好感，现在方知他们这种认识大错特错了。”^④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短暂期间，曾经再三地向各国的官方代表和工商界代表求援，但都徒劳无功。南京政府财源枯

① 麦考密克 (McCormick, F.): 《中国革命》(彼得格勒1914年版), 第6页。(按:俄文原文恐系有误,英文原著系《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纽约1913年版。——译者)

② 《外交大臣萨宗诺夫1912年1月10日(俄历23日)奏折》, 见《红档》杂志1926年第5卷(总第18卷), 第88—89页。

③ 《驻北京代办1912年3月15日(俄历28日)急电》, 见《红档》杂志1926年第5卷总(第18卷), 第101页。

④ 《驻北京公使1912年4月28日(俄历5月11日)急电》, 见《红档》杂志1926年第5卷(总第18卷), 第103页。

竭，可是，革命党人却自我安慰说：一旦列强承认民国，外国银行就会向民国提供经费。

美国记者麦考密克曾经于1912年初会晤孙中山，他在其著作中对年轻的共和国当时极其困难的处境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孙中山总统……和我谈到承认民国的必要性问题……总统说：我们的存在没有得到国际的公认。我们有三亿六千万人口，十六个省份（直到缅甸边界）。我们有自己的政府，但是，我们的存在没有得到国际的公认。此种状况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人民不答应，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列强不承认我们，他们不理解外国的政策。您要知道，民众充满着排外情绪。这种情绪可能爆发，我们将无法阻止它，因为我们无法回答中国人民的提问，他们不会就此罢休。其实，各国……都表示对我们友好，但我们更需要正式的承认。你们应当承认我们！”^①

英国记者濮兰德写道：由于四国银行团一开始就支持袁世凯，孙中山乃于1912年2月企图通过三菱公司向日本借款二百万两，其交换条件是向日方提供长江通航权和近海航行权。^②英、美、法、德唯恐日、俄采取单独行动，乃正式邀请它们加入银行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国政府首脑的要求置若罔闻，毫无表示。

正在奋不顾身地与俄国帝国主义的支柱——沙皇专制政府进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对中国人民反对满清专制制度的革命行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报刊经常报道中国革命运动的消息。比如《星报》1911年2月刊出一张由孙中山署名的“同盟会”传单，传单猛烈抨击满清专制制度。^③武

① 麦考密克：《中国革命》，第103—104页。（按：俄文原文恐系有误，英文原著系《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纽约1913年版。——译者）

② 上引濮兰德：《中国最近的事变与目前的政策》，第367—368页。

③ 《星报》1911年1月22日（俄历2月4日）（引自A·赫菲茨：《二十世纪初期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第99—100页，

昌起义后不久，《星报》开辟了“中国革命”专栏。1911年11月初，该报发表了B·邦奇-勃鲁耶维奇欢庆辛亥革命的文章，标题是《觉醒了的巨龙》。^①为布尔什维克报刊撰文的许多诗人，纷纷写诗颂扬辛亥革命。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我庆贺你，觉醒了的中华！
我支持你“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呼声！
无权的国家啊！你向人民发出的号召
现在响彻了海角天涯……^②

《工人日报》号召俄国无产阶级支持东方各国人民。该报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处在西方与东方日益发展的革命风暴的中心……为了直接支持亚洲民主派的革命斗争，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提出自己的口号：革命的波斯万岁！革命的中国万岁！革命的印度万岁！”^③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作出了专门决议，支持中国革命和反对沙皇政府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帝国主义政策（它们企图乘中国内战之机，进一步掠夺中国的领土）。列宁在为代表会议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中说：“鉴于政府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论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并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的行为。”^④

① 《星报》1911年10月23日（俄历11月5日）。

② 《星报》1912年2月5日（俄历18日）。

③ 《工人日报》1911年12月22日（俄历1912年1月4日）。

④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1912年1月5日—17日（俄历18—30日））》，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中国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7页。

布尔什维克提醒中国革命党人，不应当过高估计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即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但是，从本世纪头十年的深刻体验中，我们知道：要能战胜行将衰亡的政治制度的垂死挣扎，并为新制度扫清道路，人民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无疑地，中国人民也正面临着这个为巩固新制度而斗争的任务。”^①

孙中山在担任共和政府领导人期间，曾和他的亲密战友一起渴望援助亚洲邻邦的民族解放斗争。2月15日即清帝下诏退位的第三天，孙中山拜谒明太祖朱元璋陵，并致祭文。他说：中国革命开创了东亚各国革命的先例，建立了共和政体，就此而言，它应为其他国家所效法。^②在这期间，中国革命党人和越南革命志士的交往更加密切了。1911年12月，越南和泰国的一些革命志士来到广东，潘佩珠就在其中。^③潘氏在其《自我批评》一书中写道：“1912年2月底，我到南京，曾拜见孙中山，并出席中国同盟会会员大会……我到达南京之际，政局非常复杂。孙中山忙不暇接，但仍抽空接见了。”^④

潘佩珠还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会晤了黄兴、陈其美和胡汉民，商谈援越事宜，他们向潘氏提供了武器、弹药和经费，并同意接受越南革命志士进入华南中国学堂和军营学习。可是，由于孙中山政府处境艰难，援越规模毕竟有限。1912年夏，在广东成立了一个以潘佩珠为首的中越革命组织，他们认为，振兴中华乃亚洲繁荣昌盛必由之路。该组织在《宣言》中提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如印度、缅甸、朝鲜）相互支持的问题。^⑤

① 《星报》1912年2月2日（俄历15日）。

② 《泰晤士报》1912年4月3日。

③ П·丘扎江：《亚洲觉醒时期越中两国的革命联系》，第98页。

④ 潘佩珠：《自我批评》（手稿），第151页。

⑤ П·丘扎江：《亚洲觉醒时期越中两国的革命联系》，第100页。

孙中山的外交活动阻碍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殖民地瓜分，从而加速了满清帝制的灭亡。然而，孙中山在其政纲中没有明确提出足以唤起广大民众坚决反对外国奴役者的反帝主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因而，中国也未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

译自《中国辛亥革命》（论文集）（莫斯科1962年版），第236—271页。

丁如筠译 邹宁校

辛亥革命前夜的 中国资产阶级

白吉尔

译者按：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吉尔(M. —C. BERGERE)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多年，著述甚丰，《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是其主要论著之一。该书主要是从中国资产阶级入手，探讨它的形成、发展及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和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进而从不同角度论述辛亥革命的性质。本文是该书的前半部，后半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已先期译载本刊第二辑。为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观点，特将原书引言全文译出，补附于后。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什么？它在经济方面都有哪些活动？作为一个阶级，它的存在都有哪些表现？与其它阶级的关系如何？它是怎样生存的？它的政治观点如何？

如欲回答上述问题，无疑首先必须弄清楚资产阶级这个名词的涵义。这个名词在本文中指的是商业资产阶级、近代或半近代的企业家团体、商人、金融家和实业家，即就其最狭义和专有名词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其既包括商业团体，又包括知识分子、地主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中产阶级”这一普遍意义而言的。

我们之所以要从狭义上来理解和使用这个名词，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某些特点，即：严格地讲，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以法律为基础而又秩序井然的社会（尽管存在一个世袭的

满族贵族阶层);更不是一个建立在经济作用有明显区分的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是士绅阶层,其权力基础便是占有土地、登科及第和出仕官职。这些因素往往是互为因果,错综复杂的。因此,只有在弄清行业标准(尽管这个行业标准还很不完善)的前提下,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资产阶级这个名词的涵义。就其狭义来使用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商人和企业家常被视为最活跃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除此之外,采用这个定义,还有一些更专门的文献作依据:双重资料来源——中国和西方,为我们探讨商业资产阶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仅用一个词来概括1911年以前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那么,“软弱”这个词是最合适不过了。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是与中国经济的落后紧密相连的。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有关“资本主义萌芽”^①方面一直存在的争议,即便说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某种雏形,而实际上,商业资产阶级则仅仅是在二十世纪初,随着经济界的局部转化才开始逐渐形成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济界的各种转化

有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开放”所导致的经济后果,许多

^① 费维恺(A. Feuerwerker)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篇幅较短的探讨性文章,后面有中文书目),载《中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哈佛1961年版),第181—189页。

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中国大陆近期史学论著》,载《亚洲研究杂志》(1958年11月)。

有关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存在问题,见戴曼(L. Dermigny):《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广州贸易(1719—1833)》(巴黎1964年版)。该书作者认为,广州的哈尼商人虽然很富有,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资本家。因为当时既不存在真正的资本积累,也没有什么信贷。[见卡蒂埃(M. Cartier)对这本书的评介,载《通报》第52卷第4—5期。]

史学家已经做过种种阐述。^① 为建立近代工业,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遇到过重重困难,同时也遭到了种种失败。对于这些问题,史学家们均已做过强调说明。有关这方面演变的研究也是相当深入的,所以,于此无须赘述。但是,着重谈谈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的某些特点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回顾经济上的主要变化

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中国人对西方入侵的反应是想通过不同程度上的真诚、精明和有效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的话,那么,导致中国开放的列强的主要目的则是发展商业贸易。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十九世纪末叶,由于进口纺织品、煤油和食糖等产品以及出口茶叶、蚕丝等(大部分是农业原料),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得以不断增长。^② 但是,这种营业额的增长很不稳定:进口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高于出口产品的价格,所以,中国不得不动用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当时西方人认为,中国市场的利益并不在于提供原料,而在于能否为工业产品提供销路。这与当时其它殖民地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如在埃及或交趾支那,这类新的贸易活动对国家经济命脉的影响,在推销外国产品方面要比在收购地方农业原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

各种贸易活动最初是在一些主要通商口岸开始的,尤其是在天津、广州和上海,这些口岸成了外国和中国“内地”之间的中继站。然而,在控制商品流通方面,中外商人极不平等:西方国

^① 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办企业》(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8年版)。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工业史研究》(东京1961年版)。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金融业》(北京1927年版)。

铃木智夫:《清末民初民族资本在中国的展开过程》,载《中国近代化的结构》(东京1960年版),第45页以下。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1955年版)。

^② 赵祖邦:《中国对外贸易研究(1864—1932)》(里昂1935年版)。

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华盛顿1948年版)。

雷麦(C. F. Remer):《中国的对外贸易》(上海1926年版)。

家和日本在各通商口岸均设有商行和银行，中国与外国（购买方和供货方）之间的资本和商品流通完全控制在这些商行和银行的手中。（中国人寄希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目的是想直接与外国人进行接触。）由于语言不通、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以及国际条约对迁移的限制，所以，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往往要受到一定的约束，结果内地和通商口岸之间的商业活动（收购也好，推销也好）只好由中国商人去进行。但是，要想办好商务，中国商人仍然离不开外国银行提供的资金。外国银行主要是通过中国的钱庄来提供资金。也就是说，外国银行为这些钱庄提供期限极短的贷款，上海公共租界通常称之为chop-loans（即拆票）。但是，这种拆票很特殊，没有任何实物担保。1910年，上海钱庄以这种形式达成的借贷总额为一千万两。此外，外国银行还经常以当即立付商品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接受钱庄发放的期票，也就是即期见票即付的庄票。可见，在没有中央银行或没有具备相当数额基金的近代中国银行的情况下，这些为中国经纪人和批发商的商务活动提供资金的钱庄本身，实际上也是受外国银行资助的。^①

在各省，乃至各地区和各地方经济处于隔绝状态、币制混乱的中国，根本无全国市场可言。然而，在原有基础上，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和金融结构，这与近年来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虽然这些结构很脆弱、不完善，甚至可以说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1910年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则完全可以证明它们的存在。导致这次危机，并不是因为农业受灾，而是因为中国人在橡皮行市上做了投机买卖。这次危机导致全国各地的大多数钱庄、商人和企业主在几个星期之内宣告破产。^②

① 参阅拙著《清末上海的一次金融危机》（巴黎1964年版）。

② 同上。

然而，我们不应该在这方面过分强调，还应看到方兴未艾的全国市场。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由对外贸易关系，即外国的需求决定的。这种市场不受任何真正的海关法保护，所以，它一开始就是作为国际市场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出现的。中国经济的统一是与中国的割让同时开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经济的统一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副产品而已。

其实，中国的近代工业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中才开始得到发展的，因此，它在新的贸易活动中只能起辅助作用。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开始有权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办工厂（主要是纱厂），其产品可与中国内地进行交换。由于当地劳动力和原料价格低廉，企业家便力图在当地组织生产（而不再从西方或日本进口），增加利润。从此，资本输入便接替或取代了商品的输入。在这方面，中国人也很想进行一番尝试，但是，由于形势发展不利：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人和外国人在经营商品流通方面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已被一种直接的竞争所代替，所以，因不受海关的真正保护而身处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家在这方面根本无力与外国人竞争，因而成功希望无几。假如以工业发展的主要部分之一——纺织工业为例，那么，在二十世纪初，一位名叫张謇的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就，则纯属事物发展中的一个例外了。^①

这些近代经济形式之所以能得到发展，关键在于设立了一系列必不可少的结构（其中大部分是靠外国人扶持的），尤其是有了发达的运输工具（轮船、火车）和通讯设施（电报），以及在拆除旧城墙的同时，筹建新的商业区和大力发展诸如天津那样的都市。^②

① 参阅严中平，前引书，第126—127页；朱昌峻：《张謇——中国的实业先驱》。

② 《海关贸易报告册》（以下简称《关册》）1904年，中卷，天津报告，第53页。《关册》，1907年，中卷，天津报告，第56—57页。《字林周报》，1906年8月17日，第417页。

二、上述变化的重要意义

这些变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显而易见，它给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从中国经济的传统形式来看，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农业活动，因为绝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仍然过着闭关自守的经济生活。某些原料（如蚕丝、棉花和茶叶）的出售，以及生产品的推销，在国内并不占主要地位，而且仅限于某些大城镇周围和交通发达地区附近。各通商口岸对内地的影响还很有限。根据费维恺的看法，^①以长江流域为例，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几乎没有超出湖南省。即便是在那些新的贸易活动得到相应发展的地区，这些贸易活动也无法显著地改变当地的生产方式和速度。虽然在某些部门确实出现过不景气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并不普遍；相反地，工业用棉线的推销，以及由于各种外国商品输入所造成的消费市场扩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否则，在数年之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传统手工业（纺织品、食糖、印染）得以迅速发展以及它的生产远远地超出近代工业的生产，并且能够填补由于西方人撤离中国而使市场上出现的空白，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关于商业贸易，施坚雅（W. Skinner）曾经指出：除交通发达的主要城镇及其远近郊区外，贸易结构在二十世纪初期并未发生变化。毫无疑问，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的贸易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了。但是，国内的贸易活动并未摆脱其传统的方式（由于交通极不便利，运输十分困难，所以，贸易仍然是集市贸易）。对外活动，即新的需要，只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传统形式的贸易活动增多。这便是施坚雅所说的“假近代化”。^②

^① 1965年8月，费维恺教授在温特沃斯海滨(美国)举行的辛亥革命讨论会上，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②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1964年11月—1965年2月）。

辛亥年间，中国的真正的经济近代化是很薄弱的，并且主要（或者说仅仅）体现在各通商口岸。此外，这种近代化所涉及的范围也很窄，仅限于个别方面，如进出口贸易和纺织工业。尽管这种近代化在经济实践中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它给社会和政治上带来的后果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自五口通商发展起来，并以对外贸易为趋向的商业活动，就不难肯定这些商业活动实际上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从上海开始，这些活动非但没有局限于湖南省内，而且还一直发展到了四川省。因为贸易活动渐渐远离通商口岸，断断续续地向内地发展，所以，它的规模只能越来越小，从而，对经济的影响也就不会太大。但是，我们认为，这些贸易活动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虽然它与欧洲中世纪的庞大贸易活动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常有人做这样的比较），但是，它却使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产生了联系，即：一个是经济处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中国内地，一个是租界、通商口岸、近代商业、先进技术和西方世界。

虽然两个世界之间的资本和商品交易范围有限，但是，这种交易关系却使中国人很有可能受到启示和觉悟。如果对其中的某些人来说，初次往来未免凶多吉少的话，那么，更明显的事例则是四川绅商的经历：他们把银锭存入上海钱庄，结果由于1910年股票暴跌，^①其中部分人随之破产。

总之，对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经济近代化问题，不能仅就其表面进行研究，还应看到其实质。从这方面来看，外国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无疑是主要问题之一。诚然，中国人也曾参与了中国经济的变化过程，但是，他们的作用则是次要的，其原因是：

^① 四川铁路公司（是由当地绅商创办的）确实将一部分基金存入上海的钱庄。这项存款和其它存入钱庄的存款一样，也在1909年—1910年的橡皮股票投机活动中损失殆尽。许多大的钱庄倒闭之后，上海道台与外国银行订立借款合同，以便清偿债票。然而，得到清偿的只有外国债票。尽管四川铁路公司的中国股东们为此提出抗议，但仍然未能捞回基金。见《字林周报》，1910年8月19日，第438页。

从总的方面来看，他们的活动并没占主导地位。甚至在极有利的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反而影响了外国人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的目的往往是利用通商口岸中饱私囊。所以，投机便成了中国工商业者的天堂：利用蓬勃发展的郊区土地进行投机，利用上海交易所（因无严格的规章制度，致使不法行为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① 证券行市的涨落进行投机，利用各省之间货币汇率的变动进行投机，利用白银与黄金折价的波动（这种波动常使对外贸易业务变成一种赌博）进行投机。此外，他们还利用世界行市涨落进行投机，利用各铁路公司进行投机，以及利用铜币价值的波动进行投机活动。说好听些，中国企业家象是助手，说得难听点，他们就是寄生虫。无论如何，他们在经济生活中从未起过杠杆作用，但是，只要有大发横财的机会，有挤进先进世界的机会，则少不了他们这些人。二十世纪初，中国商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开始形成的。

资产阶级的形成

一、人员及其分布

由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只是一种局部现象，而且又是刚刚开始出现，所以，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必然微小。纵然所有写过有关论著的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几乎一致，但仅就现有资料来看，谁也提不出资产阶级的确切数字。然而，作为参考，倒是可以提出某些数据，尽管其出处不尽相同，且又是偶尔发现的。以奉天这座影响有限的南满首府为例，1909年加入中国地方商会的有二千六百五十七家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商行（据统计，其中饭馆和

^① 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主要经营期货交易，清算日为每三个月一次（而不是象在欧洲那样每月一次），用来发展交易业务所应缴付的保证金十分菲薄。1910年各交易所破产后，曾采取了某些制止投机活动的措施，但是收效不大。见《字林周报》，1911年5月6日，第329页。

客栈有二百六十家，银行仅有十二家)。①此后不久，甘博(S. D. Gamble)于1919年在北京做过一次调查。据统计，加入商会的企业共有四千六百三十家。他认为，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较大企业总数的六分之一。②我们虽然不掌握上海有关方面的统计总数字，但是，大家一定还记得，该口岸在革命时期约有二百二十家中国钱庄为企业提供资金，可见上海的有关方面数字要比奉天或北京大得多。③

此外，据其它文献资料记载，资产阶级的人员分布也很不均匀。近代商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内地较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都集中在各通商口岸。所谓“开放口岸”主要是个法律上的概念，甚至可以体现某一种法规，它完全可以包括一些边远的城镇，如四川省的成都。由于通商口岸为直接与外国人频繁接触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所以，各通商口岸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最主要的聚集点。天津、广州，尤其是上海，这些口岸的情况就是这样。长江三角洲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变化最为深刻的唯一地区，也是新生资产阶级能够得到迅速发展的唯一地区。

二、社会成分

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成分十分庞杂，其性质也很难确定。组成这个阶级的社会集团包括买办、商人、钱庄老板、实业家、运输企业家和海外批发商。因此，各社会集团的个体性质非常明显。

① 《关册》1909年，中卷，奉天报告，第185页。

② 甘博：《北京社会调查》（纽约1921年版），第212页以下。

③ 《上海钱庄史料》，第10页。据其中引用资料记载，1909年上海约有钱庄九十家。

刘大钧指出，1912年上海还有一百三十家过去称作山西票号的银行。（刘大钧，前引书，第41页以下。）

买办^①一词来自葡萄牙文，原指广州第一批外国商人雇佣的华人。这些华人把主子的商品拿到市场上换取所需产品，然后把换取的产品运到停泊在水面上的船上。随着这类交换活动的日益发展，这种人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他们充当外国批发商和中国公行（指经官方许可经商的商人）专利商人之间的中介人。不过，只是到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从而废除公行的特权，并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自由贸易之后，买办的作用才得到公认。因为外国人对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及至货币制度等一窍不通，所以，一切有关贸易的事务均委托他们的买办去处理。买办的职能因各雇佣公司业务活动的性质而异。为出口商奔走的买办，其任务是使经营茶叶或丝绸等产品的中国商贾保证供应货物……。相反，为进口商行活动的买办则负责在市场上推销棉纱、棉布或其它商品；其中能力较强的买办则被外国银行雇佣，他们必须为外国银行保证中国雇员（有时为数甚多）的忠实可靠，并负责与中国各钱庄进行日常的交易活动。除此之外，这类买办还须保障外国银行向当地信贷机构（即钱庄）提供的款项的清偿；选择哪些钱庄可以得到借贷，哪些钱庄不能或不可以得到借贷；认证银行存库中的中国硬币的价值。总之，这一类买办掌有主管业务的全部权力和相当大的自主权。十九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买办制度相当完善，以致当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也纷纷聘用买办……与西方雇主进行商谈。

买办被视为社会上的一种重要人物，除工资收入外，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还可以从经办成交的买卖中获取一笔佣金。由于买办

① 参阅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第89页。

参阅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东京1961年版），第150页以下。

K'wang Yung-Pao：《买办：他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载《经济杂志》（伦敦）1911年12月号。

根岸信：《买办制度研究》（东京1948年版），第34—74页。

肩负重任，管理巨额资金，因此，在就职之前，他们必须向雇佣公司交付保证金，如现金、地产证券、流通票据等。这类符合西方商界惯例的防范措施在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出数月，买办的诚实可靠之声誉就在雇佣公司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了。同时，买办也很清楚，擅自挪用资金一旦被发现，其后果对自己是极为不利的。^① 革命前夕，买办就已经不再如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时那样十分可怜了，更不再是某些史学家所称呼的奴才。^② 相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进入了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绅商阶层。他们之所以能发财致富，首先是他们为外国企业效尽犬马之劳的结果。其次，外国企业选雇买办，一开始就是有条件地从殷富商人中间进行物色，即：买办原有财产必须足以保证他们的诚实可靠，他们的言论在中国商界要有足够的信誉，交际广泛，以利于扩大在市场上与各界的接触。^③ 此外，买办在许多方面既象外国企业主的合伙，又象他们的雇员，如汉口麦加利银行的买办掌握订立合同的权力逾三十年。^④ 很显然，买办的利益是从属外国的经济利益的，但是，其隶属程度并不比中国其它企业家的利益更深。与外国人朝夕接触反倒使他们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使他们成了从事新经济和政治活动方面的内行和专家。从表面来看，这个买办集团的人数并不算多，但是，外人却很难挤入（买办的职位往往是世袭的），^⑤ 其影响也很大。日本史学家小岛淑男在对1911年上海总商会内部商贾的社会根源及其职业做过调查之

① 《字林周报》，1910年6月10日，第593页。

② 黄逸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主要支柱——买办阶级》，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55页。

③ 一位西方商人认为：“中国的买办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阶级，因为他们享有牢固的诚实信誉；他们肩负重要的交易任务，并且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他们为祖国也赢得了商务上极好的公正威望。”（《字林周报》，1910年6月10日，第593页。）

④ 《字林周报》，1905年1月20日，第140页。

⑤ 《字林周报》，1913年2月8日，第418页。汇丰银行买办的继承人之间曾发生一起诉讼案件。这家银行的买办职位被买办继承人看作是财产争执的一部分。

后指出：在他研究的十六个商人中，有七人出身买办。^①

多数商贾均参与了进出口贸易活动。由于他们居住在各通商口岸，收购和推销均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他们也控制了内地的商品流通。其中有些是名符其实的批发商，一手买进，转手卖出。但是，绝大部分人是买卖中间人和掮客，他们本人无需投放多大的资本，只是通过与内地商人直接取得联系，将存货通过内地商人转手而已。这部分商人的活动至少与买办的活动一样，同是外国企业的附属活动。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老板已经不全是山西的货币兑换商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来自华北的货币兑换商曾经向全国各省提供贸易资金，在公共资金的储存和管理方面拥有一定的垄断权，所以，他们的影响还可以不断扩大。可是，中国开放口岸与外国通商却给这些兑换商带来了严重后果：国际贸易取代了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商业活动所需投资形式也随之改变了。此外，日益贫困的满清政府几乎无银存放，而且新的收入来源（尤其是海关税收）也已断绝。山西省各银号的衰亡之日，正是新的信用机构——钱庄的兴起之时。这些钱庄的主要作用是，向中国人分配由设在中国的各外国银行提供的贷款。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仅上海一处，这类钱庄就有近百家，其中有独家经营的，也有由几个同仁（一般不超过十人）合办的。^②

占资产阶级内部人数最多的无疑是商人和钱庄老板。相反，实业家仅占其中人数的一小部分。当生产活动作为商业活动的一种扩展、一种垂直集中的形式出现时，实业家与商人往往就难以区分了。例如茶叶或蚕丝批发商拥有各种工厂，他们可以把未经加工的原料进行加工和包装。因为大工业在1911年才刚刚兴起，而且在最初阶段遇到了重重困难，发展速度必然缓慢，所以，开

①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当中上海独立时的绅商阶层》，载《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东京1960年版），第113页以下。

② 参阅《上海钱庄史料》，第94—95页。

始时不可能一下子就形成一个老板集团或工业企业主集团。政权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冶金工业部门（如上海的福州和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的参预作用十分重要。本世纪初，正当铁路和纺织工业开始兴办的時候，私人资本恰好补充或代替了官方投资。但是，这类活动对于投资者（商人、买办、地主、官吏）来说，只不过是他們活动中的一部分。一般说来，他們的这类活动收益甚微：1896年至1910年间兴办的十九家纱厂，其中仅有大生一家能保证正常生产，并能给股东带来可喜的利益。^①这些资本家有的是退职官吏，但大部分是地主。说来也倒奇怪，上述十九家纱厂只有五家是在上海开办的，其余则分布在浙江和安徽，而且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主要是为文人和地主所控制。^②除了资本的来源，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无用之人越来越多，任人唯亲和徇私舞弊等现象终使刚刚兴起的中国工业与官场结成联姻，而且这种关系比起商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就有一部分商人、官吏和文人对工业化极感兴趣，并且参加实现工业化的活动，但是，当时还谈不上有什么工业资产阶级。

至于海外侨商，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虽与中国社会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他们的人数不少，不可低估。据了解，辛亥革命期间尚无海外华侨人数的统计资料。根据1925年中国政府所做的有关调查，^③我们可以看出华侨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当时移居海外的华人总数为七百六十万人，其中大部分几乎全是广东、福建等南方各省的移民。他们多半侨居法属印度支那（一百零三万人），荷属印度群岛（一百八十万人），以及暹罗和香港。当然，这些华侨移居国外时都不是商人，而是做苦力、矿工和农工，有

① 严中平，前引书，第126页。

② 同上。

③ 长野朗：《支那资本主义发达史》（东京1931年版），第129页，作者在书中援引过有关方面的调查材料。

的甚至作过佣人。但是，在中国称之为南洋的那些东南亚国家里，华人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往往占据重要地位。在西贡和堤岸，诸如稻米和丝绸的贸易、头发和皮革的出口，以及帆船制造等，均由这些华侨所控制。在暹罗，稻米的全部贸易（从收购、碾磨加工到出口）均由他们一手包揽。在荷属印度群岛，华人则又是欧洲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中介。这些华人虽然有的已经侨居海外长达几代人的时间了，但是，他们仍然与自己的祖国保持着家族、经济和宗教信仰方面的联系。然而，清政府怀疑这些华侨有反清复明的倾向，故将他们排斥在大都市的政治生活之外，时间长达数世纪之久。然而，十九世纪末叶，清政府又企图恢复与这些华侨的关系，公开邀请海外富商把在国外积累的经验 and 财富献给祖国。如1895年至1896年间，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曾试图将京汉铁路的股票分摊给华侨。^① 1904年，这位在刚刚设立的商部内任职的张振勋，又号召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当时海外华商非常乐于投资，尤其是愿意为自己或前辈的原籍省区投资。于是，南方各省的某些地方铁路建设都得到了资助，如1905年漳州——厦门铁路修建所用资金大部分是由南洋的华侨寄回来的；1906年汕头——漳州铁路所用资金为三百万元（这笔资金几乎全部来自爪哇的侨商）；^② 此外，侨居美国达四十五年之久的一位华人还号召居住加利福尼亚的同胞投资修建新宁——涌口铁路。^③ 华侨资本家对自己祖国的制糖业也颇感兴趣：一位海外资本家专程回漳州，并从爪哇进口甘蔗苗，从日本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以便改进传统的生产方式。^④ 这些资本家还分别在丝织、榨油、碾米、针织以及许多轻工业生产部门投资。^⑤ 随着华侨参与中国经济生活的活动日趋频繁，他们在政治上的作用（详见下文）也得到了不断

① 费维恺，前引书，第234页。

② 陈达：《华南的华侨界》（纽约1940年版），第214页。

③ 《字林周报》，1908年1月16日，第76页。

④ 《关册》中卷，厦门报告，第541页。

⑤ 《关册》中卷，江门报告，第656页。

的发挥。

尽管上述成员极为庞杂，但能否因此而说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呢？

三、与社会上其它各阶级的异同

其实，上述各不同集团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在中国，一种人同时从事几种职业的现象很普遍，买办也是商人，钱庄老板也从事企业主的活动。以上海世代经商的方氏家族为例，其发迹史可上溯至十九世纪初期。方家充分地利用了通商口岸，其最初期活动是商业贸易：派人到外地收购青茶和土丝，再转手卖给上海的一家英国商行，换取该商行进口的印花布疋，最后再把这批印花布运到汉口地区销售。为了能给自己的商业贸易提供资金，方家还分别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钱庄。由于这些钱庄除专营钱业外，还兼营布疋杂货（如上海各钱庄），因此，从性质上来说，很难将钱庄和商店分得特别清楚。后来，方家的活动又逐渐扩大到其它方面：在管理大量钱庄（共有钱庄四十余所）的同时，又兼营食糖、棉花、洋货等贸易业务，甚至做帆船买卖，经营书业和地产。^①

由于中国历来就讲究个人私交和家族谱系，所以，资产阶级也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因为子孙都是在家族企业内部培养长大的，所以，无论是学徒还是做钱庄的经理，只有本家族人（中国的家族一般说来范围很广，中表亲戚也包括在内）才有资格。

此外，商人同业公会也很注重籍贯，“行帮”即由此得名，这对资产阶级结帮成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上海帮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影响最大的则是广东帮，在上海经商的广东人均属广东帮，其中多数人是买办和茶商，少数人是蚕丝、皮革和鸦片批发商。从事钱业的人多半属于浙江帮，他们

^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3页。

控制着金融界。从狭义上来看，浙江帮所指的是那些来自浙江省内，主要是从宁波来到上海落脚并经营钱业的人。然而，从行帮这个名词的广义来看，它又是上海大资产者的同义语，即掌握上海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①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和一致性已经同时开始显现出来了。其它各阶级和各集团的分化也初露端倪。资产阶级之所以不同于农民，因为他们家道殷实，同时也因为资产阶级和农民在活动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至于因为什么资产阶级又不同于手工业者，其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比较大，其次便是因为他们在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过程中，往往起着主导作用。^②商人与士绅的关系很密切，但是，这种关系又很难说清。按照中国社会的传统习惯来划分，文人和商人之间是存在社会地位的高低之差的。随着近几十年的社会演变，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日趋缩小，因此，当时有些人往往把他们统称为“绅商”。毫无疑问，士绅的定义逐渐失去其本来的涵义是与这种社会演变不无直接关系的。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士绅定义的三个基本标准，即占有土地、登科及第、出仕官职。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定义中的某一个标准或是渐趋消失，或是不再绝对限于士绅阶层了。在过去，只有那些科举及第的文人才能出仕官职，

① 参阅长野朗，前引书，第116—132页。

《中华年鉴》（上海1944年版），第434—453页。

《中国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年版），第308页。

② 《关册》1907年，中卷，长沙报告，第176页（如刺绣丝织品生产中的商业资本主义）。

《关册》1907年，中卷，南宁报告，第586页；报告中谈到鞭炮的生产（因为逢年过节，中国人总要消费掉大量的鞭炮）：“生产鞭炮的厂家很多，但规模大小不一……。鞭炮主要也并不是在工厂里生产的，而是把原料交给工厂的工人，由他们拿回家里加工制作。”

《关册》1906年，中卷，广州报告。“居住在广州郊区的生产者（用灯蕊草编织席子和地毯）和他们的雇主（广州的大批发商）多次发生矛盾冲突。

方显廷在《华北一个地区（天津1935年）农村的编织业与商人雇主》一书中，曾论述了同类问题，只不过是时间稍稍错后一点而已。

可是,这种情况在后来就改变了:帝国政府往往把官职出卖给有财势的人。随着国家的财政亏空,这种买官的现象日甚一日,直到十九世纪末,大半文人的官衔均是用钱买到的。当然,一部分富商也买到了官衔(他们以此获得官职,享受特权,而无须就职上任和行使权力)。1905年,传统的科举制度被取消之后,这种演变才告结束。功名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已经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士绅的标准之一——登科及第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除了官职内所允许猎取的、或多或少是合法的利益之外,土地占有和在农村发放高利贷,始终是士绅阶层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如前所述,自十九世纪后叶起,士绅阶层已逐渐把资金投放到铁路、纺织等近代企业方面来了。所以,当时的不动产倍受商人欢迎。众所周知,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均缺乏流动资金,因此,一旦面临倒闭和破产的严重威胁,他们就将大部分资本(即地产)变卖。^①人们不禁要问,(将其资本投放于近代企业的)地主兼高利贷者与(按期征收地租和租金的)商人之间的资产阶级界限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土地所得部分在商人财产中的比例是多少,以及士绅阶层在工商业方面的投资比重。^②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不全,有关方面的研究尚不深入,因而对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做出圆满的回答。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可以指出,商人的地产投资在各通商口岸、商埠郊区和邻近商埠的内地,发展得十分迅速,并且往往带有投机性质。当时使孙中山大为不安的正是这种在城市出现的、并且以资产阶级为主的 投资现象,而不是当时的农村形势。在亨利·乔治的影响下,孙中山之所以制定一项土改计划,其目的并非为了解除农村的严

^① 方家各钱庄受到1910年金融危机和1911年各革命运动的严重冲击,方家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控制的二十五家钱庄,其中仅有六家能继续维持经营。而这六家钱庄还是在变卖许多地产的情况下才保住了信用。见《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3页。

^② 张仲礼:《中国士绅阶层的收入》(西雅图1962年版),第六章《商业活动——一种收入来源》。

重危机，相反，是为了打击这些投机商的狂热。

在国家政权机构中，占据最高政治和行政职务的往往是士绅阶层（商人出任重要官职的现象极为罕见；即便是有，那么也寥寥无几，同时也只能充当某些达官贵人的幕僚和参谋，如李鸿章的亲信郑观应），在地方当官的则多半是商人。在保护地方利益方面，商人和士绅的行动是一致的。各省谘议局的经验证明，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08年，各省设立谘议局是与满清政府改革政治和行政机构的计划相吻合的。谘议局允许民众对有关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所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谘议局的议员并不掌握实权，他们只能评议，并将自己的意见反映给省督抚。议员们均是由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并拥有在行政机构任职的资历或拥有五千元以上财产和企业的中国人间接选举出来的。1909年各省设立的谘议局实际上是由文人、地主和大商人组成的。无论是在要求维护地方利益方面，还是在要求召开国会方面，^①他们的意见都是相互一致的。

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和满清政府的日趋衰败，士绅这个名词的本来涵义也逐渐改变了，而新兴资产阶级的界限一时又难以划清，故两者常常被混为一谈，被看成是一个地方士绅阶层，即：与土地有密切联系、同时又不轻视近代工业所能带来的利益的“绅商”。

把士绅和商人混为一谈的现象虽然普遍，但在程度上却有所不同，在内地，如四川或湖南尤甚，因为那里的士绅威望很高，土地经营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在沿海地区则不然，这里是资产阶级麇集的地方，他们的表现也比较活跃，对土地采取了新的经营方式，如各大商业公司开发利用，兴建厂房等，因此，也有的商人利用土地进行投机活动……。在上海和广州，士绅和资产阶级还在这种混乱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然而，在这种联盟的内部，

^① 卡梅伦 (M.E.Cameron): 《1898—1912年中国的改良运动》(纽约1963年版), 第120页。

资产阶级始终特别注重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广州商人的情况：1905年，广州商人曾要求废除当时还存在的、在官吏面前卑躬屈膝的种种礼节。^①

四、“资产阶级”的组织

从各种专门机构的设立和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思想的开通。比如，商会的建立既反映了满清政府对全国经济结构的关注，又符合商人有关合理调配他们的力量和满足他们的要求等方面的愿望。中国商人有许多传统组织形式，如帮（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和公所。^②但是，这类组织比较分散零乱。十九世纪末，根据政府提议，又设立了商务局，但只取得了一半成功。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不久，某些商人在诸如盛宣怀等具有近代思想的官吏支持下，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商业会议公所，这个商业会议公所的宗旨是联络各传统组织。在设立商部和颁布各商会法规之后，该商业会议公所于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所属这个新设机构的组织有：各公所、各地区公会，以及各大近代公司。这个组织机构没有任何民主性质，此外，机构的领导成员都是从各公所、大企业主乃至高级官吏中物色来的颇有影响的人物。数年之内，中国就设立了五十多个总会和大约二百多个地方分会，其中包括海外华侨组织的商会。^③

起初，商会的作用和其它政治及行政机构的作用一样，在政权机构和地方商业团体之间建立联系和对话。但是，在一些小城镇，各商会还不能完全摆脱清廷官吏的控制；相反，在一些大的商埠，尤其是上海，各商会很快就获得广泛的自治权力；这些商会的活动首先是保护商人的利益，从而商会也就成了商人利益的

① 《字林周报》，1905年1月20日，第149页。

② 马士（H. B. Morse）：《中国公行考》（伦敦1932年版）。

③ 有关各商会中的公所，见小岛淑男，前引书，第115页；关于中国各主要商会的分布情况，详见书中的附录B。

代言人。

与此同时，商人还建立了“商团”组织，借以直接保护自身利益。商团成员基本上是从商界征募的年轻人，间或也有公所和商会雇佣的；商团的所有武器装备都是由各企业专筹款项购置的。商团的公开任务就是在发生动乱的情况下，保护商店和商业区的安全。其实，商团组织是商人实行自治和进行军事干涉的武装力量。第一个商团组织是1905年在上海建立的。^①

五、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

由于受西方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资产阶级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也与众不同。中国商人开始追求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享受，主要是受盎格鲁—撒克逊商人的影响。因此，他们普遍（也许是表面现象）信仰耶稣教，崇尚体育，认为体育活动能使人长生不老。他们对社会公共事业及俱乐部的活动也很感兴趣，甚至大赶时髦，创办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组织。^②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掌握了英语，而且，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在租界的学校里学习英语，然后还可以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学里深造。无论是西服、楼房，还是驾驶汽车、轮船，总之，凡是新鲜事物，中国资产阶级都一概接受。^③

这就是一个经济上不能独立、人数很少、社会成分复杂、尚未完全分化的资产阶级。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年时间里，某些与资产阶级的迅速发展直接有关的思想 和政治主张已经形成，并且开始传播。究竟是些什么思想呢？当时这些思想又是怎

① 《字林周报》，1906年5月8日，第40页；5月25日，第441页；7月13日，第69页；7月16日，第83页；7月27日，第181页。

同上，1907年1月4日、1月25日等。

② 为明确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某些重要商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请查阅《字林周报》，1906年5月18日，第364—365页。

③ 有关西方的风俗习惯对资产阶级的渗透情况，《字林周报》、各种回忆录和传记，如项美丽（Hahn, Emiy）：《宋氏姊妹》（伦敦1942年版）等文献中均有大量实例记载。

样被引进中国的呢？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首先必须明确两点：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我们是就其广义而言的；二，按照欧洲的理解，它既包括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提出的自由主义学说，也包括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全盛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一、该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过早发展

十九世纪初，这一具有双重涵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大大渗透到了中国的思想领域和政治文学领域。面对警署的暴政和法庭的专横，民众提出了个人自由的要求。孔夫子的父为子纲开始受到攻击；妇女解放的思想也随之出现了。在政治上，虽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深感改革旧机构和号召全国民众齐心协力的必要，但是，改良派却大肆鼓吹建立君主立宪制；而革命派则认为只有建立共和制，民主主义才能得以体现。于是，全国统一和民族独立便成了人们一再提出来的主题。中国人要挣脱满清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可耻桎梏！中国人要奋起反抗西方人的侵占。在这里重复上述思想的发展过程是毫无必要的，因为中国的近代史学家对此早已了如指掌，而且，外国对此亦有深入的研究。^①

^① 费正清 (J. K. Fairbank):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20页以下。

戴遂良 (L. Wieger): 《现代中国》，第一卷《绪》。第一卷几乎全都与梁启超有关。

勒文森 (J. R. Leveson):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思想》。

史扶邻 (H. Schiffrin): 《孙中山早期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的由来和意义》，载《亚洲研究杂志》(1957年8月)。

斯卡拉皮诺 (R. A. Scalapino)、史扶邻: 《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载《亚洲研究杂志》(1959年5月)。

史扶邻所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起源》一书行将问世，这是一部齐全的中国领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意识形态是否在理论上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定义相一致；是否真的应该把它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或本能的表现。新兴阶级的软弱性似乎与下面这种概念相互矛盾：诚然，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各通商口岸，他们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并且已经步入了先进世界，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利条件。但是，即便人们重视上述补偿性的因素，那么，也还会遇到其它方面的种种困难。与资产阶级本身的形成相比较，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显然是出现得过早了；然而，欧洲的情况则不同，无论是在伏尔泰还是在卢梭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演变的过程要经历若干个世纪才能完成；相反，在中国，这些新的或更新的政治主题则是先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而出现的。例如：孙中山最初的几次声明是在1900年以前发表的；梁启超是在1902—1903年间由于发表了《饮冰室文集》，才在文学和新闻工作方面飞黄腾达；而资产阶级仅仅是在参加通商口岸商人组织的初次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时，才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民族情绪的高涨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期待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形成，而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感情。因此，资产阶级最关注的不是自身内部的统一，而是担心失去市场。

二、输入概念的影响

如果说外国对中国的威胁加速了中国人民对民族问题的认

领导人传记，全书共三卷，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巨著尚未出版前，我们也可以翻阅一下有关方面的论著：德礼贤（P.M.d'Elia）的《孙文的三民主义》（上海1930年版）。

沙曼（L.Sharman）：《孙中山的生平及其意义》（纽约1934年版）。

谢诺（J.Chesneaux）：《孙中山传》（巴黎1959年版）。

我们还可以参阅罗斯特（John Lust）对邹容的研究。邹容虽在西方并不为更多人所熟悉，但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在宣传革命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抨击性论著《革命军》，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罗斯特已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并且还作了评注（巴黎，1968年出版）。

识，那么，要求民族独立、改变民族面貌，以及把民族独立与十九世纪的排外主义区别开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过早出现，则促使人们产生了引进和输入意识形态的要求。通过阅读当代的政治论著（大部分是有关西方的理论和经验的论著，但也有论中国实践的），我们便可以对上面的问题得出证实。随着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思想流通的速度也加快了，于是，中国人也就开始直接接触外国经过若干世纪的孕育才形成的思想体系。正如中国接受了完整的火车头就用不着去从头发明蒸汽机一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无须等待资产阶级完全形成。

这些新思想主要是通过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新军的某些军官（一般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输入中国的。这两种人虽然分属各不同阶层或阶级（农民阶层，士绅阶层或资产阶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似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有着一定的独创见解和主张。十九世纪初，正是这样一部分人在中国的各不同方面充当了中介，并且在没有某个阶级的实际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传播外国思想。

三、内在的虚弱与不加区分的传播

根据上面提到的输入情况，我们就可以对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某些特点做出解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在的即理论上的虚弱。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代表着一个远远脱离中国现实的文人阶层的思想，而且这个文人阶层的本身在精神方面尚不能得到彻底的满足，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阶层的思想是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如革命知识分子常常受到清政府警方的追捕，即使是流亡，这也只能使他们获得一半安全）形成的。此外，中国知识分子在行动中还缺乏思想武器，因为他们尚不能熟练地运用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多数人还不能看懂外国人的原著，手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译著，而且还是面目皆非的日文译本，其结果是，不但无法理解原著，反而以讹传讹……）。改

良派和革命派之间存在着分歧，这也说明了这种思想上的不成熟，例如：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焦点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孙中山反对梁启超），而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深刻的、真正不同的看法。

此外，由于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与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特殊的关联，所以，它在各个领域乃至各行各业的传播甚广。同时，这种传播也是不加区分地进行的。一些主张经过革命领导人的进一步发挥，便在各秘密会党成员、士兵和商人，甚至在某些地主和官吏中间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种反响越来越大，越来越脱离原意：一种本已离开原意的思想再经过广泛流传，必然导致削弱资产阶级的概念及其政治效果，以致新词掩盖了过去的现实，输入的意识形态掩盖了传统上一直存在的矛盾。于是，民族情绪为反清情绪所代替，民主主义则为地方封建势力特权反对中央政权（帝国政权）的斗争所代替。由此可见，诸如孙中山这些领导人在消除误解方面是毫无建树的，相反（也许是因为缺乏经验，也许是因为在谋权方面很不精明），他们反倒使思想上的混乱加深了。

当然，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当中也传播甚广。但是，比起其他阶级或阶层，中国资产阶级对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解就更深一步吗？面对种种新的要求，资产阶级是否认清了哪些是自己的迫切要求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资产阶级在革命前所采取的各种不同态度和政治立场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一、传统的孤立主义

在着手探讨资产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的各方面情况之前，我们想着重指出他们所遇到的障碍，特别是心理上的障碍。在这方面，旧的思想结构是相当顽固的，并且一直起着强有力的牵制作用。

要想参加社会活动，关心民族危亡，就必须克服由来已久而又根深蒂固的分裂主义和社会孤立主义。

多少世纪以来，商人这个集团始终受人歧视，并被排斥在国家事务之外；他们的活动很分散，并没有被纳入社会活动的范围之内，因此，商人们就以行业技术和一些信誉标准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由行会管理的商人集团。这些商人的活动宗旨只有一个，即繁荣经济，但是，因为当局对他们的干涉往往是以敲诈勒索等形式出现的，所以，这又成了他们极力想摆脱的灾难。这个关闭的社会集团（其家族、地区和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坚如磐石，自给自足，并且几乎是在与整个社会隔绝的情况下，或者是在社会的边缘独立发展，甚至在不改变其基本性质的条件下，在海外继续发展。二十世纪初，正当中国经济被卷入世界经济范围的时候，商人本身对并入周围的社会、并入自己的民族，表现得顾虑重重，犹豫不决。这样的态度，即使是在某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也有所表现。例如，1911年奉天发生瘟疫时，商人便要求专为商人设立隔离区。^① 在一些重大事情上，这种态度则更加暴露无遗：如果说某些商人认为组织商团会掩盖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也有人认为这种组织不过是个“互卫”措施。^② 有时，商人似乎宁肯通过私人警察对自己进行特别保护，而不愿建立公共秩序；^③ 他们最为关心的不是如何改造国家（尽管这样做对他们有利），而是（不问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如何建立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和谐的安全地带。因而，他们愿在乡村或城镇进行活动。他们还创办学校，铺设林荫大道，把自来水和电灯接到他们的住

① 《字林周报》，1911年3月3日，第483页；同样，上海商人也曾要求专设医院治疗他们被传染的眷属（见《字林周报》，1911年3月3日，第504页）。

② 这主要是大买办、上海商会中有影响的会员虞洽卿的观点。中国商团就是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并归上海市商团（外国机构）的。

③ 《字林周报》，1906年2月23日，第397页。

区。^① 甚至在经济条件极为富裕的情况下，他们还建立模范城镇。张謇在通州活动的情况就是这样。^② 面对帝国政府，他们的强烈反应便是倾向于分裂。长期以来，许多人就热衷于地方自治或省自治。^③ 直到二十世纪，仍有不少中国商人梦想建立模范省城，继续维持他们前辈的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生活。政治家的返祖性猜疑酷似天真的空想，似乎在全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也可以得到改变；在全中国没有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下，他们就可以使某个省区进入近代化；似乎中国达到复兴，可以通过政治以外的其它途径；甚至他们的具体活动可以脱离一切意识形态。

中国商人很想回避政治现实，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不但他们本身面临种种政治现实，而且他们的纯商业活动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事物的发展，他们不得不与帝国的政权机构以及外国人建立种种关系，正是因为这样做了，他们的思想才逐渐地开通了。所以说，中国资产阶级能在政治上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这恰恰是他们与满清官吏或西方商人保持某些关系的结果。

二、资产阶级与帝国政权的关系

资产阶级与满清政府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是，从密切合作到激烈斗争，甚至公开对抗。在地方上，随着帝国政权的逐步解体，官吏的自主权日益扩大，以至达到个人决定一切的地步，因此，个人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一般说来，中国商人有时也从自己的活动出发，向政府提出免税、特许权和专利权的要求，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帮助和保护。政府也尽

① 有关1905—1910年间，各通商口岸掀起都市规化运动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关册》。

② 参阅朱昌峻：《张謇——中国的实业先驱》，第165—175页。

③ 尤其是广州，这种自治运动的声势较为浩大。

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如中国最初建立的一批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①（实际是半官方企业，建立于1890年）就获得了生产专利权和免交十年的厘金。为了给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政府还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订立各种规章（如1903年设立商部，1904年又拟订公司律，1905年颁布破产律；同年，总督张之洞还试图改革币制）。然而，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纷纷在中国开办工厂，生产垄断的特许权遭到了破坏；又由于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免税权也大不如前了。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终使各种改革计划成了泡影。虽说满清政府无能，只有良好的愿望而没有真正的行动，但是，在资产阶级奋力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时，满清政府并没有从中作梗刁难。设立商会这件事情，最初就是清政府提议的。^②此外，组织商人武装也曾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和公开赞同。在对付外国人这一方面，清政府把资产阶级看作是自己的盟友，并力图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1905年上海发生一起会审公廨事件（中国人奋起反对这个设在公共租界的法庭滥用权力），身着便衣的清兵和店主、资产者并肩参加了这场斗争。^③事过两年之后，为了阻止外国金融家的渗透，上海的官吏和商人再次相互接近，力图用本国资本兴办一家电车公司。^④在一些较小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如芜湖以许鼎霖为首的道台还采取鼓励商业发展的积极政策，展宽街道，修建市场等。许道台离职之日，全城商人在商会会所前为他树立了纪念碑，对他表示感激。^⑤这种融洽的关系并不奇怪，它具有共同的基础，即一致对付外国人，因为他们外国人在外国人面前觉得自己并不强大。这种关系只能在治理国土和发展经济的具体合作方面得到巩固和发展，但还不能符合广泛利益，

① 为人熟知的英文名称是Shanghai Cotton Cloth Mill.

② 费维恺，前引书，第70—71页。

③ 《字林周报》，1905年12月22日，第671—673页。

④ 同上，1907年6月7日，第586页。

⑤ 同上，1905年1月6日，第23页。

因为贪赃受贿的现象在中国还很普遍。^①

商人觉得有必要贿赂官吏，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帝国之间的联盟实际上非常脆弱和肤浅，甚至流于表面。政府提出的保护措施犹如空中楼阁，资产阶级怎能不为此而感到大失所望呢？虽然在税收方面政府曾给予例外的特许，但是，致使一切商务活动处于瘫痪状态的厘金制度却依然存在；政府鼓励爱国思想，但在危难时刻（如1910年交易所破产），中国当局却宁肯牺牲本国人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承担新的债务，保护外国人的投资。^②商会机构所享受的优惠待遇也不是未加全面考虑而随意规定的，而且，清廷官吏力图独揽商会大权，以及擅自挪用资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③在经济活动方面，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是经过重重困难和曲折才建立起来的：官吏滥用职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商人只好拒绝提供资金。自1905年起，各铁路公司不断发生危机，这就揭示了他们之间互不信任和明争暗斗远远超过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④当商人与政府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如果说商人尚能在某种程度上采取克制态度，避免转为公开对抗帝国制度的话，那么，在抨击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他们却毫无顾忌地在公开集会上揭露其受贿和无能；^⑤当然，也要谨言慎行，否则的话，批评者有时会因为措词过激而受到惩罚或问罪。

资产阶级在形成的时候，开始并不是一个与满清帝国相对抗的阶级。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的一些行业组织，尤其是商会，

① 《字林周报》，1910年2月11日，第302页。

② 拙著《清末上海的一次金融危机》（巴黎1964年版），第39页。

③ 《字林周报》，1911年7月1日，第25页。

④ 《关册》（1905年）中卷，广州报告第402页（广州—汉口铁路）。《字林周报》，1906年1月24日，第177页；6月22日，第691页（广州—汉口铁路）。《关册》（1907年），中卷，九江报告，第237页。《字林周报》，1910年9月16日，第67页（浙江铁路）；10月7日，第27页（同上）。《字林周报》，1910年2月11日（四川及广州—汉口铁路）；4月1日，第39页（同上）。

⑤ 《字林周报》，1906年10月5日，第13页（江阴事件）。

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帝国政府的下属机构；在日常事务中，商人也很重视争取官吏的关照，因为这对他们的活动关系重大。但是，如果把官吏的关照说成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未必十分恰当，事实证明：一，只是关照还远远不够；二，在抵御外国人的蚕食方面，这种关照并不是卓有成效的保护；三，对医治执行制度方面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特许也并不是灵验的药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资产阶级与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良好关系，并且继续加以发展之外，商人之中普遍产生对帝国政府不信任或敌视的思潮，这是很自然的。

三、资产阶级与外国人的关系

在资产阶级与在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同样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许多中国史学家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一个是全部以中国资本进行企业经营并对外国人持极端仇视态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另一个则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完全依附外国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如此对比固然十分鲜明，但这种对比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为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属半殖民地性质，因此，中国不可能有独立的民族企业。从提供资金、必需品和设备，到产品的销售，总之，中国一切稍具规模的商业活动都是从属性质的。1910年，当外国在华各大银行决定停止为钱庄提供贷款，并拒绝接受作为现款的期票时，首先受到威胁的是全部中国企业。因而，“民族”资本的区分标准就不可能有深刻的经济意义。此外，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以物质上的从属地位为前提的。

但是，通过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也未必导致政治上的依附或从属。恰恰相反，经济上的依附，往往会孕育最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国商人（其中也包括买办）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们人人百倍警惕，特别关心国家的主权是否受到侵犯：1905年，当上海公共租界的

会审公廨越权想把一名中国被告（女）逮捕入监时，^①他们无不义愤填膺，无不强烈要求参预租界的管理，^②要求参预帝国海关的行政管理事务，^③参预制订海关税则，^④并且一致强烈反对外国人扩张租界；^⑤无一不为国土将被瓜分的前景感到焦虑不安。商人的处境使他们对外国人实行控制的明渠暗道和某些贷款的隐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西方人控制矿藏和铁路，这使商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备受挫伤，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仇恨。^⑥在这些事实面前，民族主义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在主张赎回矿权和筑路权的运动中，^⑦商人和士绅是站在一边的，他们同意提供资金，清偿国家所欠的累累外债，^⑧支持建设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海军队伍。^⑨当然，这类活动收效并不太大。既然商人的财力雄厚，那么，他们为何不填补因列强的活动而造成的、不断增加的国家亏空呢？提供资金的商人对负责管理资金的清政府行政机构越来越不信任，因此，赎回矿权和筑路权的运动往往仅限于某个地区或一省范围；商人和士绅之间常常发生争执，头绪纷杂，互不协调，致使运动无法继续开展下去，以前提供的资金也因此不翼而飞。^⑩

① 《字林周报》，1905年12月22日，第653，671，673页。

② 见《字林周报》，1906年2月16日，第347页：中国商人请求加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他们从领导人当中选择七人组成一个董事会，该会成员有：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棉布同业公会会长郁屏翰，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杂货同业公会会长朱葆三等。

③ 《字林周报》，1906年7月20日，第151页。

④ 同上，1907年8月2日，第265页。上海华界召开了一次有上海商会和上海的华商旅沪维持会参加的集会。有人在会上强调指出：“在将来与列强商订贸易条约或关税协定等事务方面，上海商人应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⑤ 同上，1910年1月14日，第81页。

⑥ 同上，1910年5月27日，第480，491页。（见湖北商人于1910年5月2日（农历四月初四）在《中西日报》上发表的一项声明的译文。）

⑦ 参阅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台北1963年版）。

⑧ 《字林周报》，1910年1月14日，第73页；2月11日，第316页。

⑨ 同上，1910年1月28日，第175页。

⑩ 如1910年上海出现金融危机时，用于赎回和建筑川汉铁路的其中一大笔资金下落不明。

此外，资产阶级在民众奋起反抗外国人的动乱中，也曾起过重要作用。1907年，商人在学生的帮助下，曾经组织过多次群众集会，^①并且还为1911年上海成立国上保护委员会做过积极的贡献。^②有时资产阶级也使用自己的一套办法，例如训练商团，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在动乱形势下，对商业区采取保护行动，而且也是为了在外国人瓜分中国领土的情况下，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③当然，武装干涉显然是一种幻想，但是，它毕竟反映出一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民族主义事业的需要，商人又重新采取传统上一惯使用的反抗形式——“抵制”，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抵制已经成了中国各同业公会的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遇有个别商人违反同业公会规章和行政当局滥用职权的情况，商人便利用这种斗争形式。这种斗争手段行之有效，能迅速制服违反者，也常能使帝国政府的权力机构屈服让步。但是，这种手段的使用范围历来较窄，只是与某些行业的活动或某公所的集团利益有关。二十世纪初，中国商人彻底改变了这种抵制运动的性质，以至在后来的数十年中，抵制运动变成反抗外国统治的一种主要斗争形式。到了1905年，这种斗争形式竟至发展成一场有史以来第一次震撼整个资产阶级的运动。^④各大通商口岸的中国商贾都有权代表各同业公会或商会，决定停止进口或推销美货。而且，这种抵制运动也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商人一致抗议美

① 《字林周报》，1907年11月22日，第454页；12月20日，第706—707页。

② 同上，1911年3月17日，第636页。

③ 1911年4月，马来西亚华侨致电上海商团及其他组织：“列强正在策划瓜分中国。请训练民众武装，以支持中国的对外政策。”见《字林周报》，1911年4月12日，第240页。

④ 有关1905年的抵制运动，见雷麦(F. Remer)：《中国抵制运动研究》(巴尔的摩1933年版)，又见菲尔兹(M. Fields)的近期论述：《1905年中国的抵制运动》，载《哈佛中国集刊》第十一辑(1957年)第63页以下，及路康乐(E. J. Rhoads)：《广东的民族主义与排外思想(1905—1906)——广州的抵制美货运动和廉州的反传教士动乱》，载《哈佛中国集刊》第十六辑(1962年)第154页以下。

国移民法针对华人而确立的种族歧视政策，因为这首先涉及的便是民族尊严问题。通过1905年的抵制运动，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团结已经超出了某同业团体或地区的范围，同时，它也证实了商人对民族利益的普遍关心。在这次运动中，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显示出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也是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愿望。此后数年之间，类似的抵制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其发展规模时而席卷全国（如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时而仅限某一地区（如1909年末在吉林）^①或某一城镇（如1910年在上海或杭州）。^②抵制运动无论大小，其目标都是对准外国人的。但是，抵制运动的起因较多，或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引起的（如1908年的“第二辰丸”事件）；^③或是由于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之间发生的地方纠纷，^④或是由于苦力与英国警察之间发生的殴斗。^⑤抵制运动似乎成了资产阶级鼓励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惯用形式。抵制运动虽然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但必须通过经济手段才能实现，因此，商人力图以拒绝一切合作的办法打击外国人的利益。由于中国商人是帝国主义必不可少的助手，所以，抵制运动在短时期内可能奏效，^⑥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抵制则未必有效。在经济方面，中国商人和外国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在依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抵制外贸必然导致进口贸易下降，商品滞销，库存积压，长此以往，中国商人必然自食恶果。此外，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是帝国主义经济体系扩张的产物，因此，它怎能既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经济体系，而又不使自身受到任何牵连呢？本世纪

① 《字林周报》，1910年2月11日，第296页。

② 同上，1910年2月18日，第381页。

③ 中国当局派人在厦门查获一艘私运军火的日轮后，日本政府用过激语言提出抗议。有关“第二辰丸”事件及其它事件，请参阅入江昭：《舆论与对外政策（晚清）》，载费维恺、墨菲（R. Murphey）及芮玛丽（M. Wright）合著《中国近代史入门》（伯克利，洛杉矶1967年版），第216—238页。

④ 《字林周报》，1910年4月8日，第88页。

⑤ 同上，1910年2月18日，第381页。

⑥ 参阅《关册》（1905年和1906年有关各通商口岸的贸易报告）。

初，中国主张经济自给自足和民族独立，可以说都是属于乌托邦范畴的。归根结蒂，与其说抵制运动是资产阶级所采用的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一种方法。

但是，相比较而言，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依附与其几乎上下一致的民族主义愿望之间的矛盾，要比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与一个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

四、资产阶级与其对立面

资产阶级与其周围的权力机构（满清政府、列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清政府和列强在政治上的对立，激起了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与最新输入的意识形态发生偶合，这样，中国资产阶级在尚未彻底认识到自己的迫切要求的情况下，便接受了各不同政纲中提出的现成要求。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但它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过早成熟。然而，这种早熟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和在社会上没有明确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资产阶级很快就成了各主要对立会党的依靠力量。如果说知识分子是这些会党的主要活动者，那么，商人则是这些会党的最重要的和真正的支持者。

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曾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有人试图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确立一条分水线，把他们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①如此区分，未免有些刻板，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处在寻求意识形态的时代，处在各种纲领尚不明确以及大人物的言行可以代替政纲的时代，资产阶级表现出动摇不定，这是不足为怪的。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年代，资产阶级时而支持改良派，时而支持革命派，甚至某个有影响的人物到外国去走一次（如

^① 参阅章开沅、刘望龄：《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的性格》，载《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1962年版），第12页。

1900年梁启超曾去过夏威夷),就能使一部分人从一个阵营转入另一个阵营。^① 诸如孙中山、康有为及梁启超等人,他们对这类不稳定情况非常清楚,他们成了自己政治主张的旅行推销员。一般说来,可以这样认为,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改良派思潮占了上风,在大陆资产阶级当中尤为如此,而各种革命学说则是在1911年前夜才取得优势,并且主要是在海外商人中传播甚广。尽管根据这些不同的政治态度很难在社会经济方面做出明确的区分,但是,大陆资产阶级与海外资产阶级之间的激进主义的区别并不完全是变幻莫测的。一方面是大陆商人,他们和士绅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都有社会保守主义的思想,但是,商人和士绅能以现实主义观点去看待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是海外华侨商人,他们虽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隔绝,但是,他们渴望将最先进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引进自己的祖国,并力图使自己的祖国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国家。

商人对改良派的支持,主要表现在1900年对以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会的资助方面。改良派的第一份机关报——《清议报》,就是用横滨华侨商人提供的资金于1898年在日本创办的。^② 自1900年,檀香山华侨商人捐款十万余元,次年汉口起义动用了其中的一部分。^③ 1903年,梁启超同样又得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华侨的资助。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资产阶级还曾参预了中国国内的改良运动。1906年9月1日,清朝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资产阶级为之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上海

① 勒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思想》(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53年版),第65页。

② 参阅勒文森,前引书,第62页。

③ 有关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斗争,见段云章等著:《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华侨中的斗争》,载《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619页以下。

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所用资金是由改良派提供的。革命派对这次起义的计划也略有所闻。起义失败更加深了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裂痕,并使孙中山失去了他曾力图在长江流域建立的联络。

商会将消息电告各省商会，要求集会下传并组织[庆祝活动。汕头、①广州、②江阴等地组织了欢庆活动，与会者高呼光绪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人呼喊慈禧的名字。③各商会及商界在草拟商法的同时，还准备协助制定未来的宪法。④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时，一些议长和议员就是些有财势的企业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便是其中之一。⑤1910年，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又派代表向清政府请愿速开国会。⑥可以说，他们就是代表商界到北京请愿的。⑦同时这也证明了许多商人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

同样，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时一再强调的也正是这种关系。⑧孙中山的第一个较大的会党——兴中会正是于1895年⑨在檀香山创立的，第一批会员是该市的华侨商人——他哥哥的朋友。⑩此后数年间，横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华侨，⑪以及国内（但入会的积极性较差）各界人士均有陆续入会的。⑫1905年同盟会创立时，兴中会与黄兴的华兴会的合并，以

① 《字林周报》，1906年9月28日，第746页。

② 同上，第748页。

③ 同上，1906年10月5日，第13页。

④ 同上，1907年8月30日，第495页。

⑤ 见朱昌峻，前引书。

⑥ 《字林周报》，1910年1月14日，第119页：各省咨议局议员汇集北京，选出三名代表，其中就有一名代表是商人。

⑦ 同上，1910年5月27日，第509页。上海商人派钱庄经理沈缙云为特派代表赴京递交有关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⑧ 中国和苏联的史学家通常把同盟会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⑨ 原文如此。误，应为1894年。——译者

⑩ ⑪ 冯自由：《革命逸史》（台湾1953年版），第1卷，第11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重庆1941年版），第16页。

⑫ 1911年4月，孙中山会党的六十人在北京被捕，其中多半是商人。（《字林周报》，1911年4月22日，第197页。）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引自柴得廉等编《辛亥革命》（上海1957年版），第1卷，第141—172页。据冯自由估计，1895年至1900年，陆续加入兴中会的会员有七十五人，其中二十五人是商人，而且横滨华侨商人占半数以上。

及兴中会与章炳麟的靠近，使知识界对孙中山的政策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孙中山仍然与商界保持密切联系。^①商人的积极参预，使革命事业染上了一种相当奇怪的贪财重利的色彩；孙中山向他的隐名合伙人签借了三十万元的债务，并且答应在他取得政权之后，予以加倍偿还。^②在纲领中，孙中山还特别强调了可能吸引上述资产者参加的那些要点，即坚决谴责满清政府；政治结构近代化；与外国人合作发展经济，但必须维护民族独立。可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尤其是土地改革的计划，始终是含混不清，并且被降到了次要地位。^③同盟会的公开刊物——《民报》在最初几期中，曾发表过大量有关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在中国的可能实践的文章，到后来，这类文章则逐渐减少了。^④

资产阶级与各新“党派”内部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进一步证明了从西方输入的政治口号和在部分经济近代化中新产生出来的阶级的要求，已经逐渐趋于一致。对于由知识分子引进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词句，中国资产阶级比其他阶级理解得更深刻，并能以更诚恳的态度予以接受。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尚处于形成阶段，其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社会地位又未确定，但是，它却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以往的经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宝库，一个思想和政治上的大宝库。这个宝库可能很不完善，经过世代相传，已经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了，但是，它的存在仍然可以给资产阶级的活动增添一种特殊的活力。

这种由多方面条件促成的、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意识形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弥补资产阶级薄弱的经济基础呢？对于确

①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斯坦福1961年版），第35—37页。

② 《字林周报》，1912年10月19日，第176页。

③ 史扶邻：《孙中山的早期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1957年8月）；斯卡拉皮诺、史扶邻：《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载《亚洲研究杂志》（1959年5月）。

④ 革命党有关“社会主义目标”的所有重要文章几乎全部是在1905—1907年间发表的。

立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在1911至1913年间席卷中国的历次事件中，资产阶级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

译自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et la Révolution de 1911*) 巴黎 1968

年版，第17—54页。

引 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武装暴动，揭开了一次大起义的序幕，随后，其他各省也相继揭竿而起。这次起义的结局是：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建立了民国临时政府；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告退位；袁世凯窃国成功。这一系列事件，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开辟了一个风云变幻的纪元：暴动、起义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终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宣告结束。这次起义的重要意义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它的性质及其深远影响，以及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对这次起义的作用，却远远没被认识清楚。这是一次“传统形式的起义”吗？^①清廷的崩溃与历代王朝的灭亡，就土地问题引起骚乱的扩大、秘密会党的作用、士绅^②阶层的参与活动，以及袁世凯窃国成功后，复辟帝制的尝试而言，两者之间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反之，我们能把1911年的起义看成是一次“革命”吗？能否因为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在一系列事件中极力想夺取政权，并使政治制度适合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就把它看成是英国或法国曾经出现的那种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吗？其实，从许多方面来看，1911年中国的情况确实可以与几个世纪

^① 参阅市古宙三教授于1965年8月在温特沃斯海滨（美国）举行的辛亥革命讨论会上的报告。

^② 中国史学家所用的士绅（英文gentry）一词，一般指的是中国上层社会人物，其中包括大地主、高级官吏和文职人员。

前欧洲的情况相比，这就是：经济领域里的某些近代化（虽然是相对的，但也是实际存在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意识形态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自由主义口号（消灭特权、提倡民主、个人自由）几经更新，符合了民族主义口号（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我们不妨暂且撇开历史不谈，回过头来看看当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近期形势。这些国家的现代史不是有助于解释中国的近代史吗？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是以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为背景的，因此，这次革命除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应之外，还接受了一些外来概念（由那些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引入中国的概念）。诚然，这些概念并不完全合乎当时中国国情，但是，辛亥革命难道就不像近几十年来不断震撼第三世界各国的大动乱吗？

这方面的争论非但没有结束，相反地，一切理论和假想，都能够而且应该促使历史学家去印证历史事实，丰富研究的内容。我们暂且不给士绅的活动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样或那样的定义，仅想就资产阶级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番探讨。

多年以来，中共历史学家一直强调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①他们认为，1911年的起义是一场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甚至说，这场革命还略带社会主义的性质。他们把同盟会看作是这场革命的政治体现，把孙中山看作是这场革命的领袖。然而，资产阶级的要求又实现了多少呢？如果说这个资产阶级具有民族主义思想，那末，它提出的口号却是驱除鞑虏，并且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前屈服让步；如果说它主张民主主义，可是它推翻帝国专制主义政体、建立共和政体只能说是发展个人权力的一个新阶段而已。资产阶级之所以无能为力和遭受部分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资产阶级在数量上人少，势单力薄，政治上尚不成熟，在斗争中还不能认清真正的盟友，所以，它依靠的并

^① 拙著《中国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载《历史评论》（1963年）第468期。

不是广大农民群众，而是士绅阶层；二，列强对共和派运动及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实现，只能取决于业已确立的帝国主义利益。）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

近年来，中国发表了许多有关的文章和论著，因而，这些论题完全可以成为研究资产阶级的起点。

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就这些论题所作的阐述，我们既不应不加争辩地予以接受，也不该不加分析地弃之不顾。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加以参考，并且在不受作者的方法和结论的影响的情况下，努力对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作出明确的论述。

黄庆华译 胥森校

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

巴斯蒂

从1911年9月至1912年2月，在中国各省展开了一场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倾向于把这个政治变化看作完全是有名无实的。^①他们强调指出，随着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旧制度的保守势力在政权中便保存了下来。他们认为，在真正的革命者之所以败在这位老政治家手下的各种原因中，列强对后者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解释并不新鲜，甚至袁的追随者们都曾引用过。他们把这看作是袁具有政治才干的一个证据。^②虽然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态度已有人做过仔细的研究，^③但法国外交的表现却一直为人们所忽略。我们将就这一既涉及中国国内历史又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问题，提供一些详细情况。我们的叙述将以1911年9月

①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1962年版)，尤其是第229—258页和第645—675页。

白吉尔(M. —C. Bergère)在1963年10—12月号《历史评论》上发表文章，对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作了精辟的阐述。目前，有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也同样倾向于贬低这次革命的重要性(参看温特沃斯海滨(美国)讨论会报告集《革命中的中国》(1968年版))。

② 例如林彪(Pyau, Ling):《中国现代史文选》(柏林1917年版); 克劳斯(F. E. A. Krause):《东亚史》(哥廷根1925年版); 韦布律热(R. Verbrugge):《袁世凯:他的生平和时代》(巴黎1934年版)。

③ 李约翰(J. G. Reid):《满清退位与列强(1908—1912年)》(伯克利1935年版); 别洛夫(E. Belov):《中国1911—1913年的革命》(莫斯科1958年版); 余绳武:《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第11—29页。

四川发生动乱到1912年2月12日皇帝退位这一段时间为限。

1911年，法国在中国已占有一种完全不可忽视的地位。法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已在中国牢固地建立了起来。法国各公司在云南和山西修建了七百零八公里铁路。^①此外，法国还与比利时合作，参加了京汉线（北京至汉口）和汴洛线（开封至洛阳）共计一千五百八十四公里铁路的修建。法国的资金投入了“华中铁路有限公司”，^②该公司刚刚完成了天津至浦口间一千零九公里铁路的修建。法国金融界，特别是新教的大银行派，或多或少都参与了俄亚银行的各个企业，并向该银行提供了其全部基金的百分之八十。^③事实上，象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法国主要是依靠其储蓄收入才得以打入中国经济的。尽管参与国家借款构成法国在华经济的主要部分，^④但在私人工商业方面法国的投资也还是相当可观。诚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法国在华企业只有一百一十二家，而英国有六百零六家，日本有一千二百六十三家；^⑤可是法国资本在许多其他国籍的企业中却占有多数并拥有决定权，如在开采河南、山西两省煤矿和铁矿的英国重要公司“福

① 1911年，中国拥有九千六百一十八公里由外国人修筑的铁路。为此，中国借了七亿五千万法郎；但这只够抵偿一部分费用。在这笔款项中，有一亿四千万法郎是法国借给的；此外，法国还为云南铁路花费了一亿六千五百万法郎。

② 《外交部档案，中国文书，新编》第357卷，第268页，〈1912年3月31日关于中国借款的报告〉。这家英国公司成立于1905年，卡约（Caillaux）曾任该公司法国集团的主席。

③ AE（以下均以此缩写表示外交部档案、中国文书、新编，而只标出卷数和页数），357/266，〈3月31日关于中国借款的报告〉；AE，406/9，〈1912年3月1日关于华俄道胜银行的说明〉。华俄道胜银行系1895年由俄国政府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国家贴现银行、合股公司、马莱兄弟公司、戈盖尔公司、纳弗里茨公司等法国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的。1910年华俄道胜银行与合股公司在圣彼得堡设立的北方银行合并为俄亚银行（但在我国仍称为华俄道胜银行。——译者）。

④ 按照雷麦（C. Remer）：《外国在华投资》（纽约1933年版）一书，第619—624页的估计，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吴承明在其《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1956年版）第152页、173页、186页用其他计算方法得出同样的结果。

⑤ 《中华年书》，1912年。

公司”中就是这样。^①把这种隐蔽在其他国家旗号下的资金也考虑在内，便可以做出这样的估计：在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中，^②法国的投资至少占五分之一。

自1904年以来，法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主要部分便由东方汇理银行加以协调；该行以一种“准国家银行的地位”^③充当与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各主要信贷机构的中介人，并依靠施奈德(Schneider)所领导的一个集中了军火、铁路器材及公共工程等工业的工业集团。东方汇理银行在导致成立一个国际银行团^④的一系列谈判中是法国金融界的代表；1911年春，中国政府与这个国际银行团签订了两项借款合同（借款额各为二亿五千万法郎^⑤），用来进行币制改革和修建湖广铁路。

在远东重新组织一个强大而活跃的法国银行，更多地是符合了法国在这一地区的总政策的一种新方针，而不是符合于对中国市场的实际需要。因为尽管法国的利益对中国的经济具有一定影响，但反过来，对法国经济来说，中国的重要性却是很小的。对

① AE, 406/88,《1913年4月2日致财政部的咨文》。

② 按照雷麦前引书第58页的估算，1914年总额达十六亿一千零三十万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1911年很可能是十一亿美元左右，即五十五亿法郎（根据有关外债及工业的各种中国资料汇编计算）。

③ AE, 405/196,《法国驻天津领事1911年8月24日的报告》。关于东方汇理银行的特殊地位，又见357/262,《1912年3月31日关于中国借款的报告》；406/18,《1912年5月21日殖民部致普恩加来(Poincaré)的信》。

④ 该国际银行团由英、美、德、法四个银行团组成，借款总额由四家均摊。

⑤ 作者1981年11月25日和12月10日两次来信，对这句话作了说明，大意如下：关于1911年4月15日的币制实业借款及5月20日的湖广铁路借款两者的数额都是二亿五千万法郎一事，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有两件重要文件都是这样说的，见AE, 356/10—17,《1912年1月9日给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指示》；357/260—281,《1912年3月31日关于中国借款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贝特洛起草的，普恩加来阅过）。这个数字与4月15日合同中的借款额一千万英镑相符（当时一英镑合二十五法国法郎），但与5月20日合同中的借款额六百万英镑不符。湖广铁路借款第一批债券六百万英镑于1911年7月发行（巴黎、伦敦、柏林、纽约市场各发行一百五十万英镑）。根据合同，如果六百万英镑不敷工程所需，四国银行团可按同样条件发行第二批债券四百万英镑。——校者

华贸易充其量占法国外贸总值的百分之一，^①而在华投资只占法国整个对外投资的大约四十分之一。^②反之，从政治观点来看，中国由于毗邻印度支那，所以对法国政府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法国为了确保东京^③的边界，使中国和其他列强承认了它在中国南方的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的“特殊利益”；在广东，它从1898年起就占有了广州湾租借地。它竭尽全力鼓励其国民在这些地方兴办企业，并将在这些地方传播天主教的特权保留给法国各教会。^④不过，若干年以来，法国为捍卫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已较少依靠单独行动，而较多地依靠与其他列强协调一致的政策。

1904年签订的英法协约，密切了法国同那个在中国地位最牢固的强国——英国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协约的基础上，法国的上述方针才得以实现，结果是形成了以完全控制中国金融为目的的1911年4月的国际银行团。^⑤法国本身当时和英国在金融领域里具有最优越的条件，它在促使列强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的同时，也考虑到，它的伙伴们对保护各自资本关心，将会诱使它们在中国维持和平和现状。因此，它尽力设法将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在东亚制造武装冲突的主要国家拉入国际银行团里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对该银行团抱有敌意的，因为该银行团打破了它们在满洲的

① 虽然法国吸收了中国整个出口的10.7%，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1955年版），第65—66页。

② 根据费伊斯（H. Feis）：《欧洲：世界的银行家》第51页提供的对外投资数字。

③ 东京是西方人对越南北部的称呼，中国曾称之为北圻。本文正文中“东京”一词，除另有注明外，皆指此。——译者

④ 保留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满洲的俄国势力范围。法国一直行使对天主教所有各教会的保护权（从1902年起，意大利各教会除外），但自从教会和国家分离后，这种特权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政治武器了；如果说这种特权还有点影响的话，那主要是在印度支那附近一带，而且是在当时人们所说的神甫们“保存着法兰西爱国主义灵魂”的范围内。

⑤ 据作者1981年11月25日来函，“1911年4月的国际银行团”应改为“1910年11月正式创立的国际银行团”。——校者

特权，而这些特权是法国已经正式承认了的。^① 谈判拖延了下来。法国政府感到必须避免触怒与英国结盟的日本。^② 另一方面，法国在希望使俄国放弃那种在远东过于积极而可能忽略欧洲的政策的同时，又力求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这一同盟者；在1911年夏秋的形势下，这个同盟者的支持对法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当时法德关系正处在危机中，阿加迪尔纠纷是直到1911年11月4日才得到解决的。

如果说内阁总理无暇顾及中国的话，那么它的外交部长德塞尔韦 (de Selves) 也并不是一个对中国发展特别感兴趣的人。从1912年1月16日起，普恩加来 (Poincaré) 更多地关心中国问题了，但也并没有亲自做出什么决定。这种情况，加上与中国之间通讯缓慢，^③ 就给外交官们留下了相当大的发挥主动性的余地。菲利普·贝特洛 (Philippe Berthelot) 当时是法国外交部的亚洲处长。他在远东任职期间 (1902—1904年)，曾在中国停留过一年，因此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他访问过中国的中部各省，还去过四川，这引起了他对中国南北方之间的差别的注意。这次旅行除了使他对亚洲的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外，还使他深信中国是还能够提供广阔的经济活动场所的唯一国家。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曾在北京、上海以及汉口任职过若干年。直到1912年1月10日为止，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一直是临时代办弗朗索瓦·乔治·皮科 (François Georges—Picot) 领导的，当时，公使保罗·马士理 (Paul de Margerie) 正在参加暹罗国王的加冕典礼。他们两人一个是优柔寡断，另一个则注重实际而又充满自信，但对中国都缺乏深刻的了解。领事们的情况则与他们不同。

① 1907年7月10日法日协定。法国屡次重申，它向俄国保证在长城以北、从满洲一直到新疆支持俄国。(校者按：“7月”应为“6月”。)

② 因1905年8月12日的条约而结盟，此条约于1911年7月13日改订。校者按：英日同盟条约是1902年1月30日签订的，1905年8月和1911年7月先后两次改订。

③ 从北京和沿海各领事馆到巴黎，电报需要二十四小时，紧急公文需要两、三个星期。而从内地，电报通常需要两天或更长时间，紧急公文则需要两、三个月。

在十七个领事馆和领事代理处中，有十五个其负责人懂中文，他们全都在中国起码呆了五年，其中有八人在中国已呆了十五年或者更久。这些差别，再加上领事们的个人性格及其驻地的地理差异，就使法国的在华外交常常出现一些奇特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有时却被帝国主义这种笼统的提法掩盖住了。

法国外交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最初是凭经验明确起来的，并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都认为事态可根据所出现的不同问题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革命胜利及事实上的中立

(1911年9—10月)

1911年9月，因政府收回由地方公司所持有的铁路让与权，四川发生了相当激烈的骚乱。驻该省的法国外交官很快就看出了形势的严重性。他们强调了这样的事实：这场运动起初只反对政府，很快就走向反对“权力”，即“官吏、统治者”，并发展成为反对王朝的革命运动。^①成都领事馆的主事9月12日写道：“斗争是严酷的，叛乱组织得非常有力。”^②当驻北京公使馆认为“满洲人这次大概又将躲过骚乱”^③时，目击者们以及上海和汉口的领事们则比较谨慎。汉口领事说：“居民的苦难为革命者提供了有利的土壤。”^④骚乱并没有出现排外的趋势，驻四川的外交官们认为，只要在重庆保持已停泊在那里的那艘炮舰就够了，只有在法国侨民

① AE, 26/220, <1911年8月25日成都的报告>; 26/241, <1911年8月30日重庆的报告>; 27/273, <1911年10月11日重庆的报告>。

② AE, 27/78, <1911年9月12日成都的报告>。

③ AE, 27/105, <1911年9月16日驻北京武官的报告>。

④ AE, 27/240, <1911年10月2日汉口的报告>。

的财产或生命受到侵害时才考虑进行干涉。^① 法国驻北京代办赞同这一观点，但并不掩饰他对清政府的同情，特别是对四川反对的对象、邮传部尚书的同情，他希望外国人在财政上支持该尚书的政策。^② 法国驻华武官走得更远，他考虑到中国政府很快就会要求军事援助，他写道：“不让日本成为唯一插手的国家——这手在一开头是援助之手，但很快就会变为保护者——而由各国占领军参加援助，以维护欧洲人在这里的影响和权利，是很必要的。”^③

在巴黎，法国政府对四川的反叛并不很担心；关于这次反叛，除了报纸上简短的电讯^④之外，法国政府所收到的仅仅是来自北京的消息。^⑤ 法国外交部一有机会，就叮嘱要谨慎从事，要保卫法国通过各项条约所得到的权利。当外交部得知中国政府根据1909年的一项条约要求提供被印度支那驱逐出境的一些中国人的体貌特征时，它便请求殖民部同意这一要求，而不顾印度支那总督的反对；总督认为“不该与那些明天可能掌权的人作对”。贝特洛在他所写的咨文中明确指出，“使我们被指责为对中国南方的动乱采取支持的态度，那是非常危险的。”^⑥ 这种危险，其原因是很容易猜出的。法国将会被指责为企图浑水摸鱼。当法国正在为解决阿加迪尔事件而进行艰难的谈判的时候，最好不要使自己的各个盟国感到不快，也不要给德国提供更多的口实。在这件拒绝了高级殖民官员所作的推测的咨文中，没有表现出对中国政府

① 《海军部档案，参谋部第三厅》，1911年，BB 3 1335，《“杜达尔·德·拉格雷号”(Doudart de Lagrée) 舰长1911年10月自重庆的报告》。

② AE, 27/259,《1911年10月9日北京的报告》。

③ 陆军参谋部第二局，《中国，1910—1913年武官报告》，第13号卷，《1911年9月16日的报告》。

④ 这些电讯的内容见张馥蕊的论文（打印本）《法国舆论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巴黎1951年版）。

⑤ 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前，法国外交部只收到两份电报和9月16日的紧急报告（内有武官报告的副本）。来自成都和重庆的直接情报是11月初收到的，是为第一批官方报告；9月末和10月初的报告则一直到1912年2月才收到。

⑥ AE, 204/68,《外交部长1911年9月14日致殖民部长的咨文》。

的命运有任何特别的不安。

问题不再是对中国政府进行帮助。9月23日，四国银行团的代表在柏林开会。根据法国的要求，他们同意了俄国和日本关于向满洲投资所提出的异议。鉴于欧洲市场的状况，他们决定等到1912年4月再发行债券。法国外交部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去要求把第一次向中国付款的日期提前，也没有在关于这些金融交易情况的通报中命令驻外大使们就这个问题同其他各国政府进行磋商。^①

对情况缺乏了解的法国政府，肯定并没有想象到四川风潮的严重性，但它的谨慎政策却完全符合事变现场的法国侨民的愿望，而并不符合在北京的武官和代办的雄心勃勃的想法。

10月10日武昌的武装起义、革命政府的成立、运动向长江流域各省以及陕西、广东等地的扩展，这些都带来了新的问题。

当时，革命给法国人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小的。商业活动当然中断了；在四川和西藏，一些传教士和旅行者受到某些损害和虐待，但这是土匪们干的。^②据外交官们的看法，这次革命不是排外的，只有在首长们控制不了其部下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排外。这后一种假设在公使馆看来是非常可能出现的。^③与此相反，驻汉口和上海的领事们却显然显得不那么担心。^④

这些意见分歧是由于外交官们对革命的力量估计不同而产生的。在长江流域，领事们相信运动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并且

① AE, 355/87—89, <1911年10月10日给驻彼得堡、伦敦、柏林、东京、华盛顿大使和驻北京公使的通报>。

② AE, 28/208, <1911年10月28日成都的报告>;
27/287, <1911年10月11日重庆的报告>。

③ AE, 28/8, <1911年10月16日北京的报告>。

④ AE, 27/313, <1911年10月13日汉口的报告>;
28/26, <10月17日上海的报告>;
28/35, <1911年10月19日上海的报告>。

对革命者们的出色的行政管理、他们的积极性和勇气表示敬佩。^①在云南，使法国领事感到担心的是该省的“落后状况”，而不是革命的内在价值。公使馆对革命者很少好感，尽管它有时也谈到“解放运动”，^②可它在10月23日的电报中还是说：“革命运动似乎正在节节胜利，今天各使馆都笼罩着一种悲观之感”。^③为什么会有这种“悲观”呢？因为在北方，外交官们认为革命就要带来混乱，而居住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法国人却认为正出现一种民主政体，这引起他们的好感。好感在某些情况下虽然是真诚的，^④但并非没有任何打算；正如海军元帅德卡斯特里（de Castries）所说，里面掺入了“能够敲诈这个新政府的一种希望，因为从现政府那里得到什么东西，已经变得很难了”。^⑤

信念和利益两者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外交官们在清政府和革命者之间的冲突中所采取的正式态度。表示态度的问题是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出现的，如在地方当局请求法国给予帮助方面以及法国有正式代表驻扎的地方、在与革命政权的关系方面。从攻克武昌之日起，就开始出现帮助满清当局的问题。汉口道台要求外国领事使用他们的炮舰进行巡逻，以阻止叛乱分子渡江占领该

① AE, 28/72-3, 《1911年10月20日汉口的报告》；
28/215, 《1911年10月26日汉口的报告》；
28/164, 《1911年10月26日上海的报告》。

② 陆军参谋部，第二局，《中国，1910—1913年武官报告》，第13号卷，《1911年10月23日报告》。

③ AE, 28/109, 《1911年10月23日北京电报》。

④ 尤其是跟孙中山比较熟识的法国驻汉口领事雷奥（Réau）的情况，他在1911年11月9日写给贝特洛的信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AE, 29/134-5）。而孙本人也说到“法国领事罗氏（按：即雷奥）乃予旧交。”[英文本《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忆录》（台北1953年版），第170页。按：原文见《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有志竟成》]。1905年雷奥在巴黎就已经同孙及其支持者们有了很密切的关系，随后，1905—1907年他在蒙自担任领事期间，当法国政府打算支持孙的种种行动时，他们之间依旧保持着这种密切的关系。

⑤ 《海军部档案，参谋部第三厅》，BB 3 1335, 《1911年10月25日汉口的报告》。

城。英国领事已经准备接受这一要求，^①但领事团最后拒绝了。孙中山追述道，外国在那时进行干涉会使全国的起义再一次受挫，是法国领事出于对革命事业长期所抱有的同情，说服了他的同僚，使他们对一个他希望给予支持的革命的目的感到放心。^②雷奥在他10月13日的报告里没有指出是谁首先提出拒绝的，也没有提到曾“追随”其他同僚的意见。这种严守秘密的做法证实了其他种种迹象，^③也似乎进一步肯定了他是对这件事负有完全责任的：他自己若是向外交部夸耀自己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有受责备的危险，那也就太愚蠢了。但即使这位领事是暗中受了共和思想的指引，他的态度也还是如他自己所说，和现实的考虑是一致的。不管革命的结局怎样，支持令人憎恶的满清当局将会使外国人受到人民的制裁。至于与革命政府之间的关系，雷奥完全是按照实际需要的标准处理这些问题的。从10月16日起，他就与革命政府建立了非正式的接触。他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拒绝向革命的领导者们宣布租界中立，以免显得是承认了他们的交战者地位。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以“实行严格的中立”为理由，避免将京汉铁路的收入交给新的当局。^④

其他领事们也同样谨慎从事。驻天津领事同意向湖北转交总督的电报，但拒绝交出或揭发已经在法租界内的革命者，也不准中国警察到法租界进行侦查。^⑤当地方当局来了解法国是否同意废除辛丑条约中关于中国在天津只能保持警察力量的条款时，他

① 似乎他为了得到干涉的借口，甚至曾暗示中国官员该怎么做。AE, 27/305, <1911年10月13日汉口的报告>。

② 孙中山：《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70—171页。

③ 汉口的侨民对领事的行动不满，过了不久就组织了一个联合会来保卫自己的利益。AE, 30/165及以下各页，<1911年11月19日汉口的报告>；33/77，<1911年12月18日北京的报告>。

④ AE, 128/164-5, <1911年10月24日汉口的报告>。

⑤ AE, 28/18, <1911年10月16日天津的报告>；
28/194, <1911年10月26日天津的报告>。

反驳说“还没有必要采取过分的预防措施”。^① 驻昆明领事在帝国外交委员问他如发生动乱，法国政府是否将从印度支那派遣军队时，回答得也同样含糊其词。^②

在北京，最重要的方面是对清政府的借款要求所表示的态度。清政府因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亟需用钱，几次请求国际银行团给予不超过五百万两的预付款。法国代办于10月18日写道：“我以为，在取得帝国的担保和对资金的控制的情况下，我们既要不流露出对当局的反对态度，又要拒绝在如此有限的范围内给予援助，那是很困难的。”^③

到这时为止，法国政府所关心的还仅仅是本国国民的命运和其他列强的阴谋。它坚决拒绝了美国所提出的将所有外国人都集中到沿海各主要口岸的计划，说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危险构成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④ 它还更加反对进行军事干涉，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干涉会引起排外情绪，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拴住了它，使它难以参加这种干涉，并且它有可能受其伙伴们的骗。借款问题对它似乎是一个限制其伙伴们的野心的手段，可以使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不那么危险、而法国又更直接发生兴趣的金融问题上来。10月19日，当英国驻法大使馆就清政府的要求征求法国政府的意见，并指出英国驻北京公使对此表示不赞成时，^⑤ 法国外交部当即反驳了后者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外交部引用两天前收到的乔治-皮科的电报中的原话，坚定地表示同意借款，条件是这笔借款须有一项对款项的使用实行监督的办法相配合，并且不得以任何方式与币制改革借款发生联系——对币制改革借款，俄国已提出

① AE, 28/280, 《1911年10月31日天津的报告》。

校者按：关于中国在天津只能保持警察力量，不是辛丑条约的规定，而是1902年7月各国公使与清政府往来照会中的规定。

② AE, 28/282, 《1911年10月17日昆明的报告》。

③ AE, 355/91, 《1911年10月18日北京电报》。

④ AE, 128/152, 《1911年10月16日美国大使馆秘书来访纪要》。

⑤ AE, 355/92, 《1911年10月19日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口头照会》。

反对，法国同意俄国的意见。^①这时，外交部正受到来自北京的消息的影响，这些消息告诉它，朝廷已起用袁世凯，“悲观主义被夸大了”；另一方面，外交部知道东方汇理银行是信任袁世凯的。^②虽然协商是由英国发起的，法国的有力支持却有助于把谈判进一步向前推进。其他各国政府接受了巴黎所提出的那两项条件，英国驻北京公使制定了一项对预付款的使用加以监督的计划，内容包括必须建立一个有袁世凯和载泽公爵这样的人参加的“经过改革的政府”。^③但就在这时候，法国外交部突然对贷款的原则本身变得有所保留了。中国的共和派拍电报，发声明，宣布将不承认给清政府的新贷款并将对外货进行抵制，这大概使法国外交部感到不安。来自东京^④的消息使法国外交部担心日本会以其他列强的行动为借口，在镇压骚乱方面进行更积极的干预。^⑤尤其是10月末，革命的进展以及袁世凯的无所事事，使得对清政府的怀疑增加了。^⑥10月24日，与国际银行团有关的各个财团通知说它们不再同意借款。^⑦鉴于这种种情况，要法国外交部去试图对东方汇理银行施加压力，使之改变意见，那是不大可能的。反过来，要想知道该银行在多大程度上启发了贝特洛在10月25日所写的那件答复23日英国的来照并概述法国新立场的照会的措辞，则更加困难。这个照会强调指出，不应该“最终危害到”满清王朝，“袁和载公（载泽）在欧洲人的扶植下上台，这在一个

① AE, 355/96, <1911年10月20日外交部致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口头照会>。

② AE, 28/17, <1911年10月16日北京电报>; 28/34, <1911年10月18日北京电报>。

③ AE, 355/101, <1911年10月21日法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 355/104, <1911年10月23日外交部长给法国驻伦敦、柏林、华盛顿、东京、彼得堡、北京各大使的电报>; 355/107, <1911年10月24日法国驻彼得堡大使的电报>; 355/102, <1911年10月23日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口头照会>。

④ 指日本首都。——译者

⑤ AE, 355/106, <1911年10月24日驻东京代办的电报>。

⑥ AE, 28/80, <1911年10月21日北京电报>; 28/109, <10月24日北京电报>。

⑦ AE, 355/105, <1911年10月24日法国驻伦敦大使的电报>。

民族感十分强烈的国家里同样有损坏他们名望的危险”。^①这份照会意味着法国政府希望看到袁世凯成为中国的首脑，但不能说从这时起法国的政策就受要使袁取得政权这一愿望的指导了：它只不过是在谨慎地对待这位人物，作为对眼前困难的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

法国政府虽然有这种意图，但到底还是采取了事实上的中立，甚至在金融方面也是如此，这样就使自己的态度同在中国的本国官员们的态度一致起来了。但必须着重指出，这种外交上的表面的统一掩盖着实际上的意见分歧。驻汉口和上海的领事选择中立是出于坚信满清不值得支持。而驻北京的公使馆和巴黎的外交部则相反，它们根本不相信保全现政府是不可取的。它们采取中立很象是为暂缓作出决策而采用的一种尽量使自己少受牵连的方法，很象是为检验双方的力量而使用的一种碰运气的手段，而不是从明确的迫切需要出发经过协商而制定的策略。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法国外交才确定了自己的政策路线。

二、在袁世凯与共和派之间：积极中立

(1911年11—12月)

10月31日汉口的收复、授予袁世凯以全权及内阁总理之职、山西起义的失败，所有这些都从11月初使朝廷方面的日子好过多了。从11月末到12月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北方呈现出恢复的样子；但同一期间，革命却扩展到了所有南方各省，那些省都成立了共和派的军政府，由设在上海的一个代表会议作它们的代表。南北两方开始进行谈判。11月初第一次尝试失败。12月2日又重

^① A E, 355/109, 《1911年10月25日外交部致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口头照会》。在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没有留下在起草这份照会之前曾与东方汇理银行有过任何接触的记载，但贝特洛与该银行经理斯坦尼斯拉斯·西蒙 (Stanislas Simon) 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因此不能排除他曾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

新进行会谈，并导致了12月20日^①在上海开始的正式谈判。

在这段时间里，动乱给法国人造成的物质损失比前一段时间要大，但还是有限的：损失和破坏共计为一千万法郎，一名传教士被杀。抢劫以及特别是对以后遭受更严重的抢劫所感到的担心，使得法国官方加强了对其侨民的军事保护；而在上海，这种加强是符合中国革命者们自己所表达的愿望的。^②但是，支持军事干涉的人很少；虽然法国公使馆强调不应该排除军事干涉的可能性，^③但大多数领事馆都对此表示反对，其余各领事馆甚至回避这个问题。12月初，当叛兵在蒙自及云南铁路上杀害和抢劫了一些外国侨民时，法国外交部不顾副领事的惊慌和铁路公司的恳求，^④立即决定反对撤侨和反对武装干涉。它建议仅仅以撤侨及军事干涉相威胁，以促使当地共和当局自己去保护法国人，甚至可以资助这些地方当局维持必需的军队。^⑤印度支那政府在东京的报刊、某些军人以及河内和海防的商会的影 响下，最初倾向于进行军事干涉，但很快便赞同外交部的意见了。^⑥

法国外交部强调，派遣一支军队除了有在东京的边境上“唤醒中国人的狂热”这样一种缺点之外，还会引起外交和军事上的困难。实际上，就连英国这样一个友好国家，也曾多次对法国的意图感到担心；另外，军队必然从印度支那派遣，其多数将由安南人组成，这些人难保不与中国人进行合作。^⑦对于云南，法国

① 应为18日。——校者

② AE, 29/54, 《1911年11月4日上海的报告》。

③ AE, 128/293, 《1911年12月22日北京的报告》；31/111, 《1911年11月28日北京的报告》。

④ AE, 32/65-79, 《1911年12月6日、7日河内的电报》；32/220-1, 《1911年12月9日滇越铁路公司的来信》。

⑤ AE, 32/69, 《1911年12月6日外交部长给驻昆明领事的电报》。云南的共和政府自愿地接受了这些援款。

⑥ AE, 32/235, 由印度支那总督转交的《1911年12月11日河内电报》；36/200, 《1912年2月1日昆明的报告》。

⑦ AE, 32/139, 《1911年12月8日印度支那总督的电报》；32/70, 在外交部长同意下草拟的《殖民部长1911年12月6日给印度支那总督的电报》。

政府保留在破坏大段铁路和反复出现针对外国人的谋杀这类有限制的情况时进行军事干涉之权。^①

在地方上，领事们与由革命产生的各地当局都达成了临时协议，有时还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例如在云南)，但这种支持总是有限的，并且指定用于维持警察力量。在共和派还没有掌权的地方，可能的资助就到了效忠于清朝的官员们之手。当夺取政权迫在眉睫时，法国总是注意去平衡两个阵营之间的利益。谨慎和克制继续支配着这些关系。但是，在中部和南部，领事们一般都认为和新主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和帝国政权之间的关系单纯。驻广州和汉口的领事承认，他们与革命当局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好些，驻汉口领事从11月15日起就建议承认新的现状，至少在长江流域应该这样做。^②

但是，承认共和制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公使馆和外交部服从的是其他考虑，而不是这位驻汉口的领事。公使馆一直属意于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老练的人”，^③是“政府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倚靠”，^④是“还能使中国避免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唯一力量”。^⑤公使馆对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毫不担心，因为它认为他是革新派，是国家现代化的拥护者，为了国家的现代化，他曾预见到要特别求助于法国。此外，除了11月24日至12月5日之间的几天外，法国代办一直都认为袁世凯将会维护满清王朝。他对照顾袁世凯的名誉表示关注，这表现于当外交团在11月16日就平民遭受屠杀向帝国政府提出抗议时，他使得通过上海的领事团向革命派的领导者们也采取了一项类似的作法。^⑥乔治·皮科

① AE, 32/222-3, 《贝特洛为部长会议草拟的1911年12月9日通知》。

② AE, 30/105, 《1911年11月15日驻汉口领事致贝特洛的信》。

③ AE, 28/5, 《1911年10月16日北京的报告》。

④ 陆军参谋部，第二局，《中国，1910—1913年武官报告》，第13号卷，《1911年11月16日的报告》。

⑤ AE, 32/318, 《1911年12月15日北京的报告》。

⑥ AE, 128/268, 《1911年12月9日北京的报告》。

向外交部热情地称赞刚刚和帝国政府签订了借款合同的勾堆 (Cottu) 男爵, 指出, 这件事“格外重要, 因为它们 (借款合同) 造成的结果将是: 袁得到了钱就完全有可能控制住局势”。^① 12月15日, 他坚决要求法国政府会同其他列强向参加上海会议的帝国代表团和共和代表团的团长递交一份照会, 要求他们尽早停止冲突。乔治·皮科和俄国代办一起起草了这个照会, 他并不掩饰: 在外交团的思想中, 这样做是预定支持袁世凯的。^② 该照会经各国政府批准之后, 于12月20日交给了参加会谈的南北双方的代表。这样, 法国便从袖手旁观转到了积极中立。

但是, 负责向南北双方代表递交这份照会的法国驻上海领事德让·德拉巴蒂 (Dejean de la Bâtie) 却强烈地反对这一“勾当”。他之所以反对有两个理由。一方面, 他对袁世凯不信任, 认为袁的威信是“虚幻的”, 是否诚实也是可疑的; 他宁愿看到共和派来领导中国。另一方面, 他担心, 不管事变的结局如何, 这一做法——在中国自由派报刊上引起了极坏的反应——会引起排外情绪。^③ 德让的这种反应表明了法国领事们的信念。从11月初起, 他们就不再相信还能继续维持王朝了。至于袁世凯, 他们认为, 他不仅不能拯救满清王朝, 甚至很可能连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所需要的威望都没有。^④

法国外交部虽然批准了12月20日的这个做法, 但它的态度很少是受了驻北京公使馆的意见的影响, 而受领事们的意见的影响

① AE, 355/150, <1911年12月1日北京电报>; 355/133, <1911年11月16日北京报告>。

② AE, 32/318-320, <1911年12月15日北京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所提供的证据, 与E·别洛夫和余绳武 (前引书、文) 的说法相反, 这次行动并非来自俄国代办的倡议。俄国代办对此是很不赞成的, 这一点, 再加上他的级别低, 正是他被邀请与乔治·皮科一同起草该照会的原因之一。这次行动是英国公使同他的日本同僚商谈后提出来的。

③ AE, 33/149, <1911年12月23日上海的报告>。

④ AE, 29/57, <1911年11月4日上海的报告>; AE, 30/263, <1911年11月22日天津的报告>; AE, 31/79, <1911年11月26日驻汉口领事给贝特洛的信>。

就更小。它的态度在金融合作的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在10月末放弃借款计划之后，法国政府就已向英国政府保证，只要中国的政治形势仍捉摸不定，就不支持给中国以任何贷款。^①在11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组成四国银行团中的法国财团的那些金融机构都一致同意遵循外交部的上述意见。第二天，在巴黎开会的四国银行团的代表们通过了含义与此相同的决议。^②在这种情况下，勾堆借款是很难得到同意的，尽管这些借款可望给法国的工业带来许多好处。

勾堆自称代表法比财团，于10月27日和12月1日分别签署了金额为九千万法郎和六千万法郎的借款，随同这两笔借款还有一项在汉口建造一座长江大桥的合同，由施奈德负责执行。似乎勾堆是以个人的名义承揽这次生意的，意在把这些合同转让给那些大银行。他曾经向英国和美国的银行进行过试探，而这些银行因它们本国政府的反对而拒绝了。但很快贝特洛便透过与俄国政府有关的问题而怀疑到勾堆的交易是俄亚银行为暗中破坏四国银行团而做的一次尝试。12月2日，贝特洛不许这些债券进入市场。这样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贝特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③他在12月3日给北京的一份电报中列举了这些原因：这是为了遵守对英国政府以及对四国银行团所作出的在中国的形势未稳定之前、不支持给中国任何借款的许诺。^④中国的革命者和名流发来大量电报，以进行报复来威胁法国人，^⑤这可能坚定了贝特洛的意向，但是，主导的因素似乎还是关心于不要和英国分开。

① AE, 355/129, <1911年11月7日外交部致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照会>, 答复11月4日的来照。

② AE, 355/132, <1911年11月13日东方汇理银行经理斯坦尼斯拉斯·西蒙给贝特洛的信>。

③ AE, 355/169, <1911年12月5日给外交部长的报告>, 报告中解释了用什么样的借口向前来商谈勾堆借款的中国代办“掩盖我们不予支持的政治原因”。

④ AE, 355/160, <1911年12月3日给北京的电报>。

⑤ AE, 29/54, <1911年11月4日上海的报告>; 355/174, <1911年12月7日上海的报告>; 355/161, <直隶省咨议局给法国参议院的电报>。

果然，从摄政王退位的第二天即12月7日起，英国政府改变了对银行团所赞同的一项借款所持的反对态度，法国外交部便允许东方汇理银行在这个问题上去与其他财团合作，甚至还打算重新提出勾堆借款。^① 英国所考虑的借款是一笔三百万两的预付款，用于保证在与革命者进行谈判期间帝国行政部门的活动。因为英国的臣民和利益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或多或少要受叛乱者们的支配，所以，英国为了避免报复，希望起义者们对这项借款给予赞同。^② 俄国反对法国银行参与这一活动，因为它想使这些法国银行脱离四国银行团，并使它们与俄国及日本的银行一起组成一个新的财团。法国注意到了这个手法并了解到德国对于需取得革命者的事先同意这种作法是否恰当已表示了保留态度，^③ 便强烈地提出了行动一致的原则。如果革命者们看到列强同意借款是协调一致的，他们“将避免伤害欧洲人，以免遭到既迅速而又会使他们的希望破灭的惩罚”。因此，只需将预付款及其原因通知他们就就行了。假如所有列强都不赞成这项交易，法国也将不让本国的银行家们参与其事：“无论是在对革命者还是在对政府的活动中，列强的行动一致都是最重要的”。^④

金融中立是英国提出来的，而列强行动一致则确实是法国的主张。不仅在金融方面，而且在有关外交的领域里，列强行动一致都包括了俄国和日本，如同包括与四国银行团有关的那些政府一样。它与一件明确的事实有关：当时的报纸指出英日两国驻上海领事正在南北两方之间起调停者的作用；这些各别的活动使法国外交部感到不安。^⑤ 但行动一致的原则特别能够将法国的政策上的各种迫切需要协调起来：在与英国保持谅解的同时，保证不

① AE, 355/180, 《1911年12月8日给外交部长的报告》。

② AE, 355/188, 《1911年12月8日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口头照会》。

③ AE, 355/180, 《1911年12月8日给外交部长的报告》；355/195, 《1911年12月10日法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

④ AE, 355/200-1, 《1911年12月18日致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照会》。

⑤ AE, 355/205, 《1911年12月20日外交部长给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电报》。

采取会引起俄国反对的行动，并且逐渐做到把俄国及日本吸收到国际银行团里来。当12月20日法国政府与所有列强一起对上海和谈代表采取行动时，这项原则就已经实行过了。然而由于英国的倡议，关于借款的协商于12月23日中断，共和派和帝国之间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法国外交仍然保持着事实上的中立，但这种中立与列强行动一致的原则结合在一起，逐渐象是成了一种法国可以据以对某些措施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的理论，而不只是停留于消极被动。从表面上看来，是政府将其政策强加给了各个银行，至少这两方面都是这样说的。^① 云南的情况是很清楚的，那里法国政府对商人们的不合时宜的要求进行了限制。然而，可以肯定：东方汇理银行在政府就勾堆借款征求其意见时，曾唆使政府不要让那项借款进入市场；12月间该银行曾促使外交部同意三百万两的借款。^② 但由于在这两点上各银行的观点与政府的“重大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很难逐一说明它们的影响。

在这些“重大利益”当中，法国插手云南可以说是一种与征服欲或控制欲无关、但与印度支那边境的安全问题有关的地区性事务，而这个边境安全问题是政府十分担忧的。有关云南、广东、广西所成立的各共和政府的意图、边界事件以及在华越南人的活动等的文书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③ 然而，特别指导法国的政策的，是想同英国保持亲密的谅解以及不得罪俄国这样一种愿望。英国希望建立由袁世凯所领导的君主立宪政体，因此法国政府在向孙中山的使者答以法国对革命的态度将取决于革命对其侨民所

① 《东方汇理银行董事会报告》，(1911年)；AE, 355/132, 《1911年11月13日东方汇理银行经理的信》；355/159, 《1911年12月2日外交部长给法国驻伦敦大使的电报》；355/200, 《1911年12月18日致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照会》。

② AE, 355/175, 《1911年12月7日东方汇理银行经理给北京的电报》。

③ 特别见AE, 《中国文书, 新编》第29—37卷(内政——综述)；《印度支那, 新编》第12卷(在中国的安南叛乱分子)和第21—22卷(中国-安南边界)。

给予的保护之后，^①又指示驻沪领事告诉上海的共和派外交部长伍廷芳说，“为了中国的利益，应该使谈判尽早成功，何况民族感情始终胜过反对王朝的感情”。^②当英国政府在12月底停止对袁世凯的支持时，法国也马上跟着这样做了；当时法国驻北京公使试图说服帝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接受共和制。^③然而，因为有行动一致的原则在先，要照顾俄国的利益，故讨好英国的这种行动就稍显逊色了。

法国就是这样严格地遵守了对各个盟国所承担的义务。这一行动准则不是只有讲信用这样一种好处，而且也照顾了法国总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但是，只有到1月初，法国政府才认为有可能根据这些利益和中国的新形势来确定自己的明确目标以及使自己能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

三、南北妥协和法国的保全政策

(1912年1—2月)

1912年1月9日向驻圣彼得堡大使发出的一份长篇指示阐明了法国的对华政策；这份指示同时也通知了法国驻伦敦、柏林、东京、华盛顿和北京的代表。这是一项金融政策，其目的是对中国建立财政监督；各主要列强与此将都有利害关系，但这主要将由巴黎和伦敦领导，它们的市场能够满足中国的巨大需要。国际银行团的建立已经是沿这条道路迈出了第一步。法国对俄日两国就有关满洲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已给予支持，但不能象俄国政府、

^① AE, 204/78,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的使者胡秉柯拜会贝特洛纪要>。据作者1981年11月25日及12月10日两次来信：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弄清了胡秉柯这次拜会的是布瓦梭纳，而不是贝特洛。布瓦梭纳(Jean-Baptiste Boissonnas)自1909年10月起在法国外交部亚洲处任负责起草公文的专员(Rédacteur)之职，直到1911年11月28日。——校者

^② AE, 355/179, <1911年12月8日外交部长给法国驻上海领事的电报>。

^③ AE, 33/145, <1911年12月23日上海电报>。

特别是俄国驻巴黎大使伊斯沃尔斯基(Iswolsky)所希望的那样,同意退出国际银行团,以便组成一个法、俄、日财团,把中国北方的事务保留给自己,而把其他地区交给一个敌对的英、德、美财团。因为,如果对此予以同意,法国就会因单方面解除自己的义务而丧失信誉;就会违背自己以前的金融政策所带来的总的利益,违背自己在中国南方所拥有的特殊利益;法国的“活动就会违背白人世界那种模糊的但确实存在的意志”,归根结蒂,让日本占了便宜。法国主张订立金融和政治方面的“六国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列强各自的“特殊利益”都应相互得到承认,六国在中国执行一项“保全政策”。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自己安排不了自己的事,而世界也不能对它的善后事宜漠不关心,它的善后事宜特别需要钱。”经验已经证明了各别的政策以及列强在北京进行竞争的政策的各种缺点,那种政策过分地抬高了中国的信用,并且有为了日本一国的利益而导致中国瓦解的危险。另一方面,法国的主要力量在于它的大量流动资金,它已决定利用这些资金来为它的政治、工业及储蓄谋求好处,而不是再继续用来专门为俄国服务。由于有钱,所以法国在六国协定中将起领导作用,这个协定也将保证它的投资的安全,并将为它在中国南方的利益提供国际保障。最后,法国所主张的这个全面协定“由于中国当前的形势以及外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这种干涉,外国已予以推迟,但到中华帝国发生悲剧性事件和全面混乱之日,可能迫使它们去进行)”,而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重要性”。^①

这项指示是在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和在南京组成中央政府之后发出的,是在德塞尔韦和伊斯沃尔斯基进行了使他们的观点分歧暴露出来的交谈之后,^②在东方汇理银行于12月29日

^① AE, 356/8及以下各页,《1912年1月9日给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指示》。

^② AE, 356/3,《1912年1月4日德塞尔韦和伊斯沃尔斯基谈话纪要》。

前后所送交的一份备忘录的基础上拟就的。^① 外交部从来自中国的报告中吸收了一些思想，如关于“黄祸”（主要指日本人）的思想，关于单独干涉的危险性的思想；但这项指示的架子则是由法国在欧洲的处境决定的：与英国的协定，与俄国的联盟，需要使它们摆脱在欧洲之外所承担的过重的义务，并防止德国利用这一点来填补真空。金融利益和政治利益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促进的：如果六国协定使法国资本在国际银行团中所占的份额和利润有所增加的话，——因为俄国和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向法国借款——那末法国在这种在华国际协作中所占的首要地位将会有利于它的整个处境。不过这些金融利益都仅仅是一些大银行的利益；对那些较小的企业，法国外交部却显得很轻视，甚至抱有敌意。^②

法国在伦敦、华盛顿、柏林、彼得堡和东京为建立六国银行团的基础而进行了外交上的努力：一方面，要使美国、英国和德国同意接纳俄国和日本以平等地位加入国际银行团；另一方面，则要使俄国和日本同意参加进来。对中国，法国政府执行了“保全政策”，同时努力使其他列强采纳这一政策。这项保全政策的内容在1月9日的指示中并没有加以确定，但其种种要素在后来的文书中都列举出来了。^③

法国外交部不支持向中国的任何一方提供借款，它反对勾堆

① 此备忘录的原文一直未找到，但1912年1月26日东方汇理银行给其驻北京代表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这一点，该信保存在外交部档案中（AE, 356/50）。

② 除了给予勾堆的那种对待外，对待曾谈判小额工业贷款的德马尔透（de Marteau）也是那样（AE, 357/51）。1912—1913年间创办中法实业银行的情况也是具有特色的：亚洲处对最先来谈此事的工商业家们泼了冷水（AE, 406/17—24），但一听说胜利银行和安德烈·贝特洛（André Berthelot，即亚洲处长的哥哥）对此事发生兴趣，便千方百计给予这项事业以方便（AE, 406/46—88）。

③ 在1月27日给驻伦敦、柏林、彼得堡、华盛顿大使馆的电报（AE, 129/48）以及2月4日给这些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的电报（AE, 36/214）中有对这些要素的最系统的陈述。

和山东的清朝官员所签订的一项新合同，^①也拒绝了云南共和当局所提出的一项于法国十分有利的借款要求。^②这些借款会使交战双方得以延长其冲突，而且与巴黎所提倡的金融协定背道而驰。法国在持同样观点的英国的帮助下，迫使日本政府去制止向孙中山贷款。^③

南京政府一再要求给予承认，都被法国政府置之不理。外交部就此问题所拟的一份文件中把由于孙中山的到达而产生的组织轻蔑地称作“勉强可以算是共和组织”。^④孙中山的全权代表张翼枢受到粗鲁的接待。他以私人身分被接见，并被告知，法国与他之间不存在官方关系，甚至也不存在非官方关系；法国政府只承认帝国政府并向帝国政府派有自己的代表。虽然张关于法国在中国南方的“权利和合法愿望”的话引起了一些共鸣，但他还是被告知说，一个“强有力而受尊敬的中央政府是符合中国和所有列强的愿望的”。^⑤关系到此便中断了。

巴黎所希望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是袁世凯掌权的政府。对法国外交部来说，中国实行哪种政体是无所谓的；只是为英国着想，它才曾经对维护清朝显得有兴趣；但在1月初，所有的使馆、甚至法国驻北京公使馆都认为清帝退位已是不可避免，而且所有的外国政府（除沙皇政府外，但不久法国很容易就把它说服了）都偏向袁世凯。法国外交官们与他们的英、日同僚不同，他们没有直接干预北京和南京之间的谈判。但法国驻北京公使遵照巴黎的指示，向袁世凯保证法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⑥当马士理于1

① AE, 356/26, 《1912年1月23日外交部的报告》。

② AE, 204/34, 《1912年1月30日外交部长给法国驻昆明领事的电报》。

③ AE, 356/77, 《1912年2月13日驻东京大使的电报》；356/78, 《1912年2月13日驻伦敦大使的电报》。在1月17日前后，法国是第一个感到不安的国家；当时汇丰银行也在与共和派进行借款谈判。

④ AE, 204/100, 《1912年1月10日外交部呈共和国总统的报告》。

⑤ AE, 35/88, 《1912年1月17日张翼枢拜会外交部纪要》。

⑥ AE, 34/134, 《1912年1月10日北京的电报》。

月14日得知袁世凯打算在清帝退位的同时自己也隐退时，就第一个匆忙赶到这位内阁总理那里，恳求他千万不要那样做，并让他相信，“就我们来说，我们不但希望看到我们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尊重并得到发展，也希望看到中国的完整和统一得到保全；我们首先是希望有一个能够维持秩序的政权……在目前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胜任去做到这一点”。^① 马士理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巴黎热情的赞同。^② 法国政府对袁世凯本人的道德价值并不抱过多的幻想，但当袁在一月底显得受到威胁时，它表示失望；而在2月3日，当事情的解决在望时，则深表满意。^③

1912年2月12日，法国外交部刚得知清帝退位、袁世凯保住了中国的首领之位，就向驻外大使发出指示，要他们和各国政府讨论“未来的借款，以使用以恢复秩序，抚恤牺牲者，偿还以前的借款，整顿财政和货币，发展公共工程”。^④ 这股热劲清楚地表明了法国在华政策的明确、现实、利益攸关的目标。对袁世凯的这种照顾，完全是与要实现这些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目标法国相信是和中国的利益一致的。后来，在3月间，法国外交部想知道中国各省对改变政体的反应。难道这不特别是为了证实可以和袁世凯打交道、他不至于旦夕之间就被推翻吗？

巴黎的这些新指示为北京的公使馆和天津、上海、汉口的领事馆规定了行动准则，它们感到不得不限制与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其他领事馆的情况则不同。在云南、四川和广州，法国领事们和当地共和派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真诚的：拜访、交谈、寒暄不断增

① AE, 204/113, 《1912年1月14日北京的电报》。

② 前一文件的页边注释和《1912年1月15日巴黎给北京的电报》(AE, 204/114)。

③ AE, 129/48, 《外交部长给驻伦敦、柏林、彼得堡、华盛顿大使的电报》: 36/215, 《1912年2月5日给北京的电报》。

④ AE, 356/68, 《1912年2月12日外交部长给驻伦敦、彼得堡、华盛顿、柏林、东京大使和驻北京公使的电报》。

多。这些外交官对于使“杰出、聪明、积极的人物”^①得以上台执政的新政体表示好感，关心公正和公共利益。他们祝贺共和思想的胜利，对于与这种思想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很少感到害怕，但对军国主义却害怕得多，因为共和思想有屈服于其下的危险。^②驻上海领事写道：“严重的事将是革命的失败：幻灭的、被激怒的中国将怨恨全世界。”^③这些想法并不完全是没有私心的：他们也想到，法国在“一个亚洲的姐妹共和国”那里将得到一种特权地位。

* * *

法国政府不顾其领事们的意见，没有象在1907—1908年所曾经打算的那样试图去支持中国的革命者。众所周知的他们和“安南叛乱分子”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的“空谈的民族主义”，使他们受到法国政府的怀疑。而且，这样一种支持中国革命者的态度将会把法国孤立起来，同时也会使法国的总政策的成就陷于危险境地，并由此使法国的金融利益陷于危险境地，即使孙中山出于感激而马上给法国一些实际利益也罢。不过，巴黎是根据国际间的争端来估计中国形势的。法国政府只是在其他国家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的时候才对这个国家关心起来的。法国政府跟着英国在中国保持中立，但它特别关心于避免因中国混乱局面的延长而引起列强的干涉，这会将英国和俄国拖到欧洲以外，而法国是需要它们在欧洲对付德国的。

就国际力量在远东所起的作用而论，在辛亥革命期间，法国的作用大概比英国的作用更重要。事实上，为使各方都遵守中立

① AE, 36/16, <1912年1月31日成都的报告>。

② AE, 35/119, <1912年1月20日厦门的报告>; 36/254及以下各页, <1912年2月10日广州的报告>; 37/127 及以下各页, <1912年2月20日成都的报告>; 37/171, <1912年2月24日昆明的报告>。

③ AE, 32/45, <1911年12月2日上海的报告>。

而突然发怒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也正是法国为结束相互争夺而主张六国协约，是法国把注意力集中到金融问题上，并就此把其他列强都团结起来，使财政援助成为巩固袁世凯政权的最稳妥、最恰当的行动手段。

但就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预而言，法国外交的影响与英国外交相比则居于第二位，因为在当时存在着的各个派别、各种人物和各种政治方案（对这些派别、人物和方案，由法国所实现的国际协调将会给予支持）之间做出选择并将其通知中国人的的是英国人。

要想知道假如英国建议支持孙中山，法国是否会支持他，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此相反，应该强调的是，从中国革命一开始，东方汇理银行就不断向法国外交官员和政府表明他们对袁世凯的偏爱；工商界的大多数人和温和派的报刊也都对他抱有好感，把他看作是秩序和权威的维护者、曾经答应给外国人以有利条件的人。1911年11月孙中山经过巴黎时，会见了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试图从该银行得到贷款。斯坦尼斯拉斯·西蒙以“在冲突期间保持中立”为借口拒绝了孙的借款要求，他对孙为将来所预拟的财政纲领相当担心，特别感到不安的是孙要求取消厘金和把海关管理权归还给中国人——外国的借款就是以中国海关的收入作担保的。^①这样的谈话并不是为了使工商业者们离开袁世凯，即使袁似乎处境不利。

起初，法国政府是倾向于袁世凯的，因为英国为了自己首先主张的君主立宪制方案而看中了他。但后来，在某些时候，由于共和派毫不妥协，英国为加以迁就，准备同时牺牲君主制和袁世

^① AE, 204/107—111, 东方汇理银行送交的该银行经理《斯坦尼斯拉斯·西蒙1911年11月23日在巴黎与孙中山谈话纪要》。

凯；^①而法国则同意舍弃帝制，却不同意抛弃这个老官僚。实际上，在法国首先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做出的最初选择中，对袁世凯的支持是完全符合金融界的心愿的。不过，在中国危机期间，法国外交的力量就在于妥善地调和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也使巴黎能够通过法国的银行家们去说服其他国家。

尽管法国政府愿意扶植袁世凯，但这并不是象一些中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喜欢袁去压制他们的同胞。对法国政府来说，中国只不过是整个帝国主义战场中的一小块，在中国，它是根据欧洲的力量对比来作出决定的。法国政府在其注意到此一问题的范围内，认为使中国避免内部混乱并通过开发中国尚未开发的资源从而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也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是“为它打开全面的文明之利”。但实际上，法国政府从来不是就中国问题本身处理中国问题；其特点是在华外交官们的意见很少受到重视。

与此相反，一些驻华领事却专心致志于了解中国的形势。他们没有经济帝国主义授意给政府的那些粗暴地谋求私利的反应，但是，他们的努力也还是浸透着一种优越感，他们不大能想象，中国如果离开西方的标准而且没有“白人世界”在财政、技术、政治及精神等方面的援助，还能搞好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他们关于法国国家利益的想法也许是着眼于更广阔的未来而产生的，但这种想法仍然属于殖民主义和不成熟的新殖民主义思

^① 据作者1981年11月25日来信，这里应作如下说明：1911年12月底和1912年1月初，当南北两方代表在上海进行的谈判出现僵局时，法国的外交官们和法国政府注意到，英国政府改变了对袁世凯的态度，撤销了前此所给予袁的积极支持；因为当时英国看得很清楚：袁世凯坚持保留君主制，革命派不可能接受；保留君主制势将引起严重的动乱。参阅 A E, 355/197, 《1911年12月17日英国驻巴黎大使的照会》；355/219, 《1911年12月23日伦敦的紧急报告》；33/145, 《1911年12月23日上海的电报》；204/112—113, 《1912年1月14日北京电报》；204/100, 《1912年1月10日呈共和国总统的报告》；129/28, 《1912年1月16日汉口的紧急报告》；35/95, 《1912年1月18日北京电报》。——校者

想的范畴。

译自法国《近现代史评论》第16卷，
1969年4—6月号第221—245页。

王刚译 张振鹏校

校者后记：本文译、校完毕后，恰值作者巴斯蒂夫人来我国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承她抽空阅读译稿，并提出一些意见；我们按照她的意见对译文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当然，译文如有错误，应由我们负责。

文章中有几个具体史实问题，我向她提出，并进行了讨论。她返回法国后，利用外交部档案，重新核对资料，并对若干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根据她来信所述，她研究的新成果或对原文所做的说明已加在本译文有关地方的注释中。

此外，有几个小问题，我以按语或注释的方式做了一点修订或补充。这样做，曾与作者商量过，并得到她的同意。

辛亥革命在东三省

西村成雄

序

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过程的基本范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这样一个社会，不能仅从它的经济过程中去理解，还必须从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崩溃而产生、巩固、直至彻底崩溃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权的政治过程中去理解。^①同时，它还与近代中国在世界史，亦即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没落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为了深入理解推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本文准备对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权崩溃第一阶段的辛亥革命加以初步探讨。不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打算就所有的研究资料进行探讨，只想通过对辛亥革命时期农民斗争和城市民众斗争资料的分析，一方面确定东三省辛亥革命在围绕国家政权所展开的对抗斗争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从辛亥革命发展过程的角度，就二十世纪初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如何对

^①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1958年）。在我看来，这部讲义虽然理论结构欠完整，然而却也不失为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中国，特别是对东三省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加以具体揭露。^①

辛亥革命前夕的东三省

一、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清政权

“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而结成的和平的联盟”，^②正如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A. Waldersee）在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本系一种“幻想”。^③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早已被证明，但是，帝国主义各国在镇压义和团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而且，在镇压义和团之后处理中国问题时，即在“恢复中国安宁秩序”这一点上，它们的立场也“完全一致”。^④何以会如此呢？就是因为义和团的斗争使个别帝国主义国家再也不能实现其任意“瓜分中国”这一目的的缘故。^⑤于是，帝国主义通过给予“每个弱小民族以国家独立”等种种“自由”的政治手段，^⑥即通过控制整个清朝国家政权来建立它们的统制。1901年12月23日清政府全权大臣奕劻和李鸿章接受外交团提出的有关“惩办祸首”（不包括西太后）的和议大纲十二款要求之后，^⑦12月27日西安清廷决定承认《和议大纲》这一历史事件，便是有

① 就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提出讨论的主要是外交史界，而且它们几乎都是闭眼不看中国国内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来进行讨论的。以角田顺所著《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一书为例，作者尽管提到了斗争问题，但也只得出清朝“民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结论。即使在入江昭的英文论著《舆论与外交政策》（见《中国近代史入门》，1967年）中，也仅仅是对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桥梁的“舆论”，即对构成“舆论”内容的立宪派的新闻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在具体问题上只提到资产阶级对抵制美货运动持谨慎态度一点，仅此而已。

② 列宁：《帝国主义论》（岩波文库），第194页。

③ 王光祈译：《庚子联军统帅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华书局，1928年），第207页。

④ 同上书，第251页。

⑤ 同上书，第141、143—144页。

⑥ 列宁：《帝国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国民文库），第85页。

⑦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第836页以下。

力的证明。^①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做了政治抉择，决定把政权交还给西太后。对帝国主义把西太后作为谈判对手这一事实，必须理解为，那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延缓其不可解决的矛盾激化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也说明帝国主义已被义和团这一民族抵抗运动大大限制住了。

由于缔结了《辛丑条约》，西太后政权便正式奠定了它继续存在的根基。可是《辛丑条约》却带来了清朝专制政权的内在变化。与义和团运动以前不同的是，帝国主义通过它们的控制，在中国国内豢养出更为合适的代理人。西太后政权的政治特色，在她的“惟有变法自强”的懿旨中表现出来。^②无论是为了保障《辛丑条约》要求的履行，还是为了维持与此相关联的国内统治，清政府如果不实行“变法自强”，就会造成经济上政治上无法维持的局面。所谓“变法自强”，乃是以刘坤一、张之洞的“变法奏议”^③及后来袁世凯等人的奏折为基础而形成的。“西太后新政”乃是支持清朝国家政权的国内基础，其性质是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在这里，在帝国主义阶段，清朝统治集团正式地重新组成了。

西太后政权不仅以政务处作为“新政”的总指挥部，而且借口“首先应以邦交为重”，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同时通过了偿还数额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在各省建立新军并设置以统一军制为目标的练兵处，在经济政策方面新设商部等等，企图把所有矛盾都转嫁给人民大众，从而集中控制政治经济实权。这样，《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赔款便支配了西太后政权，并且确保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控制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各省又把它们所分摊的赔款转为农民的直接负担。这之中有田赋附加捐、盐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第853页。

② 同上书，第1327页。

③ 《十二朝东华录》，光绪27年8月20日条。

斤加价和房捐等，它们在各省分摊的赔款来源中占了大部分。^①这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从而使政府同人民大众的基本矛盾日深一日。^②同时，清政府在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采取了这样一个对策，正如上谕所示，“断不可有仇视外洋之心；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条约之举”。^③这表明西太后政权深知自己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才有此种举动的。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虽然人民大众对这样一个清朝专制国家政权展开了斗争，^④但这些基本矛盾却反而加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太后的新政进一步走向新的更高阶段，即非但不能解决任何矛盾，反而进一步加深各种矛盾的“宪政”阶段。1905年7月16日任命“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实其嚆矢。^⑤当时，沙皇专制政治因受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冲击而发生动摇，作为帝国主义体制支柱的封建专制体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崩溃，西太后的这一行动恰巧与此相对应。清朝专制国家政权接到驻俄公使胡惟德的来电，获悉沙皇体制发生了根本动摇，遂电告各省督抚：“此次改革专制，伸张民权，实为非常之举，盖民众之所急如此迫切，倘不实施改革，即不能平乱。”^⑥显然，清政府从俄国“人民的觉醒”中看到了本国未来的“不安”。

当时，一方面存在着与“西太后新政”相对立的全国农民和

① 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策》，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第246—248页。

② 《十二朝东华录》，光绪30年10月22日条及光绪30年5月27日条。

③ 同上书，光绪32年2月11日条。

④ 龚书铎、陈桂英：《从清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反抗斗争》，载《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

⑤ 《十二朝东华录》，光绪31年6月14日条。

⑥ 参谋本部（明治44年）：《清国宪政沿革略》卷1，第100页。

城市民众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等进行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还有构成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一环的清朝专制国家政权，以及处于两个基本矛盾之间、并以前者作为口实而迫使清朝专制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派。在这三种政治势力中，“宪政”给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最大。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曾述及：“今日，吾党与政府间之决战，属第二义，而吾党与革命派间之决战，乃系第一义的。”^①另外，革命党在《民报》上从第一期开始便断言“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朱执信语），并严厉地痛斥了1906年9月的《预备立宪上谕》，^②谓：“只要主权尚在满族之手，则所谓开明专制与立宪，皆残贼汉人之具而已。”^③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政权开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于1907年8月成立了“宪政编查馆”，归并议会政务处于内阁，设立作为国会的资政院，^④并指示设立作为地方议会的谘议局。^⑤西太后政权对诸如此类的“宪政”如此“热心”，究其根本原因，可能是由于沙俄专制制度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冲击下发生根本动摇而不得不如此。“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事起一隅，动关全局，推其酿敌致衅之由，必非一朝一夕之故”，当时所谓的政局就是如此。^⑥这也许就是事情的根本原因。^⑦于此可见，政治危机已遍及全国。作为意识形态的反映，“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⑧这些话不无道理。可以确认辛亥革命前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基础上，存在于清朝国家政权“专制”与人民大众之间。其后，1908

① 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218页。

② 《十二朝东华录》，光绪32年7月13日条。

③ 《民报》第8号。

④ 《十二朝东华录》，光绪33年8月13日条。

⑤ 同上书，光绪33年9月13日条。

⑥ 同上书，光绪33年9月11日条。

⑦ 《清国宪政沿革略》卷1，第166页。

⑧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27页，载译《密折》。

年7月,清朝专制政权公布了《资政院章程》和《谘议局章程》,在8月又公布了《宪法大纲》,翌年各省谘议局召开了第一届会议。^①

这样,西太后政权便以大地主保守派集团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联合政治统治的形态,借“宪政”而逐渐巩固起来。这是支持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至于清朝专制国家政权成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整体中的一环,则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的事。

二、在东三省围绕着“宪政”问题展开的各种政治矛盾之间的斗争

可以肯定地说,以1905年为界限,西太后政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速向“宪政”阶段推进。当时,西太后政权和醇亲王载沣政权如不改变其体制,就无法维持他们的传统统治。但是,在东三省推行“宪政”的使命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以下拟就此问题加以分析讨论。

在东三省,最初实行的与“宪政”有关的改革,就是以简任总督来代替盛京将军。^②袁世凯麾下的官僚徐世昌就任第一任总督。此外,唐绍仪被任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吉林巡抚,段芝贵出任黑龙江巡抚。据当时传闻,东三省已俨然形成“莫不为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股肱”的情况。^③但是,1908年11月相继传来光绪帝和西太后死去的消息。醇亲王载沣执掌朝政,颁发上谕,略谓:“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继续执行作为“国是”的“宪政”方针。^④在这一点上,直到辛亥革命最终阶段,其政治

① 《十二朝东华录》,光绪34年6月10日、6月24日、8月1日各条。

② 同上书,光绪33年3月8日条;据盛京将军赵尔巽在关于日俄战争后东三省改革的奏折中所说,清朝曾派商部尚书贝子载振,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到东三省视察。同上书,光绪32年9月2日条;《退耕堂政书》(徐世昌著)卷5,奏议5《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

③ 松岛宗卫:《清朝末路秘史》,第74页。

④ 《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卷2,光绪34年11月10日条;卷8,宣统元年2月15日条。

倾向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1909年成立谘议局和1910年开办资政院等所谓政治统治形态的设置，即是集中表现。东三省谘议局就是在这样的宪政阶段中出现的，东三省辛亥革命的开展与其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后，与袁世凯遭到载沣政权革职相关，^①徐世昌也转任为邮传部尚书。云贵总督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并受命继续承办从徐世昌时代开始的宪政准备工作。临近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赵尔巽接替锡良的职位。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赵尔巽政权的社会基础，无疑是在这个宪政准备阶段所集聚起来的那个统治体系，别无其他。

那么，东三省总督锡良究竟是基于何种认识来推进宪政的呢？这可以从他所说的“外交之危迫，全在我无实力以为抵御……而所谓实力者，如开银行、修铁路、开放商埠、兴办实业、广开屯垦”等等方面来理解，即要通过“重修”内政来制止对外矛盾的激化。^②但是，“重修”内政，“非借外人之财，不足以经营东省；尤非借外人之力，不足以抵制日、俄”，这又是以完全依附帝国主义为前提的。^③事实上，他在“锦瑗铁路建设”上，就举全力采取了这种措施，^④即以“借款筑路”为其基本方针，以依赖“列强牵制之力”来抑制日、俄向东三省扩张为前提。因此，锦瑗铁路借款问题可以说是“利用”各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以达到使他们在东三省“势力均衡”为目标的一个策略。当然，在此必须谈及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范围的划定（第二次日俄协约），以及当时日本“合并朝鲜”等所谓帝国主义国际环境所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锦瑗铁路借款问题，由于日俄联合起来对英、

① 《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卷4，光绪34年12月11日条。

② 《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第29页上。

③ 《锡良遗稿》第2册，文书号第898号。

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52章；克莱德（P. H. Clyde）：《满洲的国际竞争》（1928年），第190—200页；杨沃德（C. W. Young）：《满洲的国际关系》（1929年），第106—110页；格里斯沃尔德（A. W. Griswold）：《美国的远东政策》（1938年），第4章。

美资本家集团施加压力，加上清政府内部的矛盾，而未能解决。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清朝中央政权内部，也就只好发出“莫如广辟商埠，俾外人麇至，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的密谕。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象这样的“借款筑路”政策，正贯穿于整个中国。^① 其实，锡良引进美国资本的计划，在东三省可以说失败了，倒是张之洞、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之间，就湖广铁路借款问题却达成了协议。因此，对清朝专制政权跻身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内，以及把宪政作为国内政治改组这两件事，有必要理解为表里一致的一个整体。

（一）地方立宪派的形成

《民报》第20号刊载的《辽东义军檄文》，针对清政府于日俄战争后在东三省所行诸政及其现实，作为“新政”和“宪政”所带来的矛盾而加以抨击，谓：“所行诸政无一不病国、病民。”^② 不过，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在宪政准备过程中确也奠定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因此，革命派在东三省推进革命时必然知道，在辛亥革命前夕，客观上那里已经建立起地方政权存在的基础。至于各地方在宪政准备阶段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是以1908年8月公布的“逐年应行筹备各事”为根据的。^③ 东三省的官制经过改革以后，确立了督抚统治的体制。而“民政”之特别受到重视，以及“地方自治”的改革，也是从东三省创始的。^④ 据锡良的报告，截至宣统元年六月，地方统治中心机构的“厅、州、县巡警”大体上已初具规模，“镇乡巡警”亦在配备之中。^⑤ 例如，1908年在辽阳就把原来的“乡团”改变为官办组织，成立巡警；^⑥

① 《锡良遗稿》，文书号第898号。

② 《民报》第20号。

③ 《十二朝东华录》，光绪34年8月1日条。

④ 同上书，光绪33年5月27日条。

⑤ 《锡良遗稿》，文书号第899号。

⑥ 《辽阳县志》（民国16年）卷22，警甲志。

又如在庄河，把旧制的“团练”改编成了巡警。^①在复州，也“取消乡勇，改设巡警”。^②几乎各地的巡警都是以当地的“乡团”或“团练”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但是这样的宪政实施过程，恰如《铁岭县志》所载：“为问警、学、自治之由来，则惟农民为首功。既有国税，复有亩捐；既有牛马税，复有车牌捐。凡议一事，疑无从出，则曰农民任之。故家屋营业之捐不行，而田亩附加已逾正税二倍，其间接之税更无论矣。”这样，农民所担负的赋税就成了宪政阶段一切措施的经费来源。^③又据农安县知县寿鹏飞所述：“调查现行各种行政经费，以教育、巡警、实业、慈善及监狱等五项为主，其中尤以巡警费所占比例最大。”在地方的宪政实施过程中，各地方“除按垧抽捐以外，别无办法，欲使人民免除痛苦已不可能”，这是对当时的情况的生动写照。^④也就是说，“人民较前更加仇视新政……抗捐之争屡有所闻。”这种现实是有其存在的基础的。^⑤清朝专制政权就是在这种基本矛盾的情况下逐步把宪政推向前去的。

但是，巡警的设置，这只不过是政治统治机构的一个直接环节而已，在其背后，另外还实行了旨在扩大权力本身依存基础的各种措施（因为宪政本身同以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基本矛盾为基础的各种情况有关）。可见，在把开设“谘议局”作为最大课题下达各省的同时，还要在各地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政策。在“地方自治乃宪政之基础”这种认识下，奉天谘议局筹办处推动所属各地方设立了“地方自治期成会”，^⑥并在奉天创设了“地方自治研究所”。^⑦在吉林省，也以设立吉林全省自治研究所为先导，

① 《庄河县志》（民国10年）卷5，民治。

② 《复县志略》（民国9年）卷8，官制略。

③ 《铁岭县志》（民国6年），地方杂捐志。

④ 《吉林农安戊己政治报告书》卷2，财政。

⑤ 同上书，卷2，财政。

⑥ 《东三省政略》卷6，民政：奉天省，第53页上；铁岭县志（民国6年），自治志。

⑦ 《东三省政略》卷6，第23页下。

在省内各地设立了自治研究所，使其承担选举谘议局议员的准备工作。^① 经过这样一段过程，1909年初，实行了谘议局议员的选举。^② 以农安县为例，经调查，具有选举资格者为二千二百零二人，通过“初选”选出四十三名选举人。这个数字表明，以投票资格为基准，选举人仅为当时农安县在籍男丁人口的百分之二弱。^③ 也就是说，开展宪政的过程是这样一种过程，即作为地方统治机构一环的巡警设置与担负巡警经费的农民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但这种过程毕竟是有力地推进了宪政；同时，它还为收敛地方自治、向谘议局过渡，进而在政治上逐渐把谘议局组织起来，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商会”和“农会”作为推行宪政的经济基础的集结点，遵照上面的对策，也相继成立起来。在奉天，把原有的“行”、“帮”加以重新组织，成立了“商务局”，随后，“商务分会”便在各地成立起来。^④ 在吉林，也将原有的“商业会议公所”“商业公议会”和“商业公所”改组为“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等统一组织。^⑤ 于是，这类组织不仅作为经济团体，而且作为极其活跃的政治团体开始发挥作用。^⑥ 另外，宣统元年在奉天开始设立“农务总会”和“农务分会”，随后在各地相继成立了农会。^⑦ 毋庸讳言，这种“商会”、“农会”当然都是由各地方统治阶级一手成立起来的。以这类当地统治阶层为基础选举出来的那部分谘议局议员，必然会受到处于帝国主义政治环境之下的东三省危机和取决于全国农民及城市民众斗争的立宪派运动的威逼，终于导致了“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早在1908年前后，就传出了关

① 《东三省政略》，卷6，民政：吉林省，第17页。

② 同上书，卷6，民政：第29—30页。

③ 同上书，卷6，民政：吉林省，第23页上；《东亚同文报告》第105号。

④ 《东三省政略》，卷11，实业：奉天省，第125页，第127—128页。

⑤ 同上书，卷11，实业：吉林省，第22页。

⑥ 《盛京时报》，1908年8月9日、12日、13日、20日；《奉天经济十年志》，第379—380页。

⑦ 《沈阳县志》（民国6年）卷7，实业；《支那生产实业统计表》上编，第180—182页；《锡良遗稿》，文书号第1160号。

于“铁岭商界请开国会”、“奉天学界拟联络商界请开国会”、“营口绅商会议请开国会书”等等报道。^①

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之所以能在政治上集聚起全国速开国会的运动,是因为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成立了谘议局的缘故。从这个意义上讲,谘议局在政治上缩小了基本矛盾,却使清朝专制政权体系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1910年2月和6月,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举行了两次请愿,但都遭到拒绝。^②然而,在同年10月召开的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七次会议上,主要由谘议局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资政院议员却一致通过了“速开国会议案”,提出“鉴于日本之所以兴盛,朝鲜之所以灭亡,今我国如欲统一财政,平息内乱,维持外交,除召开国会,别无他法”,举行了第三次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③在这之前,东三省、直隶、湖广诸总督曾上书清政府,谓:“有内阁可救目前,无国会必难善后”。^④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专制政权作了让步,诏“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⑤这一措施使立宪派内部发生分裂,张謇等的江浙预备立宪公会,即日解散,而其他各省,如四川、湖南、湖北、东三省的代表则决定继续进行第四次请愿运动。^⑥东三省的代表在奉天发动了一次政治运动。据说,1910年12月各界绅民一万余人,手持写着“请开国会”字样的小旗,集聚到东三省总督公署,由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亲手把请愿书交给了锡良。^⑦请愿书称:“(东省大势,较三次上书时)日俄协约、日韩合帮情形更有迫不容待者”,“现今朝野上下,无不公认国会为救亡之良药”,要求翌年,即1911年秋尽速召开国会。锡良也认为东三省能否免遭跟

① 《盛京时报》,1908年8月9日、23日、28日。

② 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第37—41页。

③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9号、第10号。

④ 《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中国时事汇录:各省督抚会商要政电》。

⑤ 《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卷43,宣统2年10月3日条。

⑥ 前引《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第42页。

⑦ 《锡良遗稿》,文书号第1147号。

朝鲜同样的命运万难保证；认为东三省较之其它各省，确有“特别之危险”，因之不得不代为转奏。^①这次运动的组织，正如传闻所云：“阳历12月6日午前十一时，奉天谘议局议员、奉天教育总会会员、奉天农务总会会员、奉天商务总会会员等，无虑万余名，在奉天谘议局集会”。由此可以看出，以谘议局为中心的各商会和各农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②这样，在东三省对外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国内的基本阶级矛盾也在宪政过程中愈益激化起来。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东三省的立宪运动势必日趋高涨。

（二）农民斗争

对东三省基本阶级的统治所带来的矛盾既已作了探讨，这就为确认辛亥革命时期农民所展开的斗争提供了前提。以下准备就此问题加以分析讨论。在1907年“东边民变”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乃是由于推行作为“新政”一环的“丈放”政策引起的。我认为，这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的历史特殊性，就这个意义来说，很值得探讨。清政府对东三省的政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奖励移民时期；（二）默认时期；（三）重申封禁例时期（1740—1894年）；（四）全面开放时期。”^③这里成问题的是第四个时期，即所谓全面开放时期，“殖民实边”的时期。它反映了在中国被卷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特别是在东三省变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的对象这一时期清政府的政策。东三省内被指定的开垦地或官荒（围场、牧场等）在经过丈量后实行开放的同时，又有计划地推行了承包荒地的垦殖工作。但是，这种按“放领、收价”政策清丈的土地都不成为其课税对象。所以遇有农民“私占私垦”时，当然就要将其土地作为“浮多地”，当作新的课税对象加以处理。大约光绪27年（1901年）以后，在奉天就实行了这种垦务政策。“凤、岫、安、宽垦务”就是其中一例。1906年设

① 《锡良遗稿》，文书号第1147号。

② 《清国宪政沿革略》卷2，第94页。

③ 天海谦三郎：《中国土地文书研究》，第729页。

立了垦务总局，但因“该处乡民借词贫苦不听丈量”，以致发生反抗斗争，终至废止。^①翌年重新设置垦务总局，于是农民和这个垦务总局之间发生了被称为“东边民变”的事件。

有一篇文章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苛捐杂税的情况，谓：“中国当今之弊端，其最严重者莫过于滥刑、重捐。……练军、兴学、开埠、修路、实施新政、设置新部所需之经费，几全靠敲民之骨、吸民之髓以为筹措……言其重捐税而齐人民，理由尽在于此。”^②

“丈量”本身不是别的，恰恰是一种重捐。按赵尔巽的说法，借丈量东边道一带土地，揭发“私垦隐种”者，加以课税，以开拓利源。^③于是设置垦务总局，实施土地丈量。但是由于丈量方法多有不公之处，正如传闻所云：“民众不服，群情激愤，终至集聚千人反抗官兵”。对此，当局立即派兵赶赴现场镇压，最后酿成这次事件。^④事件的领导人是凤凰厅西雪里站“大粮户”鲍化南。据报载：“鲍化南等率众迎击，农民亦复相助，与官军战斗，大败之。”又传说“雪里站一带之佃户皆同情于鲍化南”。^⑤从这个意义上讲，雪里站大粮户鲍化南反对倚仗国家权力实施强制课税一事，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佃户们的支持。因此，称之为“民变”是有道理的。“民变”与鲍化南“对佃户大肆勒索”的行为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⑥这次事件被奉天军队（经安奉线乘火车赶来的）镇压下去了。^⑦事件从发生到被镇压下去，大约不到一个月时间。垦务总局被撤回，丈量事宜则移交凤凰厅管辖。^⑧

① 《东三省政略》卷7，附奉天省垦务，第1页下。“凤凰城，岫岩，安东，宽甸”，即所指的东边道。

② 《盛京时报》，1907年1月18日。

③ 同上，1907年1月5日。

④ 同上，1907年3月13日。

⑤ 同上，1907年3月14日。

⑥ 同上，1907年3月24日。

⑦ 同上，1907年3月19日。

⑧ 同上，1907年3月21日。

但徐世昌就任总督后，又重新开始了土地丈量。^①这样一来，重捐随着以后宪政的具体化而渗透了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苛税对以农民为主的民众来说，日益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

“东边民变”后刚刚几个月，奉天以南的辽阳又发生一起反对重捐的抗捐斗争。^②他们声明：“牛马圈捐，征税苛酷，实不堪忍受，特将实情上诉奉天将军，恳请减轻，目的不达，决不解散”，^③“千余人分三路”准备到奉天示威游行。^④这次抗捐斗争也是以巡警调查户口为背景的，“对实际值百元之牛马，估价二百元，如此在征税之时，无异将税率提高一倍。刘委员即以此种轻率无理之征税方法对农民”征收所谓“牛马圈捐”，以此为发端引起了斗争。据说，这类附加税（特别是车捐、田亩捐）仅奉天省“每年收入即达二百七十余万两之巨，与盐税、粮税、统税之总收入相当，几为地方财政收入之泰半”。象上述那样的重捐，在当局的财政收入中，不能不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⑤当地的统治势

① 《东三省政略》卷7，附奉天省垦务，第22页上。

② 《盛京时报》，1907年6月15日。

③ 《辽阳时报》，明治40年6月28日。

④ 《盛京时报》，1907年6月18日。

⑤ 根据《财政说明书奉天之部》卷4，总论；《昌图府志》（宣统2年），政治志，其财政构成如下：

〈岁入之部〉（地方公捐）

（单位：两）

名目	光绪34年	宣统元年	经 收	支 出
斗捐	10295.92000	10799.293466	各镇商家代收	教练所津贴概归两科及法警薪津。
车牌捐	25932.55000	20132.73000	府署派员	官立各学堂及劝学所、习艺所、工程统计处、农业试验场、孤贫院。
亩捐	82259.92933	79953.939000	捐务所	警饷、卫生医院、自治研究所、公立各学堂。

续上表

名目	光绪34年	宣统元年	经 收	支 出
屠宰场捐	4212.81000	3408.104000	捐务所	习艺所经费。
商学捐	2695.00000	2063.460800	各镇商会代收	学堂。
庙产捐	445.00000	636.333000	此款由绅董	管理学堂。
膏捐	未 办	283.500000	警务局	补助自治研究所经费。
商警捐		1781.64000	各镇商会代收	巡警经费。

<岁出之部> (地方行政费)

(单位: 两)

名 称	光绪34年	宣统元年
劝学所	2918.0000	3131.5236
师范学堂	3248.9100	2806.7760
官立学堂	15680.0000	17885.8912
公立学堂	4158.0000	10569.4570
教练所	977.98276	3381.60000
宣讲所	723.00000	3968.50000
教育会	未开支	883.81400
巡警局	6379.89600	7396.2821
卫生医院	6795.79220	2426.58500
自治研究所	未开办	894.77100
捐务处	未开办	935.52710

力利用国家政权所承认的这种征税机构（捐务处）的结果是，由于农民抗捐斗争的发展，地方政权反而进一步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统治阶层就更加倾向于推行以巡警为支柱的宪政了。这就是《辽东义军檄文》中所说的“巡警局即官胡”的具体内容。

至于农民斗争的一般经济背景，就必须从东三省农村经济本身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角度去加以理解。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世界列强再瓜分的对象，在日俄战争后很快就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东三省的“大豆生产”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①早在日清战争前后，日本就把豆饼作为氮肥进口。^②自1908年以来，东北的大豆作为商品就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占有决定性的位置。^③东北大豆国际

① 根据《满洲经济史》（朝鲜银行，1921年版）第208页所载东三省进出口实际统计数字如下：（单位：海关两）

年度	进 口	出 口	入超，出超
1908	50,669,264	45,143,363	-5,525,901
1909	63,269,015	86,357,860	+23,088,845
1910	72,871,718	86,846,897	+13,975,179
1911	95,384,311	99,855,712	+4,471,401
1912	94,640,621	89,309,545	-5,331,076
1913	99,149,138	99,765,241	+616,103

另外，据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的《满洲大豆及其加工品》第202页，大连港总出口额和三种大豆产品（大豆、豆饼、豆油）出口额的比率如下表所示：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三种大豆产品所占的比率	85.7 (%)	79.8	74.6	74.2	66.1	62.2	69.2

② 驹井德三：《满洲大豆论》，第145页。

③ 《东方杂志》，第7年第8期，《中国时事汇录：〈支那经济报告书〉第40期》。

商品化的过程，给东三省农村经济带来的影响极大。据说，“日俄战后，南满、东清、京奉等铁路交通机关日益发达，三省所产大豆一跃而成为世界性商品……因此该地农民争相种植，以求获利。昔日种植高粱之区，今皆改种大豆。……为此，用作燃料之秫秸不足，取代之煤炭需求量急剧增加。此外，民间食用高粱之不足，复影响米谷需求。民众经济生活之变动愈益严重。日本商人乘机运进外国商品，从中获利。”^①这如实地反映了以生产土产大豆为转机，东三省农村经济的再生产体系所发生的激烈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外国商行有意识地促进这种变化、利用这种变化输出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以及外国商品在控制农民生活领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另外，据调查，1906—1910年中东铁路（即东清铁路）的粮食运输总量已由1903—1905年的七万吨猛增至三十万吨，其中出口比例也从百分之十四点七激增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五。^②这样一来，东三省的经济便被强行改造为支配清朝专制国家政权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下的原料供应市场，^③其地位和作用虽然已被这样的环境从根本上确定下来，但在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庄河厅等地，“贫民”对当地企图与外商洋行勾结输出谷类的粮商十分愤恨，起而要求“均分粮食”，并展开了“抢米斗争”。^④

其次，在具体研究东三省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本文还拟讨论构成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一环的清朝专制国家政权完成其作为政策的宪政政治的意义，以及辛亥革命打倒以宪政统治为基础的专制政权的意义。

① 《商务官报》，庚戌第2期（宣统2年2月5日）。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2辑，第234页。

③ 参见拙著：《关于帝国主义与农村经济的纪录》，载《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报》第11号。

④ 《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

辛亥革命在东三省^①

一、第一次庄河、复州“暴动”

辽东半岛的南面有两个城镇：一个是面临黄海的庄河，一个是面临渤海的复州。这两个地方一向被认为是“民间疾苦，夙多隔阂……豪强迭兴，辄有聚众抗税之举”的地区。^②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月，《盛京时报》曾发表一则消息，略谓：复州、庄河发来呈报，请求派“军队镇压土匪”，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已向庄河地区派出三营马队云云。^③其后大约过了三个月，该报又报道说，赵尔巽业将“庄、复两地匪犯肃清，民众皆额手称庆，今人心大定，商民各业恢复正常”。^④在这三个月期间，不仅武昌起义开始，而且，第二次庄河、复州起义也紧接着发动起来了。这里，在论述东三省辛亥革命的政治背景之前，先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次庄复“暴动”。

据赵尔巽的报告，这次“暴动”是1911年8月27日庄河的潘永忠以“拒纳警、学各捐为名目，捏造新增十八道捐之说”，“煽

① 论述东三省辛亥革命的论文很少，可列举下面几篇：陈贵宗：《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的革命运动》（载《史学集刊》1956年第2期）；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东三省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此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1960年）一书也有详细论述。本文所引用的《盛京时报》系1906年10月18日在中国东三省奉天创刊、由日本人亲手经营的中文日报。这份以中国人为对象的报纸之所以在东三省的政治中心奉天发行，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日本政府为了着手经营满洲而进行宣传工作，痛切地感到必须设置一个言论机关”，（据山本文雄：《明治时代日本人在中国经营的报纸》，载《铃木俊教授花甲纪念东洋史论丛》，第744页）。中岛真雄把《顺天时报》让给了上野鞆羯，而创办了可与“当时俄国的机关报纸《远东报》抗衡的《盛京时报》”（《对华回忆录》上卷，第719页）。中岛真雄早在1901年就在北京创办了《顺天时报》，后来又在营口经营《满洲日报》，他是一位新闻记者（据外务省的记录）。

② 《复县志略》（民国9年），官制略第8；《庄河县志》（民国10年），卷5，民治。

③ 《盛京时报》，1911年9月10日。

④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18日。

胁愚民”，“闯入城街，围署鸣枪，捣毁自治议事会所”等事件为其发端的。^① 赵尔巽是当年4月接替锡良从四川总督任上刚刚调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接任后原打算往吉林、黑龙江一带巡视，由于发生这一事件而只好延期动身。此外，复州知州也急电赵尔巽，谓：“界内匪乱猖獗，势甚汹涌，请速派兵弹压”，^② 报告了当时的紧急情况。第二天，又传来凤凰厅管界内“匪魁”蔡景芳率“匪徒”响应庄河起义的消息。复州管界的“马贼”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参加者达三千余人。^③ 但是，由于庄河、复州地区系《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第五款所规定的“中立地带”，而且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继承了俄国在该地区的“权益”。^④ 因此，赵尔巽照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求得日本的认可，并在日本势力的关照下，利用“南满铁路”运送千余名军队，^⑤ 杀害了庄河暴动的领袖潘永忠和王发春等。^⑥ 据传，这次暴动就这样被平息下去了。其后，赵尔巽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非常害怕庄河、复州暴动再起，曾下令严密防范。^⑦

那么，第一次庄复暴动的原因究竟何在？这正如传闻的那样：“东边民气强悍，而以庄河为最。自光绪32年迄今，已三次发生暴动。”这次暴动，具体地说，就是反对加征附加税，“先毁自治公所，复围庄河厅署”，终于迫使地方政权豁免了一切捐税。^⑧ 在当地施行“宪政”的过程中，增加捐税，这对农民（及城市贫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次暴动可以视为全国反宪政斗争的一环。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18日。

② 《盛京时报》，1911年9月14日。

③ 《盛京时报》，1911年9月16日。

④ 东亚同文会（大正11年）：《支那关系特殊条约汇纂》，第102页。

⑤ 《盛京时报》，1911年9月16日。

⑥ 《盛京时报》，1911年9月23日。

⑦ 《盛京时报》，1911年9月15日。

⑧ 《盛京时报》，1911年9月20日。

当此之时，华中展开了以四川保路同志会为中心的运动，亦即反对构成清朝中央政权的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所主张的“铁路国有化政策”的运动。这在帝国主义来说，“犹如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这次反抗运动，一进入旧历7月，便情势汹汹，事态已发展至“四川省城城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的地步。^①截至4月，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曾收到盛宣怀送来的一系列关于四川、湖北的详细情报，遂亲自向盛宣怀发出“弹压为宜”的指示。^②于是有人把“川民滋事”和东北庄河、复州的“暴动”联系起来。据说庄河暴动时，议事会的议董丧了命，复州则纠集上千名“胡匪”准备增援庄河。若果真如此，必将步四川的后尘，四川之今日将是东三省之明日。^③象这样全国范围内互相关联的抗捐斗争，应该说，纵令它仅仅是一种“暴动”，但从抗捐斗争即反宪政斗争的角度来看，无须多久，清政府就将难以应付。当然，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有必要给予适当的评价。

二、武昌起义和东三省

可以确认，在武昌起义这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复“暴动”有着与已往完全不同的意义。下面就从这个国内政治的巨大转折点出发，来考察东三省所出现的政治倾向及其矛盾发展的结局。

据1911年10月13日齐齐哈尔电，正在那里视察的赵尔巽决定立即返回奉天，同时下令奉天实行戒严。^④15日赵尔巽回到奉天，召集各司道赴总督公署商讨“维持治安”事宜，翌日发出具体指示，要求加强武器弹药库的防卫、加强对新闻报道的控制（以“扰乱治安”为理由封锁了大中公报馆）、预防“匪徒潜入”。^⑤另外，

① 《辛亥革命》第4册，第478—479页。

② 《愚斋存稿》卷82，电报59（宣统3年7月20日）。

③ 《盛京时报》，1911年9月19日。

④ 《盛京时报》，1911年10月15日。

⑤ 《盛京时报》，1911年10月17日。

还召开“新旧将领会议”，训令“振兴军备”，“捍卫国家”，甚至连士兵间的往来和信件收发也加以禁止。《盛京时报》记者在报道“东督赵次帅对鄂乱取异常慎重之态度”的消息时，认为上述各项措施皆用心周密。^①然而，这样的政治、军事、社会措施，并不能防止经济的动摇。早在武昌起义一开始，就发生了如下的情状：“市内日用品小商贩率先拒收几家银行（大清、交通及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接着，兑换钱庄也不肯收换纸币了，致使纸币币值一落千丈，人们争先恐后到银行、钱庄挤兑硬币”。^②银票成了一张废纸。^③此外，营口的过炉银汇兑市场也出现了“过炉银一两比小银圆一元价格还低的没有前例的跌价局面”。^④甚至赵尔巽也不得不承认“奉市异常惊惶，自非赶铸小银元，恐外人逼处，一有扰乱，为患甚巨”。^⑤为此，必须设法恢复市面安定，遂以度支司和盐运司的名义，指示各府、厅、州、县衙门征收钱粮税厘时，务必收纳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东三省官银号的钞票，以扭转现银不足的局面；^⑥或者由谘议局和商会制定救济方案。但是这些都被认为是难以办到的，因为“不待救济市面危机方案定出，何时又会发生市场恐惶，实难逆料”。^⑦此时，人们对本国统治政权已不信任，宁愿将“现款存入横滨正金银行者急剧增多……而存款户多半是大官八旗富豪人家”。这样，统治阶层本身就产生了严重的动摇。这样一来，能够把钱转存到外国银行的阶层，正是执掌东三省地方政权的那部分人，而把一般中小商人阶层当做“挤兑人”，“用兵力加以控制”。^⑧显然，可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0月18日。参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54页。

② 《支那调查报告书》卷2，第21号，第59页。

③ 《盛京时报》，1911年10月17日及10月19日。

④ 《支那调查报告书》卷2，第21号，第59页。

⑤ 《愚斋存稿》，卷87，电报64（宣统3年8月25日）。

⑥ 《盛京时报》，1911年10月20日。

⑦ 《支那调查报告书》卷2，第22号，第63页。

⑧ 《支那调查报告书》卷2，第24号，第33—55页。

以说经济动摇的矛盾把所有中小商人阶层都席卷了进去，继而又把这种经济矛盾转嫁给了一般民众。以上所述就是以赵尔巽为首的东三省统治阶层对武昌起义这一事态的反应与对策。同年10月22日召开的第三次谘议局年度常会，则使这些反应和对策具有了社会和阶级的基础，并得以强化。根据这种加强并得到统一的具体政策，在11月11日，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东三省终于成立了“保安公会”。^①

另外，在出现了全国革命形势这个总的条件下，清政府除了试行改组统治阶级内部机构外，已到了不再能维持其作为整体的权力体系的地步。义和团运动以后，特别是在宪政阶段，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斗争终于使整个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迫于这样的攻势，清朝专制政权所能做的，只有把那个曾经被从权力中枢逐出的袁世凯抬出来重新加以利用。于是，11月1日袁世凯取代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接任内阁总理大臣，随后即开始了同南方革命政权的谈判。正是在这时，赵尔巽与袁世凯联合起来，企图设法维持住东三省的旧统治体制。据传闻，在这之前，赵尔巽曾致电内阁，谓：“尔巽兹拟联合各省督抚，敦请慰帅迅速晋京”，以求慰帅（袁世凯）出庐，^②此外，又致电袁氏，谓：“旋乾转坤，维持大局，惟公是赖。……”“情势汹汹，内容极为危迫。……今日本会（保安公会）成立，举尔巽为会长，秩序尚无骚动”。^③如下所述，赵尔巽认为必须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与中央的袁世凯维系着亲密的关系，企图以此来保全他的地方权力。赵尔巽在东三省辛亥革命中所占地位本身，不就说明他是清朝专制国家权力全面崩溃最后阶段的一个极端反动的人物吗？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11日。

②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11日。

③ 《辛亥革命》，第7册，第421页。

(一)保安会和联合急进会

武昌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奉天，在这个政治分裂从未发展到激烈对立程度的世界，便形成了一个公开对立的场所。据说当时在奉天也有三种不同的势力：革命派（张榕、蓝天蔚等），保皇党（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等）和改良派（吴景濂等）。^①首先试看一下被人们认为是反革命派的政治集团（其中包括改良派在内）所组织的保安会的成立过程。保安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旧政权在武昌起义及其影响波及全国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典型对策。

11月11日，在谘议局中成立的保安会，实际上是在赵尔巽和谘议局中的右派袁金铠的授意下，指使巡防营统领张作霖打进谘议局，并安排当时已脱离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指挥的第二混成协炮兵队^②把炮口对准谘议局的情况下成立起来的。^③保安会在军队包围下成立的事实本身，就完全说明了它的本质。因此，保安会被看作“名为保安，实则借此反对共和，以暗杀革党为宗旨”^④的一种组织。赵尔巽企图依靠保安会和军队来度过辛亥革命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张作霖已经起着很大的作用。正如保安会《简章》第九条“以该处现任地方官为分会会长”的规定所表明的，它是由行政权力机关本身组织起来的。^⑤例如在奉天，从保安会会长赵尔巽起，几乎都是现职官员兼任保安会的职务。^⑥其后，就这样在各地相继成立了保安分会。^⑦最先在铁岭成立了以“凡侵扰公安者，均视为公敌”为宗旨的一种组织，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597页。

②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第265页。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547页。

④ 《盛京时报》，1912年3月5日。

⑤ 同上，1911年11月14日。

⑥ 同上，1911年11月17日。

⑦ 保安会的组织过程：

附设商团、民团等武装组织。^①这就是在保安会之前组织起来的所谓“保全会”。可以设想,这种组织也许曾向赵尔巽提出过请求,所以就“自上而下”急速地组成了保安会,以为这样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又如在法库,法库厅的张司马向厅议事会提出成立保安团的建议,议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责成劝学员周用三和农会总理鲁化廷等指导这一组织工作。^②由此看来,领导保安会的部分社会基础,可以从宪政过程中参与政治的劝学员和农会、商会

地 区	成立年月	构 成	出处《盛京时报》
铁 岭	1911.11.11.	工、商、绅、学界	11.12
奉 天	※ 11.11	官、绅、学、兵、各界	11.14
长 春	11.16	绅、学、官、商、	11.16
公 主 岭	11.15	官、民协议	11.17
安 东	11.14		11.18
新 民	11.19		11.23
吉 林	11.16		11.22
黑 龙 江	11.17	官、民	11.18
锦 州	11.22		11.22
营 口	11.22		11.23
凤 凰	11.24		11.24
开 原	11.21	(保卫会)	11.28
双 城	11.21		11.25
岫 岩	11.21		11.26
海 城	11.21		11.26
奉 化	11.21		11.28
辽 阳	11.26		11.29
法 库	11.26		11.30
庄 河	12.7		12.7
义 州	(1912.1.19)		

※ 1911年12月23日宣布取消,1912年1月21日裁撤。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12日。

② 同上,1911年11月19日。

中去寻求。同样，在长春也组织起名为保安队的团体。11月13日，孟观察在自治公所召集绅学官商代表说：“除设保安会外别无他法”，并决议“商家农户各出年力强壮者一人”。^①公主岭也于11月15日成立了保安会，交涉局总办任分会会长，以下有商务会总理、电报局长、盐务局长及福兴达栈、东保栈的经理等为评议员，他们占据着主要地位。^②在安东，知县召集官绅制定了保安会组织案，在其章程中有一条规定：“凡不能兑换之官银号纸币，商务总会必代为兑换”，由此可见商务总会在该保安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③

在奉天成立保安会的影响下，11月16日吉林以巡抚陈昭常为会长，11月17日黑龙江以巡抚周树模为会长，相继组成了各自的保安会。^④吉林保安会的成员，皆由绅董公所、农务总会、商务总会、工务总会、劝学所、教育会、城议事会、城董事会、慈善会、四乡巡警公所、谘议局、清乡局等推选出来。毋庸讳言，这些人当然都是当地支持宪政阶段各项政策的阶层中的主体。^⑤根据黑龙江保安章程规定：保安会可以参加行政组织，也就是说，保安会与权力机关之间须有相互补充的连带关系才能有自己位置。^⑥因此，武昌起义以来，保安会对处于剧烈动摇之中的统治政权，可以说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总之，由此可以知道，政权本身想利用缩小或扩大社会基础的办法来维持其原有的统治，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为自己树立起了对立面。自武昌起义以来，长春一带处于“所在民人辄不服地方官命令，抗捐滋扰”的状态。据说，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16日。

② 同上，1911年11月17日。

③ 同上，1911年11月18日。

④ 同上，1911年11月18日及11月22日。

⑤ 同上，1911年11月23日。

⑥ 同上，1911年11月29日。

在德惠县一地就有“本期收税额仅不过二十吊文……”的情况。^①可以说，省一级的旧政权通过把地方统治阶层全部重新组织起来的办法，制止住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同时，旧统治由于组成了保安会而有了继续存在的基础。赵尔巽在致内阁电中，给予保安会以极高的评价，说：“自设立保安会以来，大局安谧，人心亦甚镇静。”^②

然而，为了说明保安会的根本作用，还必须讲一下与保安会有一定联系的“联合急进会”。“联合急进会”是由东三省“革命派”所组织，在以它的支持者农民为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在奉天，保安会成立后的第六天，即11月17日，“联合急进会”便成立起来，以张榕为会长、柳大年、张根仁、李德湖为副会长。^③张榕^④发表了联合急进会的主张：“尊重人道主义，以建设满汉联合之共和政体为目的，故清帝退位尤为吾党所赞成”。以满汉联合的共和政体为目标，致力于政治革命，这一点正与“清政府”针锋相对，不能不说他们是与赵尔巽等保皇派划清了界限的。同时，尽管张榕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充分准备，但却未能发动，究其原因，据他说是“以东省与日本关系甚密，未便轻举之故而已”。这就是说，不管怎样，如果不把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势力（即现实的统治力量）考虑进去，则无法采取行动。这是对帝国主义统治问题所表现出的一种认识。但是，这种认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均未把帝国主义当作打倒对象来加以评价，这个缺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9日。

② 同上，1911年12月10日。

③ 同上，1911年11月18日，11月21日及1913年5月1日。

④ 尚秉和：《辛壬春秋》，民党死事记第三十九《张榕》项下有如下记述：“张榕，字荫华，号辽鹤，本山东历城人，以亡父官于辽，遂籍抚顺。……年二十二入京师大学堂，口俄战起弃学回辽，毁家募兵，谋满洲独立，附者数千人。事泄逃走，与吴樾共谋炸击五大臣于东站，樾死，榕毁樾所遗物，易姓名为余木强，……东渡日本……未几归大连谋起事，得同志甚众。武汉事起，乃于辽阳组织急进党，旧部多来归。合绿林胡寇团众万余人。”

点可以说是当时革命派的通病。^①其后，他们把可以组织各地方急进会分会的党员，分别派到辽中、辽阳、庄河、复州等地。^②以吉林为例，保安会于11月16日成立，可是后来吉林师范等各校代表在出席谘议局召开的保安会上却不承认保安会，而主张独立。^③此外，吉林法官养成所学生公开发表声明：“救亡之道，惟在建立共和政府”。由于受到这种情势的推动，官场报纸也提出“鉴于时势所趋，俯从国民舆情”的主张，据说还在暗地里宣传“共和政体”的好处。^④此外，在1911年12月6日，当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辞职之际，巡抚陈昭常及各司道、各军官等均以有失治安职责而引咎辞职。^⑤从这个意义上讲，与中央政权紧密相关的地方势力上层，可以说在政治上已出现动摇崩溃之势。处于动摇崩溃之中的吉林，在这种政治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据传，“革党……赵元寿君赴吉林，闻颇受各界之欢迎”。联合急进会不仅就这样直接活动起来，而且向着组织化的方向发展。^⑥

如上所述，急进会与保安会在组织上完全不同。它被认为是在反保安会运动的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保安会在各地自上而下急速组织起来的同时，与之相对立的，反对保安会的运动也在各地逐渐展开。第二次庄河、复州“暴动”的发展过程就是这种运动的典型。^⑦它主要是在联合急进会和关外都督的影响下展开的，所以只能以曲折的形式实现。

（二）第二次庄河、复州“暴动”的发展及其失败

据11月25日发行的《盛京时报》报道，第一次庄、复暴动领袖潘永忠，高玉祥等数人被赵尔巽军队逮捕杀害后，庄河地区爆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4日；《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第32页。

② 《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日。

③ 同上，1911年11月26日。

④ 同上，1911年12月3日。

⑤ 同上，1911年12月12日。

⑥ 同上，1911年12月14日；1912年1月7日及1月10日。

⑦ 《辛亥革命》，第7册，第389—392页。

发了反抗运动。据传，现已“联络复州民团组织成军，与巡防队发生冲突”。在同一天的报道中，还登载了赵尔巽当即派出军队搭乘满铁火车赶赴现场的消息。11月20日复州的顾人宜联合其弟顾人邦及潘永忠之弟潘四老等一起在顾家岭共同起义。^① 起义檄文曰：“今遇此千载一时之机，即倾复专制跃入强大地位之阶级也”，明确指出这次起义是以打倒“专制”为宗旨的。^② 他们以顾家岭为根据地，向太娘娘庙、东橙及大刘家屯等其它各地派出了军队，据说，总兵力约为千人。^③ 其中也包括象驻扎水门子巡警局长段宝山率领“投入革军”那样的部队。^④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急进会会员杨太宝（杨大实）和张璧二人于11月24日由奉天来到顾家岭，就“起事及与南省革军联络事宜”，同顾人宜等进行了协商。当时，各地已纷纷举起了“革命旗帜”。^⑤ 这就说明顾人宜等的起义是以全国规模的革命发展为背景的。所以他们在宣言中主张响应黄兴、黎元洪的号召，赞同兴师起义，并称起义乃为“建立新国家”，“决非乱党，而实为革命之抗议”。^⑥ 以革命军自任的顾人宜等认为，“际此专制时代，无不受官吏压迫，何不群力群策以争立宪权利而达完全自由之目的乎”，可以说其目的就在于彻底打倒清朝专制国家政权。^⑦ 而且，据说这支革命军与人民的关系是“纪律严明，所占之处，秋毫无犯”，“绝不扰害人民”。所以人民自愿投军、自愿“助饷”。^⑧ 正如所述，第二次庄、复“暴动”和第一次“暴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决定这两次暴动性质不同的原因，当然是以武昌起义的爆发为契机、以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的直接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6日。

② 同上，1911年12月1日。

③ 同上，1911年11月28日。

④ 同上，1911年11月29日。

⑤ 同上，1911年11月28日。

⑥ 同上，1911年11月29日、12月5日及11月30日。

⑦ 同上，1911年11月30日及12月1日。

⑧ 同上，1911年12月5日及12月10日。

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有必要阐述这样两个问题：一、顾人宜等以当地为基地的起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作为全国革命“代表者”的革命派取得联系，又怎样作为革命整体的一部分接受革命派的“领导”；二、旧统治势力和帝国主义对这次革命的反应及所采取的对策。

(A) 革命派的领导

毫无疑问，在复州起义后，联合急进会的杨大实等人即对之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指导。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被清政府革职的蓝天蔚（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关东大都督）也参与了领导。^① 11月14日，蓝天蔚被解除第二混成协协统职务，离开奉天到大连居住。复州起义一开始，他即派密使与顾人宜及杨大实进行协商。同时任命顾人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第一军司令官”，设指挥部于李家卧龙。^② 这时蓝天蔚已向“满洲各同志”发出“共图推倒清政府，辅助军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号召。^③ 在这样的领导下，复州革命军占领了水门子地区，翌日即张贴出“满汉回蒙父老，共建中华民国”的“安民告示”，明确打出了政治革命的旗帜。^④

对这次起义，赵尔巽一面派出军队镇压，一面又派出两名使者前去“招抚”顾人宜。^⑤ 顾人宜对来使的“招抚”提出了三条要求：首先，必须赔偿夏天被官军掠夺去的财物，即要求赔偿第一次庄、复暴动所遭受的损失。于此可见，清政府作为专制权力机构已经不起作用了。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必须公开承认起义军为民军，而且必须从庄复地区撤走清政府的巡防营。顾人宜提出

① 据《革命逸史》初集，《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记载，蓝天蔚曾任拒俄学生军之队长。

② 《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文书编号第357号；李培基：《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盛京时报》，1911年11月30日。

③ 《盛京时报》，1911年12月5日。

④ 同上，1911年12月6日。

⑤ 同上，1911年12月3日。

这后两条，就是要树立他自己的权力。^①关于这一点，以奉天省盐运使熊希龄对庄、复起义的认识来说，当时他认为起义仅仅是对第一次暴动遭到镇压所采取的报复行动，认识只停留在这样的阶段，并没有看到起义的发展前途。^②赵尔巽等也是这样，认为造成“变乱”的原因是“官民隔阂”。^③但是根据其后报纸的报道，在双方谈判过程中，对上述三项条件，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第三两条，双方的矛盾相当尖锐，在这上面，赵尔巽等人可说是开始认识到这次起义所具有的意义了。^④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赵尔巽才向起义军提出了“议和”的建议。但是，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权建立后，顾人宜等改变了说法，宣称：“此番起义专推倒现在恶劣政府”，并回答说，有关和议一事须视全局之结果方可定议。^⑤

这时，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之间的“南北议和”会谈，由于袁世凯亲自解除了清政府方面全权代表唐绍仪的职务而陷于停顿状态，^⑥随之而来的是，袁氏所属军队较前更多地使用“远交近攻之手段”，意欲攻山西，陷陕西，进而进兵甘肃。^⑦这时，共和政权决定实行“北伐计划”，作为北伐的一环，任命了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并于1912年1月13日派蓝天蔚率巡洋舰三艘、水雷艇一艘及其它舰只若干从上海启航，登上了北伐征程。^⑧16日，北伐舰队驶达芝罘，然后与后续部队一起为“光复”东三省各地而继续向前推进。^⑨就这样按照陆军总长黄兴的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2月5日。

② 同上，1911年11月30日。

③ 同上，1911年12月21日。

④ 同上，1911年12月26日。

⑤ 同上，1912年1月7日。

⑥ 《辛亥革命》第8册，第102页。

⑦ 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第61—62页。

⑧ 《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26页；《盛京时报》，1912年1月18日。

⑨ 《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第291页；《盛京时报》，1912年1月20日。

预定计划实行了北伐，蓝天蔚接到命令后，即刻奔赴辽东半岛地区展开登陆作战，以期与庄、复起义方面取得联系。^①顾人宜等也立即派起义军到海岸迎接北伐军。^②这样一来，登陆的北伐军在沿海一带实施军政，以关外都督的名义颁布布告：“关税免征一年，厘金落地税等一律撤废，本年度下半期租税一律免征”。^③2月3日，在庄河约有千名北伐军登陆，当即张贴出“革军示谕”（中华民国元年2月1日发），阐述了民军革命的目的 在于打倒那个只图填饱私囊而不顾丧权辱国、一味献媚列强的恶劣政府，即那个专制政府。^④在复州，有的清政府 巡防 队将校投降了革命军，士兵“归顺民军”的人数也多了起来。^⑤

这样，当以庄复地区为中心的革命军蜂起、联合急进会和关外都督的统一组织，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思想上均日益发展的时候，作为全国规模大革命最终目的之一的“清帝退位谕旨”终于在2月12日宣布了。专制政府被打倒了，孙文等的革命政府认为至此民国之目的业已达到，于是便在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总统。^⑥在清帝退位诏书发表的第二天，司法总长伍廷芳从上海致电孙文与黄兴称：“清国统治权业已消灭，自此以后，国内所有军队皆中华民国之军队，岂宜自相冲突。”^⑦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遂以总统训令分别电告关外都督蓝天蔚，山东都督胡瑛，略谓：“北伐军改称伐虏军，将专以讨灭反抗民军者为目的。”^⑧该电文强调要从主观上消除一切矛盾，在准备实现东三省革命时也应贯彻这一主旨。蓝天蔚接到电报后，复电请求孙文解除其关外都督职并指示北伐

① 《盛京时报》，1912年2月2日。

② 同上，1912年2月3日。

③ 同上，1912年2月3日。这个布告似乎是根据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写成的；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68—71页。

④ 《盛京时报》，1912年2月7日。

⑤ 同上，1912年2月10日及2月15日。

⑥ 《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3页及第132—133页。

⑦ 同上书，第138页。

⑧ 《盛京时报》，1912年2月16日。

军善后事宜。^①于是，蓝氏2月16日将驻在以复州为中心的关外第一军一部、25日又将其余兵员约三千名，由海路撤到芝罘。^②撤兵的主要原因，一半是由于受到日本武力威吓的缘故（见后述）。这样一来，北伐军的溃灭，在实质上就不能不说是蓝天蔚自己或孙文等人亲手造成的。庄、复起义领导者顾人宜等人既然接受了革命派的领导，也就只好遵照命令撤兵到芝罘，以致失去了依存的社会基础。^③可以说他们（包括孙文在内）对于“清帝退位”这个云遮日般的疑团也过分地相信了。其后，他们在东三省的行动，就失掉了在当地进行斗争的能力。就在这一点上，革命派的领导作用也终于随之消失殆尽。因此，在帝国主义体制下的清末政治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又得以重新组成，这就可以看出宪政统治的社会意义了。下面来具体看看竭尽全力维持旧体制政权的赵尔巽、张作霖等人所起的作用。

（B）东三省政权的反应与对策

在东三省保安会尚未具体成立起来的时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认为必须遏止革命浪潮的蔓延，遂于10月26日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直接面谈，提出“希望此时日本警察能与清国警察合作，以防变于未然”的请求，要求日本与之结成国家和阶级的同盟，以对付革命的爆发。^④此外，在中央由袁世凯组织“内阁”之前，赵尔巽就同袁氏有着密切关系，袁世凯对东三省的革命也采取了非常敏感的对策。也就是说，早在11月27日，袁世凯就致书日本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请求他对蓝天蔚的动静给予应有的注意。^⑤这时，庄、复地区的起义正在开展起来，如果从联合急

① 《辛亥革命》（《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139页。

② 《盛京时报》，1912年2月27日；《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第355页。

③ 其后，顾人宜于1912年7月上旬与部下三百余人一起，由海路回到庄河；《盛京时报》，1912年7月12日。

④ 《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第260页及第262—263页。

⑤ 同上书，第270—271页。

进会已同蓝天蔚等取得联系这点来看，可以说赵尔巽等同日本势力的联合，是直接为了镇压这次起义的。因此，赵尔巽在下达各县衙的指令中说，所谓“革命”，即“改革政治”，朝廷既已决定“实行立宪”(宪法信条十九条)，则已无“革命”之可言。因此指令对辽阳、辽中、庄河、复州、凤凰等地的起义加以弹压。^①此外，1911年11月下旬，当袁世凯派冯国璋所部清军在汉阳打败黄兴所率革命军的时候，在东北立即又进行了新的镇压。^②12月中旬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斡旋”，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政权进行所谓“南北议和”的时候，袁世凯等人在作为清朝方面基地之一的东三省贯彻实行的乃是彻头彻尾的旧体制统治。当时，奉天省城发布了戒严令，据说是由张作霖发布的。^③赵尔巽企图利用张作霖等旧军队势力为后盾来“维持治安”，与此同时，还召集保安会来确保其政治基础。但是，第二混成协标统在这次保安会大会上，夸大地强调了军队完成任务的意义，说：“自保安会成立以来，混成协官兵上下一体，日夜辛劳，尽到了保卫东三省人民之责任。”^④如今可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张作霖军队已能为其自身利益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了。^⑤

在南方革命政权成立的过程中，作为东三省旧体制堡垒的军队采取了“以武力严拒革军”的方针，而在袁世凯和伍廷芳以电报直接交换南北议和意见之后，奉天谘议局、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农务总会及城、镇、乡自治会等所谓地方权力机关也纷起反对革命，致电袁世凯内阁要求中止南北议和交涉，主张“以武力痛剿

① 《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2日。

② 同上，1911年12月14日。

③ 同上，1911年12月17日。

④ 同上，1911年12月27日。

⑤ 刘骥：《滦州起义记》，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薛立敦(J.E.Sheridan)：《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事功》(1966年)，第42—48页。

革党”。^① 不仅奉天如此，黑龙江谘议局也谴责南方革命派“假托共和实行专制”。^② 赵尔巽致电袁内阁称：“凡利用匪徒企图暴动者，一律按土匪严拿就地惩办”，于是把各地以革命派为主的活动镇压了下去。^③ 除赵尔巽外，联名签署该电的还有北方主要官僚和军阀段祺瑞、陈夔龙、张锡銮、锡良、陈昭常、周树模等。这种支持袁世凯的行动，在全国处于双重政权的情况下，除了对南方革命政权起着牵制作用之外，同时还显耀出袁世凯在清政府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时关外都督蓝天蔚正式以在东三省登陆为目标，把兵力集结到芝罘。就在北伐军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的前几天，即1912年1月23日，东三省统治政权竟暗杀了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④ 据传，当时赵尔巽、张作霖在杀害张榕以后，便开始“惨杀”联合急进会员，仅奉天一地遭到杀害的就多达三百余名。^⑤ 对于旧体制政权实行的这种残暴袭击，急进会系统的人并没有找到机会给予任何有力的反击，在奉天之外的各地，特别是在没有同庄、复地区取得有效联系的情况下，急进会都失败了。但是奉天省城在该事件发生后，终于陷入了政治上经济上一片恐慌的状态，“人心大为恐慌……粮市飞涨，商民莫不困窘”。^⑥ 在这样的情势之中，东三省政权由于和日本结成了直接关系而表现出积极的反应和对策。

据说，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传出日本政府对蓝天蔚等北伐军

① 《盛京时报》，1912年1月17日。

② 同上，1912年1月9日。

③ 同上，1912年1月16日。

④ 大宰松三郎：《满洲现代史》（满铁调查资料第47编），第120页；《盛京时报》，1912年2月2日。

⑤ 《盛京时报》，1912年9月11日；照蓝天蔚的话说：“迄今为止，吾党人遭其毒手者已不下四百余人。”（《外交文书》，第311页。）

⑥ 《盛京时报》，1912年2月3日。

登陆持反对态度的前一天，^①即1月26日，张作霖曾向落合总领事讲过：“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本人认为，与其将满洲委诸南方人之手，毋宁让与外人更为了当。”此时，奉天交涉司随办于冲汉曾秉承张作霖的旨意，向落合总领事探听，谓，风传皇帝即将退位，果真如此，日本国届时是否仍能承认赵尔巽为总督。^②张作霖其后又说：“吾人如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在这个内幕中还包括有川岛浪速等人的策划，即所谓“满蒙独立运动”。^③至于张作霖本身，根据所传袁世凯秘密调查员报告中所说“惟统领张作霖之势力隆隆”来看，袁世凯似乎认为“预先说服张统领，而后发表共和，否则东省将永远不得赞成共和”。^④正如落合总领事说过的那样，张作霖的“权势已凌驾于总督之上”。^⑤由此可见，当时东三省的实际统治权力是掌握在以张作霖为主的军队手中的。而张作霖暗地里与日本驻外机关或所谓“民间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日本则利用这一点作为“增进日本在满洲利益的方法”，^⑥正因为如此，日本对东三省的干涉采取了典型的直接妨碍北伐军行动的方式。

(C)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

尽管庄河、复州地区的民军起义与北伐军登陆作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在该地区设置了“中立地带”。日本在充分利用这个“中立地带”的过程中，预先阻止了北伐军的正式登陆。这个由帝国主义强制设定的所谓“中立地带”的地区，当然是以帝国主义的利害为首要前提的，因此，日本为了在事实上对赵尔巽表示

① 《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第302页。

② 同上书，第303页及第305—306页。

③ 同上书，第320—321页及第207页。会田勉：《川岛浪速翁》，致参谋本部电，第74、75号。

④ 《盛京时报》，1912年2月7日。

⑤ 《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第302页。

⑥ 同上书，第325页。

支持，才表现出“其阻止登陆的决心”。^①至于蓝天蔚对此有何反应，可从以下两封电报中看出。北伐舰队进入芝罘港的第二天，蓝天蔚即向日本关东都督府发出电报照会，略谓：“敝国共和军之兴起，以改革专制政府为目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次委余统摄关外一切事务，故凡我军到处，各地外人之生命财产一律由本都督切实保护。查南满铁道既系贵国管理，亦应归入中立之列。贵国夙尊重文明且切冀和平者，请飭该铁道严守中立，将民国军队与清国军队一律看待，勿稍歧视，为荷！”^②后来，蓝天蔚在决心登陆阶段又致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谓：“以后若有官军请求借车运兵之事，切祈贵公司严守中立，万勿允诺。”^③蓝天蔚在主观上始终坚决要求日本保持中立，阻止清军利用“满铁”，而实际上日本方面不能不说是立足于与东三省间更具深刻利害关系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当然，这不是蓝天蔚个人所持的认识，孙文本人也说过：“诸友邦对义举持中立之态，良足深谢，”对帝国主义列强所谓“中立”的政治选择抱着浓厚的幻想。而蓝天蔚的认识和上述幻想是有关系的。^④就象证明确保“中立”那样，1月18日日本海军第二舰队所属之“常盘”舰舰长与蓝天蔚会谈，向蓝方约定“如派兵员在中立地带内登陆时，必先征得日本同意，未征得日本同意之前，不派兵员在上述地区内登陆”。^⑤其后，日本方面一直监视着北伐军的动静。蓝天蔚与第二舰队的官佐们继

① 同上书，第295页。此外，众所周知，山县有朋在其《对清政策概要》中曾谓：“我国政府为了巩固满洲租借地及铁路的保护，预防发生一般的秩序紊乱，以及预防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必须判断出向满洲出兵（一个或两个师团）的适当时机”，主张“帝国政府”对“南满洲施加威慑力”（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337—338页）。实际上，日本军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实行了“京奉线守备”，于1912年1月6日派兵进驻了与“东三省邻接的滦州——山海关间的地带”（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第756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294页；《盛京时报》1912年1月20日曾刊登了与《日本外交文书》相同的记事（后半部分）。

③ 《盛京时报》，1912年1月31日。

④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第295页。

续会谈，但日本始终主张“绝对拒绝利用中立地带”。^①在这种情况下，蓝天蔚乃不得不答称：“考虑到贵国现下所处之立场，北伐军决不在中立地带内选择登陆地点。此旨，本人已通令所属各部。”^②但是，事实上，正如所传的那样，“2月2日，北伐军之一部在毕利河（碧流河）口附近登陆。据认为，这是一支由该部队三百名左右官兵同一百名左右当地革命派人员联合组成的队伍，第二天，即3日，该部向东进发，在花园口以北约二（日）里的地方与官军交战，官军节节败退，终于向庄河方面溃逃，其中有四十名官军向革命军投降”。又据报告，一部分北伐军登陆后已与当地革命派顾人宜等联合。^③另一方面，在中立地带以外地点登陆的北伐军，正向安东和凤凰城方面推进。^④

这样一来，日本方面在北伐军于辽东半岛登陆已成事实面前，在2月6日向关东都督大岛发出训电，希“立即向北伐军司令官发出通告，责其不应无视我方之一再警告而强行登陆，并要求其尽速退去”。^⑤但这时日本外务省已作出“满洲朝廷之让步，已成为大势之所必然”的判断，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此时对革命党施加压力，究应保持何种分寸，亦须慎重考虑”。^⑥帝国主义的政策一方面取决于全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方面也须顾及今后更确实地把握自身的权益。根据这种政策，在清帝退位消息传出的第二天，即2月13日，日本便决定采取措施要求清军和革命军双方均从中立地带撤出，并决定“派兵至各地监视双方撤退情况”。^⑦面对日本方面的要求，蓝天蔚结合孙文等的方针，向日本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一为：“民军已占领之地区，民军撤出后应

① 同上书，第299页。

② 同上书，第311页。

③ 同上书，第316页。

④ 《盛京时报》，1912年2月2日。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22页。

⑥ 同上书，第312页。

⑦ 同上书，第303页。

由民国设置民政长官并设置巡警维持治安”。然而，日本不仅答以“贵军之要求实难应允”，而且还通告称：“如不听从，则将诉诸武力”。^①北伐军在这种非常现实的压力下，终于全部撤退。就此意义而论，北伐军和当地革命派的认识可说是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清帝退位后的东三省

武昌起义后大约四个月，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决定实行“立宪共和政体”，命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而宣布退位。^②在各地参加起义的农民、城市民众、士兵以及革命派旨在打倒清朝专制政权的活动，现在被认为已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孙文发表宣言，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这样一来，所谓双重政权的政治情势亦随之瓦解，南京的共和政权最终落入了北京“临时共和政府”的袁世凯之手。这一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原封不动地再现了北伐军在第二次反袁、复起义中的撤退过程，以及所谓东三省旧势力全面复辟的过程。

早在清帝退位诏发表之前，袁世凯就曾致电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声称：“日来各处谣传，谓袁某阳持君主阴谋共和，此乃革军间疏我北军之诈计耳。”^③这就意味着赵尔巽等东三省地方势力，特别是以张作霖等军事势力为后盾，始终在向袁世凯传达反对共和制的意思，以及袁世凯为此所制定的东三省政策。根据2月11日的记事，据传内阁曾通知东督赵尔巽，关于“国体”问题，已由慈宫解决。但由于东三省不赞成共和，故而推迟了“退位”的

① 同上书，第334—335页。

②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53—155页；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日译本），第62—63页；另，参见永井算巳：《关于清帝退位经过的记录》，载《信州大学文理学部纪要》第12号。

③ 《盛京时报》，1912年2月8日。

公布。^①这样，终于把赵尔巽、张作霖以及谘议局、商务会、农务会、教育会、自治会等各方面反对共和制的意见巧妙地引导至下一阶段。^②也就是说，2月13日袁世凯派“两名密使”至张作霖处，据日本方面的调查，谓“张氏已接受袁世凯之馈赠达数万金之巨，因而态度一变，软化下来”，或者说：“昨今以来张作霖已完全软化，乃至讴歌共和制似属事实。”^③在这前后，东三省军队的主要首脑冯麟阁、聂汝清、刘鸿恩、吴俊陞、张作霖等联名向东三省各地区发出了“一、须保有大清帝号；二、袁内阁须任大总统之任；三、新政府地点须在北省，各地决不承认南京”这样的决议通电，而且明确地表达出袁内阁已经承认共和制的意思。^④张作霖在同日本方面晤谈时也曾言称：“关于采取共和制问题，不独赵尔巽总督，即本人等亦因缺乏资金和武器等种种原因，在目前情况下因实力不足而不得不暂时屈从”，以此来表白他们之所以不得不下决心支持共和制的理由。^⑤

另一方面，旧体制政权对东三省革命派仍在继续进行攻击。蓝天蔚致电孙文谓：“奉天冯麟阁率步骑千三百余，炮十门，围攻庄河等因”。孙文接到电报后，即要求袁世凯命赵尔巽立即撤兵，以息战端。^⑥此外，以作为保安会基础的谘议局为首的各种团体，也纷纷致电袁世凯及参议院，谓：“共和既成……已无革命之可言，乃蓝天蔚照会各处，自称关东都督，在复州扰乱……应请与日公使交涉，并飭蔚速去”。很显然，在革命已成为事实、所谓共和这个现实已近在眼前的情况下，甚至连那部分曾经高呼反对革命的人也被迫不得不承认共和了。于是，就连东三省最反动的势力也在表面上承认了共和，赵尔巽本人甚至还下令各县衙升起“民国

① 同上，1912年2月11日。

② 李时岳：《张睿和立宪派》，第84—85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334—343页。

④ 《盛京时报》，1912年2月14日。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33页。

⑥ 《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145页。

旗帜”。^①旧政权机构的基层组织各县衙，也分别发出晓谕立即响应：“共和已定，战事告终，民军化归乌有……倘有借民军为名希图扰害地方者，定遵照袁大总统命令，一律按土匪严惩。”^②虽然整个东三省地区皆已宣称“共和”，但事实上仍在贯彻执行旧体制。不过，对这种现象必须做出这样的评价：它本身表现了“革命运动现实成功的进步迫使彼等无论如何也得承认共和制”。在帝国主义体制下必然会被当作政治统治体系的清朝专制国家政权，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权，终因其内在的力量而崩溃了。很明显，这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可以说是一个严重而又具有必然性的挫折。同时，全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斗争终于迎来了2月12日这个所谓新阶段，从而面临着在新条件下组织战斗的形势。《盛京时报》的某读者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所谓新政府即旧政府之变相也，共和即专制之别名也”，“东三省只将一个龙旗革去，衙署如旧，官员如旧，自治腐败如旧，兵士骚扰如旧，商民仍如旧，各局所委员苛税虐民亦如旧。”^③

在这种政治形势正在展开的时候，北伐军及其指挥下的庄、复起义军早已于2月16日撤离了根据地。尽管蓝天蔚斥责“赵、张两人虽口称共和，而心实反是”，^④但是，革命派却把2月12日奉若神明确信不疑。可以这样说，在东三省，新阶段的主要领导权完全被赵尔巽等人夺去了。正如这位蓝天蔚自己所讲的，那是因为“共和既成，蔚愿已偿也”，^⑤未能认识到打倒“清朝”专制政权之后国家政权的现实所致。因此，不能不触及作为革命派的蓝天蔚个人有无缺点的问题。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导致了“清帝退位”；以后，因为未能认识到大地主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把“清

① 《盛京时报》，1912年2月27日。

② 同上，1912年2月28日及2月29日。

③ 同上，1912年3月17日及3月13日。

④ 同上，1912年3月1日。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341页；《盛京时报》，1912年4月26日。

帝退位”当作必不可少的政治外衣，这才出现了作为直接统治权力体系的袁世凯政权，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权的重新组成。这一事实作为今后的历史课题，不是能划时代地规定中国近代史上真正革命的出发点吗？这里有一封“关外民党代表”致“前总统孙中山”的书信。关外民党代表在信中总结东三省辛亥革命时说：关于北伐军和庄河、复州革命军联合的问题，如果当时南北议和推迟半个月，东三省就有可能彻底打倒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同时还报告说，以2月12日为转折点，赵尔巽用“阳赞共和，阴仍残刻”的方针，把民军全都扣上“土匪”的罪名而加以杀害。^①尽管这些代表们对赵尔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报告作为现实力量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在赵尔巽方面，成立“共和”之后，他在奉天召开的省议会（谘议局的后身）的演说中有如下的讲话：“去岁之事，各省纷纷独立，而奉省只以保安为亟亟者，诚以奉省地位与他省不同……所赖防陆各军、各警察、官绅各团体同心协力保治安，是以初念所不敢望及者，幸得渡过危险。”^②

结 语

以上概略地叙述了东三省辛亥革命的经过情况。一看便知，东三省是完全受袁世凯政权统治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也曾掀起过推翻清朝运动的高潮，而在直接镇压这次运动的过程中，还有重新组成的旧体制的当地势力存在。从这样的对抗中来看辛亥革命，便可划分出这样一个阶段，即：按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方式重新组成的清朝专制政权已被打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已陷于崩溃没落的阶段，同时还必须弄清楚，在其背后已经出现了

① 《盛京时报》，1912年9月1日。

② 同上，1912年6月8日。

作为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的袁世凯政权。当然，虽说是“直接统治”，但对这种能使亚洲最先采取所谓共和制政治形式的力量也必须予以高度评价。在专制的清朝被打倒之后，革命派未能认清新产生的权力体制的本质，因而没有对它采取具体的行动。这意味着在东三省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要遗留下一个课题，即如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矛盾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体系崩溃的过程，以及与此相应的半殖民地统治，同时又如何去明辨区分这些情况。这些课题可以说已经明白地提了出来。

然而，横山英先生却认为辛亥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历程中的一个变革过程”。^①他把辛亥革命时期的基本对抗关系说成是“封建势力”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势力”，即“清朝”与“军阀”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半殖民地半封建势力（军阀）在“资产阶级化的过程中，不仅与清朝产生了对立，而且要打倒清朝。这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程中所进行的变革，便不仅推动了历史的一定发展，而且表示了资产阶级的进化过程。”也就是说，横山英先生把辛亥革命解释为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势力——军阀所领导的一种主张“树立绝对主义”的“变革”。^②他认为，所谓辛亥革命，只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势力（军阀）排除了旧封建势力（清朝）罢了。横山英先生还说，以同盟会派的各种活动为主的、在“反帝反封建历程”中进行的“民众反抗斗争”，对军阀实现全国性统治曾起过积极作用，或者是说，为军阀权势的树立创造了条件。究竟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首先，在这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势力（军阀）和封建势力（清朝）之间关系的图式中，把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范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规定理解成了好象只是军阀势力所特有的东西。可是，要知道，所谓旧封建势力不也是构成半

① 横山英：《清末变革中的领导和同盟》，载《史学研究》第97号。

② 《日本历史学的发达与现状》（Ⅱ），第373页。

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权力的一种力量吗？同时，就横山英先生所说的“军阀”和“清朝”之间的矛盾而论，激化矛盾的原动力不就是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权力和在整体上形成矛盾的“民众反抗斗争（也应包括同盟会派的斗争）吗？这种根本矛盾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政治温度，终于导致义和团运动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权力的分化瓦解，即第一次崩溃。”如果不是首先认识到基本的对抗关系和次要的对抗关系，只根据辛亥革命在现象上的因果关系而得出“革命终于以清朝政府将权力移让给立宪派而结束”的结论，那是错误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决不允许改换成为军阀辩护的历史。我认为，这是由于怀疑在东三省是否发生过辛亥革命，是由于排除了东三省这个所谓“落后地区”的基本对抗关系，把辛亥革命当作一次不足以构成危机的“革命”，而仅仅十分粗略地谈及这次革命所“冲溃”的那部分情况所致。这绝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势力（军阀）”所进行的“变革过程”，而是“反革命”对抗“革命”的问题。

最后，作为结语，我想简单地谈一谈在日本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所采取的对策中，所谓“满蒙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个问题，在许多日本外交史中都曾讨论过。^①其中，例如在由井正臣先生所撰《辛亥革命和日本的反应与政策》一文中说：日本针对辛亥革命提出的“满蒙独立计划”，乃是军部超越政府从独立的立场出发推行的侵略冒险政策，而外务省对此一面表示要追随、依赖，一面准备加以利用。^②据说这个计划历来受“西园寺内阁的压制”（栗原氏语），或者说“自日俄战争以后，外务省当

① 栗原健：《第一、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与小池外务省政务局长的辞职》（收录于《对满蒙政策史之一面》）；曾村保信：《辛亥革命与日本》（《日本外交史研究》，1961年第1号）。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只有山本四郎的《辛亥革命和日本的动向》（载《史林》，第49卷第1号）及由井正臣的《辛亥革命和日本的反应与对策》（载《历史学研究》1969年1月号）所述与前者不同。另外，参见彭泽周：《辛亥革命与日本西园寺内阁》（载《中国现代史丛刊》第6册）。

② 前引由井论文（载《历史学研究》1969年1月号），第10页。

局常常设法借助内阁和重臣等的力量来牵制军部的这种游离不羸的行动”（曾村氏语），或者说“受政府压制的日本陆军突然中断不再提起这个计划”（角田氏语），对于强调以“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为核心的“外交方针升格”问题，提出了要采取日本帝国主义统一的对策。在这一点上，由井先生虽然表示了赞成的意见，但在别处，却把探求“这个计划之所以轻易遭到破产的主要原因”说成“就在于军部内部方针的不统一”。^①但是，我认为应当在更深的上来把握其“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推动东三省辛亥革命的力量决定了赵尔巽和张作霖对革命的“让步”；此外，全中国的革命形势也迫使赵尔巽和张作霖不得不“承认共和制”，这就是使日本军部笼络赵、张的活动，亦即“满蒙独立运动”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东三省的革命运动钳制住了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遥相呼应的东三省地方势力。当然，其背景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可是这样一来，在评价东三省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有必要指出它在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野心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原载日本《历史学研究》第358号（1970年3月）。

傅仲译

① 同上刊，第9页。

1928年中国革命

新战略的出现

索 顿

译者按：本文是索顿 (Richard C. Thornton) 所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 (1928—1931)》一书的第二章，第一章已先期译载本刊第一辑。全书论述了立三路线的前因后果，其主要论点是：共产国际1928年在斯大林指导下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新战略，这种新战略具体体现在中共六大决议案中。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在此后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并未遵循这一新战略的精神，亦未按共产国际1928年以后的历次指示行事，立三路线之失败，原因即在于此。本文对中共六大决议案的叙述较多，目的就在于具体阐述共产国际的新战略，同时也是针对西方较为流行的观点的，这种观点与作者的观点相反，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是含糊两可的，即无论事态如何演变，将来都可以自圆其说：或者说，极“左”路线就是共产国际制定的，李立三不过是个执行者而已。因此，立三路线失败后，李立三受到批判审查，是做了“替罪羊”。例如诺斯、许华茨等，都持这类观点。

斯大林在反对极左派^①并与右派^②妥协的同时，发展了他自己的见解。他的中国战略的逐步出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中看得最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一决议(随后经过琢磨和发挥)看来就是中国共产

① 指罗米纳兹、纽曼、瞿秋白等。——译者

② 指布哈林、张国焘等。——译者

党人直到1949年取得政权以前所遵循的“解放战争”战略的基础。

如果认为斯大林因为反对极左派，他的战略就一定不如他们的革命，那就错了。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他们为革命的完成所设想的时间界限不同，开始行动时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同。极左派希望，立即而广泛地发动反对国民党的起义，可以直接导致中共政权的胜利建成，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尚未完全巩固。斯大林则强调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就是说，革命的成功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游击战争需要时间，或许是几十年的时间，直到能够积蓄起必要的力量，与国民党进行决战。

立即行动以推翻国民党，就要直接进攻国家政权的中心地区——国民党所掌握的大城市，而在共产党没有一支即使是略强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未必能取得胜利的战略。然而游击战争将能在国民党军事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即在远离国家政权中心地区的农村进行。根据这种战略，进攻国家政权中心地区，只能在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中共的决定性变化时才能实现。从一开始，斯大林就坚持逐步积蓄军事力量的意见，作为他的中国新战略的核心。这种意见是在斯大林参加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来的，决议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红军队伍，以后再把这些队伍逐步统一为一支全国的红军部队”。^①

这种做法本身就大大背离了共产国际以往在中国所采取的战略。从1923年到1927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统一战线的活动，在国民党赢得中国政权的斗争中与该党合作，同时尽力从内部控制该党。发展一支独立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并不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幸的是，

^① 《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贝拉·库恩（Bela Kun）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765页。

1927年4月，当国民党实质上已达到目的而中共尚未从内部接管国民党之际，蒋介石与他表面上的盟友破裂了，并发动了一个消灭他们的运动。这时中国共产党人才转而求诸特定的自卫军事行动。

与国民党破裂而在组织上遭到破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策略上没有准备的。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行动也没有显示出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什么宏伟计划。^①中共领导的幸存者在逃脱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肉体消灭共产党人）之后，急忙聚集他们能够聚集起来的力量，几次试图推翻新建立的国民党政权，如8月的南昌起义，9月的秋收起义，以及12月的广州起义，但均未成功。于是许多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退到华南多山的较为安全的地区——几世纪来土匪的隐匿处——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命运处于衰败时期。几个月之内，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几乎化为微不足道。这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召开之前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显然要求有一项新的方针，斯大林于是决定制订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新战略。

斯大林的中国战略

1928年2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时，新方针的基本要点已经制订出来了。其基本组成部分的轮廓已在1928年2月25日的《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②中勾画出来了，它包括的首先是关于时局的分析（第一至四条），其次是新战略的梗概（第五至十一条）。决议阐述了党在城市和农村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为达到这些目标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宣传

^① 见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失败的余烬》，载《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3—54页。

^②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763—767页。

上需要采取的方法。

在分析时局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坚持1922年所主张的理论公式，^①即中国革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直接目标依然是要建立工农专政，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一切封建关系，并统一中国。决议强调，中国革命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意味着已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不是“不断”革命，它意味着在中国推行一项毫不间断、毫不减弱的武装暴动的方针。^②

决议说，“工农广泛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了”，而且对革命来说，尤其对于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的。决议继续说，这种形势标志着“中国整个群众革命运动向新的、苏维埃阶段的过渡”。^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决议中继续说，目前，“没有全国规模革命群众运动的声势浩大的巨大高潮”，但“某些征兆”表明，工农革命正向着全国规模高潮的方向发展。^④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广州工人的英勇暴动，军阀部队中层出不穷的兵变，政治上的混乱不堪，以及各个军阀集团之间连年不断的混战，而“首先是一些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一些地区的苏维埃化……）”。^⑤

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到，中国的革命运动“……因为斗争的历史条件不同，各省发展是不平衡的。迄今为止，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发展也不平衡”。^⑥当前革命的苏维埃阶段还有一个特点：虽然农民运动正在向前发展，工人运动却“经历着某种程度

①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第一个宣言》，载布兰特 (Conrad Brandt)、许华茨 (Benjamin Schwartz)、费正清 (John Fairbank) 编：《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58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763页。

③ 同上。头年9月共产国际显然提出了要求建立苏维埃的第一个号召。

④ 同上，第764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的低落”。^①

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随着军阀部队的哗变，共产党的力量得以增长，革命已进入新的、苏维埃阶段。虽然从长远看，中国革命前景良好，但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当前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每个省、城市和农村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使用“发展不平衡”这一概念，似乎是说，至少在目前，革命没有全国规模的一定条件，因此也不可能很快出现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

基于此种分析，共产国际执委会勾画了中国共产党人所要遵循的战略方针的轮廓：

党必须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将不可避免地要使党面临组织和领导群众武装起义这一直接的、实际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武装起义和推翻现政权，革命的任务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目前党的整个工作的重心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团结在党和党所提出的口号的周围（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中国的国家统一并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推翻现政权，实行工农专政，组织苏维埃）。在整个目前形势下，最大的危险是工农运动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因对当前形势估计错误和低估敌人的力量，而脱离群众，过于冒进，分散自己的力量，从而被各个击破。共产党如果不了解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不反对偏离组织千百万群众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的各种企图，那么它就一定会被击败和瓦解。^②

因此，新战略不是立即到处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国民党政府，

① 同上。

② 同上（着重点系作者所加）。

而是“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为有朝一日能推翻国民党政府而进行准备。^①这一口号是不是排斥一切军事行动呢？共产国际的领袖们确实反对某些军事行动，谴责“盲动主义”和“零星分散、互不协调的游击战争”，^②认为这二者都是“拿起义当儿戏”。^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态度是：盲动主义（企图以一小群人夺取国家政权）和自发的、散乱的、即使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都不能成为“全国范围起义的出发点”——共产国际战略的最终目标。^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排斥一切军事行动。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在边远农村地区的乡村和城镇进行经过周密计划的游击战争。决议规定，党“在组织今后必须严重注意的农民运动时，要经常地、正确地考虑中国各省各地的不同斗争条件”，特别要考虑“那些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地区”。^⑤共产国际执委会进一步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苏维埃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实行“土地革命”^⑥与“组织红军队伍，以后再把这些队伍统一为一支全国的红军部队”。^⑦这里概述的军事方针，是要进行游击战争，以农村苏维埃为根据地，再从那里推进斗争。第九次全会所提出的，也不过就是这种战略的建议，但这种建议在大约四个月之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发展成为明确的方针了。

“争取群众”的口号，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人农民中进行政治工作来说，具有具体的实际意义。它指的是要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并渗入已有的非共产党组织。在城市，要通过“工人兄弟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76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见本章后面的论述。

⑦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765页。

会”^①的方式组织工会，组织共产党阵线的组织，向工人提供帮助，使他们有机会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命令中国共产党渗入合法的甚至是“黄色”的（国民党的）工会，作为在工人中重新确立党的影响的另一种方法。恐怖主义与命令主义（强迫罢工）是要坚决反对的。在这一时期，当党的目标还是争取“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②的时候，恐怖和强迫只能使他们疏远。

在农村也一样，共产国际执委会概略地给中国共产党人规定了具体任务。决议说，最重要的是“建立和扩大农民组织网（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③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应“特别注意”做贫农的工作，应当为农村的“无产阶级分子”（雇农）建立“专门组织”。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党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在城乡群众中进行系统的宣传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在党的领导下把他们组织起来。^④

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认为，整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非常重要。他们在决议中强调：“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全面加强中国共产党本身，加强它的干部，它的外围和它的中央”。^⑤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要求中国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加强党的中央组织同地方组织的联系，建立坚强的党的机关。决议强调说，这一切都应当是当务之急。

在宣传工作上，不用说，中国共产党要明确反对国民党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告诫中共领导人，对于象谭平山那样原来是共产党员的人组织他们自己的共产党的企图也必须加以反对。决议说，党越是卓有成效地向“自己队伍中的左倾‘盲动’主

① 简·瓦尔丁（Jan Valtin）（理查德·克雷布斯）在其《离开黑夜》一书中（第106面）对欧洲“工人兄弟会”的方法进行了论述。

②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76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就越容易克服。^①看来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持的立场越是不左不右（诚然，这是他们向自己内部左倾偏向进行斗争的结果），他们对群众的吸引力就越大，而其他政治集团也就越难得到普遍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强调，同样重要的是，党必须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被消灭”。^②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决不能抱悲观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者，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最后，共产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阐述了国际主义路线，“责成”全世界“一切支部”，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撤回驻华海陆军，反对吞并和瓜分中国领土的一切企图，反对镇压中国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来支援中国革命。^③

根据《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的总战略可归纳如下：中国共产党要审慎地进行有计划的和互相协调的游击战争，以反对国民党政权；利用农村苏维埃为根据地，向外展开斗争。政变企图和盲动主义，以及无组织的农民起义，共产国际执委会都加以谴责，认为只不过是“拿起义当儿戏”。在城市和（苏区以外的）农村，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诸如工会、农民协会之类的组织，与国民党竞争和抗衡，争取群众的支持，并渗入一切非共产党组织，进行控制，或至少使其中立——用这些方法实现广泛的政治颠覆计划。在这些颠覆活动中，要避免使用强迫和恐怖的手段，以利于进行宣传说服工作。最后，党本身要进行整顿改组，以便更有成效地实现这些任务。

与提出在农村举行起义相反，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并未强调纯粹的“城市起义”，尤其没有提到象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京等大城市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决议确实要求在广大地区进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活动，这种广大地区诚然也包括城

① 同上，第76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767页。

市和农村，但直接进攻国家政权的中心地区、关键的工业和行政城市（在那里国民党的力量集中，其所处的地位远比共产党优越），并不是这种新战略的直接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张国焘与作者的通信所述，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人制订的战略，是要他们“占领某些边区”，^①即远离国民党军队（多半驻扎在大城市）易于进攻的边远地区。在远离城市的地区，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以被国民党军队歼灭的最小风险，逐步建立起为顺利进行革命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当然，国民党能够挫败这些早期企图的大部分。）

游击战争的战略大大有助于解释共产国际指示中关于革命必须继续进行的主张和盲动主义必须避免的主张这二者——显然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之间的区别。第九次全会的决议指示说，革命将以游击战争和政治颠覆等方式继续进行，而盲动主义则企图以一小群人夺取国家政权。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国家政权设立在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的大城市。因此，共产国际对盲动主义的警告，看来是对想要夺取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大城市的企图的警告。关键性大城市是游击消耗战中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共时所攻取的最后堡垒。只要国民党在大城市还比共产党强大，那就只有谨慎行事，不要以劣势的兵力在那里发动进攻。

对新政治战略的进一步发挥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②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

^① 张国焘与作者的通讯，1964年4月29日。

^② 别列沃尔泰罗（A·S·Perevertailo）等编：《中国近代史纲》，第214页。约翰·E·鲁（John E. Rue）：《毛泽东在野（1927—1935）》，第100页。书中说中共六大于1928年7—9月召开，有误。他对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记述完全根据二手资料。见该书第99—104页。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第九次全会的新战略草案具体化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显然怀疑是否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会同意遵循这种新“路线”，因而只允许少数信得过的人参加代表大会。^① 参加大会的代表，据一项俄国资料说是一百一十八人，一项中国官方资料说是八十七人，而一项西方资料则说只有五十人。^② 无论哪个数字准确，显然有许多中共领导人被排除而未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

新任职的中共政治局领导人都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政策性演说。李立三发表了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政策问题的演说。^③ 向忠发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和关于工会情况的报告。^④ 张国焘论述了反帝运动问题。^⑤ 瞿秋白发表了两篇长篇演说，一篇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篇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的。^⑥ 项英讲了当前形势，又讲了战术起义的意义。^⑦ 蔡和森未正式讲什么，但表示与瞿秋白的观点决裂，而支持张国焘的观点。^⑧（瞿秋白与张国焘的龃龉暴露了党的领导所产生的分裂，这点后面还要详谈。这种分裂的意义共产国际的领导并不充分了解，但影响李立三回国后作出许多决定的，正是这一分裂，而且，1930年后期驱逐李立三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也受其

① 李昂：《红色舞台》，第64页。李昂原来是共产党员，后来投奔国民党，因此他所提供的资料是怀有敌意的。据他说，当时并没有反对共产国际的派别，但李本人却未被允许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他和其他几个人中途在伊尔库茨克滞留了几天，然后被送回中国。

② A·S·别列沃尔泰罗：《中国近代史纲》，第264页；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105页；罗伯特·C·诺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拔萃人物》，第110页。诺斯所列1928年党员人数为一万五千人。

③ 中共六大报告速记记录，第2卷第35面；第4卷第38面。

④ 同上，第1卷第89面；第5卷第37面。

⑤ 同上，第2卷第1面。

⑥ 同上，第1卷第53面；第3卷第64面。

⑦ 同上，第2卷第47面。

⑧ 同上，第2卷第44面；第4卷第148面。

直接的影响。^①) 周恩来是大会秘书长,^② 未发表正式演说——至少从记录看,不能认为他发了言。

确实,大部分中国代表的名字是难于辨认的,甚而是无法辨认的。一些人使用俄国化名,如瞿秋白使用斯特拉霍夫,张国焘使用斯比利多诺夫,而记录上出现的则大部分是无名无姓的代号。参加大会的俄国人,或者以首母记录,或者使用“共产国际代表”这一笼统含糊的称呼。一位“M同志”(Pavel Mif [米夫]?)发表了关于与国民党破裂前后的形势的重要演说,和关于创建中国红军的演说。^③ 另一位只能认出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演说者做了给大会定调子的报告(这在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到),并对将要通过的新的革命方针从战略与策略方面进行了评述。^④

关于这次大会,有两件异乎寻常的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关于中共被击溃的余部的所在地点及其质量,有令人惊异的大量情报资料可供共产国际领袖们使用。毛泽东的情况即其一例。虽然他在当时的运动中还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但对于他的行踪、活动,以及他所指挥的部队的情况,都知之甚详。鉴于当时中国的混乱状况和交通的不便,这一事实是令人感到奇异的。^⑤ 上述的“M同志”在关于创建红军的演说中,以几分轻蔑的口气指出:“在湖南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有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但它经常到处流动,我们就叫它流动部队。他现在正沿湘赣边界继续移

① 张国焘、蔡和森和项英的一致,以及这一集团特别反对瞿秋白,也反对李立三的情况,在速记记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张国焘谈瞿秋白,见速记记录第2卷第44面和第4卷,第148面;项英谈李立三,见同上第2卷第48面;李立三谈张国焘,见同上第2卷第36、44面。本书第3章和第9章对这种分裂有进一步的论述。

②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页。

③ 中共六大报告速记记录,第4卷第1面;第5卷第1面。

④ 同上,第1卷第9面;第3卷第93面。

⑤ 与此相对立的意见,见塞缪尔·B·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s):《北京与人民战争》。他说(见该书第5页):“我们可以怀疑,共产国际的俄国成员(在1927年后期)甚至听到过关于他的事,除非可能把他作为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异端派,那就另当别论。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提的方案与莫斯科认可的路线根本不同。”

动，约有一千人的队伍。”①

李立三本人炫耀他早已觉察到毛泽东的问题，并对他留意了。李在批评毛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时说：

关于土地纲领，有一个土地分配的问题。我们早已在海陆丰和湘鄂等地区有经验了。然而农民为什么还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口号，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错觉……第二，中国地少人多，因而产生了大量的游民无产者。这些农村游民无产者要恢复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他们要求平分土地的原因。再者，这些游民无产阶级分子是处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这次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都知道，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对在中国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的许多中国同志来说，这一点他们尚不清楚。我认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位同志。他甚至可能到现在还认为，我们之所以主张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早已提出了这一口号。但我们必须指出，这非但不是社会主义，反而会妨碍真正社会主义的发展。②

我要说的第二件异乎寻常的事，是大会的俄国东道主对大会的巧妙安排。虽然中共领导人发表了重要演说，但只有从表面上看才能说他们“主持”了大会的讨论。真正的主持人其实是俄国的发言人。他们解决关于“总路线”和创立红军等问题的争论，并在中共领导人探讨的一些问题上发表“补充”演说。会议的程序显然是：先由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某次会议上发表一篇演说，开个头，接着就是“共产国际代表”以同样的题目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将纠正中国领导人的演说可能已经给人造成的任何错误印象。这之后就是在会议参加者中展开普遍讨论，不是讨论所提的方针

① 中共六大报告速记记录，第5卷第12面。

② 同上，第4卷第50面。

政策是否应当接受，而是讨论如何贯彻。这就是速记记录头五卷所反映的大会进行的实际情况。第六卷即最后一卷是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①

无论如何巧妙处理，大会最后的决议案中所包括的方针政策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设想出来的，虽然他们通过讨论，显然是融会贯通和“表达”了这种方针政策。最后的决议案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首先表露出来的思想的结晶而已。对大会决议案稍加分析，即可以弄清楚这一事实。那些概述了共产国际新战略的最重要的决议案，是政治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组织苏维埃问题决议案，以及土地问题决议案。^②

这些决议案需要详细讨论，因为在上述西方历史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总的来说是含糊的，有时竟达到令人费解的程度，而且是故意如此。一位作者断言：“莫斯科的决议案制订者在作出各项指示时煞费苦心，为的是今后无论事态如何演变，都能自圆其说，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③我认为，以正确的观点来看，这些指示是卓越而又意味深长的，绝非“煞费苦心”使其含糊暧昧。

政治决议案要算是四个决议案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它对第九次全会决议所提出的基本命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它是对共产国际新战略的全面综述，对于要付诸行动的计划的各个方面，它都说到了。另一方面，农民问题、组织苏维埃问题和土地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决议案则比政治决议案详尽得多，不过内容都只限于各自

① 决议案的中文本，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② 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和组织苏维埃问题决议案的俄文本可在《东方共产党纲领性文件》(第14—68页)中找到。中共六大的这些决议案及其他决议案的中文本，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找到。这些决议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有合订本。农民问题决议案和政治决议案的英译本，见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编：《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49—164页，其中不无错误之处。

③ 罗伯特·C·诺斯：《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46页。许华茨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中，审慎地称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不可捉摸的”(第128页)。

问题的范围之内。

政治决议案的第五部分（党的任务）对新战略作了透彻的阐述。决议案论述了党内的整顿改组，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新任务，苏区和非苏区的政策，以及反帝运动中的宣传策略等等。党的内部改革的主要任务如下：^①

第一，恢复被反动派破坏的党支部和各级地方委员会。要特别注意在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大生产工厂中建立党的组织（支部）。

第二，积极开展从工人中吸收党员的运动；继续采取吸收工人运动领导人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的方针……

第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在秘密工作所允许的条件下，保证党内民主，实行集体讨论和集体作出决定的方针；同时反对一些党组织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这种倾向破坏党的纪律，导致不负责任的态度的滋长，而且损害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

第四，克服（党）组织内一切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有害于党的统一，降低党的战斗力。取消对工作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惩办主义”的制度；只要他们没有系统的路线并且不坚持错误，就应当纠正他们的错误。要让这些同志重新工作，但（条件是）他们今后必须坚持党的正确路线。

第五，加强对广大党员的理论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

第六，加强对武装起义中正确策略观点的宣传；^②同样，也

^① 这里用的是俄文原本。在俄文原文中没有发现中文本含糊两可的地方。《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中的英译文有错误。（以下直至“宣传方面”的“主要任务”，其所列条文，因与中文本在文字上有些出入，故按作者英译文译出。——译者）

^② 武装起义的“正确的策略观点”，在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曾经论述过，这点前面已有说明。他在报告中说，起义的路线应当继续贯彻，但“起义路线的当前意义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某些时期，如象广东的起义或广东起义前不久那个时期的意义”（大概是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见《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1929年4月，第100页）。

要加强对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宣传。^①

政治决议案对于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的指示也是明确的，不含糊的：

第一，党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他们对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争取他们的信赖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必须特别注意产业工人的职工运动，注意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作用。

第二，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立即纠正关于工人阶级与党的关系问题的某些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认为，在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上，党是离开和独立于工人阶级的，是命令它的……这是因为尚未认识到，党只不过是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部分。

第三，在与本阶级的关系上，坚决反对强迫命令的方法，反对在罢工斗争或武装起义中强迫工人参加。

第四，同时，要尽最大的努力，为恢复和领导革命的工会而工作，并渗入到一切反动组织和其他组织中去……这种渗入对于（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来说是必要的。

第五，为把工人群众从国民党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而系统地工作……

第六，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必要的先决条件，都必须在斗争过程中加以实现。要尽可能加强[党]对工人群众日常经济斗争的领导。^②

以下是对于党在农民运动中工作的指示。“农民运动”一词在共产国际的革命词汇中，显然主要说的是在不属于共产党直接控制而至少在名义上属于国民党控制的广大农村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下面的指示形成了基本政策，根据这种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就可以逐步使这些地区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种政策包括

① 《东方共产党纲领性文件》，第28—29页；《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文本，第49—50页；比较《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的译文，第149页。

② 同上，分别见这三个文件的第29页，第51—52页，和第149—150页。

加剧阶级不和，建立共产党控制的农民组织，以及支持农民对改善生活条件的许多要求。一旦这些活动在“自发”的农民起义中产生效果时，共产党就要设法将这种农民斗争纳入他们自己的游击运动的轨道上来。最后，要争取在这类骚乱地区建立苏维埃和创建红军部队。这种指示如下：

第一，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

第二，战略路线是：主要敌人是地主豪绅；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基本依靠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在现阶段，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会冲淡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放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第三，支持（非共产党的）农民游击运动，并使它深入和团结起来。把这种游击运动引导到（我们）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轨道上来。协调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

第四，创建工农红军（由于目前的政治局势，这在当前是可能的）的问题，在凡是业已开展游击运动的农村中，必须成为党的工作注意的中心。这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将成为推动革命新高潮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五，必须更加重视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秘密结社等）。加强无产阶级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作用。

第六，支持农民运动中诸如抗税、抗债、抗租和减租等局部性口号。^①

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控制的地区即苏区，要加以巩固，使之成为进一步向附近城市和农村地区扩大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为此，共产党在上述活动中，对这些地区要优先予以同情，使其易于接

^① 同上，分别见以上三个文件的第29—30页，第53—54页，和第150—151页。

受共产党的渗透，党在苏区的任务是：

第一，扩大苏维埃中心地区，即夺取那些能够成为进一步发展强大的〔苏维埃〕运动的地区。

第二，最大限度地发展正规工农红军。

第三，彻底实行土地纲领。^①

第四，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吸收群众参加苏区的行政工作。

第五，坚决镇压反革命阴谋活动，彻底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第六，最大限度地建立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系。^②

在宣传方面，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进行破坏国民党政府信誉的运动，离间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并利用社会秩序中所存在的冲突。党在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为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吸引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参加斗争，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帝国主义的支持者加以揭露。把反帝斗争与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

第二，在反帝运动发展的条件下，争得工人阶级各种合法、半合法革命组织的存在……

第三，在反帝斗争、废除军阀压迫和最大限度地减轻捐税负担……等口号的基础上，使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技工、小商人、不剥削他人的劳动者、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等等）脱离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

第四，支持职员、学徒、艺徒和手工业工人的经济要求。支持苦力的经济要求……^③

① 见本章后面的叙述。

② 见《东方共产党纲领性文件》，第30页，〈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文本，第54—55页；〈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51—152页。

③ 同上，分别见以上三个文件的第31页，第56—57页，第152页。

政治决议案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政治决议案在第九次全会的纲要中加进了详细论述,更加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国际新战略的要点。简言之,就是: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可能的地方建立或重建自己的组织(党支部、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宣传工作,以提高自己党员的理论水平,把群众从国民党思想的影响下争取过来,把国民党本身等同于帝国主义的工具,从而使它名誉扫地。

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利用现有的社会冲突,并从可能支持他们的人们(工人、贫农、雇工、学生等)中为武装部队吸收兵员,这些武装部队在时间和情况允许时将加以巩固,使之成为中国的红军。最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在苏区实行土地革命(重新分配土地,消灭统治阶级等),用这种办法来巩固根据地,并以苏区为基地,进一步扩大农村中共政权。游击战争是共产党人用来在农村地区扩大地盘使之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首要方法;苏维埃则是用来使农村地区得以巩固的政治手段。

从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和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来判断,没有什么理由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把夺回城市基地作为他们的头等任务,以便使中国共产党在它的队伍中能够获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权”。^① 共产国际看出,中共取得胜利的希望主要是在农村。诚然,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城市活动,而且也没有忽视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好机会,但是党在城市地区的任务是从城市吸取人力,并阻挠国民党当局集中全部兵力向农村苏维埃根据地进攻。^② 鉴于国民党在大城市具有优势地位,共产党在那里活动的目的未必是要夺得完全的控制权。在大城市开展

①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第127页。

② 见詹姆斯·克罗斯:《阴影中的冲突,游击战争的性质与策略》,第53页。

工作是游击战争中常用的一种牵制战术。

农村的革命政策

政治决议案的内容是广泛的，包括了党今后工作的各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由政治决议案派生出来的各项决议案则只限于具体问题。农民运动决议案主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控制一定地区的问题；它概述了在共产党控制的苏区与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之间的地区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第二个决议案，即组织苏维埃政权决议案，主要解决在不再为国民党有效控制的地区如何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如何组织苏维埃，以及如何在这一地区建立红军的问题。第三个决议案，即土地问题决议案，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新建立的苏区应贯彻何种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农民运动决议案以它前面的政治决议案的相应部分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它周密地论述了政治决议案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它构成了在苏区以外的农村地区所要贯彻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阶级区分问题上，贫农要成为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认为，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与中农的联盟是土地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但对富农所要采取的策略，则因情况而异。

凡富农现在已成了反动力量的地方，那末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

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

敌人的力量。但贫农与富农^①的斗争应同时进行，决不能因为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让步。^②

决议案并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支持平分土地的口号，但也应批评这个口号”。^③如果一个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支持这一口号，党也应支持它，但必须指出，真正的平等只有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才有可能。同样，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不应强迫实行平分土地，因为这会侵犯他们的利益。^④

党必须在农村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建立独立的组织，并扩大和巩固它对各种农民组织如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秘密结社等的领导。^⑤正是这些组织，特别是农民委员会，党必须准备使其成为将来苏维埃政权的核⼼。^⑥

决议案继续说，“游击战争是斗争的主要手段”，^⑦通过它，能够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建立起苏维埃，建立起红军，并实行土地革命。但共产国际告诫说，游击战争作为一种斗争形式，有其必须纠正的弱点：

第一，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甚至受豪绅地主的宣传，以为这是一种土匪行动。所以以后的游击战争的发动，必须出自群众的要求，尤必须在群众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宣传煽动的工作同时进行。第二，烧毁城市与无目的大烧大杀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游民无产阶级的心理反映，足以妨害党在一

① 这里作者的英译文为“The Poor peasant and hired farm hand”（贫农与雇农）。——译者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文本，第177—178页（着重点是作者加的）。注意：决议案说的是“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没有要求“联合”，李立三后来把政策解释为“联合”，因此而受到批判。

③ 同上，第179—180页。

④ 同上，第180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180—181页。

⑦ 同上。

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影响的发展。所以本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消灭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应积极去领导，党所反对的只是无目的和总的任务不相关的和不是为革命真正利益的烧杀。第三，散漫而缺乏组织。以后必须有计划的组织而集中的指导游击战争。^①

在论述组织地方起义应采取的策略时，中国共产党人被告知说：“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建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区是有可能的。”^②这里应当注意，在中共六大的这些决议案中，没有一处把提倡组织全国范围的起义，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作为立即行动的实际方针。“一县或数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显然并没有这个意思，毋宁说指的是在小地区组织地方暴动。即使是组织地方暴动，也要极端谨慎地进行，而且只有现政权“摇摇欲坠”时，才能进行。决议案继续说：

不是游击战争必定可以变成地方暴动，而是必须要在斗争过程中，真正发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在群众中有建立真正自己政权的要求，在当地反动势力的确在动摇崩溃的时候，然后游击战争必定要发展到地方暴动。所以在游击战争发展到比较广大的区域，有广大群众起来参加，有转到县市地方暴动的形势时，党必须注意客观条件及主观力量，有准备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以县市工人群众的领导与联络去进行暴动。^③运用适当的政策，^④必须立即实现一切群众斗争的口号，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① 同上，第185—187页。

② 同上，第187页。（括弧内的“建立”系译者根据作者的英译文所加。另，这里的“苏维埃区”，英译文为“苏维埃政权”。——译者）

③ 这一句作者英译文为：“运用适当的策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县市工人合作去进行暴动。”——译者

④ 这一句作者英译文为：“暴动胜利后”。——译者

以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①

不应低估农民运动决议案的意义。它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人用以在农村扩大影响的基本策略计划。它说，对一个地区的有效控制，首先要以游击战争去建立。一旦国民党势力不再能维护那个地区，共产党人即可开始下一个步骤。在宣传上要表明，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如国民党所说的土匪。共产党人要组织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们去反对统治集团，并支持他们的要求，如果可能，就支持他们举行地方暴动。当然，只有在国民党警察政权已被扫除之后，党才能从事这种活动——其实，这也就是游击活动的目的。

农民运动决议案是不是表示事先赞同所谓“毛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道路呢？不是。如果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无异于认为共产国际有超人的洞察力。这样提出问题只能绕开真正争论的问题，^②因为这肯定会被说成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实行一条游击战争的方针，从而建立毛泽东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得以胜利发展的基本理论思想。事实上，毛本人在1936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默认，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战略纲要。他说：“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③已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举行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文本，第187—188页。比较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第123—124页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论述。具体准备工作，将在下面的组织苏维埃决议案中论述。（引文中的着重点系作者所加）

② 许华茨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中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解释。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着重点系作者所加）

组织农村苏维埃

如果说农民运动决议案所侧重的是如何在农村的某一地区或地方扩大共产党的控制的话，那末组织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所侧重的则是对某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已经确立之后所应采取的策略。^①如何准备在某一地区建立苏维埃；如何在暴动成功之后建立苏维埃；如何着手建立红军；如何在苏区镇压对共产党统治的反抗；如何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而又给人一种印象——政策是由苏区的“公民”决定的；——这些问题都将在下面所说的决议案中加以论述。

决议案说，当党确定某一地区举行胜利暴动的条件具备时，就必须在该地区担负起组织核心的任务，“俾此核心于夺取政权后，准备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②并说，这种核心多半会成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在一切预定起义的地区”，党必须预先进行宣传，解释苏维埃规章的内容。

除宣传外，党还必须做组织上的工作。这里可以采用上海的旧例，即在夺取政权前在会议上将群众代表秘密选好。但在中国目前地下工作的条件下，能否这样选举政权，很难肯定。大概适当的条件是不会有的。因此……党必须通过支部、党员个人和可靠的工人事先进行准备……^③

^① 参看鲁：《毛泽东在野》，第102页。鲁断言，建立苏维埃不是中共六大提出的方针的一部分。

^② 《组织苏维埃政权决议案》，见《东方共产党纲领性文件》，第51—68页，引文引自第51页。

^③ 同上，第52页。

在某一地区的苏维埃正式建立之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的，即革命委员会”。^① 革命委员会由预定参加武装起义的各组织的代表组成。起义的一切责任都须委托给革命委员会及其参谋部。参谋部必须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应迅速变成红军司令部，领导该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准备发动工人，组织红军的军需等。^② 革命委员会决不应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协会是组织苏维埃的基础，它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③

暴动一胜利，革命委员会必须迅速进行将权力移交给正式苏维埃的工作。决议说，必须了解，革命委员会不过是一种临时政府。它组织苏维埃，苏维埃的成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自己是正式政府。决议案继续说，当然，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应绝对保证党的训令之执行。在军队中或地方民众中有影响之分子，应当加入革命委员会；可是，如果他们在加入后，立刻就表明他们不能在革命委员会中稳固的保证我们党的组织，那么，我们便须立刻设法使他孤立，并布置一切，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从革命委员会中开除出去。^④

一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第一天，革命委员会便须在党的帮助下“以武装起义的队伍编成红军”。^⑤ 决议案继续说，一开始，红军只招募“农民委员会和工会的革命分子”以及“可靠”分子入伍。在红军成立以后，即可“按照一定年龄征兵的办

① 同上，第54页。现在“文化革命”中所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其结构与职能同决议案所要求的甚为相似。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66页。

④ 同上，第54—55页。

⑤ 同上，第55页。

法”征集。^①参加起义的独立游击部队，也须使之成为正规红军，并将其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加以改组。^②

起义后必须立即采取革命措施。一切土匪必须解除其武装并予以镇压——即使他们帮助过起义，也应如此——以免他们死灰复燃，反对苏维埃政权。^③应把迷信和半迷信组织如红枪会等的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其首领，并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组织加以改组，使之处于苏维埃的控制之下。^④当然，一切众所周知的反革命头目都必须尽快加以拘捕，作为人质。^⑤

从这个决议案来判断，“无产阶级领导权”——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控制共产主义运动——或许只是为之而奋斗的理想条件，但没有立即实现的可能性。决议案继续说，要从参加起义的农民、工人和游击队员中造就出自己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工作人员。决议案继续说，旧军队的军官可以用来充当干部，因为他们有军事知识。但只有下级军官才能利用；高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已经陈腐。^⑥“政治工作人员，尤其是政治委员，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只有共产党员，而且最好是工人或佃农出身的党员才能担任。”^⑦看来党员就可以做政治委员一类的重要工作，即使他们是农民也罢。

苏维埃本身必须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保证工人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要象海陆丰和部分地象上海那样，而不应象广州那样建立苏维埃，“在广州，实际上只有过革命委员会，而非苏维埃。”^⑧苏维埃不应只由最上层组织的代表组成，它的成员应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贫农、工会工人、手工业者等）的会议上选举产生。

① 《东方共产党纲领性文件》，第55页。

② 同上，第56页。

③ 同上，第58页。

④ 同上，第59页。

⑤ 同上，第57页。

⑥ 同上，第56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第61页。

苏维埃不只是“群众大会”，也不是“几个领导人的组织”。它是由劳动群众的代表组成的统治机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为十一至二十七人。执行委员会应选出“常务委员会”，掌握实权。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为五至七人。^①苏维埃一旦选出，即应设置各部，执行各项政府职务：军务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社会保险部等。^②决议案再次强调，各种机关都须有一个党团，“这些机关的党团，都须绝对执行党的指示。”^③

“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经过这些党团，经过党员所发表的言论，表示党对苏维埃工作上各种问题的意见。”^④在苏维埃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应该通过领导苏维埃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⑤

最后，苏维埃和游击运动的基本目的，整个来说，就是逐步扩大共产党所控制的领土，逐步占领国民党所控制的领土。

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党部及苏维埃，务要尽力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保障。领土的扩大可由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苏维埃当以武力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这种行动要与红军的进攻相策应。^⑥

土地革命与共产党政权

代表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用以控制某一地区并在所控制地区组织苏维埃的方法既已叙述清楚，便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就如何在每个已建立的苏维埃中贯彻土地纲领所规定的基本经济政策

① 《东方共产党纲领性文件》，第63页。

② 同上，第62—63页。

③ 同上，第63页。

④ 同上，第64页。

⑤ 同上，第65页。

⑥ 同上，第67—68页。

和社会政策提出指导。^①事实上，土地纲领的目的，就是在所控制的每个苏区内完全彻底地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并在有利于贫苦和无地农民的情况下，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因为贫苦和无地农民一般说来占多数，所以他们将成为支持共产党人的源泉。构成共产党土地纲领的各项政策是：

第一，推翻豪绅地主和官僚的政权……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第二，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②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第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

第四，各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分配给红军的兵士供其经济上的使用。

第五，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

第六，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

第七，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累进税。

第八，国家帮助农业经济。

A、办理土地工程；

B、改良扩充水利；

C、防御天灾；

D、国家办理移民事业；

E、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

F、组织消费及生产合作社；

^① 《土地问题决议案》，第34—50页。

^② 这两句作者的英译文为：“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权；没收土地须在当地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指导下进行。”——译者

G、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制。^①

这些政策如果得到贯彻，即使是短期的和部分的贯彻，其效果也将是农民境况的立即改善。这些改革不管如何还只是初步的，但可以想象，许多农民都会相信，由于实行这些政策，这些革命者是值得支持的。这种信念又会上升到一种认识：如果当地政权夺回这一地区，企图废除这些“改革”，并恢复原状，那么它就是有罪的。除非国民党的合法政府能够说服当地民众，它的行动是根据唯一正确的方针，或者它的各项政策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否则，一个地区只要被共产党占领过，即使又被政府所收复，这个地区也将成为共产党人取得支持（积极的或消极的支持）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共产国际的战略是适合于它所要应用的具体情况的。例如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欧，共产国际指导它在那里的各国共产党在城市产业工人中集中活动。在中国，城市产业工人不多，共产国际就强调农村。共产国际特别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在城市进行政治颠覆的方针。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队不易到达的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通过在苏维埃根据地内贯彻“土地纲领”，巩固这些根据地，并创建、武装和训练小战斗部队，这些小战斗部队将在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合并为中国的“红军”。苏维埃根据地一旦在一个地方巩固下来，中国共产党人就要在毗邻地区重复这一过程，逐步扩大他们控制的领土。^②在农村建立共产党政权，看来

^① 《土地问题决议案》，第50页。

^② 苏联现在流行的关于共产国际方针政策的观点是很有趣的。在一系列高度显示自己的关于中共党史的文章中，有一篇这样表达这种观点：“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文件中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对中国共产党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对于解决诸如建党问题、在中国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及其同盟者的问题、中国革命中农民的作用问题、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以及建立中国红军的问题等这类重要问题，也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见O·符拉基米尔与V·里亚桑采夫：《关于中共党史的若干问题》，载《共产党人》第9期（1968年6月）第94—95页。

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制订的新战略的焦点。

在共产国际的新战略中，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的活动被确定为阻挠国民党集中力量打击中共在农村的主力。罢工、宣传、恐怖和破坏活动都被用来使城市处于混乱状态。根据这种新战略，共产党在城市的活动整个来说是起着一种关键的牵制作用。

共产国际的直接目标不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以武装起义的方法迅速推翻国民党政权。共产党设想出一种持久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共产党人将逐步削弱国民党而建立起自己的实力。以上所分析的战略，是毛泽东在中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展了、或许还是提炼了的战略的精髓。这种分析表明，毫无疑问，从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实行一种周到的、老练的游击战争和政治颠覆的战略。

为了贯彻这种新方针，共产国际选用了—个中共的新领导班子。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和项英^①组成了新的政治局。这个新政治局的选定将在下一章讨论，不过这里应当指出，向忠发虽被指定为党的总书记，但他是一个傀儡领袖，掌握实权的是李立三。^②这样，1928年秋，—个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新领导班子，就回到中国贯彻共产国际游击战争和政治颠覆的新战略了。

译自索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1928—1931）》（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28—1931）（美国1969年版），第30—59页。

林海译

① 张国焘与作者的通信。

② 一位原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在1927年秋看到，李立三“在莫斯科被视为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坚”的四个中共党员之一。见卡普登·尤金·皮克：《共产党人支配的中国》，第41页。

1900年中俄满洲 冲突事件新探

郭玫瑰^① 辻伸久^②

在十九世纪末，列强互相竞争想要“瓜分”中国的时期，沙俄开始修筑中东铁路，它横贯当时仍是荒无人烟的北满地区。1898年，沙俄获得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就着手把这条铁路延长到人口更为稠密的南满。北满干线的建筑是中国政府和地方官员们一致同意的，但是，俄国将铁路线延伸到南满，则是非常不受他们欢迎的。1900年，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他们领土的种种行为的愤恨，在义和团起义中达到了极点。这种情况，除导致其他事件外，导致中俄之间在满洲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争，以及俄国军事占领了满洲绝大部分地区，直至俄日战争爆发。

被伦森称为俄中战争的中俄1900年的满洲冲突，似乎最好归属于武装冲突一类，至多只能算是一场小规模战争，因为这些

① 郭玫瑰 (R. K. I. Quested) 曾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任香港大学教授。著有《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1895—1917年俄国在华势力范围》等书。——译者

② 香港中文大学的辻伸久先生阅读了本文所使用的日文资料；香港大学的丘陵庸（音）博士核对了本文所使用的中文资料；本文的所有其他方面均由郭玫瑰负责。本文是于1976年9月14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出的，作者对当时出席讨论会的王赓武教授和其他先生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冲突总共不过延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而且沙俄政府从来就没有正式宣战。关于这场武装冲突中发生的种种事件，至今尚无明确记载。外国的目击者很少，而且是孤立的。迄今为止，业已发表的所有记载，不是仅仅根据俄文资料，就是仅仅根据中文资料，因此都带有一种民族倾向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说法都同意这一事实：义和团及其在中国军队里的同情者在南满首先攻击了俄国人，但是，至于在北满发生的导致俄国入侵的种种事件的过程，俄文和中文资料之间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珀塞尔的《义和团起义》^①几乎没有提到满洲，谭春霖在他有价值的《义和团大灾祸》^②一书中关于满洲的简短章节里，没有充分解释俄国铁路人员的撤离，没有提及中国人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而指出黑龙江将军寿山以炮击阿穆尔河上的俄国侵略舰队发动了战争。中国史学会编的《义和团》^③关于满洲的记载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最全面的记载《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编，长春，1961年版。以下简称《东北革命运动史》），论述了吉林将军和盛京将军的态度，但是对于俄国军队进入满洲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只提供了不完全的轮廓，虽然书中指出所有铁路人员均已安全撤退。^④在中文第二手资料和中文档案出版物的许多文件里，有许多简短的记载，但是关于中国人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事实，看来只有一份出版的中文文件里提到了。

在俄文资料方面，格林斯基的《俄日战争的序幕》^⑤略去了

① 珀塞尔 (V. W. Purcell): 《义和团起义》(马萨诸塞, 坎布里奇 1963 年版)。

② 谭春霖: 《义和团大灾祸》(纽约 1955 年版)。

③ 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上海 1951 年版, 杨家骆 1973 年台北重印)。

④ 亨特 (M. H. Hunt) 在《边境防御和门户开放》(纽黑文 1973 年版) 中引用了这个材料, 他在关于满洲事件的简短记载里谈及“中东铁路雇用的俄国人从满洲逃脱”(第 18 页)。

⑤ 格林斯基 (B. B. Glinskii): 《俄日战争的序幕》(彼得格勒 1916 年版)。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屠杀中国人和铁路人员撤退的事实。罗曼诺夫的《俄国在满洲》^①对于满洲的各种事件也没有提供详细的记载，而且他将俄历换算为公历时有时有错误。马洛泽莫夫的《1881—1904年俄国在远东的政策》^②提到了中国人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以及从7月16日开始中俄双方在阿穆尔河上互相射击，但是没有谈及关于铁路人员从北满撤退一事。他提出的中国人在7月初就包围了哈尔滨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他记载的若干日期与伦森在《俄中战争》^③一书中提供的日期有出入。伦森的书没有脚注，并且是以当时俄国目击者的叙述为根据的，但是书中记载的日期和所作的描绘对于许多事件来说是从俄文资料里能够获得的最为准确的材料，而且在表达俄国人的情绪方面也是极为生动的。伦森指出，7月26日以前哈尔滨没有被完全包围，他提到俄国铁路警卫队和铁路雇员中间的伤亡数字（这就与《东北革命运动史》的记载有根本分歧），并详细描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大屠杀。

本文试图根据中俄双方政府政策的背景，并利用各国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中的材料，尽可能地对导致在满洲爆发冲突的主要事件按照年月顺序勾画出一个正确的轮廓。本文对战争爆发的原因作了新的评价，在本文的结尾，简短地考察了战争的过程。上面已经提到的所有的研究著作都已加以利用，此外，并利用了以前任何记载中都未使用过的下列几种资料中的材料：《清季外交史料》、^④收在《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里的杨儒的电

① 罗曼诺夫 (B. A. Romanov): 《俄国在满洲》(列宁格勒1928年版)。此书由琼斯 (S. W. Jones) 译为英文 (安阿伯1951年版)。本文所引的参考材料都是根据英文译本。

② 马洛泽莫夫: (A. Malozemoff) 《1881—1904年俄国在远东的政策》(伯克利1958年版)。

③ 伦森 (G. A. Lensen): 《俄中战争》(塔拉哈西1967年版)。

④ 王彦威、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台北1963年重印)。

稿、①李鸿章的电稿、②程德全的奏稿、③《东华录》、④《清史》⑤和《义和团档案史料》⑥。在北京出版的、由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⑦和金家瑞著的《义和团运动》⑧这些研究著作中，都可以查到满洲各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此外，也第一次利用了未出版的英国领事的报告和军事情报报告⑨，并利用了发表在《日本外交文书》⑩里的日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商务专员的报告。此人通过与俄国人的接触，对北满发生的事件的消息明显地比日本海军当局（从驻中国海域的海军舰队发给海军当局的报告收集在日本军事档案⑪里）要灵通得多。在一些较旧的二手著作里（其中著名的如马场盛吉著的《以中东铁路为中心的俄中势力的消长》⑫和阿瓦林的《帝国主义在满洲》⑬）可以找到少量的看来也是可靠的材料。传教士的若干记载（其中著名的有司督阁著的《在奉天三十年》⑭）是另一种有用的资料，尽管马洛泽莫夫和亨特已

① 杨儒：《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台北1969年重印，以下简称《电报汇钞》）。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台北1951年重印）。（以下简称《李鸿章电稿》）。

③ 程德全：《程将军守江奏稿》（台北1968年重印）。

④ 《东华录》（台北1963年重印）。

⑤ 国防研究院：《清史》（台北1961年版）。

⑥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1958年版）。

⑦ 北京1961年版。

⑧ 上海1962年版。

⑨ 《英国情报报告》，见F. O. 17/1551，第385—398页（1—30页）。

⑩ 日本国际联合协会编（东京1956年版）。希罗斯（S. Hirose）女士审阅了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发现未发表在《日本外交文书》里的档案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总之，这些档案是非常不完全的（参阅伦森：《奇怪的中立》，塔拉哈西1972年版，第307页）。

⑪ 1900年的日本军事档案（已编入杨 [J. Young] 编辑的《1868—1945年日本陆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档案选辑的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乔治城1959年版）的内容是当时海军当局收到和发出的报告。

⑫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东京1928年版。

⑬ 莫斯科1934年版。

⑭ 司督阁(D. Christie):《在奉天三十年(1863—1913年)》(伦敦1914年版)。

引用过司督阁书中的材料。最后，在这个时期的俄文期刊《历史通报》和1923年出版的尼鲁斯编纂的中东铁路官方历史^①以及各种其他较为次要的资料里都发现了一些有用的新的事实。本文所提供的全是公历日期。^②

所有资料都证实：从6月初起，义和团活动逐渐蔓延到南满，使这个地区的居民和中国军队本来已经对外国人的深刻不满高涨起来。这时欧洲列强在华北面临严重威胁，俄国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这整个局势，意见是有分歧的。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将军为首的军事集团的目的在于：俄国在军事上最大限度地卷入；以一名俄国将军充任派往华北的欧洲远征军的统帅；如有可能就占领满洲。在6月21日以前担任外交大臣的穆拉维约夫似乎和库罗帕特金站在一边，或者是受到他的影响。财政大臣维特反对俄国参加解救北京，同时希望避免俄国军事占领满洲，他大概想保留这个地区作为财政部的独占禁区。他把希望寄托在通过李鸿章同中国单独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不与其他欧洲强国一致行动）上。

然而，库罗帕特金和穆拉维约夫在不通知维特（或者是他声称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从旅顺派遣了四千名俄国士兵前往天津。沙皇6月5日为此下了命令，10日开始行动。^③但是后来（如罗曼诺夫书中指出的）在穆拉维约夫突然于6月21日逝世之后，拉姆斯道夫担任了外交大臣时，维特就“控制了俄国官方的外交机构”，^④而且维特本人声称：他于6月27日迫使阿列克谢也夫（俄国在盛京省关东半岛租借地的总督）许诺，于6月29日迫使库罗帕特金许诺，于7月1日迫使沙皇本人许诺：如果没有取得

① 尼鲁斯 (E. Nilus): 《中东铁路沿革史》(哈尔滨1923年版)。

② 1900年，俄历晚于公历13天。中国的日期是根据薛仲三的《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北京1956年版)或荣孟源的《中国近代史历表》(香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换算的。

③ 马洛泽莫夫: 《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25—131页。

④ 罗曼诺夫: 《俄国在满洲》，第423页，注16。

他的同意，就不派遣俄国军队进入满洲。^① 在俄国参加北京远征军一事上，沙皇最初驳斥了维特的意见，但是后来依从维特和拉姆斯道夫的想法，同意由一位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充当远征军的统帅。^②

维特主张的政策是有历史先例的，他很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1857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非常成功地遵循的政策是有点启发的。在那时，俄国避免对英法同盟军公开承担军事义务，但是利用英法侵略中国的机会，赢得了中国对俄国占领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省的承认。

就派遣军队进入满洲的事情来说，俄国高级海陆军官员遵从了维特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是得到沙皇支持的，尽管戈罗德科夫将军于6月29日已经想派一支军队前往哈尔滨，^③ 而且库罗帕特金在中国人于7月5日开始全面攻击中东铁路的南满支线时感到非常高兴。（在被经常引用的维特的叙述中写道：“他〔库罗帕特金〕喜形于色……他说，‘对我来说，我是非常高兴的，这将给我们以夺取满洲的借口。’”他继续向维特解释，他打算将满洲变成另一个布哈拉。）^④

几个星期以来，维特主要依靠满洲的将军们维持秩序，并且不准许铁路低级雇员和铁路警卫队从南满支线撤退，尽管形势越来越不稳定，同时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铁路警卫队开始还击）。^⑤ 尤哥维奇无疑是遵照维特的命令，于6月22日要求满洲将军们保护中东铁路。^⑥ 然而俄国当局

①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04—112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26—131页。

③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1—112页。

④ 同上，第107—108页。（布哈拉——中亚汗国，1865年被沙俄吞并。——译者）

⑤ 伦森：《俄中战争》，第7—17页。并参阅增祺的奏折，《义和团档案史料》，1/306。

⑥ 弓场盛吉：《以中东铁路为中心的俄中势力的消长》，第59页。尤哥维奇是负责修筑满洲铁路的总工程师。

于6月23日左右建议妇女和儿童撤退，而且工程师们在6月25日至27日之间从铁岭和辽阳向牛庄或旅顺口撤退。^① 维特最后于6月27日与李鸿章通电报，向他提出：如果李鸿章能在满洲维持现状，俄国将不向中国宣战，并且将用俄国军队支持他。这时开始为李鸿章和俄国代表之间举行会谈拟订计划。^②

6月27日，维特又警告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他得知中国在盛京省动员军队的消息，如果中东铁路遭到攻击，俄国将派遣军队进入满洲。^③ 次日，维特命令尤哥维奇为每一位满洲将军在银行开一个户头，各存入十万两银子的存款。^④ 据伦森说，负责修筑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工程师吉尔什曼7月5日在辽阳宣称，他曾给增祺五千两银子。^⑤ 此外，拉姆斯道夫通知杨儒（可能得到了维特的同意），俄国军队正派往华北，仅仅是为了保护外交使节和恢复秩序。^⑥

然而，首先在中东铁路地区增加铁路警卫队的正是维特。他从5月中旬起就希望办这件事，最后他获得批准于6月15日把铁路警卫队从当时的四千五百人增加到六千人，并且于6月27日打电报给在关东的阿列克谢也夫，按铁路当局的意思要求派一支小分队遣队前往营口和南满的其他地方。维特也命令阿穆尔军区司令官戈罗德科夫，如有需要，就准备一支分遣队开往哈尔滨。稍后，6月29日，维特要求铁路警卫队增加到七千人，并于7月5日要

① 伦森：《俄中战争》，第7—17页；捷姆琴斯基（B. Demchinskii）：《俄国在满洲》（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135页；杨儒6月27日致增祺电，载《电报汇钞》，第99页，参看第14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79页。

③ 杨儒：《电报汇钞》，第99页。

④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80页。（关于这件事，《俄国在满洲》中译本的叙述是：“维特…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紧急投放了‘满洲三省每省十万两的第一期贷款’”，与本书英译本的内容不同，见陶文钊等译：《俄国在满洲》[北京1980年版]第218页。——译者）

⑤ 伦森：《俄中战争》，第128页。

⑥ 杨儒：《电报汇钞》，7月1日致李鸿章电（光绪26年6月5日）；《李鸿章电稿》，23/8。

求增加到一万一千人。这些额外的警卫队员是从阿穆尔军区的预备役士兵、阿穆尔军队的侦察兵和边境警卫队的一支分遣队里面抽调来的。^①

这样，虽然他们是真正的俄国正规军，但是他们仅仅是通过铁路沿线地区进入满洲的，因此他们的到达不等于俄国军事侵略满洲。然而，在奇恰高夫将军率领下的一个正规俄国军团确实在7月初开进吉林省的铁路地带（参阅下面第201页）。俄国铁路警卫队和俄国侵略军的区别是很小的。首批额外的警卫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派进中东铁路地区的，搞不清楚，但是库罗帕特金在7月4日告诉德国驻圣彼得堡的军事代表说，那时在满洲已经有六千名俄国士兵。^②黑龙江将军寿山估计，到6月28日止，在黑龙江有五千名俄国士兵。^③

据格林斯基的记载，在这期间清廷由于主战派的影响，在6月20日颁发了对外国人宣战的上谕；^④阿列克谢也夫于同日宣布关东地区处于战争状态，戈罗德科夫将军于6月22日也宣布阿穆尔军区处于战争状态。^⑤6月23日，清廷命令三位满洲将军加强自己的军队，并对义和团进行军事训练，如果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就同义和团一起作战，并破坏铁路。虽然这道命令在语气上是防御而不是进攻的性质，但是这等于是动员。^⑥珀塞尔指出，这道命令是要维持和解的状态，清廷在接到南方总督们敦促镇压义和团

①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0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24页，注28，引用《德国外交文书》，第16卷，第45—48号。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1/201。

④ 谭春霖：《义和团大灾祸》，第157页，提供的日期是6月21日；这是《京报》出版的日子，但是命令是于6月20日颁发给总督和巡抚们的；关于这个文件的讨论见克拉布（O. E. Clubb）：《俄国和中国：一场大的争斗》（纽约1971年版），第528页，注13。

⑤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04页；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27页。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1/200；有两道上谕。

的奏折后，又于6月21日保证采取和解态度。^①按照马洛泽莫夫的说法，俄国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的哥萨克兵于6月24日接到动员令，虽然更可能的是这项动员令是于格林斯基提供的日期即两天以前发出的。在这些地区的偏僻地方，中国人被抢劫和杀害，是“时常发生的事”。预备役士兵涌入布拉戈维申斯克，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在路上碰见中国人就殴打。^②因此，中俄双方卷入战争是惊人地同时发生，虽然关东地区一定是在不知道慈禧太后宣战的情况下宣布处于战争状态的。在这个时期，战争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清廷、中国官员中的主战派、义和团和俄国的军人，而双方的普遍恐惧和排外情绪更助长了这种推动力的影响；但是双方的重要势力仍然主张和平解决。

汉人和满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比俄国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要大得多，众所周知，清廷是受到互相抵触的的意见的影响的，即有时听从这种意见，有时又听从那种意见；而在对俄国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并不比在其它事务方面的分歧要小些。排外派的著名领袖李秉衡，于1899年检阅了驻在满洲的中国军队，以改进他们的战备。在此以后，他任命了几名新的指挥官，以便对任何外国的侵入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③李鸿章仍然基本上主张依靠俄国来反对其它强国，^④而且按照罗曼诺夫的说法，他以前曾经从俄国人那里接受过巨额贿赂。^⑤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与李鸿章有密切关系，他与李鸿章交换过许多电报。^⑥另一方面，张之洞、刘坤一和盛宣怀则提出稳健的意见，主张依靠其他强国来反对俄国。^⑦

① 珀塞尔：《义和团起义》，第256页。谭春霖：《义和团大灾祸》，第97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9页和注137。

③ 参阅郭玫瑰的文章：《1895—1900年中俄在满洲的政治关系》，《东方研究杂志》，1972年7月，第128、133页。

④ 李国祁：《张之洞之外交政策》（台北1970年版），第132页。

⑤ 罗曼诺夫的叙述（《俄国在满洲》，第177页）得到现代苏联学者叶菲莫夫的同意（《1894—1899年中国的外交政策》，莫斯科，1958年版，第256页。）

⑥ 参阅1900年他们之间交换的电报，《李鸿章电稿》和《电报汇钞》。

⑦ 同注④。

在7月份，使汉人和满人发生意见分歧的真正争论点是：是否鼓励义和团；是否在俄国军队的主力有机会侵入之前就进攻中东铁路和在满洲的俄国人；如果俄国军队侵入满洲，是否加以抵抗。驻在满洲的三位将军是在1899—1900年采取一系列军事改革和提升军事人员的措施时被任命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在满洲的地位。^①寿山是黑龙江省的署理将军，他同李鸿章私人关系很好。^②李鸿章从1887年担任北洋大臣的时期起就对黑龙江省和该省重要的漠河金矿感兴趣。^③寿山本人大约四十岁左右，而且是在对日战争中勇敢作战以后，才于1899年第一次晋升为将军。虽然他是一位积极、负责的军官，^④但是俄国人并没有把寿山看作是敌视他们的人。^⑤他似乎显得对义和团不感兴趣，因此义和团几乎没有渗入黑龙江省，但是他倾向于抵抗俄国人，虽然他仅仅把抵抗作为最后手段，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军事上的弱点。^⑥

盛京将军增祺的资格比寿山老，但并不是很坚强的人。^⑦他出生于满洲镶白旗，光绪二十年任齐齐哈尔副都统兼署理黑龙江将军；光绪二十四年任福州将军、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由于俄国提出抗议后，文兴（俄国人认为他很有敌意）被免职，^⑧增

① 参阅本辑第176页注③。

② 参阅1900年3月他们之间互通的电报。《李鸿章电稿》22/4。李鸿章与寿山的父亲前盛京将军（盛京将军误，应为吉林将军。——译者）富明阿相识（并参阅《清史列传》，台北1962年重印，61/27A）。

③ 《矿物档》，黑龙江，第3节（台北1959年版），载有很多文件。

④ 《东华录》，第4603页，寿山的儿子1901年2月21日（光绪27年1月3日）的奏折。清史稿（列传、志谱）254/4A，寿山列传。《清史列传》（台北1962年重印）61/27A有更详细的列传。他是出生在黑龙江的人。

⑤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88页，191—192页。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1/201，寿山的奏折。

⑦ 亨特：《边境防御和门户开放》，第18—19页，引用了司督阁：《在奉天三十年》和其他材料。传教士罗约翰（John Ross）也把增祺描述为“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和一个人放任主义的虔诚信徒”。（《字林虎报》，1901年8月28日，1901年7月—12月合订本第415页。）

⑧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88页。

祺于1899年7月继任盛京将军。^①增祺似乎是反对义和团的，而且不倾向于采取任何强烈行动，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却比其他两位将军强些，而且处于副都统晋昌领导的强有力的反俄派的压力之下。晋昌自俄国人于1898年3月第一次占领关东半岛以来就明显地渴望进攻他们，当时他曾上奏折暗示反俄的可能性。^②晋昌统率着育字军，并且得到仁字军总统寿长的特殊有力的支持。盛京户部侍郎清锐与溥颢以及奉天府尹玉恒也都被俄国人视为充满敌意的，但是清锐的态度似乎比晋昌显得更谨慎一些。^③这个集团可能与李秉衡有密切关系，他在满洲视察，曾经使得晋昌和寿长提升。^④

地位很高的是吉林将军长顺。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具有从咸丰朝开始的漫长的经历。他开始是做低级的蓝翎侍卫，曾多次随同咸丰皇帝从事打猎旅行。从1872至1888年他多半在新疆、蒙古和甘肃工作，曾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哈密帮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他曾两次参加与俄国划界事宜（1877年与1883年）。他在四十岁以前，就因同盗匪作战英勇赢得了声望。虽然他于1887年被撤职，但不久又受到恩宠，并于光绪14年被任为吉林将军。在同日本人作战中，他在防御辽阳的战斗中起了杰出的作用。但是中日战争之后，因同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意见不合，便退休了。1899年在为反俄而调整官员职位时，他又复任吉林将军。^⑤在《续碑传集》所载他的传记中，有轻微的暗示说长顺可

① 《清史稿》（列传、志谱）240/9A，增祺列传。

② 郭玫瑰：《1895—1900年中俄在满洲的政治关系》，第128页。《清季外交史料》，134/7A，晋昌的奏折。

③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91—192页。并参阅下面引用的其他中文材料。7月14日的上谕命令这三个人负责照管盛京省的义和团（《义和团档案史料》，1/321，清锐的奏折）。

④ 郭玫瑰：《1895—1900年中俄在满洲的政治关系》，第133页。

⑤ 《清史》，第462、5044页以及321、353、1093、1731、1873、3267、3284、4993、5663和5685页。《清史稿》（列传、志谱）248/5A的较为简短的列传中所提供的若干日期稍有不同。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96页概要地述及他的经历。

能受到慈禧太后的某种特殊恩宠，他似乎是慈禧同时代的人。^①其他满洲将军都没有这么杰出的经历，也没有同如此高地位的人有联系。他反对卷入义和团的活动和任何抵抗俄国人的行动，^②他像寿山那样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军事力量薄弱。^③

根据西方传教士的材料，长顺同在吉林省的俄国人和欧洲传教士是友好的。^④中国共产党的学者指出：长顺是仇视义和团并且缺乏爱国精神的。^⑤苏联学者阿瓦林断言，他由于接受俄国的贿赂，因此长期地受到俄方的束缚。^⑥不管阿瓦林的说法是否真实，长顺显然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坚强人物，在满洲三位将军陷入危急的困境时，他比另外两位将军更加会设法成功地维持自己的地位并且使各方面都满意。

虽然增祺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亲义和团派的扰乱，从来没有能适当控制盛京省的形势，但是李鸿章、杨儒和三位满洲将军看来都十分渴望阻止俄国侵入满洲。正如下文将要论证的，李鸿章和杨儒建议采取避免给俄国以任何派兵侵入的借口来使俄国军队留在国境以外的政策，这正符合维特的思想。李鸿章和杨儒这个一贯的政策路线，似乎是不受清廷约束的，虽然研究这一时期他们和朝廷之间的关系是完全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① 《续碑传集》53/6B，这里叙述，有一段时间，当他由于在移民和现有土地的所有人之间关于土地的争议中拒绝站在任何一边，而在吉林省很不得人心时，慈禧太后站在他一边，并且对长顺对金钱不感兴趣表示赞赏。这同其他关于长顺的证据材料是不一致的，但是慈禧本人肯定是对金钱很有兴趣的。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中也有长顺给慈禧的一些私人信件，另外还有在俄国占领满洲期间长顺呈送的具有个人风格的满文奏折。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43页，引用了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7页的材料。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1/248，1/250。

④ 传教士富尔顿（T. H. Fulton）1901年2月23日致英国驻牛庄领事禄福礼（H. Fulford）的信。格雷格（Greig）医生（另一个在吉林居住多年并能说流利中国话的传教士）1901年3月1日致禄福礼的信证实了富尔顿所说的情况。两封信均见F. O. 228/1407。

⑤ 《东北革命运动史》，第125—130页。

⑥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50页。

大约耽搁了八天以后，三位将军答复了维特在6月22日向他们提出的保护铁路的要求。这也许仅仅是巧合：在维特赠送他们每人十万两银子以前，他们始终没有答复维特的要求。杨儒应维特的要求，于6月27日和28日致电增祺，恳求他保护铁路，并于28日又打电报给李鸿章，请求李电告三位将军保护铁路。^①7月1日，杨儒电告李鸿章说：维特告诉他，南满的铁路警卫队来电报告，盛京将军正调动军队，将要占领铁路。杨儒继续说，他已经向铁路的所有部门发出电报，并且又致电增祺，告诫他们不要采取任何鲁莽的行动，因为俄国在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驻有大量援兵，而且一旦俄军侵入满洲，就不会很快撤出。^②在此期间，李鸿章在6月30日以前两次打电报给三位满洲将军，^③三位将军都各自打电报给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说，假如不派遣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可以承担保护铁路线和维持秩序。^④根据一份俄文资料的记载，尤哥维奇于7月2日向铁路人员发出通告，宣布了这件事，^⑤虽然根据其他资料记载，他直至7月4日才把此事报告维特。^⑥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来看，清廷对满洲将军们直接下达的命令要含糊得多，事实上清廷的态度是极为摇摆不定的，正象1857至1860年间当西方军队开进中国时咸丰皇帝的政策那样。自6月20日至俄国入侵满洲期间，朝廷的政策从和解到主战，又从主战到和解，突然地来回摇摆好几次，对形势的不稳定和战争的最后爆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珀塞尔指出的：清廷刚刚宣战，就接到

① 杨儒：《电报汇钞》，第99、100页，杨儒致增祺电和李鸿章致杨儒电。

② 《李鸿章电稿》，23/8。按照维特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增祺想要破坏铁路线，而只是在沿线部署军队以守卫铁路。

③ 《李鸿章电稿》，27/7B。

④ 杨儒：《电报汇钞》，第100页，寿山7月5日致杨儒的电报述及此事。

⑤ 伦森：《俄中战争》，第10页。

⑥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8页引用了司督阁：《在奉天三十年》第143页的材料，并引用了《欧洲通报》35卷第8期第826—827页的文章。

南方总督们6月20日和21日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奏折，于是紧接着就开始一个和解阶段。^①在满洲方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也清楚地表现出来。6月23日给满洲将军们的上谕（参阅前面第175页）的基调是防御性的——立即联合义和团，一旦俄国人进攻，就同义和团民一起战斗。军机处6月28日给杨儒的文件指示他向俄国人解释，朝廷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虽然并不愿意庇护义和团，但又担心外国使节将不能得救，并担心如果外国入侵，将发生一场大灾难（换句话说，将瓜分和占领中国）。^②7月2日，朝廷收到清锐的奏折，他报告义和团民于6月30日攻击辽阳火车站，并表示很担心俄国会利用这个行动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③也许由于这个奏折的影响，清廷于7月3日又发出两道上谕：一道上谕命令满洲将军们执行6月23日的上谕，并号召他们尽力保卫国土，抵抗俄国；^④另一道上谕命令主管部门向俄国递送照会，请求俄国鉴于过去长期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和李鸿章于1896年与俄国缔结的条约而出面在中国与列强之间进行调停。^⑤

但是，如上所述，盛京省的局势从来没有真正地处于增祺控制之下。尽管增祺于6月30日致电尤哥维奇承担保护铁路的义务，然而他在最初犹豫不决和接到6月23日的第二道上谕以后，已经于6月24日公布了慈禧太后6月20日的宣战上谕，虽然他已把这道谕旨预先通知西方的传教士了。^⑥如上所述，那时在中国老百姓同俄国普通雇员和铁路警卫队之间气氛紧张，双方开始有暴力行为。俄国工程人员从铁岭和辽阳撤退，俄国妇女和儿童也开始

① 珀塞尔：《义和团起义》，第256页。并参阅谭春霖：《义和团大灾祸》，第97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1/202。

③ 同上，1/220。

④ 同上，1/221。

⑤ 同上，1/227。照会的另一份原文见《李鸿章电稿》23/33，这份原文是杨儒于7月10日电告李鸿章的。照会同时也送致英国和日本。

⑥ 亨特：《边境防御和门户开放》，第18页，引用司督阁：《在奉天三十年》，第131—161页的材料。

撤离。到6月底，中国人开始零星地向铁路进攻，这时俄国经营的烟台煤矿着火，攻击铁路财产和俄国人的事日益增多，偏僻车站的人员开始一面战斗一面撤退。^①清锐报告攻击辽阳车站的奏折（按照权限来说，这奏折本应由盛京将军增祺来写）表明，增祺可能已经处于反俄派的胁迫之下了。^②7月4日，增祺被晋昌软禁于自己的衙门里。^③7月5日，晋昌指挥自己部下的军队和义和团民大举进攻铁路。辽阳、盛京和许多较小的车站都被焚毁，盛京的营房被炮击，铁路线及其桥梁多处被毁。在盛京省，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处于事实上的战争状态。^④在任何可供利用的资料里，对于俄国铁路人员和铁路警卫队从盛京省逃跑时的情形都没有清楚的和综合性的记载，但是伦森编纂的目击者的材料里记载了几批人遭受苦难的非常令人信服的故事。清楚的是，虽然铁路工程师实际上也许没有死亡的，但是铁路警卫队和低级雇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中间却有大量的伤亡——伦森提到的几批人里面大约有六十至一百人死去，其中有些人是拷打致死的。另一方面，俄国人也使中国人遭受重大伤亡。^⑤

然而，在对盛京省的铁路全面进攻以后，清廷在7月9日以前仍然执行其和解方针，盛京省的满洲军队似乎一般地采取防御姿态，不试图侵犯关东半岛的俄国租借地，也不进攻正规的俄国侵略部队——这些部队在7月13日以前开始从关东进入盛京省，这一情况下文将予以讨论。增祺在几天之内与主战派达成妥协，

① 伦森：《俄中战争》，第7—17页。

② 参阅上段。

③ 司督阁：《在奉天三十年》，第149—161页；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4页；两书都被马洛泽莫夫在《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43页引用了。

④ 伦森：《俄中战争》，第7—17、48、129页等；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4页；《清季外交史料》，144/21B，增祺1900年12月11日的奏折。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8页，引用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4页，错误地说，主攻是于7月4日开始的。很清楚，晋昌进攻并不是受清廷之命。

⑤ 伦森：《俄中战争》，第7—17页；增祺7月14日的奏折，《义和团档案史料》1/306；杨儒：《电报汇钞》，第104页，李鸿章7月9日致杨儒电。

并恢复呈递奏折，^①虽然在清廷对他未能亲自奏报7月5日事件表示不悦以前，他没有呈递奏折。^②

在此期间，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将军的权力仍然没有崩溃，中国居民虽然紧张但还平静。义和团的影响在7月初才渗透到吉林省，而且其影响比在南满要小得多，尽管该省很多低级官员是反俄的。在黑龙江省，任何时候义和团的迹象都是很少的。^③马洛泽莫夫引用的俄国军事方面的材料谈及在吉林城和齐齐哈尔的俄国人于7月6日看到了命令中国军队联合义和团民并杀死所有的外国人的上谕，^④但是一项可靠的英国传教士的材料报告说，7月2日长顺就劝告所有的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离开，并亲自护送吉林城里的这些外国人，派警卫队把他们送到哈尔滨。^⑤他安排以自己的军队守卫铁路及其财产，并且向尤哥维奇提供帮助，^⑥甚至提出派遣一团吉林军队去帮助防御哈尔滨（俄国人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也呈递了一份奏折（清廷于7月5日收到），强调由于缺乏士兵和义和团民，所以不可能与义和团民联合并破坏铁路，^⑦虽然他于7月6日又打电报说，他正采取步骤，准备给二千五百名非正规的士兵和他能够找到的少数义和团民一些训练，并且计划遣散俄国人在铁路上雇用的苦力，把最合适的人留下当兵，而

① 增祺报告铁路线战斗情况的奏折，清廷于7月12日收到（《义和团档案史料》，1/295）。

② 同上，1/253。

③ 《东北革命运动史》，第119—125页，表明义和团主要集中在长春地区，吉林城和齐齐哈尔是较为松散的集中点。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94页，提到吉林省反俄的低级官员。

④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8页，引用《俄国陆军部报告》，XXXIII/581。

⑤ 同本辑第179页注④。

⑥ 捷姆琴斯基：《俄国在满洲》，第137页（这部著作是根据文件资料写成的）；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93—195页；《李鸿章电稿》23/15，23/19，长顺7月4日和6日致李鸿章电。

⑦ 《义和团档案史料》，1/248。

将剩下的人送去垦荒。^①在黑龙江，寿山除承担保护铁路的义务外，又于6月28日打电报给尤哥维奇和戈罗德科夫说，他听到俄国军队正在集中将入侵满洲的消息，并请求他们最好不要派遣军队前来，否则，俄军的到来会引起严重动乱。根据一份俄文材料的记载，寿山直到这时才开始动员军队。^②7月5日，寿山致电杨儒说，中国人从住在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的结雅地区）的俄国人那里听到他们打算“在阳历13日”调动军队，通过瑗琿前往保护铁路。寿山进一步报告说：“这儿一切似乎都依然平静，人们并没有决定行动，但是我强烈感觉如果俄国军队前来，他们肯定是不高兴，他们将破坏铁路。”^③杨儒把这一情况通知维特，维特予以否认，同时指出，如果中国官员保护铁路，就不会派任何俄国军队到铁路线来。^④维特也把这些内容电告李鸿章，并要求尤哥维奇对他所遇见的所有中国官员作出同样保证，还安排让在旅顺口的阿列克谢也夫海军中将照此办理。^⑤

然而，俄国军队即将入侵的谣言继续在北满流传。寿山收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务专员发来的使人受到威胁的报告：从俄国的欧洲部分派来的大批援军（三十六个旅）即将到来。又有报告说，有几千名俄国人已乘船潜入哈尔滨。同时增祺电告寿山，在盛京省的中国人正在破坏铁路。据说，这时晋昌也打电报痛斥寿山，极力要求他对俄作战。^⑥因此寿山便确定战争即将来临，而

① 同上，1/250。目的是防御——防止这些人扰乱秩序。

②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3页。

③ 杨儒：《电报汇钞》，第100页，寿山致杨儒电。7月8日收到的寿山的奏折提供了关于集结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俄国军队的更多的详细证据——二千名骑兵，五千名步兵和二百辆马车。（《义和团档案史料》，1/264。原文是：据探俄兵现聚海兰泡，约共马队二千，步兵五千，并备车二百辆……由本月十三日由陆进发，等语。——译者）

④ 杨儒：《电报汇钞》，第102页，杨儒1900年7月5日致寿山电。

⑤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3页。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1/579，1900年12月9日收到的长顺奏折。杨儒：《电报汇钞》，第103页，杨儒致电李鸿章报告寿山来电的内容。哈尔滨来到援兵的报告不确，虽然关于俄国军队集结的谣言总的趋势当然是正确的。

且根据战略需要应将哈尔滨占领。他可能于7月7日调动军队进入控制哈尔滨的阵地，并且他必定打电报给长顺，建议于7月8日与长顺联合进攻哈尔滨，“因为哈尔滨贮存着大量粮食，应该尽速攻取”。长顺劝阻他，因此，他把进攻日期延迟到7月10日，但是又被长顺拖延。^①这样，寿山从长顺那里未能得到任何支持，他似乎又回到较为谨慎的政策。看来他可能主要想试探一下长顺，而且他当时是否实际上调动军队到哈尔滨去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中文材料看，他采取了什么军事措施是不清楚的，而俄文材料里的证据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②

这时李鸿章和杨儒着手采取激进的新行动，即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所有的俄国人应从满洲撤出，铁路由中国人接管。李鸿章于7月8日致电尤哥维奇，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增祺、寿山和长顺也都分别将同样内容电告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戈罗德科夫将军和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格里布斯基将军，并且也电告尤哥维奇。寿山还致电杨儒，请杨向俄国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说明，他已护送铁路工程师们前往安全地点，并保护铁路财产，“当工程师们返回铁路时，仍可照常施工”。但是，俄国方面的反应是否定的。寿山声称仅仅收到一封戈罗德科夫的电报，向他保证，如果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1/271，寿山7月9日的奏折；《清季外交史料》，143/18，长顺7月18日（光绪26年6月22日）的奏折。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9页，说寿山调动军队进入哈尔滨四周的阵地，注明这是引用格林斯基：《俄日战争序幕》第113页的内容，但是实际上格林斯基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不过，索科洛娃（A. Sokolova）在1906年12月的《历史通报》第810—828页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提到此事的，这篇文章是总标题为《中东铁路1898年的大屠杀》（这个标题会使人误解）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叙述铁路人员从中东铁路西段为时较晚的撤退，是根据第一手材料或一位亲密的朋友的报告，看来语气是非常真实可信的。然而文章中关于哈尔滨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事件的后一部分，作者承认仅仅是根据“人们向我叙述的材料”，看来是含糊不清的。《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99页说，俄国人自己破坏了一些建筑物和哈尔滨郊区的电报线，以阻止料想中的中国人的进攻，而将破坏的罪责嫁祸于中国人，作为俄国召集侵略军队的借口。

派更多的俄国军队前来，将非常严格地管束他们。^① 增祺在7月14日的奏折中谈到：他根本没有收到对他的电报的任何答复。^② 根据一份俄文材料的记载，尤哥维奇于7月8日打电报给寿山和长顺作了答复：俄国方面并没有授权他将铁路移交给中国官员。^③ 虽然俄国人对增祺的建议缺乏热情是不足为奇的，至少可以这样说，寿山和长顺的建议是正确的，仍然能够实行，因为中东铁路干线的情况依旧平静，虽然流传着使人惊恐的谣言。

尽管在北满为防止战争作了这些努力，此时联军在天津附近被打败的消息使清廷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它在7月9日、10日和12日连续发出了强硬的上谕，“要求控制和动员义和团民并抵抗外国军队的任何进攻”。^④ 9日给增祺的上谕要求他在俄国人不断增加军队的地区部署军队。12日收到的增祺的奏折，肯定地预言俄国人将要入侵。^⑤ 在已发表的资料里找不到在这些日子里给寿山的上谕，但是，在一份中文材料里有一些证据，说明他或许遵照没有发表过的上谕，曾发出了秘密杀害俄国人的密令。^⑥ 不管怎样，正如一份可靠的俄文材料所强调的，^⑦ 他对于俄国铁路人员的表面上的行为直到最后都是正确的。然而，他命令在瑗珲的军队提高警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收到了与发给增祺的内容相同的上谕。

再者，俄国人现在采取全面侵入满洲的决定性步骤。虽然这

① 杨儒：《电报汇钞》，第104、105页，7月9日李鸿章致杨儒电和寿山致杨儒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1/306，增祺7月14日的奏折。

③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01页。

④ 谭春霖：《义和团大灾祸》第158页引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台北1963年重印）；53/42、44、54/12的材料。

⑤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53/42、54/12。

⑥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96页引用了刘文凤：《东陲纪行》第46页的材料说明这一情况，但对于这本著作未作详细介绍。《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117页也引用了《东陲纪行》第46页的材料，对这本著作也未作详细说明。

⑦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91—192页。

时他们或许尚未得知新的上谕，但是联军在天津的挫败必然很快地被关东的俄国总督知道了，他于7月9日“劝告”尤哥维奇电请俄国军队前来。^①这时尤哥维奇(他是伦敦英王学院毕业的一名塞尔维亚民用工程师，他并没有关于中国的专门知识。^②)还在遵守着维特的不从北满撤退铁路人员的命令，无疑由于关东总督的劝告以及几位满洲将军的来电，他便于7月9日电请维特派俄军前来。库罗帕特金应维特的要求在同一天发出了派兵的命令，^③也就是在同一天，萨哈罗夫将军的远征纵队离开哈巴罗夫斯克向乌苏里江口出发，在那里等待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开来的军队，以便同他们一起前去解救哈尔滨。^④可是，直到第二天，即7月10日，维特和拉姆斯道夫才一起告诉杨儒：铁路人员不能撤退，并把侵入满洲的决定透露给他。饶有兴趣的是，他们提出的入侵的理由是义和团已蔓延到各地，以及在盛京省铁路沿线曾发生五天战斗，而不是由于北满形势受到任何特别的挑战。虽然杨儒再三恳求维特不要派遣更多的俄国军队，但无济于事。^⑤可是第二天，7月11日，维特又接见他，并强调俄国军队将在日后秩序恢复时撤退。^⑥正如克拉布指出的，这个方式同1878年伊犁地区被占领的事件一样。^⑦于是杨儒致电寿山，要求他不要惹起任何麻烦，并于7月12日致电上海道，请他向三位满洲将军提出同样的劝告。^⑧

这时维特的反应如何，人们知道得很少，上面引证的关于俄

①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2页。

②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6—27页。

③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5页。

④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42页，引用俄国陆军部报告，XXX I/579—600，和穆施拉耶夫斯基(A. Myshlaevskii)：《1900—1901年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圣彼得堡1904年版)的材料。

⑤ 杨儒：《电报汇钞》，第107页，杨儒7月10日致李鸿章和寿山电。

⑥ 同上，第108页，杨儒致李鸿章和寿山电。

⑦ 克拉布：《俄国和中国：一场大的争斗》，第128页，克拉布错误地说杨儒是7月11日被告知的。

⑧ 杨儒：《电报汇钞》，第110—111页，杨儒致寿山和上海道电。李鸿章也致电三位满洲将军提出同样劝告。谭春霖：《义和团大灾祸》，第159页。

国决定入侵满洲的情况的现有的少量证据，可以引起人们各种推测。一方面人们可以假定。俄国军人最后以对尤哥维奇施加压力的办法抢在维特之前采取了行动，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测，维特和尤哥维奇害怕中国人对铁路的控制更甚于害怕他们破坏铁路，因为南满支线中断，是在维特没有决定派兵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因为维特拒绝从北满撤退工程人员。但是不应忽视，中东铁路干线对于俄国的利益来说，比南满支线重要得多。更可能的是，尤哥维奇至少是害怕中国人大举进攻。不管什么原因，维特现在明显地开始希望俄国能不流血地从事占领，而不遇到北满中国人的抵抗。

尤哥维奇请求派兵前来也可能是受这一事件的影响：义和团民于7月9日猛烈攻击吉林省的一队俄国铁路警卫队（这是唯一得到证实的这一时期在北满向俄国人的进攻），但是他或许直到较晚时候才得知此事。^①因为在所有这些紧张日子里，吉林和黑龙江还保持着平静。形势是逐渐严重起来的，直到7月15日双方才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不可挽回地破裂了。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可以证明7月26日以前向哈尔滨进行过任何进攻。马洛泽莫夫根据俄国陆军部报告写道：哈尔滨“从7月10日起就由盖伦戈罗斯将军努力防守”。^②可是，伦森的叙述只是表明哈尔滨由于谣言而加强了防御，以及当地俄国居民感到惊慌。^③前面述及的索科洛娃的文章中含糊地提到中国军队包围哈尔滨并从7月11日起进行零星进攻，但是文章的这一部分是根据传闻写的。^④日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商务专员于7月19日的正式报告中也谈到：俄国人的电报报告说，哈尔滨一切平静，虽然“人们认为大批中国军队正逼近”

① 伦森：《俄中战争》，第145页。并见本辑第201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42页。

③ 伦森：《俄中战争》，第140—146页。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26页明确地说是7月26日进行第一次进攻的。

④ 《历史通报》，1906年12月。见本辑第185页注②。

这个城市。^① 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很自然地处于非常惊慌的状态，因为他们从周围的地区得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而且从南满种族仇恨的地区一边战斗一边逃出来的同胞成批地源源不断地到来。在一片恐怖气氛中，看来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这些成批地逃出来的人在长春以北未曾遭到攻击。哈尔滨的驻军不多，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中国人中有些人被雇用挖掘战壕，虽然许多其他的中国人逃跑了。^②

尽管维特向杨儒坚决表示铁路人员不能撤退，但是尤哥维奇和盖伦戈罗斯于7月11日联合命令铁路人员全部撤退到最近的俄国居民点，即哈尔滨或尼格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或祖鲁海图。高级铁路雇员的家属和铁路警卫队的军官们则乘船顺松花江而下，毫无阻碍地到达哈巴罗夫斯克。^③ 这道命令大概是由于吉林省铁路警卫队遭到攻击而促成的。然而，尼鲁斯引用了一位目击者（工程师库兹涅佐夫）的回忆，他说：他负责的那段铁路上的俄国人和中国人都对撤退命令普遍感到惊奇。^④

大概就在这时，在黑龙江省西北的呼伦贝尔，俄国铁路警卫队指挥官阿列绍夫向一些中国工人开枪，并打死其中五人。寿山现在明显地试图竭力避免俄国入侵，他急忙打电报给尤哥维奇，请他调查阿列绍夫事件，并报告戈罗德科夫。但是尤哥维奇答复说，因为寿山不能维持秩序，所以俄国军队正向黑龙江开来。于是寿山便派官员前往哈尔滨和戈罗德科夫驻地，谈判俄国铁路

① 《日本外交文书》，明治33卷，第736页，附录1，第727号文件。

② 伦森：《俄中战争》，第142—145页。对于原来驻军人数的估计，从五百—六百（伦森书，第144页）至一千人（索科洛娃文章）不等，7月18日从南方调来二百五十名哥萨克兵增援（伦森书，同上）。在哈尔滨能参加防御活动的军队、铁路人员、工人和平民义勇兵等欧洲男性总人数，尼鲁斯估计为三千五百人（《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16页），弓场盛吉估计为三千四百人（《以中东铁路为中心的俄中势力的消长》，第64页），他也指出7月26日是第一次进攻的日期。

③ 伦森：同上，第142页。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02页的记载是7月10日发出命令的，第214页记载撤退一直持续到7月23日。

④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07页。

警卫队撤退事宜。这些官员未必能到达目的地，不过寿山在当天也以电报与戈罗德科夫和尤哥维奇谈判双方从铁路地区撤退士兵的事宜。通过电报谈判的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不过寿山报告他曾派一名官员到盖洛夫（他是负责中东铁路西段的工程师）那里去，准备安排盖洛夫从目前的驻地（齐齐哈尔以西七十里）安全撤退到齐齐哈尔。^①

按照寿山的叙述，盖洛夫放火烧着他的住房，于7月11日午夜开始惊慌地撤退，途中向铁路附近想象中的义和团民开枪（虽然寿山不相信有任何真正的危险），乘火车逃到哈尔滨，丢下了铁路西段十万名左右的苦力，使他们陷于领不到工资和无人管理的困境。后来听说，盖洛夫撤退时破坏了电报局的建筑物和铁路沿线储存的粮食。随他同行的有六百至七百名俄国男人、妇女和儿童，三十名铁路警卫队士兵，他们在登上火车之前，乘坐三辆马车并用八十辆马车运送行李。盖洛夫于7月15日安全到达哈尔滨。但是，还有一些工程师和俄国商人留在黑龙江的不同地区，寿山命令加以保护并护送出境。^②

伦森和索科洛娃描述了从这条铁路线其它地点出发的同样轻率的撤退，但是除三姓地区外没有谈及任何俄国人在黑龙江被杀害或受伤。可是，根据索科洛娃的记载，有三十名俄国工人和一名带着一个孩子的年轻妇女失踪，——这些人是不是据说是寿山发出的秘密消灭俄国人的命令的受害者？尼鲁斯的叙述可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说法，他描述在海拉尔附近的雅鲁车站有二十五名俄国人在遭到开枪射击后，与其余同行的人失散，试图前往阿

① 杨儒：《电报汇钞》，第110、111页，寿山7月13日致杨儒电。

② 杨儒：《电报汇钞》，第110、111页，寿山7月13日致杨儒电；第115—117页，寿山7月份致杨儒的两封电报；第119页，寿山7月16日致杨儒电。谭春霖：《义和团大灾祸》第160页里谈及在黑龙江有六千至七千名俄国人，但说明这是引用了杨儒：《电报汇钞》第116页的材料，而那一页只不过提到随盖洛夫同行的有六百到七百名俄国人。不过索科洛娃也谈到有一个五千人的团体撤退，她的朋友罗加诺娃夫人就是参加这个团体撤退到祖鲁海图的。

穆尔河畔，此后下落不明。根据索科洛娃的记载，某些在铁路线上的人也遭到抢劫或被拘留以勒索赎金。按照索科洛娃和尼鲁斯的叙述，在海拉尔附近，有一群俄国人在排列成行、指扣扳机、怒气冲冲的中国士兵之间通过，神经极为紧张。^①然而索科洛娃和尼鲁斯两人特别回忆了“保将军”对俄国人的友好关系。这位“保将军”肯定就是保全统领，后来在海拉尔前线与奥尔洛夫军团的战斗中阵亡了。^②根据各地俄国撤退人数的比较来看，黑龙江的俄国人大多数都能安全撤退，这是寿山的一大贡献，也是俄国人在中东铁路干线上始终同中国人保持友好关系的结果。无疑，俄国人主要担心的是数量庞大的苦力，这些苦力主要来自山东，是俄国人雇用来在铁路上工作的。然而，在黑龙江，这些苦力似乎主要是愤恨他们的雇主抛弃了他们，而不是受到义和团的影响。一份日本材料也谈到俄国人从中东铁路干线的东段和西段都顺利地撤退了。^③

7月13日，联军攻陷天津，^④同时俄国军队开始从关东租借地小规模地开进盛京省。7月14日，清政府接到俄国的照会，提出如果中国保护外国人并且镇压义和团，如果满洲能维持现状，俄国将对中国提供帮助。^⑤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清廷进入了一个新的和解阶段。^⑥寿山于7月15日电告杨儒，他收到了一道紧急上

①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12页；索科洛娃的文章（见1906年12月的《历史通报》第813页）谈及从工程师西马诺夫斯基的妻子那儿抢去的钻石和财物，在他们出境以前都归还给她了。

②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11—213页；《东华录》，第4603页，寿山儿子的奏折详细叙述了保全英勇阵亡的情形。索科洛娃的文章（见1906年12月的《历史通报》第813页）。按照尼鲁斯的说法，保全试图表现得格外的英勇，因为他害怕由于自己和俄国人的友好关系而遭到批评。

③ 弓场盛吉：《以中东铁路为中心的俄中势力的消长》，第63页。

④ 珀塞尔：《义和团起义》，第256页。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1/310。

⑥ 珀塞尔：《义和团起义》，第256页，但是他没有提到俄国的照会。

谕，命令他保护俄国工程师，^①同时长顺也电告杨儒，他收到了一封撤消宣战上谕的信件。^②杨儒给长顺回电，谈到俄国的照会并转达俄方的解释：他们同中国人民没有争吵，他们的军队开来是为了保护铁路，除非受到进攻，是不会开枪的。杨儒竭力要求控制住满洲的局势。^③但是阿穆尔河事件即使在那时已经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正是在那天，7月15日，璦琿的中国驻军开始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

过去几天紧张的焦点是集中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璦琿之间的阿穆尔河上。俄国人在这里集结开往满洲的远征军，把军队和大炮用轮船和驳船运往下游，这条河是俄国人能加以利用的最好的运输线，^④然而寿山根据清廷7月9日—12日的方针显然曾命令这里的驻军要提高警惕。根据寿山自己的陈述，他曾多次警告戈罗德科夫，如果派俄国军队通过璦琿的炮台，中国人将开炮轰击，但是戈罗德科夫不理睬这些警告。^⑤再者，根据增祺后来呈递的奏折，反俄派晋昌此时仍然不断地极力劝说寿山向俄国人进攻。^⑥无论这情况是否属实，寿山显然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因为在7月15日以前，他不可能收到任何关于撤消宣战上谕的文件。在他的军队中仇恨俄国人的情绪显著增长，同时他也预料到俄国军队会入侵满洲。

对于阿穆尔河事件，以俄文和中文材料为根据的记载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在细节方面却有相当不一致的地方。格林斯基和马洛泽莫夫叙述中国人第一次向一艘俄国轮船开火是发生于7

① 杨儒：《电报汇钞》，第116—117页，寿山7月15日致杨儒电提到此事（虽然没有说明收到上谕的日期）。

② 同上，第117页，长顺致杨儒电，电报里没有透露是谁送这封信给他的，这似乎是私人信件，而不是象上谕那样的正式文件。

③ 同上，第117页。

④ 沿河没有铺好的公路。伦森：《俄中战争》，第68页。

⑤ 杨儒：《电报汇钞》，第120页，寿山7月16日致杨儒电。

⑥ 《清季外交史料》，144/21B，增祺1900年12月11日（光绪26年10月20日）的奏折。

月12日，当时六艘轮船和九艘驳船装载着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大部分驻军开往下游与哈巴罗夫斯克的军队会合以便解救哈尔滨。^①格林斯基指出，那天戈罗德科夫接到寿山的一封电报，声称因为俄国军队正在侵入满洲，所以他已命令中国军队向俄军开火。^②寿山本人在给杨儒的电报里声称：7月13日由七艘俄国轮船和十一艘驳船组成的一个护航队在瑗琿第一次遭到查问，不过又放行了，这事发生后，他打电报警告戈罗德科夫，此后如再有俄国护航队通过将遭炮击，但是戈罗德科夫不予理会。^③伦森描述这第一次事件是发生在7月14日，当时中国军队向《米哈依尔》号和《色楞格》号两艘轮船开火，击毙或打伤七名俄国人，其中包括陆军上校、阿穆尔边区司令官卡尔施米特，他受了重伤。一名俄国军官和他的通讯兵被从《米哈依尔》号抓走，该军官后来回到了俄国河岸，带回了瑗琿副都统的警告：副都统接到寿山的命令，不得让任何俄国船只通过。但那个通讯兵显然是被杀了。按照伦森的说法，事情的发生是由于遵照中国人的命令在瑗琿暂停的俄国船只未得允许就开始继续前进之故。^④寿山没有向杨儒提到这一情况，但是后来他在9月8日自杀前最后一次的奏折里确实提到就在这一天（7月14日）瑗琿爆发了战争，虽然他谴责了命令轮船开行的俄国“专员”（卡尔施米特上校）。^⑤因此看来俄文和中文材料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是一致的。

最后，次日（7月15日），中国人开始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

①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5页。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9页，引用了多伊奇：《在西伯利亚十六年》，第330页的材料。

② 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5页。

③ 杨儒：《电报汇钞》，第120页，寿山7月16日致杨儒电。克拉布：《俄国和中国，一场大的争斗》第129页说：“中国人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突然开火”。

④ 伦森：《俄中战争》，第76—77页。

⑤ 寿山自杀前的奏折见《东华录》（光绪26年），第4603页。当时寿山也向皇上报告了这一事件——7月24日朝廷发给满洲三位将军的上谕中提到此事（未说发生的日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1/362。

马洛泽莫夫根据多伊奇的材料指出此事是7月13日开始的，^①但是伦森^②和日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商务专员^③都说是7月15日开始的。按照伦森和长顺后来的奏折的说法，密集火力最初是对准在河里洗澡的俄国士兵射击的。^④寿山在奏折和给杨儒的电报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次炮击。可能此事不是在他的直接命令下干的，因为他驻在距离此地至少有几天行程的齐齐哈尔。可是一项黑龙江地方志说，7月14日寿山为了进攻俄国人，把他的部队分成三路。^⑤长顺在后来的奏折里把炮击事件归咎于璦琿的副都统凤翔，但指出寿山应负真正的责任，因为他鲁莽地命令副都统不得允许再有任何俄国船只通过。^⑥

伦森也指出双方是7月15日在阿穆尔河上开始互相射击的，^⑦但是这种说法有些可疑，因为寿山本人和日本商务专员说发生此事的日期是16日。^⑧上面引证的伦森的记载说，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司令官和阿穆尔哥萨克部队的长官格里布斯基上校^⑨率领一支军队沿阿穆尔河岸前进，《米哈依尔》号和《色楞格》号轮船在侧翼

①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9页引用多伊奇：《在西伯利亚十六年》，第330—331页的材料。马洛泽莫夫也误述了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15页的材料，说成是“当时”寿山致电格里布斯基声称他已命令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格林斯基原来的确实叙述，见本辑第193页注②。

② 伦森：《俄中战争》，第80页，可能是引用埃勒茨：《阿穆尔的英雄业绩：在中国人围困下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莫斯科1901年版）的材料。

③ 《日本外交文书》33/I，第736页，第727号文件。

④ 伦森：《俄中战争》，第180页；《义和团档案史料》1/579，长顺1900年12月9日的奏折。

⑤ 张伯英：《黑龙江大事志》（北京1933年版，台北1970年重印），4/13A。在《清史列传》寿山列传里（61/28A）和《清史稿》（列传、志谱）254/4A也提到此事（没有日期），但是这些材料指出，目的是防御而不是进攻俄国人。而且，璦琿和齐齐哈尔是可以通用电报联系的，这条电报线是1886年建成的。（《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1卷，第8页（哈尔滨报告），上海，1924年版。）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1/579。

⑦ 伦森：《俄中战争》，第83页。

⑧ 杨儒：《电报汇钞》，第120页，寿山7月16日致杨儒电。《日本外交文书》，33/I，第735页，第726号文件。

⑨ 上校，误；应为中将。——译者

掩护，打算进攻璦琿并击毁那儿的大炮。两艘轮船同璦琿的炮兵之间开始交火，可是当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遭到炮轰时，格里布斯基便带着军队慌忙返回城里。寿山的叙述说，俄国轮船驶近中国河岸，双方互相射击，后来俄国轮船就逃跑了。不管这两种说法的价值如何，当寿山接到双方交火的消息后，便于7月16日致电杨儒，显然是为防止入侵作最后的努力，请求俄国不要再作任何军事调动，否则他们将再一次遭到炮击。^①杨儒通知了维特和拉姆斯道夫，但是他们不理睬这个请求，而且再一次坚持俄国的入侵必须进行。不过，他们再次表示，他们是不想进行任何战斗的，并要求停止对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进攻。^②杨儒将送给俄国方面的照会及其答复通知了三位满洲将军，而且明确地要求他们，如果俄国军队入境，不要抵抗。但是寿山回电，他将命令士兵向俄国军队开火。^③这是按照朝廷的旨意行事的，朝廷在7月20日给长顺的上谕里表示希望避免边境上的大规模战争，但是如果敌人入侵，坚决要求勇敢地保卫国土。在7月22日给三位将军的另一道上谕里，又重申了这个精神，并且主张如果俄国军队入境，可用义和团民作防御的前卫，以便把主要罪责推到团民身上，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以后与外国人进行谈判。^④

无论如何，对布拉戈维申斯克时断时续的炮击（据推测这可能是执行凤翔的命令）从7月15日一直持续到8月3日。^⑤凤翔并于7月17日和19日夜组织军队到阿穆尔河俄国河岸进行袭击，

① 杨儒：《电报汇钞》，第120页，寿山7月16日致杨儒电。

② 同上，第120—121页。杨儒7月16日致寿山电。维特也将同样内容电告李鸿章。（同上，第119页，李鸿章致杨儒电）。

③ 同上，121页，杨儒7月18日致李鸿章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1/347、1/360。显然直至7月25日清廷才发出一道明确的上谕，要求所有的地方当局保护外国人并镇压义和团（杨儒：《电报汇钞》，第122页；杨儒致寿山电）。

⑤ 伦森：《俄中战争》，第111页；格林斯基：《俄日战争的序幕》，第107—108页；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9页说是炮击了两个星期。

使俄国人遭到伤亡。^① 恐惧和不安全的情绪笼罩着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孤立的俄国居民，这有助于促成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从7月17日至21日，当地俄国军队将这个城市和郊区的三千至四千名中国人分成四批用刺刀逼着赶过阿穆尔河来。有些中国人设法登上匆忙地制成的木筏，少数相当强壮的人则游向对岸，但是有些人被杀害了，而且很多人淹死了，或者按照某些说法，有些中国人被瑗珲的中国炮手击毙，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俄国人入侵，所以开炮。^② 然而也有少数中国人被个别的俄国人所搭救。^③ 这个事件后来经过俄国官方调查和军事法庭审判——宣布的判决是很轻的。在俄国远东地区，俄国人对中国人犯下了各种各样的其他孤立的暴力行为，但是戈罗德科夫将军发布了严厉的公告，禁止这样的不法行为，因此在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中国居民没有受到伤害。^④

上面的证据表明：北满战争的爆发，首先是由于俄国决定派一支占领军，由于清廷政策的迅速变化和由于俄国无视寿山再三提出的停止在阿穆尔河上的军事调动的警告，其次才是由于中国对俄国轮船开火和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再者，根据记载，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这时甚至根本没有使维特感到烦恼，因为在他看来，此事给予俄国以摧毁瑗珲的借口，他只是懊悔实际上仅仅派了十万名士兵进入满洲，而没有派十五万名士兵前去。^⑤ 对于中国于7月24日和8月5日用电报发出的照会（谋求结束或尽量缩小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1/371，寿山1900年7月25日的奏折；1/579，长顺1900年12月9日的奏折。伦森：《俄中战争》，第104、107页。

② 伦森：《俄中战争》，第89—103页有最全面的叙述。《日本外交文书》，第33/I卷，第733号文件基本上证实了伦森的叙述。

③ 伦森，同上，第95、98页。

④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42页，对所有这些事实有很好的叙述。并参阅1900年11月14日的《字林周报》。

⑤ 《红档》，第18卷（1926年），第41、42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80页和483页注23引用了这个材料（维特给西皮亚金的信）。

冲突),俄国政府根本不予答复。^①

然而,李鸿章和俄国代表在7月底举行了会议,俄国政府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中国人的事业以反对其他强国,并于8月28日宣布了单方面从北京撤兵的意图,在9月13日至29日之间实行撤退。^②可是,此事是在俄国征服满洲的背景下进行的。

萨哈罗夫、连年刚博夫、奥尔洛夫、奇恰高夫、艾古斯托夫和其他将军率领下的俄国兵团从七个据点向满洲进军,以火与剑对待所有的反抗者,但是对投降的人不进行报复。留下的铁路人员的撤退,延续到7月16日以后很长时间。^③在这些人员撤退近于完成以前,俄国军队的前进可能受到耽搁。按照尼鲁斯的记载,在吉林省的最后一段铁路一直到7月24日至26日才被放弃,而且按照寿山的说法,成群的俄国人迟至7月25日还仍然在陆续撤出黑龙江。^④根据一份材料的记载,松花江上的三姓的俄国船坞工人和工程师7月11日遭到义和团民进攻,^⑤但是按照伦森的说法,他们直至7月19日才遭到进攻,而且在同一天就逃跑了。^⑥俄国七路侵略军的第一路军萨哈罗夫的纵队,溯松花江而上,于7月22日攻下拉哈苏苏,于24日攻下巴彦通,并在7月24日和26日之间经过两天的作战占领了三姓。早一些时候,一艘俄国轮船装载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1/370、432。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在远东的政策》,第133—134页。

③ 寿山在7月16日给杨儒的电报中提到他仍然在把俄国人集合起来并且照料他们(杨儒:《电报汇钞》,第120页);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17页。关于七条入侵路线,见《英国情报报告》,第16—18页。

④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09页。杨儒:《电报汇钞》,第122页,寿山7月25日致杨儒电。

⑤ 索科洛娃在1906年12月的《历史通报》中发表的文章,不过这是在她文章中的仅仅是根据传闻写的那一部分里。

⑥ 伦森:《俄中战争》,第153—154页,显然引用了穆尔扎克:《中国军队对三姓码头的进攻……》,《阿穆尔边区公报》,1900年,第350号,第14—16页。这是一位目击者的叙述,而且看来非常使人信服。由于外国外交使团的要求,拉哈苏苏副都统鄂英(拉哈苏苏副都统,误;应为巴彦苏苏统领鄂英。——译者)及其他官员因义和团活动而于1901年2月26日受到充军的处分。(《义和团》,1/38)

若干援军于19日在三姓的中国炮火下强行通过，^①但显然在别处没有遇到反抗，于7月21日到达哈尔滨。寿山于7月22日向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提出彬彬有礼的警告：因为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屠杀中国人，所以他认为存在着战争状态，在他进攻这个城市以前，他让俄国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安全撤出。三千名俄国人乘两艘拖带驳船的轮船从哈尔滨安全撤出，中国人于7月26日开始了看来好象是半心半意的进攻。^②奥尔洛夫的军队主要是哥萨克兵，也是在7月26日从西边的满洲里进入满洲。^③可是根据寿山给杨儒的电报所述，就在7月26日这一天，“象晴天霹雳一样”，哈尔滨以西的铁路遭到破坏，但是寿山仍然控制着局势，因为他响应军机处命令他极度小心的来电，禁止再派远征队去阿穆尔河俄国河岸。^④中国人仅仅是断断续续地进攻哈尔滨，直至8月2日至3日萨哈罗夫的纵队解救这座城市。连年刚博夫的军队也于8月2日在瑗琿和黑河屯登陆。中国军队加以抵抗，经过激烈战斗后，除了那座高的旧兵工厂的建筑^⑤外，瑗琿全部被夷为平地，这是根据俄国慎重考虑的政策实行的。^⑥奥尔洛夫的军队在海拉尔前面赢得

① 伦森：《俄中战争》，第153页；《英国情报报告》，第19、20页，指出是21日攻取拉哈苏苏的。在7月24日上谕中提到的寿山的奏折也提到此事（《义和团档案史料》1/362）。从这份材料可以看出，俄国人在拉哈苏苏是首先开枪的。

② 伦森：《俄中战争》，第146—147页。中国人只是在7月10日才切断哈尔滨的电报线（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50页；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270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指出是7月22日开始进攻的，但是弓场盛吉：《以中东铁路为中心的俄中势力的消长》，第64—65页，提供的日期也是7月26日。根据《清史列传》（61/26B）的寿山列传，他致电尤哥维奇，提出如果俄国停火的话，他可以亲自赴哈尔滨谈判，同时他又致电清廷，提出把他的全家送交刑部，如果这样做可以安抚俄国人的话。

③ 《英国情报报告》，第18页。

④ 杨儒：《电报汇钞》，第122页，寿山7月25日致杨儒电。伦森和马洛泽莫夫都没有提到中国人再袭击俄国河岸之事。铁路是被中国工人破坏的（见《清史列传》61/26B，寿山列传）。

⑤ 旧兵工厂，误；应为火药库。——译者

⑥ 伦森：《俄中战争》，第148—199页。

了一次胜利，然后在兴安岭地区的另一次激烈的战斗^①（凤翔和保全在这次战斗中阵亡^②）以后，黑龙江的军队就完全战败了。寿山（他总是渴望做正确的事情）自杀，8月28日，俄国军队进入齐齐哈尔。随着伯都讷（今扶余县）于9月19日陷落，在黑龙江的战斗就结束了。^③

有几路俄国军队先后从俄国租借地进入盛京省。早在7月13日和19日，在霍伦任科夫上校率领下的一些部队乘火车离开旅顺口，到达熊岳城。^④另一支军队在杜姆布罗夫斯基上校率领下，在途中不断交战以后，于7月14日到达盛京。然而，他们得到命令就地宿营，以待中国人进攻，中国人直到7月25日方才进攻。^⑤看来对中国人的全面作战就同时在与俄国租借地毗邻的地区开始了。^⑥大概就在这时，金州副都统和两名其他官员被俘，送往旅顺口。俄国军队打败了中国人，但是不能完全消灭他们，他们向山区和蒙古边境退却。盛京将军增祺于8月11日终于向主战派反戈一击，虽然他于9月29日又被晋昌剥夺了职位。^⑦盛京于10月1日被俄国军队攻克。^⑧但是晋昌和他的支持者寿长在蒙古边境的外围地区继续抵抗数月。寿长一直坚守阵地，直至1901年3月才向俄国人投降，作了俘虏，被送往旅顺口、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送往伊尔库茨克，^⑨被拘留在那里直至他开枪自杀，自杀

① 同上，第120页。

② 《义和团》，1/29。（凤翔在小兴安岭与连年刚博夫作战中坠马跌伤，旋即死去，并非和奥尔洛夫作战阵亡。——译者）

③ 伦森：《俄中战争》，第190—199页。《英国情报报告》，第16—29页。寿山死前的奏折，见《东华录》，第4603页。

④ 伦森：《俄中战争》，第39页。

⑤ 同上，第53页。

⑥ 《英国情报报告》，第23页。

⑦ 司督阁：《在奉天三十年》，第149—150、152—155页。马洛泽莫夫的书第143页引用了这些材料。

⑧ 《英国情报报告》，第25、26页。伦森的书，第225—231页。

⑨ F·O·228/1407，禄福礼1901年4月6日致萨托；《清实录》，483/6B，1901年6月30日（光绪27年5月15日）的上谕。

的具体日期不详，很可能是几年以后。^①因此寿长在俄国人手中的命运非常类似叶名琛于1942年后在英国人手中的命运。根据北京出版的研究著作，甚至在这两位将军投降以后，打游击战的军队仍然在满洲继续与俄国人作战达数年之久。^②但是这后来的抵抗在任何英文和俄文材料里或在较著名的旧的中文记载里都从未提到过。可是在绝大部分地区，盛京省的战争随着10月1日盛京陷落而告终。

在此期间，吉林省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长顺于7月7日在制止寿山进攻哈尔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上文已经述及。象黑龙江省一样，吉林省的中东铁路人员于7月11日开始撤退，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伤亡。长顺命令他的军队守卫着铁路线，直至7月21日铁路才开始遭到破坏，^③这是由于副都统成勋（慈禧太后任命成勋为该省义和团团练大臣）^④的命令。尽管长顺在外国人当中有好的名声，事实上在吉林省向撤退中的俄国铁路人员和铁路警卫队进攻的事情，比起黑龙江省来似乎要更多一些（大概是因为义和团在这里有更大的影响），可是，长顺在吉林城设法控制和制止义和团的活动，直至8月2日。^⑤传教士富尔顿提到7月9日在距离吉林七十里的地方发生一次突然袭击。^⑥伦森描述了于7月14日

① 《程将军守江奏稿》，16/1777，1907年3月11日（光绪33年1月27日）奏折。伦森的书，第248页（可能是引用伊·耶·伊万诺夫：《1900—1903年占领满洲军事生活的印象》，圣彼得堡，1903年版）提到一位被俘送往伊尔库茨克的“徐将军”，在自杀前变成了酒鬼，很可能指的是寿长。

② 参阅《东北革命运动史》，第128—132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05—208页，等等。

③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193—194页、210页，虽然不可能说得明确，吉林省铁路的破坏可能比其他省轻一些。从哈尔滨到辽宁的铁路线于1900年11月重新开放，而且从边境站到穆棱120俄里的铁路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见《中东铁路沿革史》，圣彼得堡，1913年版，第107页（这是官方的铁路史）。我们在中文和日文材料里没有发现关于吉林省铁路遭到破坏的叙述。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1/409，提到他的任命。

⑤ F. O. 228/1407，富尔顿1901年2月23日致禄福札（见本辑第179页注④）。

⑥ 同上。

对从南满撤退到吉林省的俄国人的袭击，这次袭击没有伤亡。^①日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商务专员也报告了7月14日在横道河子的一次类似的无伤亡的袭击，^②而7月17日在长春附近某地对六十七名铁路警卫队员的攻击，则有三十一名队员被杀。^③

长顺在一份奏折（7月18日收到）中以极大的勇气建议为了拯救满洲而同俄国暂时联盟。^④清廷此时已在试图执行与俄国达成的谅解，在已出版的档案中找到的清廷对长顺建议的唯一答复是7月20日的一道上谕，劝告他要小心谨慎并避免对俄国人的任何寻衅行动。^⑤

长顺在整个夏天可能秘密地与俄国人接触，因为按照《英国情报报告》的说法，奇恰高夫将军率领的一支俄国军队早在7月初就已经从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进入吉林省，虽然这支军队似乎一直驻扎在铁路地带以内，并且不靠近由中国军队驻防的任何地方，直至7月18日。^⑥在任何文件里都没有找到长顺向皇上报告这支军队进入吉林省的奏折，他也没有向杨儒提过此事，虽然很可能他认为这支俄国军队仅仅是增援铁路警卫队的。可是，一旦战争在黑龙江开始，他就利用呈递奏折，极力夸大战斗和向撤退中的铁路警卫队进攻的战绩的办法，以小心地保持慈禧太后对他的宠爱，与此同时，又巧妙地试图使慈禧太后对义和团团练大臣成勋产生恶感。^⑦长顺似乎曾经命令他的军队不要抵抗俄国军队，虽然他们最初曾与俄军交过战。7月18日，艾河要塞的驻军进攻奇恰高夫的军队，但是很快就被击溃了。艾

① 伦森：《俄中战争》，第137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33/1，第736页，第727号文件。

③ 伦森：《俄中战争》，第145页；《义和团档案史料》，1/377，长顺的奏折。

④ 长顺的奏折见《清季外交史料》，143/18，奏折的日期为光绪26年2月22日。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1/347。

⑥ 《英国情报报告》，第20页。

⑦ 《义和团档案史料》，1/377、1/491。长顺指责成勋在财政上铺张浪费，但成效甚微，而又试图隐瞒这一情况。

古斯托夫将军的军团至少从7月10日起就在滨海省整装待发，7月30日这个军团进攻琿春要塞。据说中国驻军在逃走之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①按照一项中文材料的记载，在此之后，宁古塔（今宁安县）抵抗了四十天，但是在它被艾古斯托夫将军攻陷以后，伯都讷几乎未经交战就于9月12日向连年刚博夫纵队投降。^②长顺与尤哥维奇谈判全面投降的条件，为此目的派他手下官员林华^③到哈尔滨去。他保证“在地方事务上完全屈从于俄国人”，不询问问题，而且也不与黑龙江和吉林^④联系。^⑤他打电报给杨儒，试图防止俄国军队占领吉林，^⑥但这个希望未能实现，他就于9月23日在有利的条件下向连年刚博夫交出这个城市，并且亲自欢迎俄军进城。^⑦按照长顺本人和增祺的奏折所述，进入吉林的俄国军队“对待人民非常之好”，但是电报局被俄国人占领了，财库和中东铁路办事处^⑧被抢去了几十万两银子，而且中国军队被缴了械。^⑨俄国人自己声称曾把一千五百支来复枪和一百万粒子弹扔

① 《英国情报报告》，第21、22页。关于这个军团从7月10日起就整装待发的证据，见杨儒：《电报汇钞》，第106页，并见《义和团档案史料》，1/250，长顺7月6日的奏折。

② 按照《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第124页所述，义和团和农民（土匪）领袖刘单子是所有抵抗力量的核心。长顺在他的奏折里夸大了这次抵抗，无疑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但是根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1页的记载，宁古塔被包围了四十天。杨绍震：《庚子年中俄在东三省之冲突及其结束》（《清华学报》，1933年，第9卷，第1期）也提到此事。

③ 林华，误；应为巴革记名副都统、黑龙江协领达桂。——译者

④ 吉林，误；应为盛京省。——译者

⑤ 《清季外交史料》，第144卷，增祺1900年12月20日（光绪26年10月29日）的奏折。并参阅《西巡大事记》里的长顺的奏折，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1—53页，引用了这个材料。关于屈从于俄国人的谅解，见台北中央研究院，外交档案箱B-9-2，第4卷宗，长顺奏折。

⑥ 杨儒：《电报汇钞》，第126页，徐星使致杨儒电（转达长顺的电报）。

⑦ 《英国情报报告》，第22页；增祺奏折，见本页注⑤；《义和团档案史料》1/811。长顺1900年12月9日的奏折。伦森的材料（《俄中战争》第197页）描述的连年刚博夫占领吉林时的英勇行为是相当可疑的，正如伦森自己在第197页的脚注中提出的那样。

⑧ 中东铁路办事处，误；应为吉林机器局与银元厂。——译者

⑨ 见本页注⑤。

进河里。^① 根据《清史》的记载，长顺阻拦义和团的活动和他们对俄国人的攻击，使吉林省免于象黑龙江省和盛京省那样遭到俄国军队的凶猛惩罚，并且最后赢得了清廷的称赞。当俄国军队开进城时，他部下的官员全部被允许留在他们的职位上照常工作。^② 因此他于1904年去世后得到慈禧太后给他很高的谥封，同时在满洲被占领时期，他比其他满洲将军受到俄国人更多的宠爱，这是本文作者近来的研究发现的，这项研究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发表。

这样，在三位满洲将军中间，只有长顺相当成功地执行了李鸿章建议的政策，维特原来也选择了这项政策，但是后来却放弃了它。然而吉林省并没有因此而免于被俄国人入侵和占领。在论述1900年事件的俄文文献和以俄文为根据的西方文献里很少提到长顺的功绩。在大量的关于惊人的暴行和历次战斗的记载里，他的功绩被人忽略过去，没有引起注意，而且看来似乎俄国人是故意地避免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唯恐因此削弱了他们占领满洲的正当理由。

这样，到十月份，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在整个战役中，官方发表的俄国人的伤亡总数是二百四十二人死亡，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受伤。^③ 中国人的伤亡人数无法估计，鉴于俄国军队的优越得多的火力和兵力，这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要比俄国人多。也许意味深长的是，俄国当局从未把伤亡数字分为侵入的军队、铁路警卫队、中东铁路的雇员和平民等几类发表，这就表明上面最后两类人的伤亡是相当少的。

总的看来，这场冲突是种族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恐惧、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并不是绝对地和普遍地真实的，因为可以找到一些中国人和俄国人互相帮助的例证：在盛京省，在早期阶段，鸭绿江地区的一些俄国人在一个

① 伦森：《俄中战争》，第197页；《英国情报报告》，第22页。

② 《清史》，462/5044。

③ 《英国情报报告》，第30页。伦森：《俄中战争》，第253页，注94。

中国人家里避难，而且这个中国人还帮助他们逃到朝鲜去。^①在俄国人从北满撤退期间，有些中国人对俄国人是有很大帮助的。^②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少数中国人由于受到俄国人保护而得救。^③两名俄国铁路工人被中国人俘虏，中国人对待他们很好，他们可能帮助了中国军队。^④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俄国人在李鸿章建议时就平静地撤退，如果他们不坚持一定要派军队进入满洲，如果他们重视寿山的警告，停止在阿穆尔河上的一切军事调动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7月14日至16日在阿穆尔河上的冲突事件呢？如果阿穆尔河上没有爆发敌对行动，而且俄国军队没有开进满洲的话，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铁路是不是会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呢？根据本文所搜集到的证据，这是不可能断定的，但是由于长顺的关键性的抑制作用，看来似乎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中国人是不是会把中东铁路归还给俄国人，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然而很可能的是，如果俄国侵犯南满的事从来没有发生，或者俄国采取更有限制的和纯粹商务形式的话，1900年在满洲的动乱就决不会发生。如果俄国没有军事占领满洲，俄日战争出现的可能性也会更小。根据俄国同中国和日本长期的关系来看，俄国从1898年以来在远东的全部政策是一系列的错误，这是1905年以后许多俄国人自己认识到的，这也是列宁和其他沙皇时期的批评家们当时毫不迟疑地指出的。^⑤

① 伦森：《俄中战争》，第53页。

② 尼鲁斯：《中东铁路沿革史》，第73页，以及本文所引证的事例。

③ 索科洛娃的文章（见1906年12月的《历史通报》第827页）。

④ 奥尔洛夫：《外贝加尔人进入满洲——1900年奥尔洛夫将军所辖海拉尔部队远征中国概述》（圣彼得堡，1901年版），第160—162页。

⑤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0、62、63页。并见惠廷（A.S. Whiting）：《1917—1924年苏俄对华政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54年版）第1章，列宁论中国。捷姆琴斯基（《俄国在满洲》，圣彼得堡，1908年版）和新闻界以及杜马特别是第三届杜马的左派也批评了俄国在1905年前后的政策（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一次会议报告速记稿，第61—72次会议，第798—822页尤其值得注意）。

附 言

本文付印后，发现更多的证据，证实了本文提供的关于中国人向阿穆尔河上的俄国船只开火以及开始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日期。同伦森、寿山和日本商务专员所说的一样，〈1902年阿穆尔年历〉（布拉戈维申斯克，1902年版）第3节，第100页，说明前者是在1900年7月14日发生，后者是在7月15日发生的。

郭 玫 瑰

译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8年，第9卷，下册。

吕其苏译 吕浦校

军部与第一次大战中的 对华政策^①

北冈伸一

1. 围绕二十一条的谈判

大正3年夏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元老井上馨称为“大正新时代的天佑”，^②这主要是指日本对华政策而言。也就是说，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列强从远东后退，削弱了非常依赖欧美列强资本、依赖列强（包括日本在内）互相对立的袁世凯政权，促进了日本的贸易和产业的飞跃发展。从而，欧美列强的牵制，中国的抵抗，日本经济的脆弱性，这些制约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都大大缓和了。明治44年末以来，满洲权益确立之后，围绕探索大陆政策方向而产生的政治对立一直继续着，大正3年4月组成大隈内阁，积极派总算获得胜利，大战又使之更加巩固。从此以后，各种类型的积极对华政策，就被提出来并加以推行了。

但是，大战初期对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并不是过去组成积极派的陆军和长州阀，而是作为渐进派核心的外务省。由于欧洲

① 本文原是北冈伸一著《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1906—1918）》一书中第三章《大战期间的陆军与大陆政策》中第一节《积极进取的大陆政策诸类型及其结果》的第一小节《对华政策》。现在的题目为译者所加。——译者

② 井上馨侯传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传》（1934年，内外书籍出版社），第5卷，第367页。

列强后退，外务省的对华政策变得积极起来。它最早的成果，不消说，就是同志会总裁、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搞的二十一条谈判。

那末，首先，元老和藩阀领导人对爆发大战是什么看法呢？8月5日，寺内在汉城得知英国宣战消息，他在日记里写道：“必须决定我国将来对交战国的态度。”^①这跟内阁立即断然决定参加英法俄一边作战比起来，寺内还不认识对德参战是那么一个自明之理。但是，对于大战给远东的影响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他却有明确的见解。8月7日，寺内给后藤新平的信里这样写道：“当局外人仰天哑然之际，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鄙见以为，靠袁君的手腕，恐怕难以维持全中国的安宁吧。回×（这里有一字不清楚）暴徒蜂起不可避免，能维持此间治安，支持东亚大局的，没有别人，只有靠我帝国才行（原文如此）。这时候，只要一面不失信于各盟邦，保护其利权；同时也确保我之利权，进一步打开向满蒙及中国本土发展的道路，难道这不是当局的紧急任务吗？我帝国如袖手旁观，美国必出而干涉中国，夺取利权，这是很明白的。”^②寺内预见到大战爆发后袁政权的削弱，以及列强对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制约的缓和，认定这种形势是援助袁政府从而实行日中“提携”的好机会，即一面同列强保持协调，一面向满洲及中国关内进行扩张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然要注意站在战争局外的强国——美国（8月4日发表中立宣言）。美国在日俄战争中，常常一面尝试同中国合作，一面在满洲采取单独行动；对此，日本一直靠联合俄英法各列强加以排挤，这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谈过了。由于大战爆发，美国和日本一样，相对地提高了地位，而且英俄法这些日本用来牵制美国的力量也削弱了。寺内认为，为了阻止美国在远东的活动，日本进一步加强同英俄法的合作，是有必要的。

① 《寺内日记》，大正3年（载《寺内文书》450—57）。

② 《后藤文书》。

在寺内给后藤写信谈了大战对远东的影响及其对策的第二天，8月8日，元老和阁员在东京召开联席会议。山县在会上指出，德国也是友好国家，没有充分理由而把它当作敌人对待，是成问题的；同时他主张，确定对华政策才是决定参战的前提。^①山县认为参战并非不证自明的问题，而必须同对华政策问题联系起来决定。日本对德宣战之后的8月下旬，山县把他的对华政策归纳为《对华政策意见书》，^②提交首相、外相和藏相。在这个意见书中，山县批评了那种“对中国只用威压以贯彻日本要求的人”，他说：“为今之计，必须着重改善日中关系，使对方产生充分信任我方的念头。”这是再次肯定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日中“提携”论。按山县的看法，现在正是列强交战已无余力在中国有所作为之时，也正是“袁世凯尽管足智多谋，恐怕也束手无策”之时，从而也是“帝国确立对华政策，纠正过去的怠慢和错误，策划新局面好机会”。山县的主要目标，是从日中“提携”、扫除互不信任开始，进一步使中国确实做到“凡政治、经济问题，如与外国有关，必须先与我谋而后决策”。他判断，当前一面使中国理解人种竞争的趋势，一面进行财政援助，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山县还认为，通过实现日中“提携”，日本在满蒙巩固其利益，发展其经济，也是可能的。

在山县看来，大战爆发，不仅增加了日中“提携”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它的必要性。山县认为，人种竞争的激烈化是世界大势所趋，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斯拉夫和日耳曼两大民族的对立。白人之间的对立都招致这样激烈的战争，接着可能发生的黄白人种的对立，不难想象会是多么猛烈。为了防备这种情况，日本必

① 伊藤隆：《大正初期山县有朋谈话笔记》（载《史学杂志》第75编第10号，第76编第3号、第9号，第77编第2号及第7号 [1966年10月，1967年3月，9月，1968年2月和7月]，以下简称《山县谈话笔记》）二，第80—82页。

②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1966年，原书房），第339—345页。

须同中国巩固地建立起合作关系。^①

但是，山县并不认为黄色人种同盟本身有积极的价值。^② 白-黄对立当然要事先防止，为此，在口中“提携”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同白人列强的联合。这种见解，在8月底的《意见书》上也可以看到，在后面要提到的9月24日同其它三位元老的共同意见书里，以及在大正4年2月21日的《日俄同盟论》^③里，就更加鲜明。

提到其它列强，山县同寺内一样，鉴于美国的一贯表现和资金力量，对美国的动向深感不安。但山县能提出的具体建议，也只限于进行坦率谈判，以防止“误会”的增多。

在山县提出建议前后，井上馨建议由日法银行吸收法国资金，转借给袁世凯。^④ 9月24日，山县、大山、松方、井上四元老同大隈首相协商，决定了下列方针：“第一、对中国的总方针：甲、着重点是使袁世凯为首的中国人扫除过去对日本的不信任和怀疑，对我信赖。乙、对于特殊问题，则派遣特使，或以旅游为名，派遣一个其地位和手腕都能使袁信服的人前往。丙、就归还胶洲湾的条件、应当换取的权利等达成协议。丁、关于铁路、矿山以及其它不违反机会均等原则的政治、经济问题，要促使袁世凯签订合同。第二、对俄问题(以及供给武器事项。——原注)。试探英国意图。不光是依赖英国，要趁此时机同俄国缔结同盟，

^① 人种竞争“趋势”，这主要是对袁世凯进行游说的理论。但山县决不仅仅把它看成是一种手段。对此，山县在他的《日俄同盟论》(大正4年2月21日，同上书，第435—438页)中有进一步的阐明。

^② 例如，山县在明治40年1月25日的《对清政策所见》中，对日俄战争后的“有色人种”民族主义冷酷地进行了如下评论：“日本对欧洲强国战而取胜，决不证明有色人种比白种人高强，倒不如说欧洲文明力量伟大，善于学习的有色人种打败了落后于文明潮流的白种人。但是，没有头脑没有知识的多数有色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只是认为日本人是有色人种，我们也是有色人种……我们没有理由允许白种人跋扈跳梁。”同上，第304页。

^③ 参看注①。

^④ 望月小太郎备忘录(大正3年8月22日)，前引《世外井上公传》，第5卷，第384页。

从而为将来建立日英俄法同盟或协约打下基础。第三、对法问题。从法国吸收资金，以日法银行的名义借给中国。第四、对美问题。使中国不倾向美国，对美国讲信义，使美国不怀疑日本，研究促进日美邦交友好的最好方法。第五、向欧美派遣确是人才的外交官。派出有力的外交官或半官方人员。寻求对付当前时局的最好方法。”^① 这四位元老的意见，有下列三个基本点：（一）援助中国政府，实现日中“提携”，从而取得若干利权；（二）加强英俄法与日本的联合；（三）日美在华对立的危险及其预防。这跟上述山县的意见是同一个设想。比起刚才举出过的寺内信件来，第（三）点稍为强硬一些，（一）、（二）两点可以说基本相同。

关心大战爆发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的，当然不仅限于元老和陆军最高层，在陆军所谓中坚层里，如下所述，也陆续提出了意见。这里要研究的，是组织上属于参谋本部，人事派别上属于上原派的、以田中为中心的那些陆军中坚层的见解。首先，参谋次长明石元二郎预料到协约国方面的军事优势，向陆相冈市之助建议：为了防止俄国夺取胶州湾为战利品，日本无论如何必须进攻胶州湾。^② 还有属于上原派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田雅太郎，是陆军中有数的几个德奥通之一，他也预料协约国将取得优势，主张对德参战。据说第一部长尾野实信和田中义一也有同样的意见。^③ 因此，关于参战问题，以参谋本部为中心的陆军中坚层，同主张慎重的山县，是对立的。

但是，他们的参战主张不仅以夺取德国利权为目的。明石说：“胶州湾问题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④ 田

① 望月小太郎备忘录（大正3年9月24日），《世外井上公传》，第390—391页。还有，四位元老在这个备忘录上签了名，肯定它的内容，但是大隈认为有遗漏事项，拒绝签名。（同上，第387—388页）。

② 给冈市之助的信件（日期不详），载《冈文书》，1—1。

③ 前引《福田大将传》第285—288页。

④ 大正3年8月20日致寺内函，载《寺内文书》，6—34。

中也说：“如果不在这时解决成为远东根本问题的中国问题，确立国家的永久基础，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① 还有，上原派宇都宫太郎在给上原的信里说：“这次要（使列强）尽可能大规模地、尽可能深刻地互相撕咬”，欢迎这个日本在中国“推行国策”的好机会。^② 总之，他们提出参战的最终目的是中国。

那末，他们所说的“解决中国问题”具体指什么呢？日本因此而对中国保持怎么样的关系呢？8月16日，明石致函冈陆相，主张强迫中国签订以下协议：“一、为保障远东和平，保全中国领土，日中两国成立协商（用同盟字样亦可——原注）。二、尊重各缔盟国的既得权利。三、尊重在南满内蒙拥有优越权利的日本政府的建议。但内容以密约定之，最后目的是等到改订日英同盟时将它合并。……用类似自治或类似租借的形式都可以。四、委托日本进行行政军事改革（用密约也可以。——原注）。五、中国如对外国让与利权或向外国举债，应事先征求帝国政府的同意（密约——原注）。”^③

田中也向冈陆相提出了类似明石的协商方案：“一、日中两国应密切合作，休戚与共，以诚实互让态度，致力东亚和平。二、日本帮助中国改善军事，开发国富，谋求日中两国国运的发展。三、日本尽可能寻求防止中国发生革命暴乱的手段，在中国认为必要的场合和程度上，帮助中国维持治安。四、日中两国根据第一条的宗旨，凡有关外国事项，事先互相商量，然后采取措施。五、中国确认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有超越各外国的特殊地位。”^④ 8月18日，田中又向冈相提出下列追加内容，作为第五条的具体化或补充：“日本承认中国在南满洲、东部内蒙古的宗主

① 大正3年8月12日致寺内函，载《寺内文书》，315—24。

② 大正3年8月6日发，载《上原文书》，17—35，第74页。

③ 《冈文书》1—2。此类文件中最早的恐怕要算8月7日福田雅太郎的意见书（《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903页），其内容与此处的明石意见和下文的田中意见大致相同。

④ 大正3年8月（日期不详）备忘录，载《冈文书》，7-1。

权。中国认可日本人在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有土地所有权和居住营业权。在该地区内如欲将资源开发权让与外国时，须先同日本政府商量。中国答应日本将关东州（大连旅顺地区——译者）租借年限延长为九十九年。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有举办交通事业及对其进行保护的权力，以及在同地区内开发资源的优先权。日本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构筑要塞及其他防御设施，以对付中国以外的国家。”^①“中国把现在的吉长铁路按现状原封不动地让与日本……中国把吉会线以及其他满蒙五路的铺设营业权完全交给日本。”^②

继明石、田中之后，在日本驻华公使馆任武官的上原派町田经宇，9月21日给外务次官松井庆四郎送去《对时局之我见》，^③列举了在中国应获得的项目。大致上归纳一下它的内容：第一，“获得使日本能在满蒙巩固其立脚地的各种必需的利权”，其中包括获得“日本人在满蒙的旅行居住自由、土地所有权、旅大租借期限的延长、新邱煤矿的采掘权、热河北京间……铁路铺设权”。第二，在“中国中央政府扶植我之势力”，其中包括“将来不仅在中国的军事方面，而且在外交、财政方面也要安插日本人做顾问，由日中合办或由日本包办武器的制造和供应等事项”。第三，在中国关内获得利权，那就是，以继承山东的德国利权为核心，包括杭州南昌间、九江武昌间的铁路铺设权，以及在福建省沿岸不得日本允诺不许构筑防御设施等权利（有美国垂涎三沙湾做海军前进基地的事实。——原注）。町田认为，“我在中国中原毫无设施，将来万一有事，连一个干涉权的基础都没有”，从这个情况来看，这些要求也是必要的。

明石、田中、町田的上述意见，包含以下各点：（一）划时期地加强在满洲的权益；（二）对中国的军事、外交取得一定的监督

① 8月18日致冈相信件，载《冈文书》，7-2。

② 上述信件在同一天经补充后，回头又送去的信件，同上书，7-3。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914—919页。

权；(三)在中国关内取得利权。从总的来说，可以认为主张基本相同吧。当然要获得的项目有不少差异，如关于山东的权益只是在町田的主张里提到。我认为，这些都可以归纳为是由于提出意见的时间差异所造成的。

他们三个人的意见，从(一)到(三)，乍一看，同山县意见、四元老意见相似。但是明石、田中各自的目标比山县等人远为彻底。因为这些目标，象山县等所说的那样靠援助袁世凯和进行说服，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实际上，明石向寺内提出之前，已经向冈陆相提出过差不多同样的设想，主张：“如果袁世凯不接受日本的这个要求，日本就不从山东撤军；同时威胁他说，不再象以往那样(为袁)好意地取缔孙(中山)、黄(兴)等中国流亡人士了；还可以同俄国合谋，着手处置满蒙，或促使张作霖宣布满蒙自治(这很容易实行)，使袁世凯大吃一惊的手段是很多的。”^①田中也主张“要有不惜以匕首加诸袁世凯的决心”。^②这样的主张，正是拒绝了山县的《对华政策意见书》。町田说：“中国人向来不是感恩戴德的国民，尤其是对狡猾多智的袁世凯，光用同文同种唇齿辅车这套陈词滥调去怀柔，那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这一点，不单是下官的意见，所有中国通、权威人士也是这样看的。”^③这同山县的设想，在手段上完全相反。在这里，可以把这四位元老的意见称为“援助一提携”论，而明石、田中的意见可称为“威压一提携”论。

如上所述，陆军上层、元老们以及陆军中坚层的对华政策在较早时期就形成了。但内阁、外务省的政策暂时还不明确。因此，元老和陆军方面，为促使内阁采用他们的政策，作了各种努力。第一，通过组织系统呈递意见或以呈递意见的形式施加压

① 大正3年8月20日发函，载《寺内文书》，6-34。

② 大正3年8月12日发函，同上，315-24。

③ 上述町田《对时局之我见》，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917页。

力，前面已经几处提到，参谋本部、关东都督府、驻华公使馆武官都向内阁呈递了意见。还有冈陆相十一月向内阁递了下列备忘录：“一、延长关东州租借期限。二、租借间岛。三、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即丹东至沈阳段。——译者）一并永久属日本所有。四、吉长铁路让与日本。五、日本人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得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住自由权，日本并享有一切采矿、修铁路的优先权。六、取得关内重要地区铁路铺设权。七、军事的改善和武器的制造，须受日本指导。八、对外国让与权利或借外债时，须先与日本协商然后进行。”^①这个冈备忘录，不消说，保持了前面所说的明石、田中、町田对华政策的共同点，一部分在形式上更为彻底。可以说，陆军中坚层的主张在这里由冈陆相总结起来了。^②

对内阁做工作的第二方面，可以称为准组织系统的工作，即由元老对首相进行说服。元老当中，井上馨自认为是大隈内阁的监护人，山县也是同内阁成立有关的。但是他们对加藤外交不满意。山县以他的心腹幕僚、农商务相大浦作媒介，井上以他的亲信、属于同志会的众议院议员望月小太郎作媒介，通过大隈首相去干涉内阁的外交。大体上，他们一面一般地支持内阁，一面批评其外交政策，二者兼备，并保持着这些作媒介的渠道。前面讲到的9月24日元老、首相会谈，就是这种尝试之一。

对内阁进行工作的第三方面，可说是非组织系统的工作，对政党的工作尤其如此。同志会里以大石正己为首的力量，一方面由于企图通过与元老加强合作而把政友会长期排除在政权之外；

① 长冈新次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之决定及其背景》，载1960年6月《日本历史》第144号，第80页。

② 不过，这份备忘录的内容，特别是在二、三两点上，比前面所列举的各种意见更加扩大。因此这份备忘录，冈陆相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他向内阁表明，不是要强迫实行这些事项，他不过是把陆军内部的意见大体上收集起来而已。虽然如此，但备忘录内容显然属于“威压一提携”论。备忘录中间岛租借论的来源今尚不明。

另一方面，由于对该会总裁加藤的反感，而向元老靠拢。^①这股力量，正如第三章第二节第一小节要谈到的，跟田中义一也有关系。不仅如此，后面还会提到，田中为了牵制并改变加藤外交，也尝试过同政友会接触。

那末，元老和陆军的上述活动怎么能和加藤当初的意图汇合而成为二十一条要求的呢？这是个早已存在的问题，这里难以作出确实的回答。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即加藤尽管受到种种压力，对于通过外务省保持和加强一元化外交，是一直抱有强烈愿望的。首先在内阁里，加藤压倒了陆相。例如1914年夏，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预定要辞职，这时加藤破例暗示起用海军将官去当总督。这事最后虽未实现，但据说冈陆相提不出有效的反对意见。^②再如，攻占青岛后分配德军武器时，加藤不理睬陆军的意图，想首先提供给英国。^③加藤出任内阁阁员，最初是在第四次伊藤内阁，比陆军军人寺内就任阁员要早。还有，加藤在第一次西园寺内阁中同寺内闹对立，因而辞过职。^④加藤身居大隈内阁，是同志会总裁，又担任副总理级的第四次外相，大概对待寺内也自认为政治地位相等，压倒冈陆相是不奇怪的。而且冈身体欠佳，大正3年10月底患了肺病，有一星期以上连会谈都进行不了。^⑤

加藤以他的政治地位做后盾，致力于外交一元化，也贯彻到阁外。例如，加藤停止了明治31年以来给元老传阅外交文件的惯例，尽管元老强烈批评，仍然没有恢复。^⑥还有对于参谋本部，

① 例如大正3年8月19日及23日望月小太郎致井上馨信件，载《井上馨有关文书》（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以下称《井上文书》），419及430-2。

② 大正3年10月22日田中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315-26。

③ 日期不详的田中致冈信件，载《冈文书》，7-7。

④ 伊藤正德：《加藤高明》（1929年，传记编纂委员会），上，第582—586页，及699—700页。

⑤ 大正3年11月6日田中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315-27。

⑥ 前引《加藤高明》下，第49页，《原敬日记》大正4年5月18日（第4卷，第100—101页）等。

加藤也要求统一外交。例如青岛战役中，参谋本部得天皇批准，决定占领潍县；加藤认为从外交上看不能这样办，便觐见天皇，奏请取消，终于如愿以偿。参谋本部受到这个措施的冲击，据说还出现了总长、次长以去留相争的风波。^①

这样，加藤维持和加强外交一元化的意图，基本上得到了贯彻。但由于存在着上述元老和陆军的种种活动，外交工作不仅在方法上，甚至在内容上，也难以忽视他们。二十一条的内容大家都知道，其中心当然是第一号至第四号，尤其是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的第二号。第五号是“希望条款”，紧迫性较小。从第五号的核心，属于元老、陆军所重视的日中“提携”论的聘请顾问等条款来看，毫无疑问，第五号主要是加藤对国内的让步。

尽管加藤追求外交一元化，但是由于他的“让步”，二十一条要求仍然最低限度地满足了元老和陆军的愿望。二十一条要求的大纲，11月11日在内阁会议上作出决定，经山县、井上、松方私下允诺，12月2日得到天皇批准。^②下面第二节将提到，以后不久，以田中为核心的力量试图改变加藤外交，但没有实现，元老和陆军都只好注视着二十一条谈判，期待着满意一些的结果。

二十一条谈判从开始到达成协议的经过是众所周知的。日置公使于1915年1月18日直接向袁大总统提出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日本在4月26日第二十五次谈判会上提出最后让步修正案。中国方面在5月1日对此作出回答，日本方面不满意，内阁于5月3日决定提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接受日方4月26日提案全部内容。但是第二天，5月4日，在元老和阁员联席会议上，元老对此方针表示异议，结果日本政府删去第5号，发出最后通牒。中国接受了要求。

^① 大正13年12月3日星野庄三郎致上原信件，载《上原文书》，97-7，第425—426页。

^② 对日置公使的训令（大正3年12月3日交给），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579页。

当然陆军对于这次谈判非常关心，一直注视着。参谋次长明石把谈判经过详细汇报给寺内，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明石说：

“必须十分强硬贯彻我方提案。”因为“如根本解决不能圆满实现，则欧洲恢复和平之日，将倍增麻烦”。^①明石担心外务省作局部让步，建议冈陆相注意这一问题。2月22日他给寺内的信件里有一段谈到这个问题：“前些日子……也曾听说铁路合并（合办？——作者注）或借款办铁道。关于动工铺设这些铁路的困难，以及外交官对统一武器等有些掉以轻心等等，已向冈相提出。”^②铁路权益的取得，究竟是由日本单独铺设，还是日中合办，或只有提供贷款权，在外务省是一个有让步余地的问题。至于外务省对“统一武器”问题不够关心，从谈判过程来看也是事实。明石认为这些都是没有让步余地的。

还可以看到，上原派也同样担心外务省会让步。青木宣纯3月23日给上原勇作写信，预料（外务省）“在目前正在谈判的各项要求之中，对最重要（原文如此。——作者）部分没有全部实现的决心，满足于中国能接受的程度，仅仅在有关满洲和山东的要求上得到了贯彻，就拿来作为巨大成功向国民夸耀”。他推测中国方面也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对于影响该国主权的项目，一定会下决心断然拒绝的”，对外交当局也作了批评。照青木看来，涉及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才正是“要求的主要部分”，必须“刺击”（原文如此。——作者注）当局，使它做到“全部贯彻包含第五号在内的我方要求”。^③

但要附带提到，并非陆军中坚层的一切人都一贯最重视第五号，即有关日中“提携”条款。例如，田中原来重视日中“提携”，但是到了对要求项目作决定的最后阶段，就特别注意能不能取得

① 大正4年1月29日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6-43。

② 同上书，6-48。明石的担心成了事实，对山东铁路修筑权和投资权作了让步，南昌附近铁路和武器统一也没有实现。

③ 《上原文书》，补遗2，第685页。

“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①还有，在谈判陷入僵局时，他对于“对方（中国。——作者注）不同意满蒙问题的前提即日本在东部内蒙古占有优越地位”一点特别不满。^②田中和青木一样，都是热望通过二十一条谈判实现日本全部要求的，但田中特别关心的是“满蒙问题”即第二号，同特别关心日中“提携”即第五号的青木不一样。明石可能处于两者之间。

陆军认为，只要日本有断然的决心，完全实现以上要求是可能的。明石预测，在临近谈判决裂时，中国会让步、屈服的。他说：“当危机千钧一发……日置公使决然拂袖而去之一刹那间，恐即对方突然改变态度之时”，担心外务省“互让妥协”。^③

明石还认为，实现全部要求，从国际关系上看也是可能的。“据外务省方面的观察，俄国不仅没有异议，反而会就这件事表示谢意（站在自己立场上也会这样。——原注）；英国从外交上看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美国的言论无足轻重，这是任何人都同意的。日本这样的好处境，前所未有。”^④“还有所谓美国的抗议，过于夸大了，不过是杞人忧天的质询。关于这一点，外务省也认为美国无所作为。”^⑤

日本方面对于二十一条交涉中最是问题的美国态度作这样乐观的估计，如前所述，外务省也有它的根据，而且加藤外相实际上是亲英派，对美国同对英国不一样，采取的是强硬态度。^⑥

另一方面，明石作为参谋次长，对于万一场合下的军事行动也作了准备。首先，作为示威行动，早在大正4年2月3日，就

① 大正3年11月26日田中致冈相信件，载《冈文书》，7-6。

② 大正4年3月3日田中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315-35。

③ 大正4年3月2日致寺内信件，同上书，6-52。

④ 大正4年2月3日致寺内信件，同上书，6-44。

⑤ 大正4年3月24日致寺内信件，同上书，6-52。这里提到的美国抗议大概是指布莱安（Bryan）备忘录，其实这时候，直到4月中旬，美国的态度还是不太强硬的。关于这一点，可参阅臼井胜美著《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78—80页。

⑥ 例如前引《加藤高明》下，参阅第13编第2章及第14编第3章（2）。

考虑了利用驻满洲和驻山东日军的换防期进行重复配置的计划（现有驻军延长留守期和新驻军提前派出）；^①此外，3月10日内阁会议又决定增派驻天津的日军。对中国作战的计划过去只有一个概要，这次则着手使之具体化。^②该计划是，考虑首先在满蒙采取自由行动，消灭中国军队，然后转而攻占北京。^③明石在谈到北京作战时说：“我暗自热切盼望时局更加紧张，以便采取迅雷疾风行动，一气呵成。”^④在明石看来，开战比“互让妥协”的解决要好。还有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町田，一方面预料不至于开战，另一方面也认为“为使中国从迷梦中觉醒，此时下一场大雨，给予充分惩处之后，再加以怀柔，实为对华政策长远之计”。^⑤田中也同样主张用武力去实现要求。^⑥

从以上陆军中坚层的意见来看，他们对于政府在二十一条谈判中作了一些让步，终于基本上撤回第五号而使谈判妥协，一定是感到很遗憾的。町田5月15日给陆军教育总监上原勇作写信说：“日中谈判终于像阁下所了解的那样结束了，实在万分遗憾。”^⑦田中、明石一定会有同样的批评。但是，即使和他们持同一立场，只要把这次谈判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来看，对谈判的结果就未必会感到悲观。例如前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第七师团长的宇都宫太郎，在谈判达成协议后说：“有人说它不能令人满意或者是个大失败，这是企图破坏内阁之辈，或者是不了解国际关系实情的人。如果有识之士还真有这种想法的话，这是由于他们把这次解决愚蠢地看成是真正的最后解决了。我认为，这是解决

① 大正4年2月3日明石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6—44。

② 大正4年2月15日明石致寺内信件，同上书，6—47。

③ 大正4年3月14日明石致寺内信件，同上书，6—52。

④ 大正4年2月3日致寺内信件，同上书，6—44。

⑤ 大正4年3月17日町田致上原信件，载《上原文书》，102—14，第478页。

⑥ 大正4年2月3日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315—34。

⑦ 《上原文书》，102—15，第478页。

中国问题的初步，真正的解决，今后还需步步推进。”^①

其它方面，元老们注意到这次谈判给日中关系带来了不好影响，并加以批评。他们的意见是，首先谋求同袁世凯合作，以此为前提推行对华政策；这样考虑的话，他们的批评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上年9月24日四元老意见书中建议作为特使派往中国的后藤新平，从这个观点出发，在2月24日的备忘录中，对政府作了如下强烈的批评^②：“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在于谋求两国执政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先研究整个东亚安危之所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大隈内阁眼光短浅，一味迁就，求急剧（原文如此。——作者注。译者按：急剧应为急遽，可能是鹤见的笔误，所以本书作者有此一注。）功绩，把支那浪人派的主张综合起来，加以罗列，^③拿去对付中国，企图成功，以至近来束手无策，陷于除了出兵就无法收拾的局面。”

后藤3月30日又给寺内写信说：“非常遗憾的是，在这种形势下，对华政策即使能够得到成功，其所造成的恶感，亦必将在两国国民之间产生巨大鸿沟，距离会越来越远。什么人手里有能够填补这个鸿沟的方法呢？现政府是不能指望的。”^④他鼓吹由新内阁去改善日中关系。山县、松方等元老说加藤外交“根本”错误，^⑤也跟后藤一样，是批评这种同中国政府之间发生摩擦的谈判方法。

但是，不管后藤也好，元老们也好，对二十一条要求的每一个条款，在本质上并没有不同意见。后藤尽管在上述2月24日备

① 大正4年5月13日致上原信件，载《上原文书》，17—39，第76页。

② 鹤见佑辅：《后藤新平》，第3卷，第554—555页。

③ 支那浪人派是当时在中国的日本政治浪人的总称。这里的“主张”二字，原文为“首张”，日文里没有这个词，看来是由于“主”、“首”同音并往往通用而产生的笔误，所以本书作者在“首张”旁边也注上了“原文如此”字样。——译者。

④ 《寺内文书》，27—36。

⑤ 《原敬日记》，大正3年12月19日及大正4年4月19日（第4卷，第78及96页）。

忘录中说“把支那浪人派的主张综合起来，加以罗列”，但在另一备忘录中也说“像这样同中国谈判，这是当然的条件……。”^①据说山县在谈判中和谈判达成协议后，对贯彻第五项持消极的态度，^②但这是不是山县的一贯主张，也值得怀疑。当时是井上的亲信，同山县也常有接触的望月小太郎，向井上汇报了5月5日同山县进行的对话。“最近我同公爵（山县）说，4月21日日本向中国送交修正方案之前，我对加藤外相说，如果中国连这个修正案都不接受的话，日本为了国家威信，结果只有出兵，关于‘将来仰赖兵力’的事，听说元帅（山县）已经允许，究竟如何？元帅说，是这样，同加藤也说过了，……（原文如此。——作者注）。另一方面，考虑到将来的情况，井（上）侯爵关于同英美俄等国沟通思想的意见，是很有必要的。”^③山县避开了明确的回答，但如果望月的记录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山县在4月中旬的时候似乎是支持用强硬手段贯彻第五号要求的。如果是这样，从4月16—17日开始中国方面因为英美尤其是美国态度的变化而强硬起来的情况来看，^④山县反对第五号，既不是反对内容，也不是反对强硬手段，而是反对违背列强意见，硬性贯彻第五号，这样看是可以的吧。

对二十一条要求内容表示支持，而对谈判方法提出批评，在寺内身上更加明显。谈判开始时，他给田中写信说：“外交的事情，眼下什么也别想说了。本来这次安排的是，在攻打青岛之前策划好，攻克之后，庆祝凯旋、撤军之前提出要求，用这样的方法处理是最好的。现在没有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去撤军，却在御×

① 鹤见佑辅，前引书，第3卷，第551页。

② 《原敬日记》，大正4年5月18日（第4卷，第101页）。

③ 大正4年5月5日寄发信件，430-1。又，4月22日加藤致日置电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3册，上，第337页），传达关于最后让步方案的决定，在电文栏外注明：“以上大正4年4月20日内阁会议，4月21日已密告山县公松方侯，并由山县公密告井上侯。”

④ 臼井，前引书，第80页。

（一字不明。——译者）之后，一反前议，提出难题，多少使中国人不能心服。”^① 他的看法与后藤相同，和不惜对中国开战的明石完全相反。

但是，另一方面，寺内认为必须使要求实现。明石的对华作战计划中，包括把驻朝鲜日军派往满洲应急的计划，立即得到寺内的同意。^② 5月5日，寺内知道元老与内阁联席会议的分歧之后，在日记上写道：“大岛（陆军次官）来密告内阁危机及调解意见。我告诉他，同意他的意见。并且约定，根据情况我也可以介入。”^③ 寺内想协助收拾最后的混乱局面。

上述加藤外交，一方面被批评为要求内容不充分、谈判手段不够强硬，是退让的；另一方面，又被批评为要求内容过大，谈判不是怀柔互让。这些批评者的核心，一方面是明石、田中、上原派等陆军中坚层，另一方面是山县、寺内等陆军上层。如上所述，陆军中坚层和陆军上层之间在对华政策上有很大距离，但是他们在批评加藤谋求通过外务省统一外交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双方的对立还处于潜在状态。

二十一条谈判结束后，双方的对立转入表面化。陆军上层认为二十一条谈判造成日中关系恶化，因而进一步强调改善两国关系。与此相反，陆军中坚层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鼓吹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大隈内阁后期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大正5年前半年的反袁政策，证明了这一点。

① 大正4年1月27日寄发信件，载《田中文书》。在谈判期间，寺内说不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关于推迟谈判日期的问题，野村乙二郎在《对华二十一条问题与加藤高明（特别关于第五号的理解）》（载于《政治经济史学》131（1977年4月））中推测，内阁方面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即利用谈判作为选举战的有利材料。不会全部是这样吧，我想这只是一种有力的假说。

② 大正4年2月22日明石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6—48。

③ 《寺内日记》，大正4年（同上书，450—58）。

2. 参谋本部和反袁政策

众所周知，在二十一条谈判时，中国反日运动显著高涨。它在中国国内产生的效果是，反政府的论调削弱，袁政权的基础加强。袁世凯乘机策划从1915年夏开始实施帝制，登极称帝。

在日本，由于发现贪污案件，大浦内相辞职，大隈内阁在8月里更换了一批阁员。当时离开内阁的是加藤集团，填补其空白的主要是属于旧国民党系统的集团。一贯谋求确保外务省主动权的加藤辞职后，内阁对外交政策的领导力量削弱，变得易于受阁外影响。阁外影响头一个就是“大陆浪人”。^①宪政本党成立以来长期所处的在野党时代中，旧国民党系统的政治家同“大陆浪人”之间，由于双方都主张“对外强硬”的强力自主外交，发生了密切关系。^②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加藤外相时代受压制的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在田中义一就任次长（1915年10月4日）、上原勇作就任总长（12月17日）以后，对内阁的影响更为显著。^③

上述中日两国的情况有什么联系呢？也就是说，改组后的大隈内阁怎样对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呢？大正4年9月初，大隈首相在兼任外相时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在中国实行君主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此时能做君主的，除袁世凯外别无他人；政体问题只要对日本没有利害关系，就不想干涉。^④但是，从希望进一步

① “大陆浪人”代表人物之一内田良平，大正4年8月27日和递信相箕浦 胜人，农相河野广中会谈，9月7日又和箕浦、河野及藏相武富进行会谈，说明他对于对华政策的意见。内田口述《对华政策意见》（大正4年10月1日，小川平吉文书研究会编《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973年，三铃书房]2，第91—102页）。

② 关于国民党与“对外强硬”的关系，参见宫地：《日俄战后政治史的研究》第三章。

③ 还有冈陆相9月1日致田中信件（《田中文书》）说，已内定田中为次长，应该开始接任。从这里推定，田中在就任之前若干时间就作为次长发挥他的作用了。再者，由于上原同田中很亲密，对上原作同样的推测也是可以的。

④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2册，第77—78页。

在中国扩张的人来说，中国伴随实施帝制而出现的混乱，是一个好机会，轻易放过，实在太可惜。

一种想法是利用这种混乱来加强日本对袁世凯的领导。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町田，在给上原勇作的信中，叙述了这样的见解：

“它（中国）成为帝国之日，由于不满、妒嫉，国内将更加不稳，加上财政日益枯竭，袁氏将备受痛苦；他的地位越困难，就会更加倾向东方，更加仰我鼻息，其结果只有看我帝国的脸色行事。”

“有人说袁世凯是绝世的豪杰、奸雄、智囊，我们日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力量操纵他。要想给他帮助，得他的信任，其结果是白白地被利用完事。也许是这样。但这是他处于顺境时的情况，现在他作为中国统治者，展望前途，内忧外患交迫，在这样的逆境下，日本利用手段使他非经常仰我鼻息不可，相信这也并非难事。”^①

另一种想法认为，日本对袁世凯扩大影响终归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积极利用这个混乱，打倒袁世凯。影响最大的“大陆浪人”之一内田良平，10月17日向大隈首相提出的《对中国帝制问题意见》^②主张：日本对帝制问题不应该提出任何官方意见，让袁去实行帝制，但不承认它，等中国混乱扩大，就打倒袁世凯。这里虽然没有明说日本在官方采取旁观态度的同时，要极秘密地援助反袁派，但应该是当然的含义吧。据内田说，袁擅长的是“利用外交问题，吓唬国民，以谋统一”，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日俄行动，第一次大战初期的青岛战争、二十一条要求等，全都被袁利用来加强他的政权。这次如果把确立日本对华领导权（二十一条要求第五项等）作为承认帝制的交换条件，只能又是反而加强了袁政权，为反日的中国作出贡献。因此内田的结论是：“这是袁政府对外政策的秘诀，我们的对华政策首先要解决的是除掉袁世凯，否

^① 大正4年9月19日寄发信件，载《上原文书》，102—17，第482页。

^②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7卷（1928年，宝文馆），第680—684页。

则不能指望实现日中融合。”看到以上内田对袁世凯外交政策的认识，对于他建议内阁不反对帝制而旁观帝制（和极秘密地援助反袁派）的理由，可以明白了吧。

10月14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由日本、英国，可能的话再加上俄、法、美，五国共同向中国政府提出劝告，说明实施帝制有招致中国内乱之虞，望暂时延期实施。美国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没有参加。这个劝告于10月28日由日、英、俄三国公使提出，法国、意大利也接着提出。北京政府11月1日答复说，国内无混乱之虞，停止实施帝制反倒会引起混乱，不打算延期。但是到了同月11日，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实施帝制暂时延期。

大隈内阁究竟从什么样的意图出发提这样的劝告？不大清楚。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幡酉吉把所谓帝制延期反倒会引起混乱这个意见向上呈报。^①从这点来看，当然很难相信劝告中所高唱的此举意在“维持东亚全局的和平”。但是，反过来也很难相信通过劝告就更能促使中国产生内乱。外相石井菊次郎也对小幡作了关于劝告的说明：“日本政府无意乘欧战之机在中国有所作为。”^②10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的主要意图，可能是为了取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的创始权，表明日本对列强的主动地位，并且使中国感觉到日本的威信。石井对小幡说：“从一方面来看，对于东亚安危有极大关系的中国帝制计划如置之不问，这有关（日本的）威信。”^③此外，在内阁中对这次作出劝告帝制延期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的法相尾崎行雄在回忆中夸耀地说：提出这个国际共同劝告是“抛弃追随外交，第一次取得主动地位”。^④以上两点，可以肯定这个推测。

① 大正4年10月16日及20日致石井电报，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2册，第79页，第81—83页。

② 大正4年10月21日发电，同上书，第83页。

③ 同上。

④ 尾崎行雄：《对袁世凯帝制延期之劝告》，载东京《朝日新闻》政治部编《回忆当时》（1928年，东京朝日新闻社），第352—353页。

但是这个意图没有充分实现。中国宣布实施帝制延期的11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Grey, Edward）通知日本驻英大使，支持中国供应武器给俄国；第二天又通知说，支持中国加入协约国。^① 中国对德参战，不消说加强了中国在协约国中的地位。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町田对中国参战能够取得的利益作了如下推测：

“一、它（指中国。——译者）最害怕的是，目前日本一有机会就会立即向中国施加压力。为预防这一点……以参加英、法、俄协约国方面为好。二、作为参加协约国的报酬，不消说可以取得对当时帝制的承认，还可以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以及将来参加和会的权利。”^②

这个中国参战案，至少从日本的立场来看，是意味着对日本——想通过劝告帝制延期以明确其对中国的主导地位——的反击。中国的意图是通过参战强调对日独立，加强对内统一。而英、法、俄则企图在对德作战中保持与中国的合作，以牵制日本。

11月18日内阁开会，决定了对于11日中国方面帝制延期答复的态度。决定由日、英、法、俄四国共同发出通告，大意是：

“本国政府考虑到了中国政府此次通告，在保留各国权利的同时，相信中国政府关于履行职责维持国内和平秩序的保证，拟暂且注视今后时局的发展。”又采纳了尾崎法相的下列建议：“向有关各国……建议，‘若中国政府与我预期相反，迅速实行帝制，有关各国应注视中国国内情况，在看清确无内乱之虞之前，暂不承认中华新帝国，这问题不能过早决定’。在内部协商好，尽可能在欧洲动乱恢复平定之前，不予承认。”^③ 内阁更加倾向于反对帝制，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中国和列强在利用中国参战案的形式进行反击。

^① 大正4年11月11日及12日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致石井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3册，下，第878—879页。

^② 大正4年11月24日致参谋次长电，同上书，第929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2册，第139—140页。

上述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列强第二次联合通告，比原案内容略有缓和，于12月15日向中国提出。这期间，帝制准备完成，只待实施，没有大的混乱。12月14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征祥（应为陆宗舆，原文有误——译者）向外相石井，15日外交次长曹汝霖向日本公使日置，分别秘密打听日本希望帝制延期到什么时候。^①日置公使向政府建议，中国方面采取的这个措施，可以作为结束劝告帝制延期问题的转机。日置认为，“这回中国方面多少有点推心置腹，探询我方心意……这是觉悟到在这种重要问题上忽视我国到底是行不通的”，这一成果是“打开局面的最好机会”。^②的确，按照当初日本提出劝告的主要意图来说，中国方面向日本打听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日本的威信，确是一个应当这样评价的成果。但是，内阁的态度现在变得越来越强硬，中国又爆发了第三次革命，促使大隈内阁转变对中国帝制的政策，去追求更大成果。

1916年1月5日，陆公使通知石井外相，中国打算在2月上旬实施帝制。19日内阁会议决定，“万一中国政府忽视此种形势强行实施帝制，日本政府应一方面注视南方动乱的发展，继续暂不承认帝制；一方面向中国……明确指出问题就在于眼看发生了动乱还视若无睹，一味胡来，推行帝制。”^③于是石井21日通知陆公使，即使中国强行实施帝制，日本在动乱平息以前不能承认，并且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日中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也将断绝。^④同一天，中国方面宣布延期推行2月上旬施帝制的计划。但是，这时内阁的目标已经远远不是帝制延期了。例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打算对中国帝制延期作这样的回答：“我们协约国方面满意地

① 会谈记录，《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2册，第169—170页；日置致石井电，同上书，第174—175页。

② 同上注，第174—175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3页。

④ 大正5年1月21日石井致日置电，同上书，第16页。

收到上述通牒”，^①但石井认为“不能保证该（中国）政府能够再次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并体现在内政上”，主张以不回答为好。^②到3月7日，内阁会议进一步作出了以打倒袁世凯为目标的著名决定，要点是：“一、……当前帝国应采取之方针，是在中国扶植优越势力，使该国国民认清日本力量，为日中亲善创立基础。二、……为推行帝国上述方针，袁氏以退出中国政界为宜。……三、……为此，以尽可能使中国自己造成此种形势为上策。……四、否则日本政府正面向袁提出，要求中止帝制或退位，以排除袁氏；这样，可以为目前进退维谷之袁氏开一活路……再者……不能不断定，欧美列强对我如此明显而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无论如何不会赞同。”^③以打倒袁为目的，一面旁观，一面期待中国内乱扩大，内阁会议中最重要的这两点，同内田良平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末，从1915年10月14日内阁对帝制问题初次作出决定，到1916年3月7日内阁决定转变政策的当中，陆军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在10月14日内阁作出决定的前一天，田中写信给在汉城的寺内说：“一两天之前，向陆相谈了陆军的意见，主张在适当时机承认帝制，并且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严厉取缔革命党及其追随者，以示援助；如发生暴乱，帝国要有自卫保护权利的决心。陆相带着上述主张，明天去参加内阁会议，可以大致上确定一个根本方针。”^④也就是说，冈陆相和田中次长的意见，同町田一样，都是要通过支持帝制，对袁世凯加强控制。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决定，可以认为是陆军支持袁和旧国民党系阁员排斥袁这两种意见的妥协，或最大公约数的决定。

到1915年12月28日，田中给在北京的坂西利八郎写信，评

① 同年1月25日井上致石井电，《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23页。

② 同日石井致井上电，同上书，第23—24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45—46页。

④ 《寺内文书》，315—46。

论 14 日陆公使和石井外相的会谈，告诉坂西，日本将在 1916 年 3、4 月间发起承认帝制。^①按照田中指示对袁世凯做工作的坂西说：“我本来就有这样的理想，使日中两国形成特殊关系，达到内政外交公开协商，他国不能提出异议的程度。”坂西还说，“尽早符号（原文如此。——作者注。按文义应为“符合”。——译者注）阁下从大局着眼的政策，发扬我帝国国威，使中国不迷失道路，巩固两国和平团结，防止西方势力东渐”，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②此外，田中同坂西 12 月前后正在筹划给中国以财政援助，并要求中国向日本派遣特使。^③总之，陆军中坚层打算趁帝制问题的机会扩大对袁政权的影响，这个设想似乎一直维持到 1915 年年底。

但是到 12 月底，参谋本部的政策就有了转变的迹象。第一，参谋本部由于中国方面对这个日中“提携”不十分合作，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田中 1915 年 12 月 28 日给坂西的信里说：“总而言之，中国政府有缺乏诚意之嫌”。^④这就是参谋本部态度强硬化的表示。第二，由于中国爆发了第三次革命，参谋本部的政策更加大胆起来。例如宇都宫在给上原的贺年信里说：“国内国外日益多事，真是大有可为的时候。要使内阁立即改变手段，这时就要以全力争取大隈伯爵，实行您的抱负。今年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现在不是区区党派之争或者阀族好恶之争的时候，我期待大小人才兼容并包，各取所长，以求圆满成功。”^⑤这个主张就是要抓住中国第三次革命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以参谋本部为中心，为掌握它而奋斗。

到 1916 年 1 月 18 日，田中命令坂西把反对帝制的意见通知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4 年，第 2 册，第 180—181 页，及大正 4 年 12 月 29 日坂西致田中信件（载《田中文书》）。

② 大正 5 年 1 月 3 日坂西致田中信件（载《田中文书》）。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上原文书》，17-43，第 79 页。

中国政府。^① 1月31日上原勇作参谋总长的信这样说：“中国云南军的发展虽然不如新闻报道之盛，但袁阵营中有拥护派、反对派等等，却是事实。明日张胆去干的良机在此。”^② 由于陆军这样改变了支持帝制的政策，同以前反袁的旧国民党系阁员之间取得了一致，可以认为这就是1月19日内阁会议决定得以通过的原因。据说，从1月起，每星期一次，在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办公室里，陆海两省的两个军务局长，参谋本部、军令部（即海军参谋部。——译者）等各自的作战、情报两部长（正确地说是参谋本部第一、第二部长，军令部第一、第四班班长）聚集在一起交换情报。^③ 这表示军部和外务省开始推行融为一体的对华政策。

从这以后，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不消说强有力地推行了反袁政策。田中在2月21日对冈陆相说：“我认为现在想出一个迫使袁完全退让，同时扶植我方政治力量的办法，是有利的。我暗地征询了各方面的意见，原则上似乎都大致同意。听福田（雅太郎，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说，阁下也有同感。如果是这样的话，想逐步归纳为一致意见。”^④ 3月9日又说：“对华政策虽然终于决定，但已相当晚了，相当艰巨啊！”^⑤ 在3月7日的内阁决议中，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的主导作用是很明显的。

3月7日内阁会议决议的内容，如上所述，是以打倒袁世凯为目标，一面等待中国内乱扩大，一面旁观。与此同时，政府决定秘密援助反袁运动。关于这一点，内阁决议说：“帝国民间有志之士，愿同情中国倒袁活动、接济钱财的，政府虽然不负公开奖励之责，但予以默许，这是符合上述（倒袁）政策的。”这个方针的

① 大正5年1月22日日置致石井电，《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22页。

② 致日高尚刚。上原勇作元帅传记编纂委员会：《上原勇作元帅传》（1937年，传记刊行会），下，第273页。

③ 八角三郎：《回忆录》（1957年），第112页。八角是当时军令部参谋。

④ 《冈文书》，7—10。

⑤ 同上书，7—11。

具体化和扩大，就是援助以岑春煊为核心的南方派，并进行第二次满蒙独立活动，特别是对后者，不仅援助钱财，而且积极策划。^① 外务省特别派遣了驻吉林领事森田宽藏出差到满洲各地领事馆通知说：“在满洲及蒙古各地……反袁运动……愿以钱财援助者自不待言，也应默许用其它方法援助该项运动者。”^② 另一方面，参谋本部还派遣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等去领导满蒙独立运动。在满洲还听说张作霖计划独立，石井外相、田中参谋次长想加以促进。在当地的各项工作确有不统一现象，至于中央，反袁政策是集中掌握，军部、外务省一致行动的。在这期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撤回帝制，接着4月21日宣布实施内阁责任制，组成段祺瑞内阁。4月11日，陆公使要求日本援助袁世凯。从4月21日曹汝霖的例子开始，中国方面屡次表示对于日本援袁将给予代价。^③ 但日本置之不理，终于迎来了大正5年6月6日袁的死亡。

第二天7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石井外相立刻表示支持。在支持黎这个问题上，军部和外务省也是一致的。上原参谋总长6月9日在一封信里说：“尊意以袁氏之死为转机……，总长、次长意见大体相同。昨日发出奉告政府方针之电，内容亦然。”^④ 6月7日，田中发出命令，停止满蒙独立运动；6月下旬运动中止，决定解散。^⑤ 随着袁世凯之死，一系列反袁政策，至少在中央一级秩序井然地中止了。

大正5年1月以来大隈内阁和陆军当局的上述反袁政策，不难想象，是会受到主张对中国政府采取“援助-提携”政策的人

① 参见栗原健：《第一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与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的辞职》（载栗原编前引书）。

② 大正5年3月19日石井致日置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854页。森田于3月21日自东京启程，4月8日返京。

③ 详见臼井前引书，第99—100页。

④ 致井户川辰三信件，载《上原文书》，第663页。

⑤ 小矶国昭：《满蒙举事计划始末》，前引《田中传》，上，第639—641页。

们强烈批评的。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小节曾提到，大正5年1月26日，山县对高桥文雄说，有同袁世凯合作的必要，强烈排斥“中国无赖”的那种“干涉他国内政，从感情出发倒袁”的论调。^①但当时政府、陆军正是要推行山县所排斥的政策。山县从2月初开始到5月中旬一直患重病卧床不起，以后就没有对政府、军部的对华政策作过强烈的批评。代山县而起成为批评政府和陆军对华政策的核心人物的，是寺内。

寺内2月2日对川岛浪速寄给他的意见书表示反对，指出在满洲发动阴谋，是“将整个中国投入骚乱”。^②寺内在3月7日内阁决议之后，明确表示反对政府和参谋本部的政策。3月11日，寺内给后藤的信中说：“觉得政府……对华方针有所改变，将来到底如何处置，有方针否？徒然将中国人民投入永久祸乱之中，此时如有渔利者出现，将如之何？对此不胜杞忧！”^③寺内认为，中国只有通过袁世凯才能和平统一。正如田中所述：“阁下对中国问题的主旨，是保住袁世凯。”^④

为了对付寺内的批评，田中同4月间到东京来参加师团长会议的熊本第六师团长明石元二郎和新设朝鲜第十九师团长立花小一郎一起商量。立花是继明石之后就任朝鲜宪兵司令官兼朝鲜警务总长的，4月1日就任师团长，是寺内总督的亲信，他同明石、田中和寺内的密切关系，已如前述。这三个人商定：不接受寺内意见，坚决推行现行的反袁政策，还要去说服寺内。上原参谋总长也同意这个方针。^⑤

说服寺内的努力之一，是明石4月底给寺内寄去的一封信。^⑥他对反袁的积极意义作了如下说明：从中国现状看，袁的没落已

① 前引《山公遗烈》，第111—112页。

② 致田中信件，载《田中文书》。

③ 《后藤文书》。

④ 大正5年5月9日致寺内函，载《寺内文书》，315-53。

⑤ 大正5年4月27日立花致上原信件，载《上原文书》，65-3，第303页。

⑥ 《寺内文书》，6—64，未写明发信日期，寺内收信日期是5月2日。

属势有必至，也看不到以后能有效地统一中国的人物。“估计结果将四分五裂，然后靠日本的后援力量去收拾局面”吧。因此，这个“四分五裂”，正是“收拾时局的必经之路，最应该欢迎的事”。日本应该支援“最弱者”，^①因为“最弱者……无所依靠，只有依靠我国的伟大力量”。其结果，“在供应军备物资上，在(作战的)地理形势上”，日本都可以得到便宜，“日本以蕞尔小邦而称雄天下”，是可能的。明石还从消极意义上拒绝反袁政策的中止或转变。因为“总之，日本已经劝告袁不能称帝，又全部控制了友邦的对华活动，好不容易才一切交给我们处理，我们必须贯彻初志”。明石更向寺内倡议，推行对华政策应作如下分工，即，“收拾大局需要堂堂铁腕”，这是寺内等人的任务。但另一方面“开辟收拾局面的道路需要纵横捭阖的策略”，担当“在纷乱中理出头绪，找到可乘之机，制造可论之理”的，是陆军的任务。“参谋本部同事们该努力的地方就在这里。”“现在，曾得阁下培养、受阁下熏陶的人，看到阁下不高兴的脸色，只有痛心烦闷。”总之，明石不仅鼓吹参谋本部政策的正当合理，而且把寺内同参谋本部的意见分歧归结为两者在任务上的差异，以打动寺内的感情，使他停止批评。

尽管作了这些说服，寺内仍不停止对反袁政策的批评。据立花说，立花把上原的口信告诉寺内，寺内“毫不动摇”，对田中、明石的“忠告口信”反而“表现出反感”。^②寺内给后藤写的信里这样说：“对华政策为老书生（指内田良平。——译者）所误，在今日情况下，挽回之策已穷，毫无办法。此事我一再告诫田中中将等，但不受采纳，终于抓住一种浪人论，认为这是政治大势所趋，相与追随，于不知不觉间误入迷途。”^③

① 明石具体推荐的是废帝宣统，但在这一点上，明石说，田中、立花都与他的意见不同。

② 大正5年4月27日立花致上原信件，载《上原文书》，65-3，第303页。

③ 大正5年5月4日寄发，载《后藤文书》。

寺内认为田中“追随”“浪人论”，是田中的独自行动，没有同原总长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同外务省充分磋商。他把这个担心告诉了上原，^①同时要求田中同外务省充分磋商。^②田中对此强烈地反驳说：“关于这次对华问题，好象您认为是我连总长也不告诉，在秘密地搞阴谋活动似的。……这使我非常难过。今天是完全根据政府的政策，陆、海军和外务省丝毫没有不统一的行动，都是大家详商的结果。何况在参谋本部内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这一点请您放心。在政策上同阁下的看法是有不同之点的，这我早就知道。我认为推行政府所决定的政策，是我辈的任务。请您惠予谅解。”^③确实，寺内所谓田中“追随”“浪人论”，决不是田中的独自行动，而是陆军、政府的一致行动。

在这个时期，反对反袁政策的人团结在寺内左右。原财政次官、贵族院议员、朝鲜银行总裁胜田主计写信给寺内，批评政府说：“如果有必要统一中国的话，超过袁世凯的人物是没有的了。……前些日子袁宣布放弃帝制的时候，不就是改变政府政策的时机吗？”又说：“一定要把排袁主义在欧战结束之前一气呵成，以对付中国，这虽然也算是一策，但却是下策。断绝了帝制观念，用共和制认真治理中国的话，就不如笼络袁世凯，采取确保我国利权的手段，这不是上策吗？袁也是俊杰，只要我们对他的态度好，他是会改变今天的想法的，通过外交手段，不是没有可能。”据胜田看来，不管帝制、共和制，反对袁世凯的话，对各国就缺乏说服力，而且实际上袁的力量不能轻视。袁复活了共和制，团结了国内力量，另一方面，五国银行团和美国都供给袁贷款。胜田担心，如其结果造成袁接近俄、英、美以对抗日本，则日本将

① 大正5年4月23日上原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336-31。上原对此反驳说：“阁下对于田中中将如何如何的说法，实在令人遗憾。”

② 大正5年4月30日寄发，载《田中文书》。

③ 《寺内文书》，315-52。未注明发信日期，但我认为这是在5月1—2日之间的事。

陷入严重困境。^①其它如后藤新平、西原龟三,还有从田中接受指示的坂西利八郎,都向寺内申诉对反袁政策的疑问。^②由(首相)大隈要求担任驻华公使的驻意大利大使林权助,决心为了阻止大隈的对华外交,表示接受任务,在从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汉城,同寺内会谈,取得一致意见。^③因批评反袁政策而团结在寺内周围的人当中,后藤出任副总理级的内务大臣^④,后来就任内务大臣,胜田起初作财政次官,后来升任财政大臣;他们领导了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林、坂西、西原都各自在中国承担了寺内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翼。

3. 寺内内阁和援段政策(一)

——国际协调下的“援助-提携”政策

1916年10月9日,寺内内阁成立的那一天,元老松方正义写了一份《对华政策意见》,^⑤送给山县看。第二天,山县告诉松方完全同意它的内容,希望送交当局。^⑥于是《对华政策意见》交给了寺内。

松方的《对华政策意见》是批评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大隈内

① 大正5年4月2日寄发,《寺内文书》,297-7。

② 大正5年5月1日寄发的后藤信件,同上书,27-44;3月寄出日期不详的西原信件,同上书,208-7;4月14日寄出的坂西信件,同上书,24-11。

③ 林权助口述,岩井尊人编著:《论我国七十年》(1935年,第一书房),第307-308页。

④ 后藤就任内务大臣后,考虑起用水野炼太郎为次官,并向奥田义人说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我个人虽然就任内务大臣,但是对中国问题有很多看法。根据这种情况,我很想去中国旅行以圆满解决日中关系,所以我很想得到一个适当人选作内务次官,内务省工作由他一人担任,把一切事务都委托给他,作事实上的内务大臣。(水野:《半生之回忆》,松波红一郎编:《水野博士古稀纪念。论文与随笔》[1937年,水野炼太郎先生古稀庆祝会事务所编],第825页。)

⑤ 德富苏峰编述《松方正义公爵传》(1935年,该传记编纂会)坤,第923-930页。

⑥ 大正5年10月10日山县致松方信件,同上书,第931页。

阁的对华政策，企图提出一个政策去代替它。松方认为，几年来的对华政策，第一，“把可称帝国外围的中国驱到敌方”；第二，“丧失了帝国在国际上的信用”，在这两点上，毫无辩解余地。

根据松方的看法，日本的对华政策必须从日本的世界政策上去决定。日本在世界政策上的课题，就是在人种竞争的趋势中如何完成“黄种人的先驱者”的任务。松方为自己拟定的课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谋求如下的“日华亲善”：“于是，其解决方法，非主要归于日华亲善不可。中国是日本以外的一个东方大国。日华亲善，不仅是为了支撑东亚危局，也不仅是为了救济中国，实为我日本帝国能屹立于世界惊涛骇浪中的自卫之道。”

松方在断定这种“自卫之道”的“日华亲善”必要性之后认为，对华政策的“根本问题”，是下述的选择——对中国进行侵略，还是培育？“日本对于中国关内，是使之弱小衰败，并吞它呢？还是视为朋友兄弟，善诱之，扶植之，把它看作东方自治的一个要素呢？”松方说，后者没有一贯实行，是日本的根本错误。那末，“日华亲善”怎样才可能呢？关于这一点，松方提到了那种从中国反日态度看问题，鼓吹“日华亲善”不可能，对中国必须威压的意见，他主张：“国际关系只有利害一致，休戚与共，方能密切。要想真正得到中国人的心，除了讲互利之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他认为，讲“互利之道”，造成“利害纽带”，就可以争取到中国的亲日态度。

松方还论述了国际协调的必要性。“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只是对中国一国的政策，那是管中窥豹。……不用说中国背后，中国的周围也有列强。如果既不让这些列强悦服也不让它们心甘的话，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绝不能说是安全的。”松方认为，要让列强“心甘”，维持国际协调，日本必须绝对根据“领土完整、机会均等原则”行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对华政策的“世界公认原则”。

当大正5年10月松方提出《对华政策意见》时，从同年3月

底以来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宇垣一成，也在他的《对华政策之我见》里归纳出这样的政策。^①

宇垣和松方一样，从中国在日本的世界政策中的意义开始探讨。在平时，中国必须是日本人的移殖地、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这样，日本才能“在世界竞争场里立足”。在战时，中国必须成为阻止欧洲势力东渐的“西部屏障”，还必须成为实现（日本）自给自足的物资供应地。总之，宇垣认为中国必须是“帝国生存的仓库，国防的屏障”。

宇垣的意见，从列强和日本对抗这一点，特别是用“西部屏障”之类的字眼，一看就同松方的意见类似。但是把松方的“自卫之道”和宇垣的“在世界竞争场里立足”一对比，就可知道，松方对欧美比较处于守势，宇垣比较处于攻势。再者，同松方把中国看成是国家和民族比起来，宇垣则把中国看成地区和资源，显然松方基本上立足于中国主体观，而宇垣基本上立足于中国客体观。

接下来的问题是，宇垣所希望的那种中国怎样才能得到呢？宇垣在这里批评了“日华亲善”论。他说，第一，国与国之间，很难希望像个人之间那样以亲善换“恩情”的关系。因为“国际间出于恩怨而作道义制裁的力量很薄弱，出于利害打算的力量则很强烈”。第二，即使援助中国国内某一派使之掌握政权，也很难期待它会“报恩”。因为这个力量既然也成了中国的执政者，为了维持其地位，就绝对必须捍卫本国利益，以博得本国国民的支持。期待“报恩”，不过是“总而言之把个人道义同国际道义混为一谈”的幻想。所以宇垣主张用利诱和威压并举去代替“日华亲善”。但这不是“一般常说的恩威并施”。在今天欧洲列强行动受到制约的情况下，是用“威”的特好机会。用“恩”的事，在欧洲战后

^① 《宇垣一成有关文书》六（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以下简称《宇垣文书》）。

列强“卷土重来”之时实行才能取得效果。宇垣的这种方法，同松方的方法不消说是针锋相对的。

最后，松方强调国际协调的必要，宇垣却差不多没有提到这个方面。他对国际的考虑只有下面一点，结论还是否定的。这段话是：“像武力解决（中国问题）这样的事，对世界列强思考上必须慎重，但遇有必要、获得良机时，要断然使用，不能踌躇。”在跟松方比较的同时，如果对宇垣关于国际协调的认识大胆作出推测的话，那么情况就是下面这样了。他认为，松方所谓的对华政策的“世界公认原则”领土完整、机会均等，的确是列强所主张的，但绝不是他们世界政策的准则；列强只是由于地理上远隔、使用实力有困难，防止相互间过火竞争，而且以压制日本和俄国使用实力为目的，才这样鼓吹的。因此，他认为不能像松方那样把列强从特殊利害出发的“原则”当作“世界公认的原则”去接受，日本倒是应该立足于列强的普遍行动准则“弱肉强食”原理之上，真正同列强对等行动。

松方和宇垣都各自批评了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穷加辨证，不留余地。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辛亥革命以来元老、陆军上层基本上根据中国主体观提出的“援助-提携”论，和陆军中坚层基本上根据中国客体观提出的“威压-提携”论，分别作了普遍、完整的总结。

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显然是在肯定松方的《对华政策意见》和否定宇垣的《关于对华政策之我见》之上形成的。大正6年1月9日，寺内内阁作出了有关对华政策的第一个重要决定。^①那就是，第一，否定企图对中国建立保护权和割取或并吞领土，高唱尊重和拥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例如，大隈内阁时期的满蒙独立运动，策动张作霖独立等，不管最后意图如何，凡在逻辑上是破坏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尝试，都加以排斥。内阁决议的

^①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第424—427页。

第二点强调，为维护保全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中国有必要改善政治、军事、经济的各种设施，日本对此“以诚意指导启发中国”，促进两国友好。那就是说，维护和加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不仅是抽象的原则，至少在中国关内，要实际上加以推进；这同大隈内阁企图乘中国积弱之机扩大日本影响的对华政策适成对比。而且这个统一、独立的维护和加强，是通过日本的援助而实现的，因而也就实现了日中“提携”。“援助-提携”论在这里第一次被采用为政府的政策。再往下看内阁决定的内容，第三，强调对中国各政治集团和党派持不偏不倚、公平相待、不干涉内政纠纷的态度。这中间也有对大隈内阁对华政策的批评。但这并非作为原则乃至主义而提出的主张，而是考虑到干涉内政不利于工商业（援助一方就要引起另一方抵制），不利于国际协调。因此，如判定“干涉”利多于弊，而且能在国际协调中进行的话，也就很容易改变方针。从后面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早在7月份就进行了。第四点，规定在日本势力范围以外的问题同列强协调，同时让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也就是说，“援助-提携”政策必须同国际协调平行，而以获得对“援助-提携”政策的支持为目标。第五点，是差不多所有内阁都强调的，那就是增进日本在南满、东部内蒙古、福建、山东的特殊利益，但不能侵犯中国的统一和独立，已如前述。

就是这样，大正6年（原文误为大正元年。——译者）1月9日内阁会议决定充满了对大隈内阁对华政策的批评。这个决定的核心是“援助-提携”论和国际协调。这些特征，在松方的《对华政策意见》中也可以看到。

可是，要“援助-提携”论和国际协调之间并行不悖，绝非易事。它的困难性在内阁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在外务省为内阁决议起草的《对华方针说明书》中，一方面主张“援助-提携”论，另一方面又抨击把日中关系说成是同洲同命运的共同体的说法，说它违反历史事实，会促使黄祸论抬头。在内阁会议

席上，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根据内相后藤的建议，才把这个部分删去。认为日中两国具有特殊关系的立场，同担心这在本质上与国际协调相矛盾的外务省的立场，这两者的对立早已显露。^①

总之，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是以“援助-提携”论和国际协调并列为中心课题而推行的。大正6年的前半期，对华政策上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对德参战问题，在这里，内阁的这种方针暴露无遗。

日本第三十八届议会解散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面临新局面：德国采用无限制潜艇作战政策（大正6〔1917〕年1月9日决定，31日对美通告）；美国对德断交（2月3日）并参战（4月6日）。美国在对德断交的同时，呼吁各中立国采取同样态度。当然中国也是其中之一。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对德断交乃至参战，在1915年11月曾提议过，大隈内阁注意到它有牵制日本的意味，表示反对。但是大正6年2月9日寺内内阁决定赞成中国对德断交，^②原因之一是由于在当时形势下中国此举对日本的牵制作用已经薄弱了。^③但更为积极的是，看到了日本支持中国对德断交乃至参战可以得到以下好处：

第一，这意味着日本和协约国的合作，将加强战后日本在其它协约国中的地位。在这以前，大正6年1月12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日本对待大战的方针，认定日本为了在战后继承德国在山东和南洋诸岛的权益，必须更加为战争出力。^④根据这个方针，日本1月27日决定应英国要求向地中海派遣驱逐舰，其代价就是英国在战后支持日本关于山东及南洋诸岛的要求。^⑤2月14日，英国给

①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第424-427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第226—227页。

③ 2月9日内阁会议决定也同时指出，中国此次要求参战的“目的及性质”跟上次显著不同。同上书。

④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第635—638页。

⑤ 大正6年1月27日本野致驻英大使珍田电，同上书，第638—640页。

了这个保证；从2月中旬到3月，日本又从法、俄、意各国取得了同样的保证。可以说，日本支持中国对德断交，同样是为战争出力的一个环节，是为了期待欧洲列强更加支持日本获得权利。第二，中国对德参战，加强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地位。国际地位的加强，协约国当作代价提供的各种利益（庚子赔款缓付、提高关税、供给贷款等），以及废除德国利权而得到的利益（取消乃至停止对德债务等），加在一起，就会加强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地位。第三，在中国消灭了德国势力。内阁在先前的1月12日内阁会议决定中，认为德国是战后发展的大障碍。寺内内阁作出判断：英国已经只是维持现状了，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对比起来，德国则野心勃勃，企图从政治上扩展。消除了德国在中国政治扩展的可能性，而且“德国过去所占的地位至少可由日本继承一部分”，^①这是极为可喜的。第四，美国首先提出参战案，因而对中国政府增加了发言权；现在日本积极支持中国对德断交，能收到抑制美国的效果。

可是，在中国，反对对德断交、参战的论调也不少。因此，经若干混乱之后，于3月14日决定断交同参战分开，先只是断交。后来段内阁独断独行，决定参战的时候，同反对参战的大总统黎元洪对立表面化，引起了政变。^②那就是5月22日黎罢免段，段宣称不服从，离开北京，支持段的督军纷纷宣布独立。黎为了收拾局面，邀请有势力的督军张勋进京。张勋独断独行，6月13日叫黎解散国会，14日让李经义组阁，7月1日，断然推行他一向主张的复辟，即复活清朝。由于张勋此举，黎元洪2日亡命到日本公使馆。另一方面，段在3日发出武力讨伐张勋的檄文。督军们

^① 前引大正6年2月9日内阁会议，（同上书，第227页）。据说当时中国还有一些德国雇佣人员，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七十二名，海关一百二十六名，津浦、粤汉、沪宁等国有铁路分别有二十七、十一、一名，邮局十二名，共计二百四十九名。（田村幸策：《最近中国外交史》，上（1928年，外交时报社），第762页。）

^② 经过详情见臼井胜美前引书，第114—118页。

一齐追随段，复辟派开始崩溃，12日张勋亡命到荷兰公使馆。14日，段入京组阁。8月1日，冯国璋副总统入京就任代总统。南京在8月底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出现南北分裂时代。

在这次政变中，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采取不干涉态度。但是，与其说单纯旁观，还不如说这是预测到由段祺瑞、徐世昌等人收拾局面而采取的态度。^①寺内首相、本野外相也同样对段、徐等人有所期待。^②在段祺瑞表明决心讨伐张勋的阶段，林公使7月3日呈请“用一个不会出问题的名义贷予适当金额”，供举事必需之用。^③日本政府一度在7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严守中立并继续监视；^④在复辟派显然被打败的11日，本野就答应日本资本家接受段的贷款要求。^⑤到7月20日，林呈请进一步积极援段。^⑥林说，完全赞成“帝国政府对华方针不偏不党不干涉主义”，但这个方针同“对于有相当巩固基础的正当政府给予正当援助”完全不矛盾。段内阁还是“巩固”的“正当政府”，“不仅应该十分好意地考虑给予贷款乃至供应武器，而且对它在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也应当尽可能给予帮助，乘机机会谋求日本在中国地位的提高”。再者，对于预料中的南方派反段政策，林说：“我们不要轻率策动南北调停，或声援南方，助长反抗气焰，徒使事态复杂；这时坚决保持冷静态度，才是最上策。”他建议不要理睬南方派。于是，7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了同林意见相同的援段方针。^⑦

① 大正6年6月林致本野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第502—503页。

② 大正6年5月8日本野致林电，同上书，第472页。

③ 致本野电报，同上书，第516页。

④ 《田日记》，大正6年7月6日。

⑤ 大正6年7月11日致天津总领事松平电报，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81页。

⑥ 致本野电，同上书，第97—99页。

⑦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第437—438页。但该书通过决定日期为20日，研究者一向采用此说。根据递信相田（健治郎）的日记，这个决定是27日开始实施的。

寺内内阁期待由徐、段收拾时局，进而采取援段政策的理由是不简单的。徐、段的参战论和“亲日性”当然也是有力的理由；但是，早期就主张援段，6月8日到北京以后更是一贯鼓吹援段的西原龟三，他的援段政策却另有所据。西原认为，废除规定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严格控制的旧约法，制定“适合国情的约法”，“组织坚强的政府，适应世界大势，开发产业，振兴国势”，推行这样的政策是中国最大的任务。他期待徐、段这股势力具有实现这个任务的意志和能力。^①林、寺内对段的期待和援助不如西原彻底。但从上述1月份的内阁会议决定来看，他们也认为必需由徐、段建立强有力的行政机构，从而加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并形成日中“提携”关系，这点同西原是一样的。

但是日本方面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完全统一于上述援段政策之下。参谋本部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正是在围绕参战问题发生政变的5月至7月，田中参谋次长在中国进行考察旅行，同中国各方面的有势力人士接触，鼓吹在黎大总统之下，网罗冯副总统、段祺瑞、徐世昌、张勋、王士珍、岑春煊、孙文等有势力的政治家，建立举国一致政府。^②还有，田中在6月20日前后给寺内的信里，谈到中国政变时说：“我看清了路数：段祺瑞免职期间，有一些谋士企图利用督军，唆使张勋，从而推翻大总统，再次拥段上台，编导了这样毫无道理的一出戏。我还看穿了，这出戏不消说是想利用日本，特别是利用阁下的内阁。”^③田中对段祺瑞、徐世昌集团的批评，不但不同于西原，跟林、本野、寺内对段、徐的期待也是显然不同的。田中进而谈到日本今后应采取的方针：“不应该随中国的情况而定日本的措施，日本应该定好自己的国策，

① 大正6年6月9日西原致胜田大藏相电报及7月6日信件，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664—665、689页。

② 前引《田中传》上，第653—660页。

③ 《寺内文书》，315—60。没有付邮日期，信是从奉天寄往东京的，收信邮局的邮戳是6月24日。

然后施行于中国，开端的机会就在今朝。最要紧的是，目前暂且以严正态度观察情况的发展，然后抓住机会，推行我们的国策。”^①田中主张静观事态，并希望在观察之后能对日本“国策”的决定产生影响。同一封信还说：“在您决定日本今后抱什么目的和走什么道路的时候，首先听听我的报告然后作出决定。”还说，如有必要，他准备中止旅行，回国汇报。

田中建议的静观事态发展和建立举国一致政府论（或南北妥协论），乍一看好像是和平的政策。但是担任过黎元洪顾问的上原派青木宣纯中将（在参谋本部工作）给参谋总长上原的信里所说的下列意见，暴露了这个设想的内幕。青木说：“中国人……我看只靠他们是无有希望能满意地统治国家的……因此我认为不如推行下列方针为有利：一、……立即劝告南北互相让步，促进和睦，制造（日本）干涉的机会。二、他们如果越来越不听我们的话，发生地方动乱，影响通商治安，那就断然用武力干涉，然后在我方领导下尽可能公平地实现妥协。三、以此为起点，今后参预中国内政，谋求其整顿和进步。”^②

田中是否以与青木相同的意图进行“南北妥协”的工作，不能肯定。但是大隈内阁后期田中领导的对华政策，从劝告帝制延期到反袁，以及袁死后在黎元洪之下通过恢复旧约法进行“南北妥协”，其进行情况是同青木设想相类似乃至相循环的。田中的政策虽然没有青木彻底，但是会向着青木设想发展的。

对于参谋本部这种以南北妥协为核心的政策，主张援段的人当然要加以批评。特别是西原，他评论说：田中的南北妥协、网罗有力人士的设想，“如果不是以期待中国的混乱为前提，不可能有这样不彻底的政策”。“这是重蹈大隈内阁的复辙。而且，徐世昌、段祺瑞一派是信赖寺内内阁的、真心真意依靠日华亲善改善国政

^① 同前页注③。

^② 大正6年7月26日寄出，载《上原文书》，2—3，第4页。

的，压制他们就会给亲美派以可乘之机”。^①从7月以来开始采取援段政策的林，前已部分提到，他也对参谋本部的南北妥协表示警惕。^②总之，从大隈内阁后期以来，参谋本部的对华政策并没有消灭，寺内内阁是在对它进行压制之下采用援段政策的。还有，寺内在田中出发去中国之后，想派遣田中到俄国去，上原总长对此反应消极，想至少要让田中完成在中国的旅行。^③从这些可以推想，参谋本部想通过田中的中国之行，恢复或维持它对于对华政策的领导权，寺内对此不高兴，想把田中和参谋本部的关心转到俄国去。

如上所述，寺内内阁在中国对德参战问题上，在维持国际协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贯彻执行以加强中国政府、加强日本对中国政府的发言权为目标的“援助-提携”政策。但是，为了推行“援助-提携”政策，不仅要作外交努力，同时还必须进行经济援助。

寺内内阁成立的时候，日本对中国供应资金的能力压倒了欧洲列强。但是日本参加了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德国已经退出），日本要向中国提供政治借款（administrative loan），必须完全服从银行团的规定。日本想充分利用资金供应能力的优势单独进行政治借款，这个诱惑力真是难以抵抗，但预料到这一定会招致英、法、俄的不信任和抗议。例如，大隈内阁曾计划趁兴亚公司贷款的机会，策划进行大规模政治借款，但计划刚一表面化，政府和横滨正金银行（四国银行团成员之一，政治贷款的经办人）就陷入困境。^④寺内内阁想独自进行政治贷款的心情也很强烈，例如后藤内相早就主张过“在四国银行团的拘束之外……投放巨

① 大正6年6月10日西原致胜田信件，〈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666—668页。

② 大正6年7月30日致本野电，同上书，第109—110页。

③ 大正6年5月15日上原致寺内信件，载〈寺内文书〉，336—33。

④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谷寿子：〈寺内内阁与西原借款〉（载〈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第10卷第1号，1966年10月，第74—81页）。

资”。^①为此，设想在四国银行团业务范围之外，以“实业性贷款”的名目进行贷款，这就是说，政治性贷款由正金银行负责，实业性贷款由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承担；考虑成熟以后，三银行团于12月4日成立。这种方式，从对华贷款差不多一向由正金银行垄断来看，是大大缩小了它的作用，同下一节要说的缩小满洲正金银行的作用是同时进行的。

日本进行对华贷款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它是对中国具有丰富资金供应能力的唯一强国，它对日本对华政策批评也最为激烈，而且它已退出银行团，处于“约束之外”。

山县和寺内从大战爆发当时起就对美国在中国的活动极为关心，这已在前面第一小节里说过。批评大隈内阁的急先锋后藤，也看到大隈的弊政是在“外交，特别是对华对美关系上”。^②山县、寺内、后藤认为，寺内内阁紧急不可缺少的就是要研究在对美关系上应当采取哪些手段。大正5年10月，外务省政务局拟订了称为《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日美关系处理方案》的文件。^③这个文件认为，美国向中国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日美必须尽可能避免冲突。这个方案因此主张：第一，必须说服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应读为“侵略扩张”。——译者）是必然而且当然的命运”；第二，向美国移民的问题，服从美国利益；第三，当美国在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发展（侵略扩张。——译者）时，日本应进而给予援助。通过这些，可能实现日美在中国的协调。

总结上述各点，当时寺内内阁对中国贷款有三条方针：第一，尽可能有利地利用作为四国银行团之一而事实上是唯一资金供应国的地位；第二，尽可能使美国在中国的发展限于“经济”方面，对此给予支持合作；第三，日本独自进行贷款。

① 后藤：《对华政策本案》（大正5年12月下旬）。鹤见前引书，第3卷，第648页。

② 后藤备忘录（大正5年8月），同上书，第603页。

③ 前引《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92—96页。

这里的第一条，后来表现为第二次善后借款的设想。^①通过第一次善后借款巩固了袁政权的基础，而且加深了同各资金供应国的关系，第二次善后借款恐怕就是在这样的记忆之上设想出来的。日本鉴于第一次善后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让债权国作盐税行政改革的监督人，日本在这次借款中，设想以田赋（地租）为担保并取得同样的权利。第二次善后贷款，仅于大正6年8月28日，大正7年1月6日、7月5日三次各预支一千万日元，得到以盐余作担保。这三千万日元都是由日本，即由横滨正金银行供应的。但结果第二次善后借款没有成立，日本没有确立作为债权人的有利地位。

第一条方针是既定路线的产物，比起来，第二条方针，考虑对美关系而提供的贷款，可说是寺内内阁的新政策。它的具体化由于下述情况而首先实现了。那就是，当寺内内阁成立时，在一部分美国资本参与下，在日益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山东省成立了借款。另一个是日中之间正在进行一项有浓厚政治意义的借款，传说美国资本要进行干预。前者是山东、江苏运河借款，后者是交通银行借款。

交通银行同中国银行一起，是中国发行钞票的两大银行，但袁世凯后期滥发钞票，使它陷于不能兑换的状态。从交通银行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协助该银行重建，在那里扶植势力，是有重要意义的。交通银行总理、袁世凯帝制推进者梁士诒早在大正5年5月就提出过交通银行由日中合办的方案，希望通过此举取得日本对袁世凯的支持。^②关于救济交通银行的问题，在袁世凯死后，仍由大仓组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秘密谈判。大仓组的河野久太郎对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说：“总之，想派人打进交通银行，

^① 以下见《中国政府第二次善后借款经过》，见前引《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75—85页；以及《中国外债史论》，第381—387页。

^② 大正5年5月21日石井致日置电，及22日日置致石井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453—454页。

挂上钩，否则，中国就会同其它国家进行同样的谈判了。”^①日本政府也表示同意。^②这问题由寺内内阁继续处理，但停滞不前。这时，美国也在关心这个交通银行的重建问题，11月16日达成的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Continental and Commercial Trust and Savings Bank of Chicago）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合同，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储备。^③12月2日，林公使的电报说，中国方面对于交通银行的重建有依靠美国的意图，这件事在芝加哥银行增加贷款中有实现的可能性。^④这时，带着破格条件登场的，是8月13日业已同章公使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的西原龟三。^⑤由于西原的活动，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三行同交通银行达成交通银行借款（第一次）五百万日元，大正6年1月20日签订正式合同。日本在救济交通银行这个跟加强在中国的政治发言权有关的问题上，没有向美国让步，也没有同它合作。

另一方面，大正5年4—5月，美国广益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和山东省政府之间的疏浚南运河借款，得到中央政府同意而宣告成立。^⑥过去德国对山东省投资有优先权，根据大正4年关于山东省的条约（指“二十一条”。——译者）第一条，应该由日本继承。因此大隈内阁认为这个借款同日本的权利相抵触，提出抗议。对这个抗议，这个运河工程的承包人裕中公司（Siems-Carey & Co.）表示，尊重日本权利，希望日本参加一部分工程。林公使也有这样的意见：“在此时机，不如

① 大正5年8月1日小池政务局长与大仓组河野、门野两人的会谈，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458—459页。

② 大正5年8月4日石井致小幡临时代办电，同上书，第459—460页。

③ 《中国外债史论》，第374页。

④ 致本野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466—467页。

⑤ 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1965年，平凡社），第119—120页。

⑥ 前引《中国外债史论》，第361页。

向他表示我方善意，作为建立将来日美经济合作基础的一个起点。”^①到12月，美国广益公司向正在访美的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提出，这个工程由日美共同进行。^②本野外相认定，接受这个建议“是日美在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开端”。^③谈判顺利进行，3月9日，美国公司和兴业银行签订了日美共同提供运河疏浚借款合同，11月20日同中国签订合同。^④就这样，美国对于政治色彩较淡薄的事业所采取的行动，寺内内阁不仅不加阻止，而且采取合作、促进的态度。日本的参加，使美国资本的投资得到安全保证，日本也阻止了美国的单独行动，使山东更加势力范围化。

这种日美资本合作，在满蒙铁路建设上一时也提议过。但本野认为，美国对在满蒙的日本有关事业投资，必须限定“美国资本家……不能是同中国政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只能通过日本资本家之手投资于上述企业”，否定了这个提议。^⑤这就是说，日本对美国资本的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合作、促进方针，根据地区不同是有差别的，在满蒙就有更加严格的限制。

对于这种抑制美国在华政治性活动、而在经济活动上予以合作(但在满蒙，“经济活动”的意义更为严格)的方针，日本想同美国达成谅解，于是有石井-兰辛(Lansing, Robert)会谈。特别是，在这个设想发展的同时，抑制美国政治性活动的必要性越来越大。美国在大正6年5月至7月的中国政变中，建议列国共同向中国劝告：中国维持一个统一、负责的政府比对德参战更为重要。^⑥(未得各国同意——译者)不久美国就独自提出了劝告。这实际

① 以上见《我国加入美中运河借款问题始末》(大正7年1月10日，载《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88页。

② 大正5年12月18日驻美大使佐藤爱磨致本野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319—320页。

③ 大正5年12月24日致佐藤电，同上书，第320—321页。

④ 合同全文见上书，第342—347页，以及395—410页。

⑤ 大正6年1月17日致林电，同上书，第421—422页。

⑥ 大正6年6月6日美驻日代办致本野信件，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第719—720页。

上有支持黎元洪、排斥段祺瑞的意思。西原推测，美国这个劝告的意图在于建立亲美派内阁。^①本野外相命令驻美大使佐藤爱麿向美国国务卿“暗中提出”：“干涉中国政治问题，日本不能置之不理。”^②

7月24日的内阁会议决定派遣特派大使石井赴美，给石井的《关于日美两国间重要问题磋商须知》中，首先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利益“特殊而且切身，关系国家安危，欧美各国不能与之相比”，“任何国家如无视日本地位，企图采用损害日本此种地位的方法，在中国扶植政治势力”，日本将采取自卫措施，希望美国承认这个宗旨。其次，日本不反对美国的经济活动，特别欢迎日美合办事业，但对南满、东蒙，如上所述，则有保留。日美签订的石井-兰辛协定，至少从日本方面看来，基本上实现了以上宗旨。

日本借款方针的第二点，即对美关系，已经具体实行。至于第一点，即四国银行团的活动，尽管实行较迟，但原则上早已着手。对比起来，第三点，即实行单独对中国借款，却陷入了僵局。上述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确有这种意味，但只限于供应对交通银行暂时流动资金，同时也不过是针对美国而采取的应急的对抗措施。

可以称为最早的单独对中国的借款，就是第二次交通银行二千万日元借款。西原最迟在大正6年2月就设想把它作为中国参战的代价，^③胜田财相于2月26日同意。^④林公使怀疑这笔借款是伪装实业借款的政治借款，担心违反四国银行团的规定。^⑤事实上

① 6月10日致胜田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667页。

② 6月9日发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第723页。

③ 西原：《关于中国参战后我方给予中国援助的备忘录》，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639—640页。

④ 《西原龟三日记》（载《西原龟三有关文件》（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缩微胶片，以下简称《西原文书》）），以下简称《西原日记》，大正6年2月26日。

⑤ 大正6年3月25日致本野公函，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260—261页。

西原也对这一点作过注释：“这笔借款，（日本）私下答应可以充当改革政治及处理对德关系之需。当然，对这笔借款是实业借款而并非政治借款的问题，需要在中国适当处理。”^①林担心可能是经过伪装的政治借款的事并非杞忧。再者，这笔借款同支持与交通银行有密切关系的新交通系、段派有关，在北方派内部以及同南方派的关系上有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但林所关心的，不是严守这个“不干涉内争”的原则，而是严守国际协调的原则。林认为：“关于中国内政的各种议论无需特别顾虑，但对四国银行团的关系必须充分注意，尽可能避免误会。”^②9月，中国交通总长曹汝霖对日本公使馆秘书出渊胜次说：“交通银行的两千万日元绝对不挪用于政治费用，眼前先把约三百万日元交给中国，余款存在日本，准备把它作为抵押，运用在汇兑上。”这样林才认为可以向银行团说明“这纯粹是以整顿交通银行业务为目的的银行之间的通融”，对借款表示同意。^③借款于9月28日成立。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是寺内内阁对华借款政策第三个方针的开始具体化。到1917年底为止，寺内内阁在这方面的实际成果，只有这一点。

如上所述，寺内内阁在其前半期约一年多内所推行的对华政策，是以“援助-提携”和国际协调平行发展为其特点的。就是说，寺内内阁的目标，是要加强中国中央政府，加强日本对该政府的发言权，乃至削弱其他国家的发言权，但这是以不出国际协调范围为前提而进行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参战问题和第二次善后借款预付，以及一系列对美政策。以加强日本对中国政府发言权为目的的单独经济援助，也是在慎重考虑国际情况之下进行的。这个方针，从主张积极的“援助-提携”政策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彻底的。主张断然大规模援助中国政府的西原，在大正7年（1918

① 上页注③西原备忘录。

② 大正6年9月23日致本野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275页。

③ 同上。

年) 2月就是这样批评寺内内阁前半期对华政策的:“现内阁成立以来,标榜日华亲善一年有余,它有一些触及日华亲善要害、激动人心的措施和交涉吗?我们为找不到它的成果而感到遗憾。”^①西原所主张的不受国际协调路线制约的积极“援助-提携”政策,在俄国革命以后才开展起来。

4. 寺内内阁和援段政策(二)

——“援助-提携”政策的公开化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对日本外交是巨大的冲击。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对华政策,主要是通过同俄国协调以防止在国际上孤立。但是俄国帝国主义竟然在11月被完全消灭了。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政权还同德国和解,12月15日签订停战协定,第二年,1918年3月3日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大战中各国的对立和联合关系发生了一大变化。

寺内内阁及其周围对这种情况是怎样认识的呢?提出了什么样的对策呢?山县的对华政策,前已说明,是把中国作为西力东渐(具体是指俄国的武力和白人联合等)的壁垒来加强它,同它合作为基础的。山县为了避免人们把日中“提携”看成人种集团,还把国际协调作为这种合作的前提。对山县来说,俄国的崩溃意味着同国际协调的最大支柱倒下了,德俄休战意味着德国势力的东渐。对于西力东渐的这一急速发展,山县认为,只有加强中国这个壁垒,只有加强同它的合作为对策,此外别无他法。山县在1918年1月的《对华意见书》^②中说:“当此时机,帝国可采取之策,应为断然与中国合作,以对付德俄之东进侵略,不可谓不当。”山县提出了具体办法:“向中国派一使节,同中国政府磋商

^① 西原给寺内的意见书,载《寺内文书》,444—5。写作的准确时期不明,但寺内收到的日期为大正7年2月10日。

^② 大山编前引书,第353—354页。

谈判，提出二、三必须条款（但约法三章，其中之一为攻守同盟协定。——原注），共同努力，先促使中国出兵北满，日本接着出兵，以观大势。此时应说服（中国政府）对南方采取和衷共济政策。应当向他们指出：揆诸今日世界大局，不应兄弟阋墙，赤心诚意使其脑中推×（一字不明。——作者），同时应大加干涉，以求解决。如彼等固执己见，则以兵力镇压之，舍此别无他法。”总之，虽强求中国“提携”，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山县在3月15日的《时局意见》^①中，主张对西伯利亚出兵要克制。主要从防御观点出发观察远东形势的山县，不轻率同意出兵西伯利亚这一冒险行动，那是当然的。同上述山县意见书见解完全相同的，有寺内3月13日提出的意见书《西伯利亚出兵论》。^②

同山县和寺内认为俄国崩溃是西力东渐急剧进展因而担心的看法相反，另一种看法注意到西伯利亚出现了权力真空，认为俄国的崩溃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机会。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斥责“慎重和积蓄实力”的政策，主张积极援助和培育西伯利亚的“稳健派”，包括武力援助在内。田中说，“利用俄国人的同仇敌忾心理，以防止德奥势力东渐，趁此机会，设法网罗与我国生存有关的友邦，而且对各协约国做到有信有义，不仅在远东拥护列强的权利，同时笼络处于悲惨境遇的远东俄国人，使他们成立自治国，将来加以领导，达到能开发资源丰富地区的地位。”^③还有出兵西伯利亚的积极推动者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宇垣一成，他对亲自签订的日中军事协定（见后述）记述说：“吾人所希望者，仅欲搞好左右关系，即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互相协作应付困难而已，别无他求。”^④同山县、寺内主张日中“提携”和制止出兵西伯利亚相反，

① 大山编前引书，第355—360页。

② 《寺内文书》，441—10。

③ 田中手稿：《关于西伯利亚的意见》，载前引《田中传》下，第140—142页。

④ 角田顺校订：《宇垣一成日记》（一）（1968年，三铃书房，以下简称《宇垣日记》），第164页。宇垣也同下述的西原、坂西一样，重视出兵带来日中关系密切化的那一侧面（例如第183页）。但重点显然在于出兵本身。

田中和宇垣是把日中“提携”作为处理西伯利亚问题的一种策略手段而提出的。

和田中、宇垣同样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人当中，也有人相反把出兵看成是日中“提携”的手段。西原虽把俄国革命称之为“空前未有的国难”，但他说：“扶持与帝国活命有关的邻邦中国，确定东方自立原则，在国内谋求工业组织的大革新，达到以经济立国”，这是“转祸为福的不可动摇之论”。^① 坂西主张：“当前，在对俄军事协作的名义下，先把中国军事领导权掌握在我手中，然后把它扩展到经济关系中去。”^② 他们就是这种人吧。

其次，从事实上的执政党政友会的情况来看，总裁原敬，早先被认为是对中国有清醒认识的人。对中国的将来，原敬认为：“说什么应当使中国成为统一、文明、富强的国家等等，都是表面的外交辞令，……从我国的利害打算，即使中国不成为文明国家，不能富国强兵，也不妨事。”对中国的内部对立，他的看法是：“劝告中国国内保持表面统一也好，实际上不能统一也好，都没有关系；只要注意他们对我国不抱敌意，他们之间的纠纷，不仅对我无害，反而可以乘机取得利益。”^③ 但原敬的对华政策到1917年后发生了变化。他也认为十月革命和德俄休战是德国势力的东渐，担心波及中国，主张有必要“使南北妥协，援助主张妥协的集团，以防中国投入德国的怀抱。”^④ 为此，时至今日仍然抱着不干涉政策不放，是危险的。^⑤ 不仅要进行未必能够成功的“道理上的劝告”，而且必须在这种劝告的同时，伴随着期待妥协必成的“种种手段”。^⑥

这样一来，对寺内内阁对华政策具有强大影响的有力人士，

① 《时言》，《寺内文书》，444-1。这是寺内在大正6年12月16日提出的。

② 大正7年2月11日致寺内信件，同上书，24-16。

③ 《原敬日记》，大正6年9月29日（第4卷，第319页）。

④ 同上书，12月28日（第350页）。

⑤ 同上书，大正7年1月15日（第352页）。

⑥ 同上书，3月17日（第374页）。

都以某种形式主张日中关系密切化，鼓吹日中“提携”的必要性。其中有几个人把它同出兵西伯利亚联系起来，但出兵还不是一致的议论，从时间上说，推行对华政策倒是先走了一步。寺内内阁对这些主张是怎样接受和归纳的呢？

谈到日中关系密切化乃至日中“提携”，只要中国内部存在对立，首先就有一个选择提携对象的问题。至于克服内部对立，它的范围可以从克服北方派内部对立直到南北统一，克服对立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例如，本野外相认为，收拾中国内乱和建立巩固政府极为必要，因此，北京政府的内部统一才是必要的，“南北调停”不合时宜。^①西原认为：“象袁世凯死后那样进行弥缝式的妥协（在保存旧约法下网罗有力人士），是更加滋长祸乱的原因。”^②这同原敬的“南北妥协”论是对立的吧。

继大正6年1月9日、7月27日之后，寺内内阁关于对华政策第三次重要内阁决定，是大正7年3月8日作为批准给林公使的秘密训令备忘录而做出的。^③它的第二项说：“我们认为必须早日平定中国国内骚乱，建立巩固政府，为此，希望北京政府内部团结一致，同时希望结束南北分裂抗争。”从下述情况看来，这是为了使本野外相的方针和原敬的意图不发生矛盾而作的修改。当时，内阁对中国大规模地供应资金，要通过发行政府保证的兴业银行债券（一亿日元以内）才有可能，为此必须取得议会的同意。原敬要求在外交调查会上通过对华政策大纲，作为政府保证兴业银行债券的前提。^④政府为此而在3月17日外交调查会上提出的对华政策大纲，就是给林公使的这个秘密训令。寺内让原敬看

① 大正7年2月21日给林公使（在东京）的秘密训令，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二册，上，第1—2页。

② 《备忘录》，《寺内文书》，444-3。写作日期，从内容判断，是在布列斯特条约（3月3日）之后，西原第五次访华（3月11日启程）之前。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二册，上，第2—3页。

④ 《原敬日记》，大正7年2月22日（第4卷，第363页）。

到，政府打算把向北京政府劝告“南北妥协”作为政府的训令，^①在外交调查会上也同意了原敬的劝告妥协论。^②

但是日本政府终于没有进行南北妥协的劝告。林公使认为“要使妥协有结果，必须进一步推动南征步伐，施加更多压力”，他支持段内阁关于在平定湖南和广东之后再行妥协的政策。^③坂西也认为，在现状之下作妥协，就得根据旧约法恢复旧国会或召集新国会，这会“妨碍政务进行，使日中两国不能团结，……成为三度捣乱的近因”，反驳了田中关于签订日中军事协定后进行“南北妥协”劝告的意见。^④坂西和田中在这个政策上的对立，是上一年（大正6年）5—6月中西原同参谋本部之间在有关中国应该推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上对立的延长。

对于林提出的用四到五个月的时间平定湖南、广东然后进行南北妥协的意见，寺内在4月中旬表示希望说，不管是促进讨伐还是促进妥协，总之一要赶快收拾局面。^⑤但是到了5月里，寺内却建议坂谷芳郎（预定就任中国币制改革顾问，当时在中国游历中）不要发表有关强调南北和解的言论。就是说，最晚到这个时候，寺内内阁选择了段内阁所主张的以武力讨伐南方，在北方派取得优势地位后再作妥协的政策。寺内内阁3月8日给林公使秘密训令备忘录中用最大公约数的办法确定下来的统一中国的方针，结果就这样倒向了援段政策。

那末，这个以北京政府为对象的日中“提携”是怎样具体化的呢？首先，军事上的“提携”由日中军事协定实现了。^⑥上述

① 《原敬日记》，大正7年3月13日（第372页）。

② 同上书，大正7年3月17日（第374页）。

③ 大正7年4月12日及21日致本野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上，第4—6页。

④ 大正7年4月30日坂西致田中电，同上书，第11—14页。

⑤ 大正7年4月20日，本野致林电，同上书，第4—5页。

⑥ 关于这个协定，以及交换公文详情，见关宽治：《1918年日中军事协定的缔结》（载关宽治：《现代东亚国际环境的诞生》[1966年，福村出版社]一书中）。

给林公使的3月8日秘密训令的第三项，以及同一天的其他内阁决定，^①确定了签订有关日中共同防御协定的方针；3月25日，日中之间交换了有关共同防敌的公文。但它的具体化推迟了一些，5月16日双方才签订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日签订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这个协定，有几个具体的目的。第一，表面上说是阻止敌国势力的渗透，实际上是日本为了进行西伯利亚战争而取得中国的同意和合作。第二，日中军事“提携”，从两国的力量关系来看，意味着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领导力量。宇垣认为，“日中之间如果不形成上下关系，日本权力不能统治中国，那么，中国的改善……差不多是不可能的。”^②为了作好准备，他说：“在日本所向往的时间到来之前，密切地结成左右关系，深深地打进内脏；当向往的时机一旦到来，转瞬之间就变为上下关系；要打好这样的基础。”这个将来要转变为“上下关系”的“密切”的“左右关系”，宇垣提出，其中之一就是军事“提携”。^③第三，这能加强北京政府。关于这一点，坂西这样说：“目前日本要领导中国没有别的途径，只有先成立这个军事协定，使中国认识到准备参战的必要……使它新编成几师国防军，在经费上仰赖我国，组织训练也靠我国帮助。由于这次军事协定的成立，中国……恐怕不必动用这些国防师的一兵一卒，首先在北方和长江沿岸的督军中和这些地区将威信大增，令行禁止，使前线官兵不怀疑中央，这样，各地归服的好机会自然会到来。另一方面，政府迅速建立立法机关，修改约法，万事依法办理，这样，定能保证达到统一目的。”^④这就是说，日中军事协定将加强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进而成为通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上，第280—281页。

② 《宇垣日记》，第166页。

③ 同上书，第168页。

④ 大正7年4月30日致田中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上，第13页。

过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基础。

与军事“提携”同时，经济“提携”的设想也发展了。上述3月8日给林公使的秘密训令提出，日本考虑放弃庚子赔款余额，相应地要求中国政府在“保卫日本……和开发中国”的目的下，把“日华共同铁自给方案（即日中合办钢铁工业）、中国修筑铁路、改革币制及整理税制等问题”付诸实施。这些方针的具体化，日中之间达成协议的，就是大正7年4月13日西原龟三和陆宗輿之间交换的备忘录。^①该备忘录第一项规定，日本放弃庚子赔款余额，中国政府用于奖励种植棉花、奖励繁殖绵羊、进行地质调查、振兴实业教育，以及设立推行上述事业的特别机关，聘用日方推荐的技师和讲师。跟着第二项即所谓“日中铁自给方案”规定，中国维护现行的铁矿国有政策（下文叙述），确定钢铁国营，创办设有特别会计的炼铁厂，日本征募炼铁厂公债一亿日元，以炼铁厂全部资产作为担保；炼铁厂聘用日本人为总工程师，总产量中除去中国所需要部分外，其余供给日本。第三项是中国铁路国有化，中国成立中国铁路投资团，承担发行中国铁路公债，以该项公债所得的资金加速修建铁路，实行国有化；中国铁路投资团由日中有力银行组成，允许国内外有力银行有条件地加入。最后第四项是整理中国税制和改革币制方案，实行包括废除厘金等货物通行税和整理田赋在内的税制改革，以巩固财政，并且决定建立金本位制；日本对这些改革给予最好的援助。陆宗輿所谓“害怕将来被骂作卖国贼，战战兢兢地签字”的，^②就是这个备忘录。

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个西原—陆备忘录之后，5月22日，寺内首相、后藤外相、胜田财相一起商定了给即将去中国的西原的指

① 前引《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84—185页。

② 前引《梦的七十余年》，第185页。

示事项。^①内容有四项：第一，以吉林、黑龙江省的森林和矿山为担保，供应开发上述资源的借款三千万日元，和加速吉会铁路建设的借款二千万日元。第二是铁白给方案。第三是关于中国加速修筑铁路、铁路投资团事项。第四是免除赔款和奖励棉花、绵羊、地质调查、实业教育，以及整顿税制、改革币制和日本的援助等事项。这就是说，西原促进的日中经济“提携”方案，通过政府首脑的决定，即将进入实行阶段。

在阐明5月22日决定的各项内容和意义以前，必须先把大正6年底到这个时期已经成立的借款的内容和意义加以阐明。第一是大正6年12月30日成立的军械费借款，第二是大正7年4月30日成立的有线电信借款。军械费借款是用借款形式供应军火，这同日中军事协定一起，是日中军事“提携”的一个环节。这项借款的预期效果，是要加强北京政府，并通过军械的统一加强日本对中国军事行政的领导力量，等等，同日中军事协定的情况类似。这项借款也是为了排除美国对中国供应军火的可能性。^②林公使从大正6年8月开始就抓紧进行。^③从它的这些意义和成立时期来看，这个借款同寺内内阁前半期对华政策具有共通的特征。大正7年7月31日又成立了一次军械费借款，款额共计三千二百万日元。

有线电信借款，起因是大正6年末北京政府要求行政费用借款二千万日元，日本方面对借款名义，提出了两个方案加以比较研究。^④一个方案是用建设吉会铁路的名义，它的重大缺点是“事实上并不建设铁路，恐惹人注意，引起怀疑”。因而采用了另一

① 《对西原的指示》，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下，第799—801页。

② 例如《原敬日记》，大正6年9月29日（第4卷，第318页）。

③ 例如大正6年8月18日林致本野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上，第487—488页。

④ 《中国行政费二千万日元借款》，载前引《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179—181页。

个方案，即用改良和建设有线电信的名义。有线电信遍及全中国，第三国要举出它没有改良和建设的证据，确实比吉会铁路要困难。该项借款显然是伪装为实业借款的政治借款，其第一个目的就是供应北京政府的行政费用。但是，（第二），从长远来看，也注意到了向中国的庞大电信事业投资，可能占据有利地位。第三，有线电信事业的发展，将加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促进中央集权化，这也是寺内内阁的基本政策。

上述有线电信借款中，日本方面的意图，在5月22日的决定事项中差不多都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看日本供应行政费用的意图。5月22日决定的整个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从这个观点去设想的。西原在5月31日给胜田财相的电报中说，为了维持段政权，今年至少必须供应七千万日元，其中分配给黑龙江、吉林的林矿借款三千万日元，吉会铁路预备借款一千万日元，以炼钢厂借款垫付的形式提供的烟酒专卖借款三千万日元，这样中国就能在今年内统一，明后年（大正9年——译者按：原文如此）财政收支平衡。^①林公使也认为对段政府有大量提供行政费用的必要。林认为，为了救济中国财政困难和讨伐南方，段“再借八千万日元乃至一亿日元的外债”是必要的，日本应该提供给它。关于提供的方法，林认为“如款额在一千万日元或二千万日元左右的话，用铁路借款或其它适当的实业借款名义借给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但达到八千万日元或一亿日元这样巨额的话，就不可能用以上方法，还不如光明正大地向四国银行团建议大借款，然后争取尽可能由日本承担为好”。^②正如大正6年强烈抵制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一样，林公使仍然重视同四国银行团的协调。

第二，5月22日决定的各事项中，同有线电信借款一样，日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下，第814—815页。

^② 大正7年4月21日致本野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上，第7页。

本都分别抱有长远目的，企图取得重要权益。黑吉两省林矿（关于矿山，在以后的谈判中，仅以金矿为对象）借款的目的，是中国建立采金局、森林局，依靠日本资金去发展林业和矿业。还有吉会铁路借款，也是由日本供应资金，由中国政府去着手建设。这样，尽管名义上高唱中国政府的权利，实际上是日本在开发南满东部，加强它的势力，如下面第二小节将要探讨的，这是对朝鲜满洲一体化政策的增强。特别是吉会铁路的战略意义，前面已经谈到过了。

再次，第三项关于铁路投资团的设想，出发点是为了抑制列强个别地建设铁路的意图。早在大正6年1月，在内阁会议决定前后，外务省有这样的意见：“各国在中国有根据铁路划分势力范围的趋势，这从保全中国的方针来看是很不好的，为了打破上述趋势，也应该慎重研究这一问题（铺设铁路问题）。”^① 铁路投资团的出现就是这个意见的具体化。日本银行团在这个铁路投资团中占据强有力的地位，当然就意味着在整个中国铁路中日本权利的增大。

日本所关心的长远利益，在第二项炼铁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交还赔款的用途，尽管在棉花、羊毛之外，也举出了调查地质和实业教育，但是同棉花、羊毛比起来，不管在具体化程度方面还是在规模方面，都只有附带的意义。棉花和羊毛是日本最必需的，而且是一向依赖外国的原料，这些东西由日本作技术指导在中国发展生产，对日本的经济当然是很重要的。铁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时日本的炼铁量根本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美国参战后禁止钢材出口，使日本受到了打击。为使这个措施能有所缓和，日本政府同美国进行以船舶换钢铁的谈判，但得不到称心的结果。谈判当事人递信相田（健治郎）在大正6年11月13日内阁会议上发言说：“断然撤销这次谈判，确定我国钢铁自给自足

^① 《有关对华方针大纲决定的具体措施》，载《寺内文书》，443-10。

的根本政策，是今天可以采取的唯一政策。”这番话得到全体阁员的赞同。^① 提出中国官办炼铁厂的设想，以发展在原料上方便得多的中国炼铁业，并把它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其背景就是上述的内阁一致意见：要确立一个钢铁的自给自足体系。

棉花、羊毛和铁是西原对华政策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西原在大正7年2月上旬向寺内提出意见书，对对华政策做了彻底的再探讨。西原首先否定武力合并全中国论，说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关于武力合并满蒙论，虽有可能，但肯定要引起中国关内的反日化，结果会产生下列深刻问题，也不应该搞，加以排斥。他说：“帝国如依赖兵力将满蒙完全占有，帝国必需的铁到哪去找呢？棉花、羊毛也永久求之于美、印、澳洲吗？还有帝国增加国富国力所必需的日本商品市场到哪儿去找呢？”^② 就是说，从根本上决定西原对华政策的，是他认识到中国作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消费市场的必要性，而必须确保的主要原料正是棉花、羊毛和铁。

如果日中之间围绕棉花、羊毛、铁建立上述关系，那就意味着日中经济集团化。此时成为集团化的大障碍，是中国的不统一和银本位币制。日本5月22日决定第四项末尾所说的改革币制，就是对此而言。但这不只是使日中经济集团化圆满进行而已。西原4月25日备忘录里有一项是“交通银行发行和日本货币同一的金纸币”，寺内在一旁批注：“此项宗旨望能坚决实行。”^③ 这个币制改革的前景包括了日中混合使用货币，它本身就是构成日中经济集团的基本因素。它的实现将给日本带来极为巨大的长远利益。

5月22日决定中最后的问题，就是第四项里的改革税制。它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问题而发展。但前面提到的两个项目却约定

① 《田日记》。

② 《寺内文书》，444-5。准确的写作日期不详，寺内收件日期为2月10日。

③ 《寺内文书》，444-7。

好了，一是以烟酒专卖利润为担保，日本提供与炼铁厂有关的借款；同时在日本领导下改革专卖制度；还有，以地租作担保提供与币制改革有关的借款，同时改革地租制度。绝对没有放弃税制改革。参预这些税制改革当然会带来日本势力的扩大，这不用看英国在海关的例子，也是很明白的。

包含在5月22日决定中的第三个意图最具特色，即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统一和加强。日本“援助”的重点，放在有助于加强中国中央集权的统一和增强国力的事业上。凡威胁这个统一和加强的列强个别扩张行动，包括日本在内，都在排斥之列。但是，这里被排斥的列强看到，这些事业都和日本有关，日本企图通过这些活动同中国建立全面的“提携”关系，日本放弃了国际协调路线，企图向全面垄断在华利权的路线转变，因而会进行反抗。此外，在中国已经有了利权关系的日本民间资本，只要还想保持下去，当然也要反抗这种路线。

上面第三个意图及其逻辑上的归宿，最鲜明地表现在炼铁厂问题上。国营炼铁厂的建设，一方面能使日本直接得利，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当然也有巨大的意义。这使它同列强以及日本民间资本的关系上产生了难题。中国于大正3年（1914年）3月通过铁矿暂行办法，实行铁矿国有，阻止外国获取铁矿利权。^①日本同列强一起反对这个措施，要求撤回，并支援大仓组、三井等民间资本，多方设法试图取得铁矿利权。总之，在中国铁矿问题上，中国的统一和列强的个别利权要求是对立的。从这些经过来看，日本承认中国铁矿国有，在这基础之上进行炼铁厂借款，是明显的政策转变；在列强看来，是日本放弃了国际协调，企图垄断中国铁矿和炼铁事业。^②这次政策转变也否定了日本民间资

① 经过情形见大森德子：《关于西原借款——铁与金圆为核心》（载《历史学研究》第419号，1975年4月，第42页）。

② 大正7年6月15日林致后藤电，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下，第847页。

本的活动。大藏省著名文件《有关中国炼铁借款合同的疑点说明要录》指出，当时大仓组试图在凤凰山，三井试图在铜官山等地取得铁矿利权，是不可能实现的，说：“不如签订本借款（炼铁厂借款），一扫过去纠纷，（由炼铁厂）收买中国各地的铁矿和中国人所有的采掘权，一网打尽，谋求实现我国的铁自给方案为好。”^①后来不久，外务省在推行炼铁厂借款上，遇到了来自列强和日本私人资本两方面的强烈抵抗。

在炼铁厂问题上碰到的情况，在铁路投资团设想上也碰到了。前已有若干地方提到，这个设想的目的之一，是要阻止以铁路利权为中心进行分割中国的活动。这个设想如能取得进展，显然有助于促进中国铁路建设，以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化。但是，这个铁路投资团是在日本资本势力下组成的，同炼铁厂问题一样，将被看作是日本侵犯列强铁路权益，垄断中国全部铁路利权，并且同日本的既得利权也发生了抵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铁路投资团的业务范围不包括吉会铁路那样的铁路在内。也就是说，中国的铁路国有统一化只限于中国关内，日本一点也不想为此把它的势力范围满蒙拿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第二小节再加以探讨。

此外，在中国的币制、税制改革，当然也是企图实现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统一和加强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脆弱，主要是由于税制上的地方分权。因此，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不进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是不行的。还有，通过实行金本位以统一币制，可以提高中央政府的国内外地位，这也是不说自明之理。这一点，从袁世凯推行帝制时曾准备采用金本位制来看，^②也可以明白。以上币制和税制改革，由于日本的全面参与，也同列强的利害发生了抵触。

① 大正7年8月，《胜田家文书》，112—12。

② 前引《梦的七十余年》，第184页。

要举出其余项目的話，还有羊毛、棉花、调查地质、振兴实业教育借款以及黑龙江吉林的林业矿业借款。前者并非特别有助于中国的统一，但这些不仅合乎日本的利益，对中国工业化也有帮助，这是很清楚的。这毕竟同二十一条谈判中延长关东州租借期限不一样，日本取得利权，但并不意味着只是中国丧失利权。至于后者（黑吉林矿借款），中国所享受到的利权就很少。这同吉会铁路与铁路投资团之间的关系很相似，日本在满蒙的要求就更高一些。

通过以上叙述，大正7年前半年寺内内阁决心实行的对华政策设想，包括军事“提携”在内，都明白了。寺内内阁希望中国建立一定程度的强大的政府，并希望这个政府同日本之间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为实现这两个目的，对北方派进行了大规模援助。大正6年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是在与国际协调相平行的范围内，推行对中央政府的“援助-提携”政策。但寺内内阁由于丧失了国际协调的最大支柱俄国，又认为“西力东渐”急剧进展，为了对付这个新情况，强迫地推行“援助-提携”政策。这种抛弃国际协调初衷，在一定程度上无视中国意图而强迫推行的“援助-提携”政策，在企图加强日本自己的军事基础的“威压-提携”论者那里，很受欢迎。例如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对寺内内阁前半阶段的对华政策没有起什么作用，却积极活跃地参与了从日中军事协定设想阶段起到西原借款最后阶段的对华政策。这就是说，寺内内阁的政策转变，使双方的政策实际上接近了。

5月底着手实行的设想，如所周知，在寺内内阁结束之前只实现了一部分。^①主要原因是，外务省、横滨正金银行对于大大背离国际协调政策表示反对，大藏省对庞大支出态度消极，私人资本对于不让它向中国扩张极力反对，加以世界大战结束的空气日浓，列强对远东的关心再度高涨，最后，寺内内阁在大米骚动中

^① 详见多田井喜生：《解题》（载《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受到巨大打击，终于使经济“提携”的设想完全停顿。

5月设想中所实现的，只有黑吉林矿借款三千万日元，以及吉会铁路预备借款一千万日元。退还庚款在9月19日的外交调查会上被否决，因此准备同它一起进行的炼铁厂借款，以及振兴中国的棉花、羊毛事业受到挫折，接着它进行的改革币制借款也成为不可能。日中经济“提携”的核心部分以失败而告终。寺内内阁在内阁最后一天（9月28日）通过三项借款，将政府保证的兴业银行债券一亿日元的余额六千万日元，分别由参战借款、山东两铁路预备借款、满蒙四条铁路预备借款各占二千万日元加以瓜分。这三项借款，象参战借款之于日中军事协定，山东和满蒙的铁路预备借款之于二十一条谈判，都是分别着手实现已取得的权益。日本的一部分目的，是为将来的和会作准备，把这三笔借款拿给列强看，这是日本在大战中取得的权益，是日中双方同意之下具体化了的，因此这是合法而正统的。

关于这个内阁最后一天慌慌忙忙通过的借款，有这样一种看法——新内阁虽然认为也有必要，但是希望能突出表现同前内阁的政策一刀两断，所以让寺内内阁自己去解决。^①这个任务分担论至少在田中义一身上是适当的。根据西原日记，由于山东、满蒙铁路预备借款一时陷于很难成立的危局，西原在9月26日要求田中予以解决。^②9月27日山县和原敬决定让田中担任陆相，^③从而原内阁全部组成。在天皇特任式以前，让不让这三笔借款成立，是取决于田中的判断的。

原敬新内阁对华政策的转变已众所周知。^④新内阁改变对北方的援助，争取“南北妥协”，抑制政治借款，决心实现外务省的外交一元化。田中陆相对这种转变不加反对，甚至是合作的。西原

① 《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7—38页。

② 前引《梦的七十余年》，第204页。

③ 《原敬日记》，大正7年9月27日（第5卷，第15页）。

④ 三谷论文有出色论述。

在这以前担心田中的态度变化，在新内阁成立那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访问田中中将，对将来的日中关系需要精神上的合作团结。我和他说定对这一点的互相了解必须负责实行，并祝贺他就任。”^①田中的“豹变”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寺内内阁时期的陆军省军务局长奈良武次，晚年在回忆里批评田中的对华政策道：“他好象什么事都能随机应变，可惜我从田中男爵那里找不到一定的大方针。”^②

从大战中到原内阁，促使田中转变其对华政策的最大原因，不消说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是，如后所述，形势的变化并不能促使所有的人物都能同样转变政策。因此，促使田中转变政策的条件，必须从田中的大战期间的政策里去找。西原和奈良对田中的批评，一方面也说明他们预料到了田中的转变。

大战期间的田中对华政策，在几个时间点上，被称为“威压-提携”政策。但绝非一贯如此。田中在袁世凯帝制问题初期（大正4年秋）是主张“援助-提携”政策的，在袁世凯死后（大正5年6月）和围绕参战问题的中国混乱时期（大正6年5—7月），他是主张“南北妥协”或是静观形势的。这期间，田中一贯所持的是中国客体观。就是说，彻底利用中国作为日本加强军力乃至国力的手段。这就是田中所认为应有的对华政策。因此，在田中看来，像山县、寺内那样，坚持中国的统一和一定程度上的加强，甚至坚持日中“提携”，不过是妨碍上述合理政策的因素。原敬的对华政策倒是同田中接近的。已如前述，原主张中国不必统一和加强，中国国内对立有益无害，这一方面是从国际协调的观点出发，同时也是以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同中国的密切关系也能自立这样充满信心的中国客体观为背景的。

对华政策，如果象田中那样，完全从加强日本国力的观点去

^① 前引《梦的七十余年》，第204页。

^② 昭和14年6月14日谈话，载《田中文书》，440。

设想，其他方面都没有原则可循的话，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反应就会是很敏锐的。例如上面第2小节所举大正5年10月宇垣的《关于对华政策之我见》里，预言大战时期的“威压”将改为大战后的“援助”。还有我们在那里推测的，宇垣认为日本的行动准则应当是列强的世界行动准则“弱肉强食”。如果是这样，在战后，露骨的侵略好歹已在全世界被否定，和平发展经济形成一致协议的时候，违反这个新准则就会在全世界被孤立起来，这对加强国力就不会是好事了。这样的推测，不仅对于宇垣，对田中当然也是适用的。^①

比较起来，“援助-提携”论者转变政策要困难一些。因为他们光是担心日本的脆弱性，即使国际协调不可避免，也不能不继续倾向于某种形式上的日中“提携”。寺内在大战结束后的大正7年12月8日外交调查会上说：“日中两国的关系密切，情况特殊，……从领土接壤的关系来看，本来就不应该同其他国家一样看待。”^②这个事实说明寺内转变政策的困难性。

对于比寺内更少考虑国际协调的彻底的“援助-提携”论者来说，转变更为困难。前面提到西原对田中强调的日中团结，就是例子。还有坂西在大正8年4月30日给寺内写信说：“我们陆军的对外发展是这样没有出息吗？！徒然令人愤慨……。”^③坂西6月11日给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田雅太郎打电报说：“当此时，日本如果不改变在对华问题上同欧美专讲协调的政策，毅然决然首先考虑日中特殊关系，使中国前途的危险能防患于未然，则我坚信日本的将来也难免遇到危险。”^④坂西在这以后，致力于培训作为寺内

① 宇垣政策的转变不那么明显。但大战结束后不久，从《宇垣日记》看他对于对华政策的强硬姿态就消失了。还有，大正9年秋天他写道：由于日本“暂时被封锁在国联里”，不能动用武力，目前必须通过“和平手段”（第228页）。

② 小林龙夫编：《翠雨庄日记》（1966年，原书房），第341页。

③ 《寺内文书》，24—17。

④ 大正8年6月11日坂西致寺内信件，同上书，27—18。

内阁“援助-提携”政策成果之一的中国参战军三个师，^①这三个师在大正9年直皖战争中崩溃四散之后，他还继续鼓吹“援助-提携”政策。^②

这里很有趣味的是，坂西的两个主张，包括前述给福田的电报，是向上原派提出的，要求他们合作。^③不仅如此，坂西把参战军说成是“蒙阁下（指上原）的特别关怀、指导、帮助，仅仅树立了根基，这是日中两国军事提携事业的一端”。^④从这一点可以推测，上原派具有同坂西主张相近的一面。即使在大战时期，上原派对日中“提携”的意向尽管不如寺内，但比起田中来更加一贯坚持。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宇都宫意见书，二十一条谈判时青木把第五项作为最重要项目，町田在袁世凯帝制问题初期的主张等等，都是例子。上原派不像山县、寺内那样强烈地害怕日本的脆弱性。但是上原派对欧美的反感、同欧美对立的认识，远比田中强烈。^⑤上原派之所以对日中“提携”论一贯比较坚持，就是这个缘故。上原派这样专门注视同欧美对立的问题，归根到底可能同他们只能依据军令（即参谋本部。——译者）系统行事有密切关系。

从以上寺内、西原、坂西等的“援助-提携”论者和上原派的对比中也可以知道，积极负责大战前后的对华政策转变的，是田中。同大战时期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和山县、寺内从根本上担心西力东渐而拟定的对华政策相比，田中鼓吹的对华政策是要从这种担心中解放出来。战后对华政策的转变，从田中来说，不过是

① 大正9年8月22日坂西致上原信件，载《上原文书》，86-3，第380页。

② 例如大正10年1月1日坂西致上原信件，同上书，86-4，第381页。

③ 同②注及上述①注中的信件。

④ 同①注中的信件。

⑤ 关于上原派的这种认识，参见大正10年12月20日田中国重（鹿儿岛出身，上原派）致参谋次长菊池慎之助的信件，载《上原文书》，59-6，第258—259页。他对欧美的印象是，把欧美人看作人种相异、不能相容的“敌人”；田中对欧美的印象，全面地看来，比较近似于把他们看成是“竞争者”。

这种对华政策的“自由化”的一个过程而已。而田中的政策，不仅为陆军所接受，特别是在大隈内阁时期，也为政府所接受，这就具备了转变的前提条件。

以上本节第一小节，探讨了以寺内的“援助-提携”政策为中心的大战时期的对华政策。在下述第二小节中，将以同“援助-提携”政策相适应的寺内的朝鲜满洲一体化政策为中心，联系对华政策，探讨日本在大战时期的满洲经营政策。

译自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163—234页。

郑基译 赵明杰校

瞿秋白与彭述之 论中国革命问题

Л·捷柳辛

1927年3月，在武汉出版了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的一本小册子，题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①作者公开地、尖锐地批判了彭述之的观点，实际上批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立场。他在小册子里剖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提出了关于革命的敌人和同盟者，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分析了民族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

当时离蒋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瞿秋白阐述他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时，仍然充满着乐观情绪，仿佛胜利已经在望，而为了取得胜利，当时必须制定正确的策略并付出巨大的努力。

革命地区的扩大，革命从“困在广东”发展到全国规模，预示着革命将取得进一步的成就。许多地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积极开展，被看作是全国性的普遍革命高潮到来的证明。数量上的成就被理解和评价为质量上的收获。由于战胜敌人而举行的庆功会，在革命军所到之处群众举行的大会，以及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掩盖了事情的真象，妨碍了人们对北伐胜利的真正原因、对革命缺乏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取得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同时，

^①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莫斯科图书馆）（1928年版）。

革命阵营中形成的分裂，两个力求独揽大权的北伐司令部的出现，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期限上的意见分歧——这一切证明革命已进入自身发展的最复杂、最困难的阶段。革命刹车了，它的车轮空转着。共产党员们试图加速革命的运动，促使革命脱离原先的轨道。有些共产党员以为，客观因素有利于革命向更高阶段转变，一切仅只取决于意志和正确的策略。于是在策略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也并不是偶然的。在论战的过程中，双方互相揭发，指责对方的过失，其中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

瞿秋白的小册子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阐述业已形成的局势的特点，制定有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阵地、加速革命向最有利于国内劳动群众的方向发展的政策。

他的对手彭述之也提出了这样的任务。1927年6月，彭述之在武汉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小册子。^①作者承认中国革命遇到了最严重的危机，但他对中国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是抱乐观态度的。

可见，在今后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问题上，瞿秋白和彭述之的立场是相同的，即革命的胜利可保证中国转向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当时，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尽管在策略问题和具体政策问题上有着许多尖锐的意见分歧，但他们都相信能够把民族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几乎人人都怀着一种革命的急躁心情。中国共产党员们觉得，社会主义已经来到大门口了，只要迅速敞开大门，十月革命就会继俄国之后胜利地进入他们的屋子。反革命明明在共产党员的头上举起血淋淋的斧子，而他们却还对光明的未来满怀信心，恨不能胜利明日就到来。

这两位政治家在自己的小册子里，都力求从理论上论证中国革命发展中新的非资本主义阶段来临的可能性。其中主要之点是：

^① 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莫斯科图书馆）（1928年版）。

一、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二、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共产党的两位著名理论家对中国社会持何种观点。大家知道，关于中国的结构问题，关于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乃是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中共其他领导人研究的课题。瞿秋白根据他自己积累的经验 and 进行的理论研究，试图阐明他对这一课题的观点。彭述之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两位作者的意见是一致的。按彭述之的看法，帝国主义已无孔不入地渗入到国家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瞿秋白指出，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实际上，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例如，瞿秋白和彭述之都指出外国银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帝国主义者借助于银行遏止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彭述之直截了当地把英国汇丰银行叫作“中国经济皇帝”，而瞿秋白则认为这个银行是一个核心，国家的金融和经济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转动。

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是军阀混战的根源，是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即国家谋求独立发展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对于这一点，瞿秋白和彭述之都不怀疑。

彭述之分析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经济后果时，得出如下的结论：一、国家的封建经济逐渐遭到破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经济地位恶化到了极点；他们更加贫困，没有工作，无以为生；他们不能不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二、帝国主义在封建经济的废墟上已经建立起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不满于自身处境的工人阶级；出现了客观上与帝国主义垄断经济相冲突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三、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帝国主义挑起的军阀连年混战，小资产阶级更加贫困，因而不能不寻找出路；四、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因此，中国人民群众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决

心也越来越加强。

按彭述之的意见，这一切就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

瞿秋白在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时着重指出，在中国，阶级形成的过程尚未完成。彭述之也指出各阶级之间的界线是不清楚、不明确的。他认为，革命加速了各阶级的自决过程，即加速了显示和区分阶级利益的过程。^①瞿秋白把中国社会分成如下范畴：一、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二、贵族地主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五、处于分化过程中的农民；六、流氓无产阶级；七、无产阶级。

彭述之的划分法也是类似的，但他认为应当把“知识分子阶级”划作特殊的社会集团。

由于当时在国民党各界普遍存在着一种意见，认为在中国根本没有资产阶级，所以彭述之认为必须驳斥这种意见，指出它的荒谬。瞿秋白和彭述之都认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势力。

瞿秋白认为，运用官僚机构、实行土地剥削、放高利贷、进行政治投机、放债、挑起战争、进行掠夺——这一切是官僚买办阶级（包括军阀在内）聚集财富和扩张势力的主要手段。有人认为，官僚买办阶级投资于工业，从而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对于这种意见，瞿秋白是不能同意的。他认为，虽然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投资于工业，但这不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内容。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互相搏斗，但从客观上着眼，就其基础而言，他们仍是一种反革命势力。

买办资产阶级正在演变，分化，从中划分出民族资产阶级。瞿秋白和彭述之特别注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统一

^① 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政治顾问中也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在中国没有严格确定的阶级，而只有“阶级的轮廓”。

战线的策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瞿秋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首先是轻工业，而轻工业的发展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抑制的。

瞿秋白认为，革命爆发前，中国民族资本处于从属地位。外国资本大大阻碍了它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亦即工商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非常软弱，而其政治态度是互相矛盾的（从革命到妥协，甚至到反革命），是动摇的。它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可能变成买办资产阶级。

辛亥革命前，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振兴工业，推翻清朝。革命之后，它转而赞成立宪政体。

在“五四”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了抵制外货的要求，赞成恢复国家的主权、建立国内的和平和秩序。

瞿秋白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但不赞成打倒帝国主义，它主张资产阶级的革新，喜欢改良主义方法。它的策略是利用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①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1925年“五卅”运动初期，资产阶级活跃起来。随后，它又害怕了。北伐开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赞成建立军事政权，赞成通过政党管理国家，赞成在劳资之间实行强制调停（即仲裁制度），赞成修改不平等条约。戴季陶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者。民族资产阶级的危险性在于它把民族改良主义带进革命，而不在于它是“纯粹的反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扩大和彻底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军人暴力政权是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意的。从理论上讲，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对此，彭述之的论点也大致相同。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处处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

^①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53页。

阶级的利益有矛盾。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赞成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赞成反对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赞成反对军阀战争和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的斗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弱点。第一、民族资产阶级人数太少。它在经济上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它与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无产阶级起来夺取革命领导权时，民族资产阶级就准备向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和妥协。第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是形形色色的。它的大部分是刚刚从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中脱离出来的，因此它在两个营垒之间穷于应付。第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衰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兴起的时期才产生的。彭述之写道：“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革命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必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必定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以便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①彭述之着重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是不会彻底支持革命的，多半要半途而废。它的代表人物蒋介石中途叛变革命，这不是偶然的。

按彭述之的意见，“现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反革命阶级”。^②其实，它从来就不愿意真革命，只是为“改良”而斗争。它只考虑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但不考虑根本改变的问题。然而，工人和农民却要求真正的革命，要占居革命的领导地位，因此，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尽管蒋介石提出了“保护工农利益”、改善工人生活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在着手实行民族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蒋介石本人也必将变成中国的“小墨索里尼”。彭述之得出的结论是：“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死敌，如果不彻底消灭它，中国革命的前途将极为危险。”^③

① 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56页。

② 同上，第59页。

③ 同上，第63—64页。

瞿秋白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绝对的、直截了当的。这是因为他的小册子是在四月政变前写的。瞿秋白同彭述之一样，反对与民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力求掌握革命领导权是为了要与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实行妥协。然而，他认为也不能完全不考虑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和帝国主义者协议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取得国家的主权。但是，这种希望注定不能实现。关于“国家独立”的希望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民族资产阶级必将使中国处于世界资产阶级控制之下，因为它是软弱无力的，没有“友好国家”的怜恤，它就不能生存。中国必将成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投资场所。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将取代军阀（地主、官僚）地位，变成帝国主义的“政治买办”。到头来，中国革命将遭受失败。世界革命也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因为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必将走上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会加强世界资本主义。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目前仍能参加革命，它还留在革命的阵营中。瞿秋白虽然赞成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赞成和它进行无情的斗争，但认为这个阶级的内部矛盾尚有可利用之处。他提出的方针是要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坚决制止其对革命领导权的图谋。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瞿秋白与彭述之两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瞿秋白在分析城市小资产阶级（他把它分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两部分）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在这个阶级当中，中世纪残余、行会习气和厌恶洋人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小商贩害怕革命的发展，他们易于接受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改良主义口号，愿意参加合股的商号。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情绪日益变得急进，从中分化出革命部分，汪精卫就是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表达者。通常，小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救星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但是小资产阶级是受夹板气的：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在迫害它；另一方面，它又害怕工匠、学徒这些“赤色魔鬼”，认为他们的要求是过分的。小资产阶级上层

表现得摇摆不定。想要拉它前进一步，使它参加反对买办和官僚的斗争，想要使它摆脱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得花很大的气力。它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贫苦下层，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有些人担心，满足小资产阶级下层，即工匠、学徒、店员的要求，会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瞿秋白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按照彭述之的意见，作坊和店铺的老板不属于小资产阶级。按他的定义，这是小生产所有者。在城市里，小商贩、手工业者都属于这个范畴。和瞿秋白一样，彭述之也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摇摆不定的。可是它的作用是重要的，因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刻，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而另一方面，它又倾向于妥协。小资产阶级认为农民提出分配土地的要求是过分的，把它叫作“越轨行为”。小资产阶级不懂得，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和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条件，以及在城乡建立民主政权，对小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彭述之承认，店员、帮工和学徒在革命高潮时期往往提出过分的要求，但他认为这是店铺和作坊的老板自作自受，因为他们付给雇工的工资过于微薄。小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洲小资产阶级，它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无产阶级必须审慎地对待小资产阶级，必须考虑它的阶级利益。

在二十年代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提出了知识分子及其在争取国家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关于知识界的一种普遍的意见是：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它所具有的一切阶级特征，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也不同于无产阶级。

关于知识界，瞿秋白写道：不能把知识界看作是一个单独的阶级。相反，彭述之却认为，专门划出这个社会集团是必要的。

按彭述之的意见，如果说资产阶级国家中的知识分子，除少数外，都是反革命的，那么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

数具有浪漫主义的革命情绪。大学生和中小学校的教员，尤其如此。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占有重要的地位，执行着特殊的使命。知识分子也在分化。知识分子既可以为革命服务，也可以为反革命服务。他们动摇不定，要看哪一方的力量占上风，有时从革命方面转到反革命方面，有时则相反。

两位作者都否认流氓无产阶级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匪患是帝国主义造成的特殊现象。除土匪以外，彭述之把士兵和国内不下于一千万的无业游民，也都列入这个范畴。

中国不仅是一个“匪患严重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无业游民众多的国家”。士兵、无业游民和土匪同属一个社会集团。对于他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吃饱饭。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们不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往往认敌为友。但是，考虑到他们有反饥饿、反富豪的心情，所以在革命中可加以利用。他们能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活动，他们能成为革命军队的骨干。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的作用无疑问地将会下降。而且，由于革命不能立刻满足他们的要求，加之反动派可以收买他们的头目，所以在某一时机，流氓将会给革命带来危险。大部分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军官，可以很容易地欺骗他们，驱使他们去反对工农。因此，工人阶级不应过于信赖流氓，但同时却应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竭力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瞿秋白也对流氓阶层的形成作了阐述。除了士兵、土匪和无业游民外，他还把那些为帝国主义侵华效劳的政客也列入流氓阶层。破产的无地农民是流氓无产阶级的补充来源。道教是他们的宗教。中国地方上的匪患，不是新的现象。士兵就是从土匪即破产的农民中招募来的。

流氓也有从知识分子当中分化出来的，有些破产的知识分子堕落成二流子和寄生虫。这个阶层的人物得不到农民的同情。谁都知道，农民是多么看不起孙中山，他们讥笑地问道，难道这位小小的医生能当上皇帝或内阁总理？

但恰恰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成了革命的组织者。不消说，这些破了产的绅士是带着儒家思想来到革命阵营的。这是一些书生气十足的、诸葛亮式的军师。他们给革命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因为他们与其说是搞政治的，不如说是玩弄政治权术的。瞿秋白认为，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也有，这对党的前途是危险的。

瞿秋白把城市流氓叫作无赖。中国的城市从来就是无业游民的避难所，他们常常给富豪和官吏做事。城市的流氓加入了秘密会社，参加了反对当局的活动。他们的作用是互相矛盾的。他们往往成为反动派手中的驯服工具。

他们客观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为此，必须改变他们的组织。谁害怕土匪和流氓玷污“科学的革命党”，谁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

瞿秋白详尽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他写道，如果说，农民在成为士兵之前经历过长期的“土匪生活”，那么，大部分无产者在成为工人之前经历过长期的“流氓生活”。上海工人大都加入了秘密组织青红帮。瞿秋白写道：“在上海社会里，凡属‘社会下层’的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懂得流氓的某些规矩，并与流氓组织保持联系，否则，他们一天也混不下去。这似乎是一条普遍规律。因此，在工人工会里还保存着流氓的余毒，例如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搞什么政治，填饱肚子就行了’。”^①瞿秋白认为，必须同流氓做斗争，并要利用这些秘密组织，而不应像彭述之所提议的那样，对它们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

按瞿秋白的说法，中国无产阶级仍处于童年阶段，还与小农、小商保持着联系，他们之间的联接是一种家族关系。一家中弟弟是工人，哥哥是佃户，而叔叔开个小铺子——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

瞿秋白指出工厂里的落后关系：工人之上有工头（工长、领

^①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61页。

班),资本家委托工头监管工人。无产阶级人数本来就很少,只占居民的百分之二,工人中半数以上又是女工和童工。但是这些弱点并不妨碍无产阶级成为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并不妨碍它进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具有重要的长处:第一、中国无产阶级是本民族最彻底的革命阶级;第二、它有强大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第三、它得到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正因为如此,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能够争得革命领导权。在这一点上,瞿秋白与彭述之进行论争,反驳他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是民族革命领导者的论点,不同意他的一笔抹煞资产阶级作用的论点。

瞿秋白把这种见解叫作错误观点,并把它看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如果说,无产阶级是当然的革命领导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毫不起作用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必要争夺领导权了。瞿秋白指责彭述之的论点是机会主义的,因为他把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它是天生的。其实,我们用心地阅读一下彭述之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的论述与瞿秋白的看法区别不大。^①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两位作者的著作中都包含有对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的分析。在这之前,陈独秀、毛泽东以及一些国民党活

^① 彭述之正是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他把无产阶级看作革命的先锋队,看作唯一能埋葬帝国主义的阶级。和瞿秋白一样,彭述之也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很大的长处:它比资产阶级人数多,遍及全国各地,比西欧无产阶级遭受残酷百倍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在政治方面,它简直是奴隶”。无产阶级具有特殊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性。在中国无产阶级中,没有产生改良主义思想的土壤。它可吸取国际的经验和得到国际的援助。它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国内有农民和半无产阶级这样强大的同盟者。彭述之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客观上很容易落到它的手中。”彭述之在谈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弱点时指出,无产阶级年龄较轻,因此,在中国无产阶级中,宗法思想、流氓习气和性格是根深蒂固的。农民、手工业者,乃至流氓的意识,影响着工人的意识。加之,中国工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中大多数是文盲。这有碍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但不影响它起先锋队的作用,因此,关于它不能领导革命的意见是错误的。

动家，都曾试图研究清楚农村的社会结构。不认真研究农村阶级成份问题，就不能确定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不能了解这些任务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内容。

瞿秋白把农村居民分成地主和农民。地主由绅士、土豪和劣绅组成。按他的论述，绅士的特征是：占有土地并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绅士可能是官吏，也可能不是官吏，但他们必定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瞿秋白给土豪下的定义是：与农村宗族无关的、不属于绅士范畴的富裕农民。

有人认为，在中国只有资本家，而没有地主——彭述之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他在对地主进行分析时，着重指出了他们不同于欧洲地主的特点。彭述之认为，中国农村的这个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和当地军阀所掌握的剥削农民的工具。中国地主往往同买办和官僚一样，在中国起着反革命的作用。

瞿秋白认为农村经济是小农经济，宗族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民大都苦于缺少土地。辛亥革命之后，农民破产的过程加剧了，从而导致农村革命情绪的增长。瞿秋白把农民划分为半无产阶级的佃农和雇农大众，他认为雇农大众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们拥护“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赞成土地革命，赞成同大地主、官僚、买办、军阀以及土豪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土地归农民，土地国有化，在乡村建立农民政权，实行统一税。这些要求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民主主义性质的。

彭述之对农民所作的评述，大都与瞿秋白著作中的内容相同。他也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性和斗争到底的决心。他认为，中国农民与西欧农民的不同之点在于，他们更接近于无产阶级，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因为他们赞成消灭土地私有制。因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伟大的，而为了起到自己的伟大作用，农民应当接受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

中国的农民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为了反对军阀和贪官污吏剥削而开展抗捐运动，这一运动的政治性质是有限的；二、

为了反对地主和商业资本剥削而开展抗租和减息运动，这一运动具有经济性质和阶级性质；三、开展夺取武器、夺取政权、夺取土地的斗争。

二十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北部和东南部，运动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在湘、鄂、赣、粤等省，运动达到了第三阶段。在湘、鄂两省，农民掌握了武装和政权，并要求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彭述之写道：“这一切可证明，中国革命确实达到了最深刻的阶段——农民革命、土地革命的阶段。”^①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封建制度都在崩溃之中。^②

同时，彭述之还指出，这个伟大的农民革命产生了一些对整个革命不利的现象。他认为可列入这种不利的现象的是那种蒙昧无知的平均主义做法——用拮据的办法分配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以及他们的种籽、牲畜、钱、家具和器皿。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混乱。彭述之承认无政府状态不利于革命，但他也批评了那些谴责这种现象的负责人（即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因为他们没有阐明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彭述之写道，平均主义原则是一种反动思想，共产党员必须加以反对。但是不能不考虑到，贫农和无地的贫民是拥护这个原则的。在革命进程中创立的农民协会里，他们的这种情绪占了上风，加之在某些农村，农会领导权落入反动分子和流氓的手中。这种过错的责任不在农民，而在对农民问题没有制定明确立场和坚定政策的革命党和革命政府。^③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则冷眼观望，充当观察家和批评家。这也迫使农民起来搞自发的行动。

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应当对农民运动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它是实际领导农民运动的。但是，正式颁布土地法、农村政权法

① 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170页。

② 必须指出，彭述之对农民运动水平的过高估计，是与毛泽东的估计相同的。彭述之实际上是转述了后者关于湖南的报告。

③ 即拖延通过土地法的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

等等，乃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职责。

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农民问题的适当解决。这里可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承认农民对土地和政权的要求是正当的，并实现他们的要求；二、坚决否定农民问题，完全不承认农民运动，并且像张作霖、蒋介石、李济深和许克祥那样，对农民进行血腥迫害和镇压。

采取第二种办法，无异于自己给自己宣判死刑。

彭述之认为，革命党和革命政府应当坚决采取第一种办法，承认农民的要求，并规定实现这些要求的阶段。

要彻底解决问题，即实行土地国有，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目前，必须没收大地主、土豪和劣绅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有人担心分配土地将使政府丧失经费来源，彭述之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但是，必须事先摧毁旧政权，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政权。为此，必须武装农民。彭述之批评了那些担心武装农民会导致农村混乱的人。革命者不应害怕农民获得武器，以反对地主。谁不同意这一点，客观上他就成了地主的代言人。^①

瞿秋白和彭述之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不是以科学的、综合性的材料为依据的。当时也没有这种材料。有的只是一些个别地区的重点查询材料、西欧作者的书籍和文章，以及亲自考察的见闻和到过农村的同志的讲述。两位小册子的作者并不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他们援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些著作，竭力采用他们的论断来叙述和确定中国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和现象，因而有时是有的放矢，有时则是无的放矢。小册子里惹人注目的是，“阶级”这个术语到处随意使用，而根本没有弄清楚“阶级”这个概念的社会经济实质。

^① 实际上，彭述之在其小册子中叙述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苛求我们的作者，要求他们的小册子的水平要有多高，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骨干的一般水平，甚至可以说，还略微高于这个水平。尽管瞿秋白和彭述之的著作中有种种弱点和不足之处，但他们还是比较确切地提供了相当正确的概念，使人能了解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各个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应该指出，他们的结论不明确，即在各个阶级之间所划的界限含糊不清。正因为如此，他们竭力把官吏、买办、地主贵族和军阀归并到一个阶级集团之内。而且，在确定这个或那个社会集团的阶级属性时，动辄使用“半”这个字眼。同时，他们在叙述各个社会集团时力图避免给予完善的形象，可见作者认为这些社会集团具有过渡的、变化不定的性质。

作者对生产关系的实质，尤其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实质，难以作出确切的定义。我们看到作者为生产关系作出这样一些定义，如“封建的”、“农奴制的”、“封建宗族的”（这最后一个术语比其它术语更常用）。这是因为作者使用那些研究西欧历史过程中所拟定和形成的术语时，没有在中国实际生活中找到相应的等值术语。此外，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地主往往的确是官吏和商业高利贷者，有时也是工厂主。中国的军阀常常也是土地占有者。

因此，在确定阶级结构时，客观上是有困难的。必须考虑到，这两部著作是在紧张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写成的。当时，查明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军阀的政治态度，并预见到他们的行动方针，要比弄清各居民集团的社会经济实质更为重要。不过，不懂得和不理解各种政治现象的社会经济实质，自然要对制定正确策略路线所必需的分析结果，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两位作者就夸大了帝国主义对国家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农村关系方面的影响范围。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错误的估价。

还可以指出其他许多缺点，但是总的说来，小册子的两位作者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颇为完整和相近的概念。从瞿秋白

和彭述之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何等五花八门，这个社会相互联系又是何等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中国社会的大部分还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发展阶段，在这个社会中，封建宗法家族关系还保持着自己的势力和权能。一方面，在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银行和公司的大楼（金融资本的象征）高耸云霄，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的穷乡僻壤，人们却继续保存着许多世纪以前形成的那种制度。他们描绘出来的草图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其中没有对革命军作出评述。早在北伐开始之前，中共领导人就担心军队会“压制”人民群众的运动，军事因素将比政治因素产生更大的控制作用。遗憾的是，这种担心的情况果然出现了。虽然国民党的首领一再规劝军队必须顺从党的意志，但军队的将领仍然独断专行，他们脱离党的领导的情况，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形式上，军队不是某个阶级利益的直接表达者。愚昧无知的士兵群众俯首听命于军官和将领，而后者总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反动势力可以依靠军队来对付革命力量，而工人和农民却没有军队。

瞿秋白和彭述之在各自的著作中，对革命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军队的政治态度这一确定不移的事实，作了抽象的概括。那些正式支持国民党的军队指挥官，都是根据某个阶级的利益来确定自己的行动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就比较容易预料。但是，除了阶级利益外，主要的一些派别还具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地域的、宗法的、个人的利益。他们形成了一些集团，组成了一些不尽是出于纯粹阶级立场考虑的派系。这些集团和派系把本来已经复杂的政治局势搞得更加纷乱不堪了。

看来，小册子的两位作者通过分析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复杂、漫长而又艰巨的道路。恰恰相反，无论是瞿秋白，还是彭述之，都不怀疑中国将坚定地沿着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认为社会主义的前景是唯一可能的，而且还认为它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对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不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坚定信念，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是有代表性的。这同孙中山的学说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总是强调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赞成社会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的实现乃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左派首领，在自己的演说中也谴责资本主义，表示同情社会主义。

这种反帝国主义、亲社会主义情绪之所以高涨，是因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中国革命以有效的支援，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反对中国革命。不消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确认向社会主义过渡乃是革命发展的现实的、唯一可能的道路。过高地估计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也助长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在民族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之间，不应有大的间隔；加速推动事态的发展，向社会主义彼岸疾驰猛进，就可以而且定能排除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凡是想提示人们注意中国社会经济落后、中国政治上不开展、缺乏物质上的先决条件以及工农没有为社会主义坚决战斗做好准备的人，他们的论据统统受到了批驳，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1927年1月，彭述之在《响导》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借口中国的民族特殊性、中国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因而认为难以向社会主义过渡。彭述之证明，农民从革命一开始，就与工人阶级携手并进，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反帝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革命不能局限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而应马上沿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推进。

彭述之认为，下列五项原则是中国革命的基础：

- “一、中国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
- 二、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
- 三、中国的革命应该拥护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到底；
- 四、完全承认国内一切民族平等；

五、永远的革命。”^①

1927年3月，为了反对右派势力的威胁（右派叫嚷什么“赤色危险”、“投靠苏俄”），彭述之再次提出这一论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总革命的一部分，因而中国革命不可能是纯粹资本主义类型的民族革命。革命应当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基础，应当为中国大多数居民——工人和农民服务，而不应当为资本主义奠定基础。这对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害关系。

彭述之写道：“工人农民是中国民族的精华，是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先锋军，是革命的主人翁。离开了工人农民的利益，反对工人农民的利益，便是绝对的反革命，是根本毁坏革命。”^② 彭述之强调指出，那些反对苏联的，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危害革命。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作者，对革命发展前途问题的看法是明确的。瞿秋白写道，当前中国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军阀的统治，也就是推翻地主、买办和官僚（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政权。因此，目前“中国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主要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革命。”^③ 军阀的统治，这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小地主（土豪、绅士）的阶级统治。

瞿秋白写道，中国革命的许多特点很像1905年的俄国革命。其不同之处，就是中国革命并不完全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是部分地具有这种性质，因为中国的农民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阶级、官僚、买办、土豪、军阀统治的反帝革命。瞿秋白着重指出：“况且，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④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乃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具有社会主

① 《响导》，1927年，第184期，第1951页。

② 《响导》，1927年，第190期，第2042页。

③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82页。

④ 同上，第84页。

义革命的性质，即要从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次性革命。瞿秋白认为，这场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又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又真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场革命的胜利，归根到底将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瞿秋白在评论彭述之1924年提出的论点^①时断言，民族革命的胜利是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如果无产阶级不全力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那革命就不能胜利，因而也不能着手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瞿秋白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双重性质，即资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指出，在革命过程中民主制将与革命专政结合起来。上面已经说过，瞿秋白批评了彭述之关于“无产阶级是当然的革命领导者”的意见，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把领导权拱手交给民族资产阶级。他断言，革命势必要越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革命必然为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铺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可能发展“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是错误的。按他的意见，在民族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定将与苏联结成经济联盟，并加入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彭述之的小册子《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也包含了类似的想法。彭述之的依据是，“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强大支柱”，“中国是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彼此争斗的最后场所”。^②因此，中国革命将给世界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中国革命的特点如下：第一，中国革命正在消灭封建势力的残余，从而也必将消灭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统治的工具，必将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第二、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必定加速其他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朝鲜、安南（今越南。——译者）、爪哇、泰国、缅甸、印度以及南海一些岛国的解放运动；第三、中国是苏俄的近邻，这必将使中国革

^① 彭述之于1924年曾写道，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全力领导民族革命，并要把它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则准备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引自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85页）。

^② 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121页。

命易于取得胜利。

“苏联的援助起着特殊的作用。中国革命的发展，对苏俄社会主义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由于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中国革命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范围……中国革命客观上不能不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①

但是，彭述之认为，革命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北伐时期，革命是在双重领导下进行的：军事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这一时期，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进行得特别激烈。工人以及工人领导下的农民，在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已经越出资产阶级所规定的政治和社会范围，客观上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

1927年，“四一二政变”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新阶段开始的转变关头，资产阶级成了帝国主义的新工具。

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一、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结成联盟，对于农民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宣战；二、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和建立农民政权的农民革命，日益扩大。

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起着领导作用。革命在其自身发展中，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彭述之在谈到革命后国家的未来发展时，不仅强调了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而且强调了其现实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软弱无力的。由此他得出结论，革命者不应只限于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关税权。必须要求将铁路运输和所有交通工具全部收归国有，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军阀的大量私有财产，没收属于帝

^① 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124—125页。

国主义者的大企业（矿山和银行）。还必须努力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一旦上述要求能够实现，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有了可能。

彭述之附带说明，在这个阶段，要解决私人资本主义的经营问题，要发挥资本主义企业的作用，但是要把它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人认为，这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彭述之反驳说，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彭述之也批驳了另一些人的反动观点，他们认为在中国可以直接在农村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是农民的国家。

按彭述之的意见，要想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必须逐步地没收大型企业、银行，建立国家的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管理机构，鼓励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组织，同时以适当的方式控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彭述之认为，虽然经济建设要比政治建设困难一些，但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经济建设。革命者应该“学会经商”，研究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实行累进税，发展生产。

不难看出，就问题的实质而言，瞿秋白和彭述之之间并没有多大分歧。他们两人都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赞成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铲除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地位，要求改变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成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民族的利益。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独占革命领导权的要求而已。他们提出的方针是抽象的，这个方针根本没有考虑国内、首先是革命阵营内阶级力量的现实配置情况。那个时期，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不具备条件。虽说1927年春，无产阶级在上海和汉口采取了英勇的行动，但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组织方面也很差。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以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掌握中国工人阶级的所有队伍，随后几年的经验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得过早，当然也就不能实现了。中

国农民的革命能量，在国内大部分农业地区，都没有发掘出来。而主要的是，军队（那个时期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没有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它指定的道路。

“革命的”煤气毒化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妨碍了他们冷静地考虑、理智地估计业已形成的局势。他们抱着盲目的乐观情绪来估计国内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的配置。他们本来已陷入绝境，却还以为离所憧憬的顶峰只有两步之隔了。

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团团长洛佐夫斯基的困惑不解，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27年春，他了解了局势后惊呼：“这算什么革命，每个将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①

中共领导人（从陈独秀到瞿秋白）打算向左猛拐，把革命亲自抓起来，依靠群众的革命创造性在中国实现“史无前例的”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这种尝试是勇敢而又坚决的。当时，许多人以为，事业的成功就在于胆量。指望勇敢（勇敢、再勇敢），表面看起来是吸引人的、革命的，但与其说它是理智的政治估计的产物，不如说它是一种“革命的空想”。

瞿秋白在他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中，过高地估计了1925年“五卅事件”的意义。当然，这一事件推动了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使它提升到更高的阶段。但是，他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一样，认为这个运动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意义，他没有把运动解释为爱国的行动，而把它说成是阶级斗争的爆发，从而过分地提高了这个运动的社会和政治意义。1927年春，中共领导人做出了不符客观情况的结论。一方面，共产党的敌人掀起了“赤色威胁”的喧嚣，竭力吓唬社会的有产阶层，而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在反击这些进攻的同时，自己也确信运动开始“染上”无产阶级的红色。他们把中国社会某一部分人民族意识的提高，估计为社会意识的重大转变。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1925年“五卅”运动没有

^① 转引自尤里耶夫：《1925—1927年中国革命》（莫斯科1968年版），第489页。

把农民发动起来。当时，还谈不上解决全民族的一般政治问题，人民群众也还没有广泛地发动起来（为此，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措施，而那时，中共并没有这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过早地提出了那种急进的口号，以为这些口号能把劳动群众发动起来，一举解决中国革命的全部任务：全民族的、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和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任务。他们认为，头一阶段的口号，群众已经深深地理解了，现在再重复这些口号已经不够了，必须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实际情况表明，他们这是企图在生荒地上播种。他们觉得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已经不够了，已经不符合新阶段的特点了。

瞿秋白认为，“必须用无产阶级方法去完成民族革命，即用苏维埃方法建立议会形式的人民共和国”。^①他直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历史已把中国置于世界上第二个十月革命（尽管还不是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的地位，就社会发展的速度而言，中国超过了俄国。

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可能性，试图促进革命的进程，企图加速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革命运动，这一切导致了可悲的结果。共产党人遭到了失败，他们从城市长期转入农村，脱离了工业无产阶级，因而不得不寻求拯救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其他道路。左倾冒进使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共产党人从1925—1927年的革命经验中得到了教训，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随后在国内战争时期（1946—1949），都较为谨慎地行事了。他们审慎地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这无疑地有助于他们在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战胜国民党反动派。

译自《中国1925—1927年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г. в Китае》）（莫斯科1928年版），第74—95页。

曾宪权译 陶文钊、邹宁校

^①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158页。

资料

关于孙中山的一份 未发表过的电报^①

C·胡谢伊诺夫

译者按：这是一篇介绍孙中山1920年7月自上海发给莫斯科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电报的短文，发表于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63年第1期。文章首次发表了这份电报全文，为进一步研究孙中山的革命经历，提供了新的史料。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1918年底，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彼得堡宣告成立。它的活动促进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革命联系和兄弟友谊的建立和加强。1920年6月底，在莫斯科召开了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M·加里宁和外交人民委员Г·契切林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说。^②与会代表热情支持苏联人民同中国人民友好的愿望，并于7月5日致电孙中山转全国人民，电报全文如下：

“上海

孙中山先生并转全国人民，以及社会各界、各团体和政党：

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旅居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十

^① 标题为译者所加，原标题为《苏中两国人民革命团结的新文件》。——译者

^② A·H·赫菲茨 (Хефцев)：《十月革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1959年版)，第63页。

万华侨，致电全国同胞：

一、我们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大力支援中国青年为打倒自己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资本主义^①专制制度而进行的革命活动。

二、呼吁全国立即承认在争取自由的共同斗争中领导被压迫人民的工农共和国，同时呼吁我国切切不可协助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俄国。

三、吁请我国派遣官方全权代表团到俄国以建立友好关系。这是对于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容漠视。

四、同时请求尽快采取措施，让自愿回国的旅俄华侨，在提出适当的申请之后，能够随时自由地返回祖国。

谨致谢忱！

以上各条业经代表大会于1920年6月25日在莫斯科通过。

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

刘绍周^②

7月5日于俄国首都莫斯科”

这份电报在中国收到以后，发表在1920年7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上。^③

不久前，我们发现了孙中山致华工代表大会复电的副本。该电是经纽约发给在哥本哈根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驻国外全权代表M·李特维诺夫的。从复电的内容来看，孙中山收到大会电报的时间是1920年7月10日，并立即把它转发公布了。在给旅俄华工代表大会的复电中，孙中山热情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即刘泽荣，时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

^③ 参见Ю. М. 加鲁什扬茨(Гарушянц)：《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载《苏联中国学》1958年第1期第140页。

地赞扬了旅俄华工对于中国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所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和愿望。

下面，我们把孙中山复电的内容首次公诸于世（译自电报英文原稿）。

“哥本哈根

马克西姆·李特维诺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

孙中山代表马素 (Ma Cy)^① 转给我们一份他收到孙中山发来的海底电报。他请求我们把它转发到莫斯科。电文如下：

‘莫斯科

刘泽荣先生：

华工代表大会7月5日莫斯科来电，我于7月10日在上海收悉，旋即向全国公布。但是，我要提请诸位注意，目前中国还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政权操在专制主义者和军阀手中，人民没有自由。还必须进行一次革命以扫除这些权力集团，方能实现各位在电报中所提出的第四项请求。此电因上海电报局拒绝受理，故经由马素先生从纽约转给各位。

孙中山’

1920年7月16日”

译自《亚非人民》杂志（«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3年第1期第72—73页。

曹代伟译 林荫成校

① 马素，旅居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追随国民党的华侨领袖。

沙俄通过修筑东省铁路掠夺我国 东北煤矿资源的几则材料

E·尼鲁斯

(一) 许景澄给俄方的书面声明^① (1896年9月8日)

诸位代表：

在商讨本日签订之合同第六款^②时，诸位请我注意煤的问题。诸位就此所述意见本公使均已知悉。本公使定然向总理衙门禀明此事，力陈务必向公司提供最优惠条件以开采铁路近旁之煤矿。顺颂日祉！

许

1896年9月8日于柏林

(二) 波兹德涅耶夫 (Позднеев) 致齐格列尔 (Циглер, Эмилий Карлович) (1899年1月)

艾米利·卡尔罗维奇阁下：

吉尔什满 (Гиршман) 工程师去年12月28日电告我，他已

① 这是中国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在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后向俄方作出的书面声明，中文原件未查到。——译者

② 该款规定，凡东省铁路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官地无偿提供，民地按价收买，但“开出矿苗处所另议办法”。——译者

到奉天，主要目的是为以确定的形式获准开采煤矿，这是去年夏末他首次赴奉天时谈定的，当时盛京将军曾书面担保向他提供开采煤矿的权利，条件是交纳所采煤价值的百分之五，并每矿交十七两左右银子。

当时还约定，确定形式的条约将在稍晚查明煤产地的状况后签订。据吉尔什满告知，现已确定在两处采煤：一处是大连湾以北七十俄里左右的瓦房店，另一处是辽阳以北二十俄里的烟台附近。

在开采上述地方之前，务必与原先占有这些地方的业主进行结算。据吉尔什满说，在瓦房店没有这样的竞争者。但在烟台，一部分适宜开采的地方却为各式各样的小企业主所占。据说，其中还有那两个英国人，在营口划拨地段时我们就与他们发生过许多麻烦，如今，他们在烟台是托一些中国人出面经营的。没有人在烟台进行正规的开采，而这些被占的地段乃是官地。

为了排除不希望出现的竞争，吉尔什满向盛京将军指出，倘以极不正规的方式滥肆开采地下矿藏，国家从中只能得到很小的收益。

对于我国工程师的请求，盛京将军的回答是，他应允派专人去烟台查究现今的那些企业主的权利，因为据奉天拥有的材料，所有这些人都是擅自开采的。

据吉尔什满说，盛京将军对我们的总的态度是友善的，但看来他担心英国人进行干涉，担心与他们发生纠葛。

(三) 波兹德涅耶夫致齐格列尔 (1899年3月14日)

艾米利·卡尔罗维奇阁下：

今年1月3日(15日)吉尔什满工程师将他草拟的与盛京将军关于开采煤矿的条约草案电告于我。

“盛京将军授权东省铁路公司在若干地方开办采煤工程。为此，中国当局在我们所指出的每一地方划拨长六十里、宽四十里的地段归我们专用，在所划地段任何人无权采煤及进行任何采矿工程；如若我们声明有人侵犯了我们的此种权利，中国政府有义务立即采取措施令该侵犯者离开。在这些地段的矿井、工厂及各种建筑所需土地，以与铁路相同的原则予以划拨。我们有权建筑通往矿井的支线，并将根据专门协定在一定期限内交付矿井所采煤价值的百分之五，每井交付约十七两半银子，如同吉尔什满先生首次赴奉天时书面确定的那样。”

为了加速此事的进展，吉尔什满先生请我向总理衙门提出呈文，请求向盛京将军下达相应的命令。

我确信，如将事情提到总理衙门，后者就会详细查询条约的种种细节，事情就会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因此，我回答吉尔什满先生说，我认为最好是与盛京将军就地了结此事，我并向吉尔什满工程师指出，可将他的条约与阿聂尔特（Аннерт）订的吉林的条约进行比较。

然而，为了加速事情的进展，我经与许景澄商定，向总理衙门提出了一般性的请求，请衙门致电盛京将军，说明尽快结束在瓦房店、烟台及盛京省其余各地的煤矿事宜是可取的。

我的请求得到总理衙门的尊重。总理衙门拍发的电报看来产生了应有的作用，因为今年1月10日（22日）我收到吉尔什满的电报，其中说，已准许他在瓦房店开办工程，至于烟台采煤问题，他将就地与各地段的企业主进行谈判，尔后获得盛京将军的允准。将军关于条约草案的决定将稍待时日再告知吉尔什满先生。倘若这些地段的企业主不同意放弃他们的开采权，吉尔什满将请将军授予我们在现今尚无采矿工程的所有地方专擅经营的权利。据我们这位工程师说，在瓦房店的工程已经开始，对经营煤矿的结果有着极好的展望。

吉尔什满在该电报中还请我协助他解决烟台采煤问题。但由

于在查明占有该处的那些地段的企业主的情况之前，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早，因此，经与许景澄商定，我决定等待吉尔什满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

（四）波兹德涅耶夫致齐格列尔

（1899年5月27日）

艾米利·卡尔罗维奇阁下：

对于先前我关于开采盛京省煤矿问题的呈报，我有幸补充报告如下：

吉尔什满工程师获准在瓦房店采煤之后，迟迟没有得到关于烟台开采权的回复。

同时，他和我都听到这样的消息：在营口成立了一家英国公司，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是英国领事，其目的在于获取辽阳和铁岭附近的采煤权。

还有一点也逐渐清楚了：这家公司假冒其名的那些中国人已在辽阳附近采煤，并正在逐步扩展地盘。

我立即将此事告知了许景澄。根据他的建议，我于2月19日向总理衙门提出一项呈文，关于该项呈文及对此呈文的答复，我已有幸在第十号报告中告诉您了。

我又收到总理衙门的一份公函，这是对上述3月5日（17日）复文的补充。在此公函中总理衙门拒绝给予烟台、铁岭两地的采煤权，理由是根据盛京将军的报告，在上述两地根本没有无主地段。

与此同时，我从财政部办公厅得到通知，由于财政大臣的请求，外交大臣已经训令我国公使协助我获得采煤权，挫败英国公司的企图，我于是将此事妥善告知了我国公使。然而，由于借助许景澄了结此事仍是靠得住的，又由于在外交部给我国公使的训令中有一项很重要的附带说明，即在办理此事时尽可能避免与英

国人发生冲突，所以，我和公使商量后决定，暂且等他就此问题向总理衙门作出声明，眼前则继续通过许景澄来进行活动。

我知道，当吉尔什满先生在奉天逗留期间，盛京将军曾派遣一名代表与彼得尔森（Петерсон）工程师和周兰鼎^①一起去调查产煤地段，该代表在当时精确绘制的一张平面图上曾证实确有无主地段，于是，经与许景澄商定，我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新的呈文。我在其中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盛京将军关于没有无主地段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此外，也是根据许景澄的请求，我并非很正式地到总理衙门去了一趟，将我国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协商结果以及我国公使收到的训令告诉了总理衙门章京，并请他们转告总理衙门大臣，事情如不能在我们之间了结，我国公使就将提出抗议与要求。这种方式大奏其效，由于我提出了如许景澄所述的呈文，总理衙门已向奉天发出了措词最坚决的电报，要求批准对我们有利的这一事项。

然而我认为，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死将对此事的了结造成种种耽搁。因为新的将军裕长虽已任命，但他未必能在一两个月之内到任。

（五）波兹德涅耶夫致齐格列尔

（1899年6月）

艾米利·卡尔罗维奇阁下：

矿业工程师阿聂尔特来此后，我立即就在吉林省境内允准东省铁路公司开采煤矿事宜草拟了一项对总理衙门的声明，我与阿聂尔特先生一起还就此事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晤谈，请他了解一下我们准备提出的声明的内容。李鸿章没有发表任何重要的意见，他只是提请我注意在叙述地段界限时所用的“界桩”一词，

^① Чжоу Лан-тин, 音译。——译者

因为这种说法可以指国家的界桩。为避免误会起见，李鸿章请我们不用这一个词，只用普通的表示界线的说法。

我们请求把准许在我们指出的地段进行开采的文件就在北京交给我们。李鸿章声称不可能满足这样的请求，因为这同此间历来的做法是完全违背的。然而李鸿章担保立即电告吉林将军，不能再继续规避满足我们的要求，并将我的声明的抄件连同关于我们拟进行勘探的那些地段界限的说明一并寄给吉林将军。这应当使吉林将军明白，应拨给我们进行勘探的正是我们所要求的那些地段，而不是将军随意选择的其他地段。

数日后我收到了总理衙门的书面答复。中国外交部^①在该项公文中通知我，已照我声明中指出的意思向吉林将军发出训令，总理衙门还表示，希望矿业工程师阿聂尔特立即返回吉林就地了结此事。

我立即向李鸿章声明，我不能对这一回答表示满意。因为吉林将军已经不止一次地使我们有理由确信，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不怀善意的。同时我还补充说，矿业工程师阿聂尔特将留在北京，在此等待我们提出进行的谈判的确定结果。同时，我还向总理衙门声明，鉴于矿业工程师阿聂尔特眼下不能去吉林，我请求建议吉林将军与阿聂尔特工程师的助手矿业技术员莫列耶夫（Мопеев）一起了结关于向我们划拨地段的事宜。总理衙门本着这一意思向吉林发出了命令。此后不久阿聂尔特收到了莫列耶夫的电报，其中告知，吉林将军同意将我们指出的地段拨给我们，并指派专人办理此事。负责吉林省矿山和森林事务的大员们遵照将军的命令制订了一系列条例，然而，其中几项规定了种种限制，无异于拒绝批准我们在吉林省开采煤矿。关于上述条例的内容，以及我认为有义务向总理衙门作出的声明，您均可从本信所附我5月20日声明的译文中知悉。

^① 原文如此。——译者

李鸿章在今天与我的谈话中声称，收到了吉林将军的电报，后者表示要修改他制订的条例中不适宜的条款，李并表示相信，一切都会圆满解决。

从此事的整个过程中应当得出结论：就满足我们提出的请求而言，在中央政府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障碍，造成种种耽搁都是吉林将军之过。

考虑到最近吉林将军还在继续采取措施，对我方请求仍然不怀好意，我认为有义务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就此坦率地作出声明。5月17日（5月2日），我与他们就此问题进行了一次晤谈。

（六）总理衙门致吉林将军电报的抄件^①

（1898年5月21日〔6月2日〕）

璞科第声言：“新近颁布的开采煤矿条例第二条称，距离大村屯或坟墓五里之内，距离零散住户二里之内不得进行开采。实难想象，某处应开采的地方不在离村屯五里范围之内或离零散住户二里范围之内。因而此条不能接受。另有第七条称，倘若地主不愿将地让与公司，地方官府不得以任何方式给予协助。完全有理由担心，有人将利用此项规定进行敲诈。同时，地方官府还可能暗中唆使这些人拒绝卖地，结果，这一条无异于拒绝批准开采煤矿。此事已经拖延七个多月，吉林当局千方百计阻碍了结此事。如果事情仍将这般迁延不决，东省铁路董事会将下令独自进行勘探并开始采掘，还将派遣护路队人员前往保护工程师和工人。东省铁路公司对由此产生的冲突不承担任何责任。”

煤乃铁路必需之物，条约已允开采，故设法阻碍此事，实为不妥。切盼贵大臣酌改采煤条例，致使公平合理，并迅即电告本署。

^① 原文注有“译自中文”，但中文原件未找到。——译者

**(七) 总理衙门向东省铁路公司
董事提出的建议**
(1898年5月29日〔6月10日〕)

本衙门于5月20日(6月1日)接获贵董事的下述公文：“从矿业工程师的助手莫列耶夫处获悉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吉林将军执意不肯允准俄国人采煤。他颁布的若干条例中，有两项是不能接受的。为此我请求致电吉林将军，为了公平合理起见，修改根据他的命令颁布的新章程。并望能将贵衙门就此事发给吉林将军的电令，以及吉林将军的回复，告诉于我，俾我采取相应措置。”

鉴于上述请求，本衙门认为应将本衙门与吉林将军往来电报之抄件转告东省铁路公司董事璞科第。同时，本衙门建议贵董事致电矿业工程师莫列耶夫，请他在当地与吉林将军及专为交涉此事简派的大员们友好磋商此事。

**(八) 璞科第请求电飭吉林将军立即派员
将所指地段划拨勘探的呈文^①**
(1898年5月30日〔6月11日〕)

5月20日(6月1日)我提出了一项呈文，其中说，我收到了矿业工程师的助手莫列耶夫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谈到，吉林将军已下令派员与他莫列耶夫一起去划定我们指出的三处地段以供勘探。我遂电令莫列耶夫，嘱其会同吉林将军派遣的官员友好地办妥此事。

但出乎意料，又接上述矿业工程师的助手发来的电报，其中说，吉林将军派遣的官员突然患病，不能前往履行交付给他的职责。我担心，此事后面隐藏着阻碍事情的新的诡计。因而冒昧请

^① 原文注有“译自中文”，但中文原件未找到。——译者

求贵大臣，电飭吉林将军，立即派员前往划拨地段。如若延宕不决，不派官员前往，则上述矿业工程师助手莫列耶夫将独自前往进行划定，我对由此产生的误会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敬请贵衙门再次致电吉林将军，飭其友善了结此事，勿再寻思推诿搪塞。

(九) 总理衙门章京的信
(1898年6月5日〔17日〕)

本衙门接获贵董事呈文，呈请电飭吉林将军迅即派员划拨地段以供勘探。贵董事还请电飭吉林将军友善了结此事，勿再寻思推诿搪塞。吾等在将呈文禀明大臣时奉得命令，并已遵命致电吉林将军，立即派遣可靠官员，友善了结此事，勿再延宕。

吾等认为应将此事告知贵董事。

译自尼鲁斯 (E. X. Нилус) 编《东省铁路沿革史》(«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哈尔滨1923年版)，第428—437页。

陶文钊 译

威廉二世关于沙俄占领旅顺口

Л·捷列舍瓦

十九世纪末，沙皇政府和德国分别占领了旅顺口和胶州，从而断然走上了在远东进行扩张的道路。下面发表的沙皇驻柏林大使奥斯登-萨肯（Остен-Сакен）的信件，极其鲜明地说明了威廉二世（Вильгельм II）在国际关系史上这一极其重要的时刻所采取的立场。这些信件所包括的时期是从1897年12月到1898年3月，即从俄国海军力量在旅顺口出现之时起，到1898年3月27日（15日）俄中订约、俄国最终领有旅顺口时为止。

众所周知，1898年12月初，威廉二世派其兄弟普鲁士亲王亨利（Генрих）率领军舰数艘前往远东，以加强远东的德国海军力量。在基尔举行的为这支舰队饯行的宴会上，威廉二世——照当时德国外交大臣比洛（Бюлов）的说法（《回忆录》第1卷第203页）——受到刚刚接到的沙皇政府关于俄国承认德国占领胶州这一事实以及俄国舰队开进旅顺口的消息的影响，发表了黩武好战的言论，建议亨利在德国利益所需要的一切场合运用“铁拳”。比洛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这篇使他本人和威廉周围的人都极为震惊的演说，惹得伦敦大为恼怒。我们公布的奥斯登-萨肯与威廉的第一次谈话是紧接着基尔演说之后举行的，当时德国也十分担心与日本关系的复杂化。（见《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1章，第3732、3740、3741号）威廉1897年12月17日（5日）拜会奥斯登-萨肯的基本目的是力图让沙皇政府相信，不仅在远东，而且在近东，对沙皇政府的威胁来自日本及日本背后的英国，因而俄国必须与德国一致行动。另外三封信涉及另一时期，当时英国正同

俄国就在远东和近东划分势力范围问题进行谈判。此时威廉二世力图使沙皇政府明白，英国现在不能打仗，对俄国并不构成威胁，大概他指望以此使俄国变得更为强硬，从而使俄英谈判破裂。

在这方面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下面发表的奥斯登-萨肯1898年1月20日(8日)的信，从中可以看出，威廉二世要比洛转告奥斯登-萨肯，似乎他已经委托英国驻柏林武官告诉英国政府，他不允许发生针对俄国和德国的侵略行动。威廉把此事告知沙皇大使，除了上面指出的目的外，还在于希望使俄国更深地卷入远东的冒险之中，从而在中欧和近东减弱俄国的威胁。

威廉在谈话中的激昂的调子，这位皇帝异乎寻常地一大早亲自去找大使，将大使堵在被窝里，这些都说明了威廉对这一问题是何等关心。

我们刊载的这些文件，无疑是对《德国外交文件》、威廉二世、维特(Витте)、比洛等人回忆录的重要的补充。

驻柏林大使奥斯登-萨肯伯爵致外交
大臣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ев)伯爵
(1897年12月19日〔7日〕)^①

绝密，亲启

亲爱的伯爵：

前天星期五我已电告阁下，^②威廉皇帝在凌晨二时从基尔回京后，清晨率领人马在柏林郊区举行了狩猎，午后四时半驾临我处。

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无疑是由我最近遵奉圣上的命令转告给他的一项通知所引起的。皇帝是从波茨坦到基尔途中，在火车上

① 革命与外交政策档案。译自法文。

② 指奥斯登-萨肯1897年12月17日(5日)的电报。

获悉此通知的。①

我毫不怀疑，这一通知是最近发给亨利亲王的训令的基础。关于训令的内容，陛下说已经直接告知圣上。②

皇帝以他特有的激昂语气向我详尽叙述了他给亲王的训令，同时，由于在我国的通知中包含有呼吁协调在远东的利益的内容，他对自己采取的很少成功希望的措施显然感到放心。

鉴于圣上已经获悉发给亨利亲王的训令，我就不再逐字赘述我同皇帝谈话的这部分内容了。

此外，我已经在星期五晚上，皇帝陛下离去后，立即发出密电，转告了训令的简要内容。③

皇帝说完之后，我认为有必要郑重其事地把德国对我们承担的义务明白无误地确定下来，我向皇帝指出，占领胶州本身不能成为发展其远东政策的坚实基础。

我说：“陛下在那里还完全悬在半空中，陛下的力量不足以对将来可能遭到的打击作出反应。可庆幸的是，我受托以本国国君的名义转告陛下的通知，已使问题有了可靠的基础，即我们两国在东方保持利益一致，那将是对您的支持和对您的保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皇帝面前坚持认为，这一通知对他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① 奥斯登-萨肯指的是12月14日(2日)的通知，德国政府由此获悉俄国海军占领了旅顺口。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在通知中表示相信，“俄国与德国应当、并能够在远东携手并进(载《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1章，第3733号)。奥斯登-萨肯是在12月14日(2日)晚，即威廉二世从波茨坦动身到基尔去的前夕将这一通知告知比洛的。

② 普鲁士亲王亨利于1897年12月16日(4日)率领一支德国舰队前往远东。威廉二世就此事发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顺便告知说：“亨利亲王为在东方与你的军官和舰只相遇而感到幸福。如果某种危险威胁你的军官或你的利益的话，他奉有我的指示与你的军官站在一起。”(《德国外交文件》，第14卷，第1章，第126页注)。

③ 奥斯登-萨肯在12月17日(5日)的电报中根据威廉的口述转告了发给亨利亲王的训令的内容。电文中说：“训令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在远东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与日本关系的复杂化迫使我们采取敌对行动，他将不惜命令其舰队的军舰与我国军舰并驾齐驱。”

我补充说：“这一通知使陛下摆脱了孤立状态，使陛下的措施不再具有冒险的性质，原先甚至您这一勇敢行为的捍卫者也会毫不迟疑地认为这是一种冒险。”

皇帝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并对我说，他完全懂得，德国为了巩固自己的事业，必须依靠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两个大国中的一个：或者俄国，或者英国。

皇帝说：“正是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与英国的利益拴在一起，我决定选择胶州港，它的地理位置使我处于俄国势力范围的边缘。现在你们的敌人——不论他们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也就是我的敌人；任何一个挑衅者，不论他是什么人，只要他想以武力阻碍你们实现自己的意图，他都将遇到德国舰队与贵国的舰只并驾齐驱。”

根据皇帝获悉的情报，日本正准备派遣使团去欧洲，其任务首先是与土耳其缔结一项攻守条约，一旦日、俄两国发生战争，土耳其将承担义务，对我们封锁海峡；其次，使团还将受托筹备一个反对俄国的欧洲国家的联盟。

我指出，这件事若不是十分愚蠢，便是可笑之极。皇帝对此回答说，这一消息本身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与此有关的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即在此事背后隐藏着英国，它力图利用日本的仇俄情绪。日本人生来就不安分守己，而且遇事专心着迷，因此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这些家伙真是可恶！”

皇帝继续说：“此刻，日本人刚刚着手重整陆海军备，加之他们在征服福摩萨^①岛方面遇到了困难，这就使他们的危险性比较小了，他们的准备工作要到1905年方能就绪。但我坚定地希望，我们的太平洋舰队将在此以前把他们的军舰击沉。”

当话题转到我们在远东始终有德国站在我们一边、从而占有优势时，皇帝高兴地表示相信，有赖于此，我们将同样能得到法

^① 福摩萨(即我国台湾。——译者)岛是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的。条约的这一规定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他们奋起抵抗日本军队。

国的支持。他相信，法国是不甘心于我们单独与德国在一起的。为了证实这一点，陛下援引了下述事实（附带说一句，此事我早已知道）：当1895年他责成驻巴黎大使明斯特(Мюнстер)向阿诺托(Ганото)伯爵^①宣称德国决定与俄国联合干涉日中冲突时，使明斯特伯爵极为惊讶的是，外长竟因此对他大加指责。外长诧异地拍了下手，说：“你们干了些什么啊，这就是说，你们要迫使我们干对俄国有利的事！”陛下指出：“话虽如此，法国毕竟参加了我们的共同行动。”

陛下补充说：“我不认为你们可以相信此人。”

我立即进行反驳，对他指出，他也许不知道，发出这一惊叹的正是明斯特，而明斯特可算不上是俄国的热心的朋友。

陛下对我的这一回答略感窘迫，无言对答，他在这次谈话中再也没有提到法国。

在结束这份关于皇帝陛下来访的报告之前，我还要告知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细节。

当皇帝向我讲到他的弗里德里赫斯鲁埃之行时，我问陛下，他可曾把就占领胶州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的情况告诉俾斯麦(Бисмарк)公爵。

他大声说：“您想想，您说的什么啊，亲爱的伯爵，我绝没有提到此事。报界找他太容易了；第二天一切都会见报的。此外，我知道，尼古拉皇帝不喜欢他，因此对于与他有关的一切我都是极为审慎的。”^②

陛下见到俾斯麦时，后者已经老态龙钟，但他的头脑还清楚。皇帝补充说：“现在他毕竟至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了。”^③

奥斯登-萨肯

^① 1894—1895年和1896—1898年的法国外交部长。

^② 比洛：《回忆录》，第1卷，第209页。

^③ 是日，奥斯登-萨肯给穆拉维约夫寄去另一封信，信中转述了比洛从基尔返回后他同比洛的谈话，并在信中送去德国政府12月17日(4日)对俄国关于占领旅顺口的通知的正式答复。比洛在这一通知中基本上重复了威廉二世所阐述的意思，指出，

驻柏林大使奥斯登-萨肯伯爵
致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
(1898年1月20日〔8日〕)①

绝密

亲爱的伯爵：

昨天比洛请我去他那里，他遵照皇帝的吩咐，把陛下最近与英国武官的一次谈话极其机密地转告我。

皇帝利用该武官出席一个军事节日的机会，托他告诉大使弗兰基·莱谢利爵士(Sir Франку Лэшель)，并要大使转告本国政府：他劝英国在确定其对于远东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态度时，丝毫不要希望在欧洲列强间挑拨离间。欧洲列强毅然决定在东方完全协调一致地追求其合法利益。分裂欧洲列强的企图将是完全徒劳的，它只能给英国带来不快。

据比洛说，英国内阁形形色色的阁员在公众场合发表了种种言论，进行口头威胁，显然是意在争取社会舆论，而英国政府又乐于借此来恫吓欧洲列强。鉴于上述原因，皇帝认为作出这一警告是有益的。

陛下夸口说，他对英国的了解如同英国人自己一样清楚。他相信，女王的大臣们也只不过说说而已。英国几乎在它所有的海外殖民地都遇到了种种困难，对苏丹的远征，镇压阿富里基人②起义的受挫，这一切耗尽了英国人的资财，使他们已经不能自拔。

俄国与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已经一致了，希望俄国支持德国在胶州地区采取的措施。

奥斯登-萨肯在这封信中还告知说，威廉二世访问他时劈头就问，比洛可曾将这一通知告诉他。当奥斯登-萨肯答说没有时，威廉声称：“他答应十点钟就把通知送给您，我来检查一下，他如何执行我的吩咐。”尼古拉二世在信上批道：“好极了”。

① 译自法文。

② 阿富汗的一个民族。

皇帝没有忽略用这些想法来加强他要大使转告伦敦的那个警告，他希望，这一警告将被理解。

此外，陛下还相信，英国不可能从日本或美国寻求任何支持。来自东京的消息使人想到，尽管日本人的性格是遇事专心着迷的，尽管他们的头脑是激奋的，但他们不会采取不理智的行动，即他们不会为英国利益效劳，不会为它火中取栗。皇帝相信，只要对圣詹姆士内阁保持坚定而冷静的立场，并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拒绝英国的建议，我们就仍将左右远东局势，而使英国的要求（它甚至不敢以武力加以支持）彻底落空。

以上就是对比洛伯爵的那些机密通知的简要复述，我认为有义务向您阁下转告使您本人知悉。这些通知反映出，（德国）此刻主要关心的是什么，皇帝对此是何等关注。

奥斯登-萨肯

驻柏林大使奥斯登-萨肯伯爵
致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
(1898年3月16日〔4日〕)^①

机密

亲爱的伯爵：

皇帝今日午后驾临我处。我在皇帝访问之后立即拍发密电，向您转达了谈话中涉及关于一艘德国军舰从克里特水域调回的那部分内容。^②

陛下同他的外交大臣一样，力图认为这一措施的性质是：（德

① 译自法文。

② 1898年3月16日(4日)，派驻克里特岛的德国军舰“奥耳登堡号”载着守岛德

国) 由于不想阻碍我们关于由希腊亲王乔治(Γεοργ) 做候选人的计划, 而不愿插手此事。

我在回答中所作的反驳达到了在与国君谈话中所允许的极限, 但仍保持着应有的尊敬而不违背通行的礼节。但我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是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一项既成事实。

克里特问题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现在起, 这一问题的展有赖于那些对于东欧的未来比德国更感兴趣的大国。可以想象, 德国内阁在解脱了责任以后将不会对其他大国所进行的调整克里特岛的命运一事制造障碍。

皇帝的访问长达一小时二十五分钟。陛下略微触及了当今的所有问题。我怀着几分喜悦的心情得出结论, 陛下有鉴于可能发生的与远东有关的事件, 在列举可以用来对抗日、英两国反对我们利益的企图的力量时, 认为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 他的军舰将同我国舰只共同行动。

同时, 皇帝认为英国报界的好战喧嚣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他相信英国无论何时决不敢对我们开战, 日本亦是如此。陛下对我说, 亨利亲王到达中国水域时我国太平洋舰队的舰只曾进行护卫, 他对此感到极为满意。

“正因为如此, 亲爱的奥斯登-萨肯, 我寄希望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您知道, 这是我毕生的信念。”

奥斯登-萨肯

军驶离该岛, 前往墨西哥。德国政府对这一步骤解释说, 俄国在1898年1月提出由希腊的乔治亲王作为克里特岛的总督候选人, 并为英、法、意所接受, 但德国认为支持这位候选人只能使巴尔干半岛的革命运动火上加油(《德国外交文件》, 第12卷, 第3290号)。奥地利也仿效德国召回了自己的部队和军舰。此后两国拒绝介入克里特问题。

以上为原编者注。1896年, 处于土耳其苏丹统治下的克里特岛居民举行起义, 要求克里特岛重新与希腊合并。欧洲列强乘机宣布该岛在“欧洲保护下”实行自治, 并派兵加以占领。后根据俄国建议, 任命希腊王子乔治为该岛高级专员, 同时列强仍在该岛留驻军队, 以阻止其与希腊重新合并。——译者

驻柏林大使奥斯登-萨肯伯爵
致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
(1898年3月28日〔16日〕)①

机密

亲爱的伯爵：

威廉皇帝今晨驾临我处，当时我尚未起床。时间是八时五十分。

陛下对于他的清晨光临解释道：今晚他必须送皇后到戈姆堡去治疗神经紊乱症，他今天整天没有空闲，而他想亲自托付我就我国最终领有旅顺口和大连湾向我国至高无上的国君转达他的祝贺。②

陛下说：“您知道，我对尼古拉皇帝在政治上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是非常关切的。如今我们俩人已经在远东站稳脚跟了，让英国去不高兴吧！到时候了，该让英国明白，它在世界各地为发展商业而追求头等的、排他的权利的努力是纯属徒劳的，当其他大国不经它的同意便在同一地区追求各自的利益时，它也该停止叫喊背信弃义了。”

根据陛下与比洛谈话时的说法，他庆幸从今以后英国将永远遇到两支舰队联合起来对抗它粗卤的傲慢：或者是俄、德两国舰队，或者是俄、法两国舰队，皇帝还补充说：“有朝一日，甚至是法、德两国的舰队——为什么不能呢？”（他暗示在非洲的共同利益）。

陛下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不来梅斯格拉弗之行，今天凌晨他

① 译自法文。

② 指中俄1898年3月27日(15日)关于租借辽东半岛的协定。

刚从那里回来。他一一叙述了汉萨同盟^①在历史上所起的光辉作用，那时其船队——尽管是一支商船队——曾使英国望而生畏。

皇帝补充说：“好啊，也许劳合^②的伙伴注定现今要在远东继承他的先辈汉萨同盟船队的传统了。它的那些巨轮——“伟大的威廉号”就是其中极好的一艘，我刚刚乘它作了一次旅行——在局势复杂化时是很容易改装成武装巡洋舰的，好自为之吧，那些将要运载阿利比昂^③财富的商船！”

我又一次感到惊讶，尽管在皇帝的血管里流动着盎格鲁撒克逊的血液，但他对英国真是怀有深仇大恨。听着他的话，可以这样断言，他现在一味寻求将言词付诸行动的有利时机。

谈话持续了一小时。陛下在谈话中对我宣称，他早就想告诉我他的耶路撒冷之行的目的了。

“您知道，我要到那里去是为了出席圣地的第一座路得教新教的教堂落成典礼。我们将向这一教派的所有教堂发出邀请，如同过去维滕贝格教堂落成时那样。教区长呈交给我的邀请单中提到了波罗的海教堂。我只在得到尼古拉皇帝的允许后才决定邀请它。我还想为此事给他打个电报。”

我想让我们皇上避免与他进行个人交往，因此赶忙回答说：

“不必了，皇上，帝王之间大可不必讨论这类微妙的问题。让我先来试探一下，并请您授予我向您作出坦率回答的权利，不管这种答复性质如何。我当然不能预卜圣上的回答，但我觉得问题不象初看起来那么简单。在俄国，宗教感情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因素。此外，我不知道，‘波罗的海教堂’这个名称是否符合我国关于外国教堂的法律。在全帝国境内只有波罗的海沿岸诸省有

① 十四—十七世纪北日耳曼各城市（汉堡、不来梅、卢卑克）的商业和政治联盟，主要目的是垄断北欧商业。——译者

② 劳合·亨利（1729—1783）研究作战理论问题的军事作家，原籍英国，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任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的军官。——译者

③ 不列颠群岛的古称，用于此处有讥讽之意。

新教徒。^①所有这一切都要三思。再一次请您允许我作您的中介人。”

皇帝欣然同意了。他自然乐于认为我关于在皇帝之间进行个人交往的意见是一种正确的考虑，是为了避免在陛下与我们圣上的关系中产生一丝一毫的误会。

“我十分谨慎地对待此事。我为此对您非常感激。”皇上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来。

我把谈话的内容转告了比洛。他表示绝不赞成邀请波罗的海沿岸诸省的宗教界；如果陛下与他谈起此事，他准备说服陛下打消这一念头。无论如何，他完全赞同我就此事提出的保留意见。

或许，我们圣上乐于指示我，应当向皇帝作出怎样的回答。陛下在临走前把有关亨利亲王的新消息告诉了我，他重复了在他上一次来访时说过的意思，^②即他对我们太平洋舰队在中国水域护卫亲王表示赞赏。

皇帝补充说：“这也使我的兄弟感到极为愉快。”

奥斯登-萨肯

又：

比洛请我向您转达他对北京的谈判顺利结束所表示的祝贺。^③

译自苏联《红色档案》（《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杂志
1933年第3卷（总第58卷）第150—155页。

陶文钊 译

① 原件如此。

② 见上一文件。

③ 信中有一张外交副大臣拉姆斯多尔弗的亲笔便条：

“以私人信件回答：

一、完全赞许奥斯登-萨肯的声明。

二、帝国政府不能允许信奉路得新教的俄国臣民受德皇邀请去参加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教堂落成典礼。

三、若有人以私人身份前去参加，他决不会因此而得咎。”



共产国际对华政策

(1921—1927)

B·格卢宁

多年来，资产阶级史学界对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重视1925—1927年革命问题。

目前，在研究整个中国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方面，美国史学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们编写了一整套论述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专著。其中，最出名的有C·布兰特、R·诺思、X·尤金、韦慕庭、夏连荫、许华茨等人的著作。在论述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全局性或局部性问题的资产阶级学术著作中，总是可以看到有关共产国际在华活动的形形色色观点，而且，这些著作的作者通常都把美国史学界上述“经典作家”的结论作为自己的依据（L·范斯莱克、陈志让、J·哈里森、纪业马[J·Guillermaz]、G·金德曼、U·多梅斯、D·宾格、吴天卫、Y·库奥、李云汉、蒋永敬等人的著作和文章都是如此）。

西方史学界对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特别感兴趣，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客观的历史情况使中国成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因为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民族革命运动理论的基本原理，在中国解放运动中经受了重大历史性革命事件的实际考验。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国际破天荒第一次具体地运用了许许多多有关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这些战略与策略——关于

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相互关系、群众运动和革命武装行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民族民主制、反帝民族民主进步统一战线、民族革命政党和非共产主义激进政党、运动的顺序阶段、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等等——都已归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武库，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革命。资产阶级史学界起劲地利用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资料，深入地探讨共产国际这一课题，可再次证明共产国际在发展和积聚中国革命力量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并可证明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在中国所取得的经验，对当代也具有现实而长远的意义。

一些作者疯狂诋毁共产国际，其另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原因是，他们怀有反共反苏的明显政治意图。许多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认为，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事件中，可以找到在政治上思想上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攻击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世界的有用材料。布兰特、诺思及其他专门研究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美国中国学“经典作家”，公然大作反共、反苏文章，其政治偏见昭然若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文章中，象博肯诺、布兰泰尔、索顿-沃森这些研究整个共产国际史的西方“权威”所提出的千篇一律的假定，竟然被作者原封不动地用来作为他们立论的前提。^①

还必须指出，作者竟广泛地引用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特别是多次再版的伊罗生的著作，以及中共叛徒的文章（其中包括张国焘回忆录，这篇回忆录在美国的中国学家参与下精心编写出来，不久前在美国出版。它一经问世，即被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视为研究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主要史料之一）。当然，西方的中国学家都很清楚，托洛茨基分子和中共叛徒的文章显然是不客观、不可靠的，他们的概念和论据是站不住脚的，这在西

^① 参看：《共产国际与东方》一书中A·B·列兹尼科夫的《论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一文；Г·З·索尔金：《回击谎言的事实》（莫斯科1974年版）；Л·А·别廖兹内：《美国资产阶级中国史学方法论批判》（列宁格勒1968年版）。

方作者自己的著作中也已多次得到证实。例如布兰特，尽管他广泛引用托洛茨基的论据和文献，以期证明共产国际处理中国事务“不当”，然而他也认为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站不住脚，断定托洛茨基的观点必将导致中国革命失败。^① D·雅各布斯和H·贝尔沃德也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完全歪曲了中国形势，“过高地估计了二十年代中共的力量”。^② 然而，故意不加批判地利用此类“史料”，这种手法，在资产阶级评论家对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论证中，已是司空见惯。资产阶级史学界中业已形成的反共反苏公式，影响着西方的那些力求保持客观探讨立场的中国学家的学术研究。既然方法论的前提不对头，那种善意分析具体史料的尝试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了，成了反共模式的翻版。这样，资产阶级史学界就有意无意地以歪曲的手法来论述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了。他们矛盾百出，含糊其词，躲躲闪闪，有时简直是造谣中伤。

论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以及中共党史和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史的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其著作中主要论述两个重要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失败”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1927年的失败问题。但是，在论述统一战线策略和革命“失败”原因的所有资产阶级著作中，研究的中心却总是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问题。

从主要选题来看，资产阶级史学界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无论是对统一战线的主要参加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或是对共产国际来说，的确是当时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1927年的惨痛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基本上决定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但资产阶级史学界的客观态度也仅仅限于这一点。

^① C·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8年版），第14章，第167页。

^② D·N·雅各布斯、H·H·贝尔沃德：《中国共产党人（文件选编）》（纽约1963年版），第5页。

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站在公开或隐蔽的反苏仇共立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一般问题和具体问题，阐述1927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所起的作用。他们在阐述共产国际政策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及其在中国所采取的具体步骤时，全面地歪曲共产国际在民族解放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极力宣扬和夸大共产国际的种种“错误”、“失算”和“挫折”。同时，他们还从西方论述共产国际史的一般性著作中搬出陈腐的公式，大谈共产国际在对华政策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矛盾”和“内在弊病”，大谈共产国际的“罪过”及其对1927年中国革命和中共的“失败”所应负的“责任”。

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史学界显然极力想把共产国际二十年代的所谓错误路线同中共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政治方针加以对比。在这方面应当指出，他们试图把陈独秀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在第一次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观点，描绘得比共产国际路线更符合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往往充当中共机会主义领导成员的冒牌辩护士（乍一看，这岂非咄咄怪事），他们把机会主义分子描绘成莫斯科私利的无辜牺牲品，描绘成共产国际无原则的错误政策的牺牲品。这种厚颜无耻和假仁假义的态度，从这些作者的整个意图来看是异常明显的，他们企图证明：蒋介石分子之所以屠杀共产党人，是莫斯科“搞阴谋”和共产国际“犯错误”的结果。

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采取共同的反共产国际立场，有其种种政治目的。第一、企图不择手段地抨击和污蔑共产国际这个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借以证明科学共产主义“不适合”东方各国；第二、企图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搅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性原则，鼓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分裂主义思潮；第三、企图在倾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煽动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怀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怀疑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以

便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其天然盟友；第四、企图彻底诋毁统一战线思想，仿佛统一战线思想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著作中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竭力贬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革命（包括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资产阶级史学家过分夸大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通常总是认为，中国的运动似乎只是名义上的、形式上的、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不能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客观上已经开始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似乎共产主义运动是共产国际强迫中国接受的。^①因此，他们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也是中国被迫接受的，这种策略并不具备其客观历史根源。例如，布兰特就毫无根据地声称：“孙中山联俄，并不是出于历史的必然性。”^②这种看法与实际情况显然是非常矛盾的。其实布兰特及其同行对于孙中山的许多演讲是十分清楚的，孙中山在演讲中，以他毕生的经验及其政党的经验为例，有力地证明了国民党和整个中国革命“联俄”乃是历史的必然。孙中山在《致苏联遗书》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想法：“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③

资产阶级史学界否认统一战线具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否认二十年代初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竭力证明统一战线不但对国民党有“害”，而且对中共也有“害”。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理想主义者”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方针是由于莫斯科“搞阴谋”而使国民党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后

① 哈里森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内因促成的，目前他的著作在资产阶级的中国学界还不起什么作用（J·哈里森：《夺取政权的长征。中共党史〔1921—1972年〕》，纽约—华盛顿1972年版）。

② C·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9页。

③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92页。

来，“现实主义者”蒋介石纠正了这个错误。这样，就为否定统一战线思想，否定在统一战线条件下实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鸣锣开道了。

歪曲国共合作的目的、形式和具体内容问题，是资产阶级史学家诽谤中国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方面之一。他们忽视革命发展的辩证法，竟以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来反驳共产国际纲领性文件中规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国民党的“大公无私”及其领袖的“理想主义”来反驳共产国际和中共“自私自利”的狭隘党派目的。这样，统一战线策略的整个意义，就被解释为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最终目的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而不是为了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共成为革命的先锋，被说成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国民党内搞“阴谋”和进行“颠覆活动”的结果，而没有被看作是革命的自然发展和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的结果。资产阶级史学家不愿意承认：中共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作用之所以不断增长，不只是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而且由于国民党领袖的阶级局限性和无能，他们经常拒绝以革命方式解决复兴国家的任务。资产阶级史学家对此避而不谈，却力图证明蒋介石分子破坏统一战线、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在历史上是无罪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史学家根本不分析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即国民党左派和中派及其领袖在1924—1927年间的进步倾向，却在国民党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中共叛徒的言论和文章中寻找他们的反共论据。

由此自然会引出这样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正是这种政治偏见，使得西方的中国学家在选择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史料时，有意限制了自己的选择范围，故意忽视了美国图书馆和台湾档案库中保存着的大量文献资料。那些不打算在学术研究上利用这些文献的美国“克里姆林宫专家”，对这些文献至今仍然视若无睹。尽管美国陆续发表了关于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史的大量资料，并且特别偏重研究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统一战线策略，但是，在资产

阶级史学界中至今还未见有一部论述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史的综合性专题著作。这一点，乍一看，也是有点令人感到奇怪的。我们知道，西方论述中国统一战线史的唯一的一部一般性著作，就是范斯莱克的《敌与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一战线》，但是这部著作实际上并没有论述二十年代中这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①

在论述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大多数西方（主要是美国）著作中，资产阶级史学界的选题大体上都是这样。

站在公开反共反苏立场上的罗伯特·诺思，是最早把列宁和罗易的提纲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的论点用到资产阶级的中国学中来的。后来，他在论述共产国际和中共对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统一战线问题的一系列观点方面，似乎不大重视这两个提纲了。诺思的《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在战后出版的论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系史问题的西方“经典”著作中，占有显著地位。^②该书对于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所阐述的基本论点，后来成了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一般通用的论点。在诺思与尤金合写的后期著作中，他的主要论据并无多大改变，只不过是选用了一些新资料罢了。^③

诺思的基本论点可以概括为：“在二十年代，俄国共产党领袖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之后，既煽动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同时又企图同国民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盟。其结果是引起了混乱和疑惧，最后，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到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没有共产国际插手的情况下，中共才独立自主地“把煽动阶级冲突的政策同建立有效的民族主义联盟

① L·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67年出版）。

② R·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53年版）。

③ X·尤金、R·诺思：《苏维埃俄国和东方（1920—1927）》（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57年版）；R·诺思、X·尤金：《罗易出使中国。1927年国共两党的破裂》（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63年版）。

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调整过来。而且，确定革命的主力不是城市工人，而是中国农民。连‘苏维埃’这个术语也弃置不用了。虽然如此，但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列宁和罗易的论点，却象一条红线，始终贯穿着三十年代中错综复杂的事件和思想”。^① 诺思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原打算在对华政策中“调和”列宁和罗易的论点，但结果犯了一连串错误，致使众多的中国人为此而丧命。

诺思和其他资产阶级作者认为，在二十年代，统一战线没有具备其客观的历史条件，他们把它说成是共产国际的主观决定，是克里姆林宫“纯策略性与权术性”的政策。^② 他们认为，共产国际所有关于中国统一战线策略的决定，都是适应莫斯科的这种臭名远扬的“权术”而随意制定的。因此，他们把二十年代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统一战线史描绘成为在莫斯科庇护之下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活动”，这种“阴谋活动”的目的是，摧毁西方列强的在华阵地，推翻中国的社会制度，吃掉统一战线的主要盟友——国民党。

诺思及其追随者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统一战线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假借国民党名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从内部控制和瓦解国民党，夺取革命领导权。^③ 1927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犯了“严重错误”，错误地估计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同盟者，对“国民党缺乏了解”，^④ 对中国国情“一窍不通”。^⑤ 诺思等人认为，共产国际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似乎共产国际无法找到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正确途径。他们甚至指责共产国际压制农民运动，说什么“共产国际领导人起先鼓励农民

① R·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0页。

② 同上，第29页。

③ R·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第53页。并参看：X·尤金、R·诺思：《苏维埃俄国与东方》，第243页。

④ R·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第82页。

⑤ X·尤金、R·诺思：《苏维埃俄国和东方》，第290页。

骚动，后又企图制止农民骚动，或企图利用农民骚动，但是都失败了。当时，农村起义的时机业已成熟，在此紧要关头，斯大林分子百般阻挠农村举行起义”，而且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回避土地革命”。^① 诺思等人对工人运动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工人运动似乎也是被莫斯科的错误指示所“断送”。被莫斯科置于“毁灭边缘”的可怜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为共产国际这种“有害”政策的后果付出代价。诺思丧心病狂地攻击共产国际在“武汉时期的政策”，说这一时期的政策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无耻把戏”。^②

可见，在诺思看来，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中共1927年蒙受严重损失，其全部责任完全应当由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和驻华代表来承担。他认为，他们的政策似乎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它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矛盾。诺思写道：“在他们之中，恐怕谁都不曾真正了解时局；谁都不曾十分清醒地预料到企图把‘自上而下’革命同‘自下而上’革命调和起来所要遇到的种种困难。”^③ 在这方面，诺思普遍沿用了托洛茨基的概念，但是不免生搬硬套罢了。

韦慕庭与夏连荫合编的《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汇编（1918—1927）》，^④ 也抱有污蔑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目的。汇编辑录了五十份残缺不全而又无关紧要的文件，其目的是要说明：在中国事务上有“莫斯科插手”，共产国际是“外行”，因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意图注定要失败。^⑤ 韦慕庭和诺思一样，认为“从一开始，国共两党革命领导的内部就必然出现严重的冲突”，因为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来说，只不过是为了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而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一种手段罢

① R·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第90页。

② R·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第97、98页。

③ R·诺思、X·尤金：《罗易出使中国》，第7页。

④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汇编（1918—1927）》（纽约1956年版）。

⑤ 同上，第463页。

了。^①

另一部中共党史文献汇编的编者D·雅各布斯和H·贝尔沃德也认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犯了错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作者肯定地说：“中共现领导人的经验可向他们充分证明，俄国同志对中国形势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多年来，中共领导人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许多错误和虚伪态度”。^②至于统一战线问题，作者竟宣称：“1923—1926年民族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盟，与其说是通过对中国政治现实情况的分析建立的，不如说是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产物，最后不能不以中共的惨重失败而垮台”。^③罗斯·道森也强调克里姆林宫的“错误”。他认为，中共领导人在1927年“明显地觉察到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错误的”，他们对这种“冒险政策”进行了抵制。因此，共产国际应对中共的“惨重失败”负全部责任。^④

陈志让的《毛和中国革命》^⑤这本公开反苏的书，完全坚持诺思和布兰特的概念。他也从这种概念出发，来解释统一战线的策略，认为“自上而下”革命（适合于“内部集团”）和“自下而上”革命（更适合于“外部集团”）^⑥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冲突。陈认为，国民党左派“不过是塞满艳丽羽毛的、虚有其表的枕头而已”。^⑦

陈认为，中共1927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实行“自上而下”革命的错误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党内集团”（这是共产国际提议的）政策。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这两项政策就

① 韦慕庭、夏连荫：《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汇编（1918—1927）》（纽约1956年版），第458页。

② D·雅各布斯、H·贝尔沃德：《中国共产党人》，第4—5页。

③ 同上，第4页。

④ R·道森：《中国革命者的流放》，载《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1963年第24卷，第3期，第78页。

⑤ 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伦敦1965年版）。

⑥ 同上，第114、121页。

⑦ 同上，第122、126页。

变得“毫无意义了”，应当被抛弃了。^① 陈由此得出结论说：实行统一战线的“武汉时期”是毫无意义的，它对于中共来说，害多利少。托洛茨基分子也坚持这种看法。

范斯莱克的《敌与友》一书，是西方论述中国统一战线的少数专著之一。作者的论点是：“在二十年代，统一战线策略给党带来的是近乎惨重的失败。但在三十年代……统一战线有了新概念。这种新概念基本上是中国自己创立的，并且主要是从实际出发和凭实践经验得出的，没有从理论上多加考虑。这种新概念逐渐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② 作者紧紧扣住新概念这一主题，所以，仅以二十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二十年代统一战线的经验，而以主要篇幅论述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策略。

范斯莱克以创立中国统一战线的新概念自居，他把新概念解释为杰出领导人物同群众相互关系的一个深奥的问题。范斯莱克批评西方的中国学家通常在著作中总是把统一战线问题说成是暂时的策略性联盟问题，而他本人则惯于把统一战线视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③ 但是，他在评价二十年代的经验时，也照搬那些充斥于西方中国学著作和托洛茨基分子文章中的反共产国际概念，并且认为，二十年代统一战线只不过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暂时的策略性步骤而已。

如上所述，资产阶级史学界在论述二十年代中国统一战线策略时惯用的手法是，把统一战线内部客观发展的辩证法硬说成是共产国际对华采取的一些主观的、矛盾的、甚至是彼此互不相容的方针。范斯莱克也玩弄这种论证的手法。他把共产国际所制定的统一战线策略说成是原本就有缺陷的、无法实现的策略，因为共产国际给自己和中共提出的目标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即在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从更狭小的政治意义上讲，

① 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伦敦1965年版），第126页。

② L·范斯莱克：《敌与友》，第3页。

③ L·范斯莱克：《敌与友》，第2页。

就是在加强国民党和同时发展中共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换言之，共产国际“既要吃掉大馅饼，又要保存大馅饼”。^①作者写道，“例如，既号召发展农民运动，又主张同那些要压制农民运动的派系继续合作。前一项政策过高地估计了中共控制群众运动并借以建立单独势力的能力。后一项政策夸大了中共控制并左右其资产阶级政治同盟者和军事同盟者的能力。”^②他还认为，除了这种种“内在的矛盾”之外，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并不“坚决”。在范斯莱克看来，正因为存在着这种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共产国际二十年代在中国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徒劳无益的”，这项政策使中共濒临“几乎垮台”的边缘。^③范斯莱克在他论述二十年代统一战线这一章的结束语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他说：“中共虽然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但是只要它继续遵循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性的、国际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概念行事，那就没有实际可能来达到自己的目标。”^④

约翰·海斯科克斯也试图对列宁和罗易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进行“新的解释”。海斯科克斯在论述罗易的概念对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政策的影响时，批评诺思给予的评价过高，而惠廷给予的评价过低，可是，他自己最后得出的仍然是庸俗的结论：“自上而下”革命即“民族”革命，同“自下而上”革命即“社会”革命，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⑤

一些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在其学术研究中特别强调中共领导人物的“革命民族主义”，认为自中共诞生以来，“革命民族主义”始终是中共领导人物政治思考的要点。最近论述中共党史的

① L·范斯莱克：《敌与友》，第9页。

② L·范斯莱克：《敌与友》，第28—29页。

③ 同上，第20页。

④ L·范斯莱克：《敌与友》，第30页。

⑤ J·海斯科克斯：《罗易和列宁关于殖民地政策的争论。新的解释》，载《亚洲研究杂志》1963年第23卷，第1期，第93—101页。

美国概论性著作的作者之一约翰·哈里森，就是这样一位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哈里森认为，就这方面来说，以及就社会出身来说，共产党的领袖同孙中山或蒋介石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但他们比国民党人更爱国，因为他们没有把不合中国传统的共产主义学说当作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而是当作最适合于“拯救中国”的政治工具。^①

哈里森认为，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与其说有质的区别，倒不如说有量的区别，因为共产党人懂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宜于采取温和的解决办法”，就是说，没有深刻的社会变革就不能“拯救中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不是别的什么缘故，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激进的代表人物，才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政策拿来作为武器，作为救国的“技术手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相结合，即把“西方革命智能的传统同中国式的群众政策”结合起来。^②人所共知的“群众路线”成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主要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一种特殊产物。因此，哈里森概括地说：在近五十年来复杂的中国共产主义史上，有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占据了主要地位。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对已渗透二十世纪中国生活的革命民族主义精神的接受能力。第二个问题是，共产党人依靠“群众路线”组织人民的能力，而组织人民的目的在于发动反对军阀和外国列强的民族革命，发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革命。^③于是哈里森认为，中共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在四十年代铲除了“自上而下”革命与“自下而上”革命之间一直无法解决的矛盾，它在民族主义基础上解决了这个矛盾，从而使中共取得了胜利。

哈里森从这个总概念出发来研究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策

① J·哈里森：《夺取政权的长征》，第6—7页。

② J·哈里森：《夺取政权的长征》，第6—7页。

③ J·哈里森：《夺取政权的长征》，第512页。

略。哈里森与其他资产阶级作者不同，他不认为统一战线是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反常”联盟，因为统一战线的参加者——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各有各的打算，但它们加入这个联盟首先是从民族主义出发的。1927年统一战线垮台，其主要原因是：当统一战线队伍中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时，无论是共产国际，或是当时还软弱无力的中共（国民党更不要说了，它对此一筹莫展），都不能找到可以使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结合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而这一方式，只有在十年之后，从“群众路线”中才找到了。哈里森通过他对第一次统一战线策略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凭心而论，当时的形势（指1927年。——本文作者）极其险恶和复杂，在这一阶段，可以说，共产党人走向胜利的条条道路统统被堵死了。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几年前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的成就甚大，但是这项成就竟大到无力对它再次进行改组的程度。国共两党本已无比强大，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竟遵循孙中山和共产国际的要求，屈从于民族主义者，而没有能够建立起‘秘密机构’，借以向其强大敌人进行挑战。此外，在二十年代，国民党在那些掌管军队从而也操纵国家（因战争始终陷于四分五裂状态）重大方针的人们中间，拥有比共产党人强大得多的势力。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即使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十分‘新鲜而陌生的’，因而不能强求他们有极大的忠诚。这本来是一个革命民族主义时代，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开战，而不是对中国社会本身宣战。因此，作为民族主义产物的第一次统一战线，由于在关键问题上，即中国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出现争论而垮台了。”^①这样，实质上，哈里森就把统一战线的垮台最终归“罪”于共产国际，因为他把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共的“正确”路线对立起来。

^① J·哈里森：《夺取政权的长征》，第116—117页。

张国焘虽然没有为中共推脱这次“失败”的责任，但他也反复强调共产国际的“错误”在1925—1927年革命“失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哈里森总的意思是，无论是在二十年代，还是在随后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理应对共产国际采取更为“独立的”立场。他不惜用激烈的字眼谴责共产国际的“错误”。^①

尽管专门研究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整个资产阶级中国学界力图不择手段地诽谤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尤其是诽谤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共产国际路线，但是大多数西方作者还是承认，中共由于切实执行统一战线策略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也并不表明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他们是出于万般无奈，因为死死抱住中共对国民党怀有“颠覆”之心这种意念，或者存心要把中共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的意图，使他们不得不如此。此外，偶尔稍微出现一些实事求是地阐述统一战线的观点，也都湮没在一大堆根本对立的议论之中。

罗伯特·诺思写道：“共产党人犯了严重错误，但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而他们的领袖对于未来更是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②有些作者，例如韦慕庭，出于维护他自己的庄重学术荣誉的目的，认为统一战线不但对中共有好处，而且对国民党也有好处。他写道，国民党人参加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想利用中共和共产国际来夺取政权，尤其是想得到俄国的金钱和武器以及得到追随共产党人的那些群众的支持。^③韦慕庭认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的任务，是中共不能胜任的。^④然而，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

①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1921—1927）》（劳伦斯1971年版），第653、664—667页。

② X·尤金、R·诺思：《苏维埃俄国与东方》，第243页。

③ 韦慕庭、夏连荫：《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汇编（1918—1927）》（纽约1956年版），第401页。

④ 韦慕庭、夏连荫：《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汇编（1918—1927）》（纽约1956年版），第461页。

“都从苏俄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①虽然中共在1927年遭到了惨重失败，但它在组织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方面，以及在组织群众方面，都“取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终于使中共赢得了1949年的胜利。由此可见，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共产党人在其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极其重要的力量源泉”。^②

韦慕庭虽然极力强调中国人(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但他还是认为：尽管1927年失败了，但“俄国人在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俄国人具有很多的长处(针对西方而言。——本文作者)，就是说，他们能向寻找救国之道的中国爱国人士提出某种具体建议。俄国人具有革命理论，有进行革命和战争的实际经验，还能提供金钱和武器。他们在南方获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③

也许，法国著名中国学家纪业马对于统一战线的评述，比西方的许多其他作者要客观一些。纪业马并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同情国民党，但他不同于其他资产阶级中国学家，他认为二十年代的统一战线是中国所有革命力量在反对共同敌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结成的天然联盟。^④从这个联盟中得到好处的，不只是共产党人，还有国民党人，而且，共产党人为提高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力曾作出重大的贡献。^⑤在1926年“三二〇事件”以前，国共之间总的说来是“和睦相处”的，因为共产党人的态度“慎之又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很慎重、很诚挚”。^⑥但是，他也和所有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一样，实际上是在为国民党人破坏统一战线、为蒋介石分子实

① 韦慕庭、夏连荫：《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汇编(1918—1927)》(纽约1956年版)，第458页。

② 同上，第467页。

③ 同上，第465页。

④ 纪业马：《中国共产党史》(1968年版)，第1卷，第77页。

⑤ 同上，第88页。

⑥ 同上，第99页。

行恐怖手段辩护，说这两件事主要是1927年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过火行为”和“过失”造成的。

资产阶级论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特点之一是，把统一战线形式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提出来。人为地夸大这个问题，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借助这种简便的手法，可以忽视、回避、甚至完全抹煞任何解放运动的带根本性的主要问题，即革命的性质、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具体的历史、经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的斗争条件，也就是说，阶级联盟和阶级集团（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就是其中的形式之一）的形式与发展所应具备的社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客观前提。不对二十年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客观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就会为随意得出毫无科学根据的主观臆测、为设想强加给政敌各种不攻自破的抽象公式，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无论哪一种斗争形式，其中包括统一战线的形式，它的出现或被提到第一位上来，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客观的具体历史条件。

在中国统一战线的形式问题上，以及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其他问题上，一切资产阶级臆测的依据是：列宁和罗易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过争论；把罗易和列宁的提纲加以对比，似乎二者完全矛盾；硬说共产国际对两种“互不相容的”革命（一种是列宁提纲所提出的革命，主张“自上而下”革命，即“民族革命”，另一种是罗易提纲所提出的革命，主张“自下而上”革命，即“社会革命”。第一种革命预定采用“内部”统一战线形式，即“内部集团”，第二种革命预定采用“外部”统一战线形式，即“外部集团”）都表示赞同，企图以此来调和这个“矛盾”，但未成功。

西方作者发挥了这种论断，说什么共产国际偏重于在中国实行“民族革命”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内部”统一战线形式，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形式；说什么共产国际不是从对中国形势的具体分析出发，而主要是依据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抽象公式。同时，他们还硬说共产国际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企图在

中国实行“自下而上”革命，即贯彻罗易的主张，发动那种似乎能彻底摧垮国共“内部集团”的工农运动。西方作者断言，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整个对华政策的矛盾所在，这种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它显然注定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必然要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革命运动遭到无可弥补的损失。

这个问题暂且不谈，倒是需要指出的是，强加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所谓“矛盾”，其实贯穿在资产阶级中国学家自己的历史研究之中。诚然，西方作者完全同情“自上而下”革命，他们把“自上而下”革命广义地解释为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者在万不得已时，解释为有限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期同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相对立。但是，他们却疯狂攻击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国统一战线的“内部”形式，用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所向往的“外部”形式来反对“内部”形式，说“外部”形式更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西方作者关于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形式的一般论断是：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因而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丧失了机动灵活的自由，使它听命于国民党，以致1927年遭到了失败。共产国际的“罪过”还在于：它无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局势的变化，死抱住它曾选定的统一战线“内部”形式不放，制止中共（特别是在1926年）及时用“外部集团”形式代替“内部”形式的一切活动。最后，当共产国际意识到“内部集团”垮台时（1927年春），再想以某种形式来代替，已经为时太晚了。

范斯莱克对统一战线形式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内部集团，即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俄国提出的方案，软弱无力和手无寸铁的中共只不过是采用罢了。很明显，需要另辟新的途径。”^①范斯莱克认为，这种“新途径”，只有在三十至四十年代，

^① L·范斯莱克：《敌与友》，第30页。

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并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才找到了。^① 约翰·哈里森也站在同一立场上，指责“内部集团”纯粹是俄国的共产国际政策。哈里森和大多数资产阶级作者一样，用统一战线形式问题来代替统一战线内容问题，认为，对共产党人和整个统一战线更为有利的形式是国共“外部”联盟，而不是国共“内部”联盟。同时，在他看来，“外部集团”形式同样也是徒劳无益的，因而他偏重于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所找到的“第三种”统一战线形式。他认为，早在1926年，即蒋介石3月20日在广州发动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彻底摆脱统一战线。^②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坚持这种观点。张国焘为了证实自己在二十年代初的观点而声称：中共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面，错就错在同意采用共产国际提议的同国民党结盟的“内部”形式。他认为，错选统一战线的形式，是1927年统一战线垮台的主要原因。^③

在资产阶级作者的概念中，统一战线的“内部”形式，无论是对中共还是对国民党，同样都是有害的。在这里，西方每次论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时所暴露出来的前后矛盾的说法又一次暴露出来了。如上所述，“内部集团”似乎“束缚了”中共的手脚，阻碍了中共自身力量的发展，但同时，却又激发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从事颠覆活动的积极性”，有助于共产党人从内部“搞垮”国民党；反过来，这使国民党领袖作出了“合情合理”的反应，“被迫”对共产党人施行屠杀。诺思和其他作者认为，国民党作

^① 所谓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统一战线策略的“新途径”“纯粹是由中国”开辟的这一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关于这个问题，参看：A·M·格里戈里耶夫、A·B·列兹尼科夫：《Γ·季米特洛夫与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季米特洛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莫斯科1972年版），第274—293页；A·M·格里戈里耶夫：《Γ·季米特洛夫与三十年代中期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制订。季米特洛夫是忠于列宁事业的杰出革命家》（莫斯科1974年版），第228—245页。

^② J·哈里森：《夺取政权的长征》，第48—50、75页。

^③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653、664—667页。

为二十年代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只不过是共产党人用来夺取全国的一匹“特洛伊木马”而已。^①布兰特发挥了这一论点，认为1927年蒋介石分子实行反革命恐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要对付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的颠覆活动，只有借助武力，舍此别无他法。^②

资产阶级的中国学家虽然也经常谈论某些中国事件对于莫斯科的决定有过影响，但在论述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形式的选择问题时，却和论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其他问题一样，实际上也并未采取具体历史分析的方法。西方作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统一战线形式问题所采取的“教条”、“死板”的态度，似乎是来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赞同的列宁的先验论公式。这种臆测分明是政治偏见的产物，或者说，至少是理论上愚昧无知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也和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那些不合乎共产国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本性的观点和行动，通通被强加到共产国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上了。

谁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认为运动只能采取某一固定的斗争形式，它“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它“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③共产国际正是采取这种具体历史分析的态度来考察各国（其中也包括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问题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向东方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其中根本不提统一战线形式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④共产国际在每个斗争场合和每个斗争阶段，都是根据运动当时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势来处理各该国统一战线的形式问题。对中国也完全如此。

① R·诺思：《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第53、66页。

② C·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4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本，第11卷，第196—197页。

④ 参看：《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的运用）》（莫斯科1934年版），第44—53页。

关于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形式的选择问题，我们研究得还不透彻。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分析完全可以断定，这个问题的具体解决，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有关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一般对比，而不只是取决于共产国际，也不取决于中共，更不取决于国民党。甚至可以说，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存在的整个期间，国民党作为这个政治集团中实力较强的成员，在这个政治集团中是举足轻重的。综合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共产国际考虑到多方面的原因，认为中共作为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党团加入国民党是最适宜的，它可以在松散而又复杂的孙中山的政党中首先起积极主动、促进团结的核心作用，承担起在政治上组织统一战线的责任，以便使所有能参加民族解放革命的政党、社团和派别都相应地参加到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来。①

二、中共一开始就同意与国民党结盟，但条件是：必须作为平等的伙伴，共产党员不拘任何形式地加入国民党。②

三、国民党拒绝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中共结盟，不同意中共作为独立的党团加入国民党。③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三方，就统一战线的形式和条件问题，经过艰巨的谈判和斗争，最后通过一项折衷的决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国共双方都保持独立。当然，这项决议要求国共两党的政治方针必须相当接近，并要求制定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统一战线共同政治纲领。实际上，这首先意味着从组织上彻底改组国民党，实现国民党政治思想方针的全面革命化和急进化，使国民党在国内同

①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6—1927）》（莫斯科1975年版），第97—98页。

②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载《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北京1957年版），第1集，第9—19页。

③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香港1966年中文版），第80—125页。

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在国际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亲密无间。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新革命政纲，是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在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参与下制定，^①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上批准通过的，^②其后，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上又得到确认。^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同意按照类似共产党组织结构的原则来改组国民党，准许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的工作。

鉴于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党还软弱无力，而且，以国民党（同意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其队伍的）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居于革命领导地位，共产国际建议中共在完全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情况下，通过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途径来实现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当时中国已经出现汹涌澎湃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已经有足够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那末，共产党人就没有必要加入国民党，加入了，反而会使整个运动倒退。

共产国际参与制定的“内部集团”形式，符合于中国革命的最广泛的目的，它既考虑到国民党的利益，也考虑到共产党的利益。国民党变成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同时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其政党的独立性。国民党既已接纳共产党人加入该党，也就摆脱了以往政治上孤立的局面，为自己开辟了通向联合国际革命运动、联合中国工农和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道路。同时，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乃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可使中共广泛地接近群众，在极短期间内变成强大的群众性政党，从而可由这个政党、而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组织完善的强大的工农运动。共产国际是根据中国人民反帝民族斗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载《共产党人》杂志1969年第4期第12—14页；A·И·卡尔图诺娃：《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改组的若干问题》，载《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第300—312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0—531页。

③ 《国民党历次大会和会议》（莫斯科1928年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广州1926年版）。

争的客观条件，以及历史上业已成熟的彻底推翻中国土地制度的必要性而提出任务的，目的在于帮助国共两党把力量联合起来，因为当时国共两党谁都无力单独率领中国革命群众去解决这些任务。

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所建议的统一战线形式（共产党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是最适合二十年代中国的具体条件的。共产党人不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过早地退出国民党，这是托洛茨基分子和中共左倾关门主义分子一再向共产国际提出的主张，也是国民党右派求之不得的，依了这样的主张，势必会遭到严厉的谴责，或者导致统一战线过早垮台，使国民党内的妥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嚣张起来。

国民党这个同共产党人合作的统一战线中的政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其声势空前浩大，导致了军阀制度的崩溃。这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的政治选择是正确的。在以“内部集团”形式组成的统一战线存在的三年半期间，中国革命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后来，当国民党破坏了同共产党人、同革命民主派的联盟，践踏了孙中山所嘱咐的国民党革命纲领，充当了扼杀革命的刽子手，从而暴露了它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亲帝国主义的面目时，中国革命才暂时停止了发展。

任何政治集团，不论其形式如何，只有当政治条件即阶级力量对比允许它存在的时候，它才能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加入这个政治集团的各个政党和派别休戚相关的时候，它才能存在。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以“内部集团”形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就是因为它最恰当、最有效地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阶段的性质和目的，它既有利于中共，也有利于国民党，而不是象西方整个史学界所断言的那样，只有利于共产国际。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在1923年到1927年4月这一期间，才始终反对右派拒不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及后来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同共产党人划清界线的种种图谋（1923年国民党改组时，在国民党第一次

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1924年8月、1925年5月、1926年5月、1927年3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

在二十年代，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国家完全独立和领土完整，恢复中国国家主权，推翻以封建军阀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政权，实现民族民主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建立统一而独立的民族国家。此外，还提出了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争取劳动群众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等口号。

革命的性质既然明明是求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参加革命的成员也就必然是极其广泛的。1925—1927年民族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民族资产阶级、^①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相当多的地主、个别封建军阀和军阀集团以及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在各个不同阶段也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要求把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所有这些阶层和集团联合起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阶层以及各个政治集团在统一战线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随着客观斗争条件的变化，统一战线中力量的对比也经常发生变化，参加统一战线的各种政治力量，留在统一战线内的时间，也有长有短。

在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不断增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无产阶级破天荒第一次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它在极短时期内发展成为革命的先锋力量，甚至敢于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进行挑战。1925年“五卅运动”、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1927年春上海无产阶级起义等等——这些明显的革命斗争事件，标志着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在这种革命活动中，无产阶级显示了无比的英雄主义、组织性和团结友爱精神，显示了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和革命热情的巨

^① 民族资产阶级通常叫做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它同外国资本没有联系或者极少联系。

大力量。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不仅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活动，而且积极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因而壮了解放斗争的声势，使斗争采用了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方式和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使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同世界工人运动和苏维埃俄国联合起来了。后一个因素对中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国无产阶级从它开始进行独立的阶级斗争之日起，即从它开始积极参加全民族斗争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但是，在这一时期，难免会有相当多的缺乏自觉性的散漫分子参加到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中来；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始终很不巩固，有的也只是一些上层组织，只能掌握为数不多的一部分最觉悟的工人。在工人中间积极从事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还不能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建立有机的联系。

中国和苏联史学界都普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绝对和相对的软弱性，即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虽有种种明显的弱点，但事实上，当时它比无产阶级强大得多。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它拥有资本，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丰富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它同其他有产阶级、军界以及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在革命中起了十分积极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先锋的作用，并且参与了领导工作，但它也具有绝对和相对的软弱性，因而不能单独牢牢地掌握革命领导权。1925—1927年革命，是由两个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以中共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共同领导的。这种反常局面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当时这两个阶级（以及与其有关的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还无力独自领导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性，于是就谋求工农的广泛支持，但同时，又企图依靠有爱国情绪的地主分子，尤其是企图依靠军官。在国际上，国民党不放弃同相互竞争的帝国

主义列强合作，同时力求苏联从道义上、政治上、特别是物质上给予援助，并竭力设法同共产国际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当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还软弱无力，动摇不了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础时，民族资产阶级就情愿同共产党人在反帝统一战线范围内进行合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与共产党人共同领导革命，但条件是它必须占主导地位。而当工农运动开始超出既定的资产阶级范围，出现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这种现实威胁时，资产阶级就伙同依附于它的地主分子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成千上万的非党工农，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国民党就由民族革命政党变成一个东方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当时，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农群众，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钻进革命队伍中的、有组织的剥削阶级力量，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在1925—1927年的民族革命中，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全民族反帝斗争（广大人民阶层，其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地主都参加了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斗争、城市底层的社会运动、农民的反封建运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是，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各不相同。无产阶级几乎全部参加了斗争，尽管时间早晚不同，至于农民运动，起初发展缓慢，只是在最后阶段，当革命已经出现危机时，才具有相当的规模。农民对无产阶级的支援显然是太晚了，致使民族资产阶级得以首先镇压工人阶级，然后伙同地主镇压农民。

革命斗争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无产阶级的政治示威和武装起义；农民的骚动和暴动；纯粹资产阶级的国会运动；以及革命军队对军阀的讨伐。换句话说，当时是把劳动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同地主资产阶级军官指挥的正规雇佣革命军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然而，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军事行动。这种偏重军事的因素实在是革命的致命伤，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军官一经觉察到工人阶级取代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将会给他们带来危害时，他们就会立刻倒向反革命一边。正是由于偏重军

事因素，革命队伍中的地主资产阶级领袖以及隶属于他们的主资产阶级军官——这帮中国的卡芬雅克^①，才得以在紧要关头轻而易举地发动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对革命群众实行镇压。

统一战线在1925—1927年革命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苏联和中国史学界一致公认，二十年代的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组成的政治集团。这样分析统一战线的阶级成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还不全面。因为第一、没有包括统一战线中的所有社会成分；第二、没有揭示四个阶级在统一战线的不同发展阶段各自在统一战线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第三、忽略了统一战线的演变，即在革命进程中统一战线内部所发生的重大阶级变动。

最近几年，有关的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对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阶级分析作重要的补充。

第一、上述四个阶级不能概括统一战线的全貌，只能说它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除这四个阶级之外，从一开始就加入统一战线的，还有相当多的地主分子（自由派阶层）和城乡流氓无产阶级；其后，陆续加入统一战线的，还有个别的军阀和封建军阀集团，以及个别地区的大买办资产阶级集团。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以地主资产阶级军官为代表的军阀，是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社会成分和政治成分，他们在统一战线中独立的政治作用愈来愈大。既要争取军人，又要防范军人，这场斗争是统一战线队伍内部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斗争中，反动军阀取得了胜利，他们在1927年充当了革命的掘墓人，从而也充当了统一战线的掘墓人。

第二、早在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就已发现，中国革命最重要

^① 1848年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时，任共和国政府军政部长，对六月起义工人实行血腥屠杀。——译者

的特征是，革命的发展极端不平衡，统一战线也绝不例外。由于这种不平衡，上述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下子就全面形成的。1924年初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形成时，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由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靠拢国民党的地主以及受国民党左派影响并成为其军事支柱的西南地区小军阀集团组成的政治集团了。可见，这个新的政治集团在建立之初，实际上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左倾运动的联合。

至于农民，当初，他们既没有独自加入统一战线，也没有和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只是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农民才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和加入统一战线，而且到1926年下半年，即革命行将结束时，农民才大规模地参加革命运动和加入统一战线。然而，即使在1926年秋至1927年春农民运动高涨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农民依然在政治上抱冷淡态度，或者说，仍处于地主的影响之下。

产生这种情况，其根源就在于东方各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解放运动所惯有的特点，即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力图把反封建革命同反帝革命分开，及时地把它们割裂开来，不使其汇合在一起，并极力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从革命的轨道转到地主自由派有限变革的轨道上去。

必须指出，最早加入统一战线的，只是无产阶级中很小的一部分，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当时，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在广州，部分在上海及其他城市）处于（并且后来仍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之下。但是，就连无产阶级的这一小部分（在建立统一战线之前，他们是有组织的、在政治上团结的共产党人），当时也远远不能在革命运动中起政治上独立的作用，更谈不上起领导作用了。以共产党人为首的无产阶级，要争取政治上的独立（哪怕是极其有限的独立），也只能在革命的进程中逐步实现。

由此可见，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最初是根据共产国际所提议的、由中共详细制定的左派集团策略，通过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两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盟的方式，“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广大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农民群众，是在革命的进程中被吸引到统一战线中来的。随着统一战线军事力量的增强，和地域的扩大，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发展。但是，统一战线的这种平行而又互相制约的发展进程，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地域方面，都是极不平衡的，往往在时间、活动地点和性质上都与发生的变化不相适应，因而各个社会阶层及其地区性集团参与或脱离统一战线的斗争，也有先有后。此外，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统一战线队伍中的阶级对抗也不断加剧。所有这一切，使共产国际和中共所要制定和付诸实行的策略不能不复杂多样。

为了按照具体的历史情况来正确评价中共随后几年的政治路线，为了了解中共实行统一战线策略后所取得的空前伟大的成就，确切地理解中共在建立第一次统一战线时的出发点，实属必要。同样地，要正确评价建立在良好基础上的第二次统一战线（1937—1945）和第三次统一战线（1947—1949）的成果，也必须对第一次统一战线的成就作出应有的评价。这样的历史回顾很有必要，因为资产阶级史学界总是力图贬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意义，竭力利用中共个别领导人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和“胜利”，来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在1927年的“挫折”和“失败”。

资产阶级史学界在阐述共产国际“强迫”采用“内部集团”形式这一论点时，一再强调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企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上下始终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把统一战线改变为“外部集团”形式。在这里，资产阶级作者引用的大都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言论，而且多半引用他被开除出党后1929年底所写的那封众所周知的《告全党同志书》，以及

张国焘回忆录。以布兰特为例，他认为陈独秀这位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说它“毫无原则”。^① 这样的论据是否 valuable，显然是值得怀疑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史学界对于许多有威望的中共领导人支持共产国际路线的大量言论，却闭口不谈。因此，中共党内围绕统一战线形式问题展开的斗争情况，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被严重歪曲了。

资产阶级史学界把中共和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描绘成中共受“莫斯科”的某种“操纵”，说什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是无力抗拒的。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没有考虑到当时中共的情况对于共产国际采取对华政策所起的反作用。资产阶级史学家硬说统一战线策略给中共带来了悲惨的结局，他们企图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产生这种“灾难”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共“力不胜任的”重担，而共产国际本身又没有给予应有的帮助。例如，范斯莱克写道：“严酷的现实，年青而无经验，军事力量不足，以及难以驾驭的群众运动，凡此种种，使中共在挑起或放弃重担二者之间难以作出抉择。”^② 持这种主张的作者本人其实是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矛盾之中。既然当时中共本身势单力薄，缺乏经验，不能适应现实，那么，这与共产国际又有何干？须知，“力不胜任的”重担是历史本身、即中国革命加给中共的。故中共只有全力投入到这场革命中去，这与它是否准备好从事实际革命活动无关。苏联作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曾经指出，^③ 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中，下达指示的一方不是决定性的一方，尽管共产国际在必要时曾作过直接指示，以纠正当时还年轻而无经验的中共所犯的 error。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是以帮助为主的。实际上，共产国际不得不负起为中国革命制定基本理论、战略和策略的重

① C·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46页。

② L·范斯莱克：《敌与友》，第25页。

③ 参看B·И·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载《共产国际与东方》，第242—299页。

担，因为当时中共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经验去独自解决它所面临的所有极其复杂而紧迫的问题。同时，共产国际大力扶持中共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迅速成长起来，为中共培训领导干部，帮助中共扎根于群众之中，即增强中共独立活动的能力。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所做的工作，以及中共领导人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历次全会，对于中共的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和第七次全会的决议等等）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共同制定的。这种做法后来成为惯例。

为了确切地阐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形式问题上的观点，有必要按年代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共产国际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的观点，可以相当明确地分为三个阶段：

1) 1922—1926年这个阶段的方针是，建立以四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以国民党为组织形式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早在1924年，中共领导曾经有过要把国民党变成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三个阶级集团”（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党”的主张，对于这个主张，在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M·M·鲍罗廷和Γ·H·维经斯基等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中，是有人表示赞同的。然而共产国际直到1926年底的主导观点是：国民党乃是双重身份的政党，它既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即四个阶级的政治集团，同时又是独立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政党，它有相当强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左派，但其领导人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

2) 从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之后）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阶段的方针是，把四个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国民党左派形式的“三个阶级集团”

(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加强共产党人的先锋作用。共产国际之所以采取变国民党为“三个阶级集团”的政党这一方针,是因为它预料到(果然不出所料)资产阶级终将脱离统一战线,从而有可能使民族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使革命领导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

3) 从1927年4月到同年7月(所谓“武汉时期”)这个阶段的方针是,中共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采取最激烈的武装斗争形式,着手准备必不可免的独立革命斗争。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四月政变这一事件表明,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领导人以及国民党将领和军官,为了维护其自私的阶级利益,不惜彻底背叛革命,背叛他们的党的原则,勾结国内外反动派,采取极端措施来镇压自发的革命势力,直至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摧毁共产党人领导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阶级组织。蒋介石分子的反革命叛乱,沉重地打击了统一战线,使民族革命陷入深刻的危机,而一蹶不振。同共产党人还继续保持联盟的国民党武汉集团,尽管其中尽是国民党的急进分子,但就其阶级本质来说,同追随蒋介石的那部分国民党基干分子并无重大区别。武汉政府领导人在保持同共产党人合作的情况下对蒋介石宣战了,并对北方军阀继续进行军事讨伐。但是,在“武汉”国民党内部,涣散、动摇、背离革命和镇压工农运动的趋向日益明显,武汉军阀越来越公开地叫嚣屠杀共产党人,开始倒向蒋介石一边。统一战线濒于崩溃,并于1927年7月中旬终于解体。

国民党人决定要对共产党人诉诸武力,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势下,共产国际认定,必须充分利用尚能在武汉国民党内继续工作的机会,重新部署中共的力量,积极迎接即将到来的同整个国民党进行的必不可免的武装搏斗;同时,还打算继续争取个别国民党领袖、国民党党员和国民党军队中最革命的部分站在共产党人一边,以期相应地缩小1927年下半年革命后卫战的规模。这就是共产国际在1927年5月和6月就中国问题所作的指示和决议的

全部含义。

中共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态度，就不能用这种明确分期的方法来阐述了。在中共党内，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才认识到产生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整个理论前提，以及根据这个策略而作出的各项具体政治决议（包括选择统一战线形式）的整个理论前提。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探索了正确理解中国革命一般问题的途径，只是探索了制定和验证政治纲领的途径，即中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战略与策略的途径。对于中共来说，最棘手的中国革命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把革命运动中的各种民族因素、社会因素、阶级因素结合和协调起来这个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问题，即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其具体表现就是如何对待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民族革命派问题。

可以比较明确指出的是，1926年末到1927年初，中共支持共产国际关于向“三个阶级集团”过渡的方针，而1923年年中以前，中共拒绝接受以国民党为组织形式的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参加了大会）作出决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以后，对于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主张，在中共队伍中已不被公开怀疑了。从1923年初起，围绕统一战线策略所开展的斗争，转变为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合作形式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27年国民党叛变。争论的焦点就是共产国际所提议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个策略问题，这个策略的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广泛的、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并将其引向胜利。

至于1923年年中到1926年年底这一时期，随着政局的演变，中共领导在策略上几经大的动摇，从号召参加以国民党为组织形式的广泛统一战线（甚至赞成联合某些封建军阀集团和大买办资产阶级集团），一变而屡次提议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改组统一战线，不再以国民党为基础，成立“三个阶级集团”的组织，即不包括

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它甚至打算在民族革命的口号下，组织完全独立的“纯无产阶级”的运动。

即使根据党中央机关刊物上的言论和党内大量文件，也不难看出，中共领导在1922—1926年期间对待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态度有一个一般规律，那就是：每当革命、特别是工人运动处于高潮时，中共领导就倾向于纯洁统一战线的社会成份和政治成份，而每当遭到挫折和失败时，它就主张极力扩大统一战线。

不过，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存在的整个期间，中共遵照共产国际的路线，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独立的原则。资产阶级史学界硬说中共领导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在1924—1927年，为了保持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经常“牺牲”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这种说法违背事实。恰恰相反，中共领导不惜任何代价，始终坚决维护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以致某些中共活动家往往担心，这样会不会导致对统一战线问题的左倾宗派主义态度。

中共领导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意向是，对孙文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国民党的政纲和策略，采取明显的现实主义批判态度，其目的是“促使国民党向左转”，使之接近人民群众，接近中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

研究中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不能只限于分析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立场，还必须仔细分析国民党的立场。可西方史学界偏偏有意识地极力回避这个对它来说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客观地研究这个问题，势必会动摇反共产国际的公式和理论基础。台湾作者的著述，其中包括李云汉和蒋永敬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资产阶级史学界的这一明显的空白。^①

台湾史学家的特点是，极尽反共、反苏之能事。但是，可靠的史料来源却又使他们写出了文献资料详实的著作。他们采用的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香港1968年版）。

文献资料是从台北国民党档案库中搜集来的原始学术资料和政治资料。台湾史学家在阐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立场以及第一次统一战线问题时，严格遵循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①一书为国民党右派定下的官方调子而绝不越雷池一步，因此，他们对于国民党党内斗争不是保持沉默，就是极力加以歪曲，特别是歪曲被笼统列入“亲共分子”的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因而，他们的观点及其研究成果也就不值得一提了。

确定国民党及其各派的阶级性，这在研究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策略中，是一个重要而又繁难的问题。目前，根据现有史料，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成份问题，即国民党内各阶级力量的组成问题，还不能作出全面的回答。因此，目前只能作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初步结论。

在二十年代，一部分共产党人通常把国民党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或者甚至看作是工农政党，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当今苏联史学界大都着重指出，当时的革命国民党属于资产阶级政党，这种见解倒较为切合实际。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充实了这种见解，认定国民党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地主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政党，它依靠一部分自由派地主和地主武装，同时以极力削弱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和部分农民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

在二十年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形形色色的政治集团，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国民党内有右派、中派和左派三种势力。

这些派别，就其阶级本质而论，是大同小异的，它们只不过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地方集团和其他集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种社会势力的不同政治观点罢了。显然，国民党各派之多变和善变，彼此之间缺乏明确的政治界限，其原因就在于此。

^①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纽约1957年版）。

最先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明显形成的是右派，接着是中派，至于左派，只是到了“武汉时期”，它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在统一战线存在期间，国民党各派发展的总趋势是：在第一阶段（1924年1月至1925年底），右派逐渐缩小，直到最后退出了党；中派日益增强；左派的影响开始扩大。从1925年底到1926年初，反动势力占了上风，1927年夏，中派与右派相勾结，战胜了武汉的左派。

鉴于对国民党各派的社会联系研究得尚不充分，所以很难确切地判定其阶级的特性。但是，苏联和中国史学界都比较明确地认定，国民党右派同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是有联系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在一定程度上也参加了革命。我国的研究资料可以为这个结论提供佐证，同时，研究资料也表明，相当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倾向于右派。

关于国民党中派的资产阶级本性，在苏联史学界中也没有重大分歧，尽管目前对于资产阶级的哪些具体人物属于中派这一点还不完全清楚。然而，经过比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中派里，自由派地主分子，特别是国民党军官，也有广泛的代表。

确定国民党左派的阶级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二十年代以来的苏联文献中，大都把国民党左派看作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但是，直到现在，对国民党左派社会关系的研究还不能证实这个观点，因而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同时，按年代来研究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发现他们的人数随着革命的深入而减少，渐渐转变为中派，继而转变为右派。这种“右倾”过程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家来说，是很平常的，也是合乎规律的。我们认为，把国民党左派的大多数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上层的革命民主派的代表，更符合于实际情况，按列宁的说法，他们在一定的时刻之前，能够“反映真正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政治”。

国民党左派的特点还在于，他们在宣布一般政治口号时（在这方面，他们往往显得比共产党人还要“红”），表现得最具革命性，然而，一旦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具体要求快要实现时，他们就大为拘谨起来。左派不同于中派和右派，他们在国民党下层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不掌握军队，而军队当时是中派的主要支柱。因此，国民党的政治领导权暂时转到武汉的左派手中，并没有使革命发展到更高的“武汉阶段”，没有使民族统一战线变成为以国民党为组织形式的“三个阶级集团”。这样的集团在革命的后期阶段倒是确实形成了，但它是共产党人领导的，而不是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也不是以国民党为组织形式的。

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并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认定的那样，是由于共产党人搞“阴谋诡计”和“颠覆活动”造成的，而是这个党的复杂成分以及党内代表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那些人物的利害冲突造成的。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工作，是经国民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批准的，是合法的，因为国民党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在国民党内，共产党人和“真正的”国民党员之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在对群众进行动员、组织和政治教育方面拟定计划等最艰巨的日常工作，都落到了共产党人肩上，因为国民党人不善于做这项工作，一般也不愿意做这项工作。共产党人一心一意地忘我工作，正如共产主义的敌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狭隘的党派利益，而且是为了民族和社会解放、为了以革命方式复兴祖国这一伟大的目标。因此，群众信赖共产党人，并跟着他们走，这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在国民党内威望和影响的生长，是与工农运动声势的扩大、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共党员人数的资料，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共产党人正式加入国民党之前，中共总共约有五百名党员。在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国民党工作的头一年半期

间（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为革命奠定基础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共党员人数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中共发展中的转机，即中共变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是在革命开始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革命是以无产阶级、大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大规模革命行动为标志的）：1926年1月以前，中共已有党员七千五百人，到1926年5月，已超过一万一千人。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所通过的关于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决议，^①并没有能阻止中共的发展，到1927年5月，中共已有党员近五万八千人。在中共发展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共的发展，国民党也迅速发展起来。

认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采取“无原则”的立场，这种看法同样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象某些西方作者所认定的那样，“实用主义的”共产国际企图“颠覆”、“吞并”或“控制”国民党，那它就不会拒绝国民党提出的加入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正式申请。要知道，拒绝国民党的这一申请，也就缩小了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说共产国际要“颠覆”国民党，而共产国际的实际行动表明，它绝对没有此种意图。非但如此，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曾一再建议中共减少其在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代表名额（M·M·鲍罗廷1925年春的建议和Г·H·维经斯基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自行限制”共产党人名额的意见）。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针对共产党人所通过的人所共知的决议，也没有引起共产国际任何神经过敏的反应。至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物质援助，谁都知道，那几乎都是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何况1927年3月以前共产党人尚未加入这个政府。被资产阶级作者指责为“民族利己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列强完全相反，它所资助的不是反动的中国军阀，而是为争取中国摆

^① 即1926年5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并通过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译者

脱帝国主义压迫而斗争的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如果说有谁对1927年失败有“罪”的话，那么有罪的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因为它们大力支持中国的反革命军阀，诽谤革命的国民党及其领袖，它们还用威胁、公开的武装干涉、收买、许诺等等手段，把统一战线（其中包括国民党本身）搞得四分五裂。对此，共产主义的敌人绝口不谈，却对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大张挞伐。

译自《共产国际与东方》（«Коминтерн и Восток»）（莫斯科1978年版），第207—244页。

吴永清译 邹宁校

法国的现代中国研究 ——最近动向的考察

巴斯蒂

译者按：本文作者玛丽安·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是法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并在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EHESS)任教，英文《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编委；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本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情况，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本文是根据1980年11月作者向我们提供的法文打印原稿译出的，有些地方参照了英译文(载《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第53卷，第4期)。

法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这里指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中国研究)，长期以来，仅限于派往中国的官员和记者的感想，旅行家的猎奇，以及研究传统中国的极少数专家的应时的、通常是令人失望的论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作为一门学科创立起来。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 de Peking)停办和该所最后一批法国研究人员于1953年回到巴黎后，才设置了一些关于现代中国的高级课程，才在高级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VIe Section)^①

^① 英文译者注：高级研究实验学院是巴黎一所研究院级的大学，不授予学位，没有正式课程，但提供多种专门化的讲座，举行多种专题讨论会，凡在巴黎各正规大学注册的学生及社会上的学者均可参加。该学院按学术的不同门类分为若干部。第六部已于1975年从高级研究实验学院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即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

中译者按：高级研究实验学院原分六部，自第六部独立后，还有五个部。

由福特基金会资助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资料中心，这个资料中心今天成了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法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由于开展得相当晚，所以一直在传统汉学的语文学传统（法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对此有过分忽视之势）、各门社会科学由研究西方社会而发展起来的方法和提问法以及公众的要求（他们或者贪求异国情调，或者渴望对外国的事物寻根究底）之间艰难地开辟道路。

本文所要介绍的，仅限于1975—1979年发表的著作，而且主要是关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研究。

1975年以来，法国关于现代中国的出版物与日俱增，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当前发展的情况，谈不上真正的科学探讨，而是属于新闻报道性质，价值参差不齐，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热衷于各种政治的、文艺的和商业的问题。对于这类著作，我们将不去多加论述。但是应该注意到，在这类著作中，正如十八世纪时那样，欧洲与其说是在描绘中国，毋宁说是在自我描绘，它们的繁荣兴盛显示了、并在某种意义上激起了对中国的现实的兴趣，这种兴趣对专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近四年来的著作，大部分是涉及1949年以后这一时期的。此外，正是这个研究领域由于有专款使物质手段有某种增加而受益特多。专职研究人员在1974年约有十五人，1979年已增至约二十人；现在的人数约相当于各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人员的名额，后者的人数在同一期间几乎没有变化。

随着一些政府机构、主要是全国科学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和大学部给予财政帮助，从而在增进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和协调研究工作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从1970年起，纪业马 (J·Guillermaz) 已在高级研究

实验学院第六部成立了几个有关中国人民中国的内政、经济、对外政策和文化的专题研究小组。1976年成立了一个把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同全国科学研究中心联系起来的研究组；这个研究组集合了各大学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着重研究清末以来的人口问题和农业资源问题。汇集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东亚语言研究中心的中国语言专家们，从1978年起开始出版《东亚语言手册》杂志(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齐安(M. Ziane)则于1979年倡议创办了一种既以专家又以有教养的公众为对象的、关于当前中国的情况及意见的季刊《海淀杂志》(«Paris-Pékin»)。最后，1980年4月26日新成立的法国汉学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当能促进研究现代中国的专家们之间以及他们和从事于传统研究的同事之间的交流。

不过，在财政上和组织上所作的这些努力还是最近的事，法国研究现代中国的能力总的说还是薄弱的，而且各门学科之间的搭配很不平衡。

这一薄弱情况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国编辑的工具书为数很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保存的关于近代中国的文献资料虽然很丰富，但是几乎还没有清理过；除了1976年钱志豪着手编纂的法学辞典外，几乎没有能满足研究工作专门需要的用法文出版的工具书。即将完成的几种工具书对这一状况应能开始有所改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近几年编成的《法国各档案馆中的亚洲史料指南》(«Guide des sources de l'histoire de l'Asie dans les archives françaises»)即将问世；另一部关于各图书馆所藏原始资料的指南已在准备之中。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编辑了它所收藏的中文期刊目录(共五百种)，现正在付印。赞助中国旅法青年的华法教育会是一个帮助1921年到1939年来法勤工俭学者(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中国的领导人)的组织，它的档案正由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清理编目。这

个中心还将出版一本国立图书馆所藏中国地图的目录，该目录已由让戴勒（M·Gentelle）编成。

除语言学研究外，法国有关现代中国的所有著作都具有明显的历史特征，这个特征贯穿于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文学专家们的研究之中。这一倾向大概是受了法国研究近代中国的创始人巴拉斯（E·Balazs）、谢诺（J·Chesneaux）和纪业马的影响，这三个人全都是历史学家。

在当前法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中，相对而言，历史学仍然是最扎实的领域之一，这也是历史学这门学问在法国较为发达的缘故。从新近出版的一般性著作判断，恐怕也正是在历史学方面，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至少是正大量用来扩大整个学科视野，甚至用来激发理论思维的能力。

由于谢诺主编的《现代中国史》最后两卷的出版以及纪业马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几卷修订本的出版，从此就有了一套关于整个1840—1979年时期的法文基本著作。^①

在继续努力开辟研究途径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一些著作和文献的校勘本。这首先是黄家城（F·Houang）对严复1896年发表的几篇《宣言》的杰出译文。^②接着，出版了义和团起义期间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北京所作的札记^③和秋瑾在1904

① 谢诺、勒·巴比埃：《革命的进程（1921—1940）》（巴黎，阿梯埃出版社1975年版），224页；谢诺等：《新共产主义（1949—1976）》，同上，224页；美国译本，纽约，伟人祠丛书出版社出版。纪业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巴黎，帕约出版社1975年增订新版，两卷），475页；纪业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9）》（巴黎，帕约出版社1979年增订新版，两卷），787页；美国译本，科罗拉多州波尔德，韦斯特孚友出版社出版。

译者按：谢诺曾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现已不再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纪业马曾任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已退休。

② 黄家城：《严复的几篇宣言》（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7年版），155页。

译者按：黄家城曾任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已退休，现为中国籍天主教神甫。

③ 伯希和：《北京札记（1899—1901）》（莱登，布里尔出版社1976年版），8—74页。

年到1906年之间所写的一本著作的带注释的译本，^① 还以中法两种文字出版了一套有关1919年五四运动、出版业的近代化、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华北的农业互助、1952—1953年河南农业集体化的开始和大寨样板大队的丛书，名为《中国读物》。^② 此外，还得加上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集子中所收入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带评注的译本。^③ 最后，还须指出从逃亡到香港的中国青年手中收集来的一批目击记和来自“民主运动”的一些文章的译本。^④

专题研究大部分仍然着重于社会分析，这无疑是其优点之一。

① 依浦隆：《秋瑾：精卫石。汉侠女儿》（巴黎，妇女出版社1976年版），303页。

译者按：依浦隆现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

② 白吉尔、张馥蕊：《“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巴黎，法国东方出版社1978年版），186页；德莱热、华昌明：《近代中国的图书革命：出版家王云五》（同上，1979年版），145页；柯乐德、程莹：《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华北的农业互助》（同上，1979年版），30页；陈禾嘉、杜铭纳：《一次神秘事件：出自庐山的假报告》（同上，1978年版），174页；佩罗：《大寨恢复了元气：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政策》（同上，1977年版），第248页。

译者按：白吉尔现为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副主任；陈禾嘉、华昌明都在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工作；柯乐德在农业研究所工作，程莹是他的夫人；杜铭纳在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

③ 特别是毛泽东未发表的文章选编《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建设：苏联道路还是中国道路》，（胡继熙辑译，巴黎，门槛出版社1975年版），192页；《毛泽东1949—1958年的著作：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巴黎，雄鹿出版社1975年版），609页；由罗迪埃领导的一个小组翻译并注释的一部1958—1962年著作汇编，现正由巴黎马斯伯乐出版社付印。

译者按：这条注释中的最后一项，英译本作：毛泽东，《大跃进：未发表的1958—1959年的著作》（巴黎，小无花果出版社1980年版），216页。又按：胡继熙在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

④ 米歇尔、黄河（音）：《在华二十年……在农村》（巴黎，门槛出版社1978年版），185页；高达乐、程映湘：《评华林（音）著〈血染天安门〉》（巴黎，门槛出版社1977年版），168页；贝罗贝：《中国的新争吵》，载《原状》，第80期，1979年夏，第38—58页；贝勒弗鲁瓦（白天祥）正在编一部完整的民主运动文件汇编，将在香港和巴黎出版。

译者按：高达乐、程映湘夫妇都在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贝罗贝在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东亚语言研究中心工作。

关于1911年以前，巴斯蒂在其对太平天国等各次大造反以后的社会演变的研究中所作的探索，旨在认识并说明各个社会集团的变化中的面貌；^①关于民国时期，工作则一开始就放在对某一特定社会阶级的研究上。谢诺对整个农民运动作了概述，毕仰高(L·Bianco)则纠正并加深了对1920—1930年间的农民运动的研究。^②阿·鲁(A·Roux)研究了国民党政权早年的工人运动，^③齐安则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到法国的知识分子。白吉尔(M.—C.Bergère)论述1921—1923年危机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博士论文，是研究民国时代工商业界的第一部基本著作。^④她对一次饥荒的经过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所做的分析由戈德芒(F.Godement)来继续进行。^⑤有四篇博士论文是研究民国时期女权运动的起源或妇女状况的。^⑥

同对1949年以前的社会问题抱有的兴趣适成对照，法国的研究者还没有专就1949年以来的社会演变写出论著。相反，1949年

① 巴斯蒂：《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1874—1911）》（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1979年版），150页。

② 谢诺：《中国的农民运动（1840—1949）》（巴黎，门槛出版社1976年版），190页（伦敦，泰晤士及哈德逊出版社英文版）；毕仰高：《农民与革命：中国的实例》，载《农民研究杂志》，第2卷，第3期，1975年4月，第313—335页。

译者按：毕仰高现为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

③ 鲁：《1920—1937年间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包袱：南洋公司的实例》，载《欧洲汉学会论文集》，第1集，第31—35页（巴黎，欧洲汉学会1978年版）。

译者按：鲁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

④ 白吉尔：《发展问题与中国资产阶级：1921—1923年的危机》，巴黎第七大学1975年文学与人文科学国家博士论文，808页。打印本，未出版。

⑤ 戈德芒：《中国的天灾与内战：1928—1931年的灾荒》，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1978年博士论文。未出版。

译者按：戈德芒在巴黎第三大学任教。

⑥ 除前页注①所举依浦隆的博士论文外，还有贝勒弗鲁瓦(白天祥)：《秋瑾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女权运动》，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1979年博士论文，未出版；昌明·雅南（按：即华昌明）：《妇女的状况与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陕甘宁的婚姻政策（1935—1946）》，巴黎第七大学1978年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拉利特：《从巴金的两部小说〈家〉（1931年）和〈寒夜〉（1946年）看中国妇女状况的变化》，巴黎第七大学1978年博士论文，未出版。

以前的很少为人们单独去研究的经济问题，^①却成了几部关于人民中国的专著的研究对象。不过，这类著作仍然为数不多。就佩罗（T·Pairault）对农村经济政策所作的非常细致的评论和分析、柯乐德（C·Aubert）关于农业问题的论文以及著名农学家（非汉学家）杜蒙（R·Dumont）的一些应时的论著^②来说，他们的见长之处是在经济方面。贝特尔海姆（C·Bettelheim）和他周围的一些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从理论上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做了说明。^③

除了上面已提到过的纪业马的著作外，自1975年以来，关于1949年以前的政治史的唯一重要著作是胡继熙的一篇论文；^④作者提供了一些新的原始材料来证明1927年到1935年间毛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基础主要是军事上的。至于人民中国，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已经激发人们写了一些关于革命的农民性质、关于官

① 这里只提出白吉尔的国家博士论文中的一章，即以专著的形式单独出版的《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中国纺纱业的危机》（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1980年版），84页。

② 佩罗的著作除注释中业已提到过的《大寨恢复了元气：七十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政策》外，还有《从解放到武汉会议中国农村的一笔账》，载《亚洲世界》，第二期，1975年夏，第181—205页；《1945—1975年的大寨：从内部看一个模范村》，同上，第11期，1977年秋，第161—195页；《学大寨与中国的经济发展：1975年秋的全局会议》，同上，第8期，1976—1977年冬，第467—498页；《从十一届一中全会（1977年8月）到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前夕的中国经济政策》，载《东西方比较研究评论》，第10卷，第3期，1979年9月，第91—130页。柯乐德的论文有：《中国农业：周而复始》，载《亚洲世界》，第13—14期合刊，1978年春夏，第33—70页；又见注释中业已提到过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华北的农业互助》以及收在下一页注^⑤所举文集中的他的论文。杜蒙的著作有：《中国的耕作革命》（巴黎，门槛出版社1976年版），213页。

③ 普莱恩：《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式》（巴黎，马斯伯乐出版社1977年版），188页；蒂西埃：《中国：农村的改造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1976年版），325页；蒂西埃：《中国的人民公社》（巴黎，出版协会总会1976年版），225页；贝特尔海姆：《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问题》（巴黎，马斯伯乐出版社1978年版），156页。

④ 胡继熙：《江西苏维埃军事计划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当权》，巴黎第七大学1976年博士论文，正在付印。

僚主义的作用以及关于大跃进时期毛的经济思想的论著。^① 不过，吸引人们注意的首先还是政治的演变和国内的重大事件。除了纪业马的第一流著作外，共产党历史学家阿·鲁刚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十年作了看法略有不同的总结。^② 杜铭纳 (J.L. Domenach) 在两本专著中对大跃进时期作了分析，其中之一对河南省的危机作了很深入的研究。^③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革命是新近出版的两本小册子的论题。^④ 有一本集体著作和《计划》 («Projet») 杂志的一个专号对1969—1975年的斗争和华国锋时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⑤ 有些研究人员目前正密切注视着那个不满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旨在反对北京官方的解释，尤其是旨在把中国的情况归结为执政的社会主义这一总的看法，这种看法同法国国内及欧洲的政局有密切关系。这是法国知识界发生兴趣的重大课题之一。

钱志豪的著作对人民中国的法律和制度作了详细的阐述。^⑥ 在《权力》 («Pouvoirs») 杂志的一个专号中，有几位专家对毛

① 参阅本辑第360页注③所引的胡继熙的论著；毕仰高：《评毛主义的性质》，载《经济、社会、文化年鉴》，第34卷第5期，1979年9—10月，第1094—1108页；本页注⑤所举的文集中毕仰高及高达乐的文章。

② 鲁：《七巧板：一个法国共产党员看社会主义中国的三十年》（巴黎，社会出版社1980年版），474页。

③ 杜铭纳：《大跃进的起源。河南省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危机和1956年夏到1958年夏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变》，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1979年博士论文，未出版；又见本辑第360页注②所举杜铭纳的著作。

④ 鲁：《中国的文化革命》（巴黎，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168页；维尔塔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中国政治体制（1962—1966）》（巴黎，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83页。

⑤ 柯乐德等：《冷眼看中国》（巴黎，门槛出版社1976年版），318页；《计划》，第132期，1979年2月，《毛以后的中国》专号，277页。

⑥ 钱志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1月17日）剖析》（巴黎，全国科研中心1976年出版），83页；钱志豪：《中国》（巴黎，法律及法学总出版社1977年版），742页；钱志豪：《中国的制度和1978年宪法》（巴黎，法国政府所属法国文献处1979年出版），175页。

译者按：钱志豪在法国全国科研中心工作。

晚年权力的基础进行了分析。^①一些非汉学家的法学家发表了几部有关宪法和司法制度的批判性著作和一本关于政治体制的简论。^②

在国际关系领域内，最初的著作是关于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的。儒瓦约（F·Joyaux）关于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所奉行政策的国家博士论文，为更深入地认识北京的印度支那政策提供了一些新材料。这部著作根据大量未公布的档案及证据，细致入微地再现了这个人民共和国在解决印度支那冲突期间的目标和策略。他还把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政策同中华帝国的对外政策相比较，从而指出了使二者结合起来的明显的连续性。^③蒂尔（D·Thyl）运用符号学的一些方法来解读中国的报刊，对1967年到1976年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同时也对毛逝世前中国的政治论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④纪业马、儒瓦约及其他作者在《亚洲世界》（《Mondes Asiatiques》）、《对外政策》（《Politique Etrangère》）、《国防》（《Defense Nationale》）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防的文章。最后，还有一些尚未发表的大学生著作，论述中国同某些亚非国家的双边关系。

近来，法国开始探讨现代中国的精神方面的历史，这种探讨侧重于思想潮流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除黄家城关于严复宣言的书以外，还可以举出一本关于黄遵宪的论著，难能可贵的是，

① 《权力》杂志，1977年第3期，〈谁在统治中国？〉专号，第126页。

② 阿尔当：《中国地方行政的改革（1979年7月1日法）》，载《公法评论》，1980年春，第99—101页；阿尔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载《东西方比较研究评论》，第11卷，第一期，1980年3月，第7—34页；伊塞亚：《中国的司法》（巴黎，经济出版社1978年版），122页；勒萨热：《中国的制度》（巴黎，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128页。

③ 儒瓦约：《中国与印度支那第一次冲突的解决（日内瓦，1954年）》（巴黎，索邦出版社1979年版），407页。

④ 蒂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1976）。〈人民日报〉论文的剖析》，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1979年博士论文，384页，打印本。

这本著作使用了欧洲的档案，明确指出了这位改革家同西方的来往。^①夏尔邦尼埃(J·Charbonnier)的国家博士论文考察了从中华帝国末期到现在对历史的解释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②德莱热(J·P·Drège)的论述商务印书馆的书，有力地说明了该馆作为文化机关的作用。^③但文化史本身，在法国本是传统汉学的特长之一，有关现代部分却大大被忽视了。例如，研究近代艺术史的书就屈指可数。不过，在此应该提到一些文学专家关于三十年代作家的种种著作，特别是卢瓦(M·Loi)和朱利安(F·Jullien)，他们翻译并评注了鲁迅的作品，其中朱利安还试图进行符号学的分析；还有巴迪(P·Bady)，他研究作家老舍的著作。^④1980年6月，于儒伯(R·Ruhlmann)^⑤倡议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的国际讨论会。

与文化演变密切相关，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也是法国历来乐于研究的一个领域。但是，1975年以来发表的著作仅涉及1949年以后的时期。这些著作一般都根据已出版的原始资料和中国国内的直接调查写成的。值得注意的，有巴斯蒂和戈德芒在1976年1月的巴黎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那

① 参阅本辑第359页注②；巴尔芒：《一个中国文人在西方的经验及思想演变：黄遵宪(1848—1905)》，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1979年博士论文，226页，打印本，即将出版。

② 夏尔邦尼埃：《现代中国对历史的解释》，巴黎第七大学文学与人文科学国家博士论文(里尔第三大学论文复制服务部1980年出版，两卷)，960页。

③ 德莱热：《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巴黎，法兰西学院高级汉学研究所1978年出版)，283页。

④ 卢瓦：《鲁迅的讽刺作品与杂文(1925—1936)：介绍并翻译》(巴黎，马斯伯乐出版社1977年版)，256页；卢瓦：《鲁迅论中国的语言和写作：介绍、翻译并注释》(巴黎，奥比埃出版社1979年版)，186页；朱利安：《鲁迅的华盖集。1925年中国的思想斗争。译自中文，序言及注释》(洛桑，埃贝尔出版社1978年版)，336页；巴迪：《有关近代中国文学史的若干中文及日文资料》，载《亚洲杂志》，第266卷，1978年第3、4期合刊，第437—456页。

译者按：卢瓦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巴迪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⑤ 于儒伯原任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译者

本书所写的稿子；^①还有巴迪和巴斯蒂给一些刊物的定期投稿以及蒂西埃（P·Tissier）的一本叙述性的小册子。^②德·米里贝尔（J·de Miribel）的尚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就西安地方教育机构的活劫情况提供了基于实地调查的十分丰富的材料。^③

* *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研究有所加深，兴趣多种多样。不过，对十九世纪仍然研究得很不够，比之作为法国研究现代中国的出发点的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日本入侵之间这一段时期大不相同。就继承东方学研究的传统，即注意历史的连续性、对不同文化的特点有比较敏锐的感受力、以及要求高水平的语言能力诸方面而言，现在的研究大概并不比以前差，然而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方面，则远逊于研究古代中国的著作。

一般说来，对中国学术的博洽和对中国社会生活的体验都还不够理想。因为，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比起英、美来，法国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华裔学者人数很少，而且至今不大吸收他们到大学里来。大多数土生土长的法国专家都是接受一门普通学科——历史、经济或政治学——的基本训练，结业时语言学习的程度参差不齐。在关于1911年以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满足于西方的资料，偏重英文资料，似乎只要是英文就能证明资料可靠。援引几条资料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这种倾向有时相当严重。最后，1964年恢复外交关系本应给法国人到中国国内去进行研究提供一些方便，但实际上这样的事很少；由于其他种种原因，香港和台湾提供的各种机会也利用得不多。此外，还须注意，像社会学或人类学之类需要实地调查的学科都没有提到。地理学只能出版一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技术》（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7年出版（本书有英文版））。

② 参阅本辑第363页注⑤所举的《计划》杂志中巴斯蒂的文章；蒂西埃：《人民中国的教育》（巴黎，马斯伯乐出版社1978年版），234页。

③ 米里贝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所高等学校：1976—1979年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巴黎第七大学1979年博士论文，285页，打印本。

所谓概论性的著作。^①至于民族学，则只是羞羞答答地出现于勒穆安（J·Lemoine）关于苗、瑶居民的著作（而且是在老挝和泰国进行研究的）、梅泰里耶（G·Métailié）关于民族-植物学的开创性著作以及施舟人（K·Schipper）及其弟子们关于台湾道教宗教仪式的论著中。^②

为了说明（如果不是为之辩护的话）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某些特点，不应该忘记在一个幅员有限的国家里进行这种研究的那些特殊条件。由于法国专业队伍人数很少，使得在法国创办一种关于现代中国的学术刊物可望而不可即；给学术出版物筹集资金也十分困难，甚至往往不可能，还使得作者们不得不既写有独到见解的著作，又写通俗著作。人们也许会奇怪，同联邦德国不一样，法国政府不曾采取坚决行动来推动对现代中国的研究。这部分地是由于，在法国，政府与教育界的关系上一直独具一种复杂的感情。个人与个人之间有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协作关系，尽管有关人士对现政府表示了意见，而真正合作的方针却总是遭到政府各部门的怀疑或傲慢对待，遭到唯恐丧失其独立性的教育界的疑忌。此外，近年来法国缺少一项明确的东亚政策，因而政府不可能采取有利于现代中国研究的有力行动。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两个能够给法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以新的推动的因素。首先，一二年来法中关系的全面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众要求对中国加深了解并熟悉情况，这种要求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另一个刺激是同其他欧洲国家的专家们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合作。欧洲汉学会和欧洲科学基金会发起的两项事

① 让戴勒：《中国》（巴黎，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270页；特罗利埃、德尔韦尔：《拉鲁斯大百科全书》中有关中国及其各省、各自治区的条目。

② 参阅勒穆安所写《瑶族的宗教与社会》一稿，载瓦纳特、穆克金农编《泰国的高地人》一书（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梅泰里耶：《近代中国植物学专门词汇》（巴黎，奥迪尔-小斧-国家图书馆1976年版），■+135页；施舟人（即施丕尔）：《道教仪式》（巴黎，《远东法兰西学院集刊》第102卷，1975年版）；施舟人：《台南的传统宗教组织》，载施坚雅编《前清中华帝国的城市》（斯坦福1976年版）。

业为这种合作开辟了道路：一个项目是计划编纂一部二十世纪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辞典，另一个项目是计划对中国的国家观念与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这两个项目联合了欧洲研究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专家们，其首批著作定于1981年出版。

刘存宽 张振麟译

1981年6月

苏联远东研究所简介

组织机构和《远东问题》季刊

苏联远东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是苏联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 也是研究远东各国的首要科研机构, 1966年9月成立于莫斯科, 属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所长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博士斯拉德科夫斯基 (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教授, 副所长有历史学博士克里夫佐夫 (В. А. Кривцов)、经济学副博士波达波夫 (В. И. Подапов)、经济学博士阿基莫夫 (В. И. Акимов) 和松采夫 (В. М. Солнцев), 另有学术顾问历史学博士杜宾斯基 (А. М. Дубинский) 和历史学博士科瓦廖夫 (Е. Ф. Ковалев)。

该所成立时, 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以及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等部门, 抽调了一批东方学家、中国学家到该所工作。研究所成立十五年来, 规模迅速扩大。1967年初, 全所拥有科学研究人员四十四名, 其中博士三名, 副博士十五名, 到1976年已有七个研究室, 二十多个研究组, 如意识形态研究室 (主任是科瓦廖夫)、对外政策研究室 (主任是阿斯塔菲耶夫 [Г. В. Астафьев])、编史和国外中国学研究室 (主任是尼基福罗夫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等; 研究人员也大大增加, 仅博士副博士即有近百名, 其中博士十余名, 副博士八十名左右。1976年8月成立日本研究室, 1980年, 该室拥有研究人员十六名, 预计几年以后要发展到三十名左右。1974

年增设对外联络与国际学术合作部，主任是历史学博士苏哈诺夫（Л. С. Суханов）。1981年，该所计有科研人员二百零二名，其中博士十七名，副博士一百零四名。研究中国的人员所占比重最大。

该所成立之初，即拟定一项研究远东各国，特别是中国当今内外政策、经济、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范围广泛的庞大计划。十五年来，除编写大量论述中国及其他远东各国的著作外，还经常主办名目繁多的“学术讨论会”，如：“全苏中国学家会议”、“中国文化问题”（1973年）、“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1974年）、“中国社会经济制度”（1975年）、“中国与社会主义问题”（1977年）、“毛去世后的中国”（1978年）、“中国和亚洲”（1979年3月）、“毛主义与民族问题”（1979年5月）、“中国社会经济问题”（1979年10月）、“中国在帝国主义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1980年）、“中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1981年）等等。这种“讨论会”大都以反华为基调，其中，1971年举行的所谓“全苏中国学家会议”，是一次反华升级的总动员会议。

1972年，远东研究所创办《远东问题》季刊，由所长斯拉德科夫斯基兼任主编，副主编是阿尔希波夫（В. А. Архипов），责任秘书是萨加列夫（Б. В. Сагарев），编委中有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贾丕才（М. С. Капица）、拉赫马宁（О. Б. Рахманин，笔名鲍里索夫〔Борисов〕，又名罗满宁）、费多连科（Н. Т. Федоренко，又名费德林）等所谓“中国通”。

创刊号特地发表一篇题为《研究中国的紧迫任务》的社论，声称“要从真正科学的马列主义立场出发，深入地研究现代中国的各种问题”。季刊每期刊载的文章，有百分之八十是针对中国的。例如，1981年第四期共刊载二十八篇文章，其中反华的就有十八篇。

自1973年起，季刊改用俄、英、日三种文字出版，1979年又

增加西班牙文版，现用四种文字出版。十年来已刊载文章四千余篇。该刊在东欧国家广为发行，还行销美国、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西欧各国，近年来，发行量增长了三倍。

自1973年至1981年，该刊特辟“本刊圆桌会议”专栏，以所谓“答读者问”的形式，就中国国内形势，大肆散布反华谰言。

对 外 联 系

远东研究所成立后，即同欧洲中国学界建立了联系，并先后派出多批科研人员分赴欧洲参加各种中国学会议。如1969年在意大利、1970年在瑞典、1971年在英国、1972年在荷兰、1976年在法国、1978年在意大利、1980年在瑞士举行的中国学会议，都有远东研究所的人员参加。1976年，欧洲中国研究协会成立，该所即成为这个协会的集体会员。首席研究人员，如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拉德科夫斯基，法学博士古多什尼科夫（Л. М. Гудошников），副所长、历史学博士克里夫佐夫，语言学博士索罗金（В. Ф. Сорокин），历史学博士苏哈诺夫，都成为欧洲中国研究协会的个人会员。所长斯拉德科夫斯基在1976—1980年间任欧洲中国研究协会副理事长兼理事，1980年当选为名誉会员。副所长克里夫佐夫教授和索罗金博士曾分别当选为协会理事。索罗金于1980年重新当选为理事并一度任副理事长。

近十年来，根据苏联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之间的协定，远东研究所约有二十名科研人员先后到美国进行为期一至九个月的工作和学术考察。他们在美国访问各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并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研究所还派出研究人员到英国、意大利、芬兰、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访问。

出国考察和访问的科研人员回国后，向研究所的有关研究室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提出关于国外科研状况的报告。他们还从国外带回各种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编写各种论著。例如，《中国

与英国》和《中国与日本》两本书，就是斯拉德科夫斯基访问英国和日本之后写成的。

外国学者也进行回访。近几年来，有四十多名外国学者，如意大利的P·科拉迪尼、日本的藤田岩、美国的G·西古尔和法国的K·希普尔等，先后到该所访问。

远东研究所同东欧国家以及蒙古、古巴、越南的学术联系尤为密切。除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交换出版物和科研计划外，还共同编写论著，如1980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纲要（1949—1979年）》一书，就是该所同保、匈、波、捷、古、蒙、东德学者合作编写的。此外，还经常与上述国家的中国学家联合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如1981年，在苏联共同举行名为“中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讨论会，讨论会上的报告，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上述国家发表。

为加强对外联系，1974年，该所增设对外联络与国际学术合作部。其职能是：统筹安排全所的对外联系，负责同外国科学中心建立联系，签订科研协定并监督协定的执行，研究外国科学中心的科研活动（仅限与该所科研内容相近的），接待外国学者和来访者，组织国际学术座谈会和讨论会，为外国见习人员和研究生制订学习和科研计划。对东欧国家和古巴、蒙古、越南等国，还以见习和研究班等方式培训专家。该所十分重视同外国科学中心交换学术资料。对外联络与国际学术合作部每年都向国外发行该所编写的上百种书籍和论文，并按时向国外订户邮寄用四种文字出版的《远东问题》季刊。同时，接收国外寄来的各种图书资料，将其分发给本所图书馆或各有关研究室。

远东研究所仅在1976—1980年间，就接待来自三十个国家的八百五十四名来访者。为便于开展学术活动和接待来访者，1979年5月该所迁入新建的十五层大楼。在来访者中间，新闻记者占很大比重。东欧国家的通讯社记者、报刊编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记者更是常客，他们不仅同该所科研人员举行各种座谈，而

且向他们约稿。来访的西方各大报社的记者也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美国的《华盛顿明星报》、“合众国际社”、《巴尔的摩太阳报》、《新闻周刊》；西德的《法兰克福评论报》；英国的《金融时报》；法国的《观察家周刊》、《时代报》；挪威的《日报》；意大利的《快报周刊》；荷兰的《自由新闻报》等。日本、印度、埃及、哥斯达黎加以及其他国家报社、通讯社的记者也经常登门拜访。

苏联远东研究所受到许多国家政界的重视。西方主要国家的许多政界要人和社会活动家(包括美国国会议员、白宫工作人员)，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都曾到该所访问。日本社会党、自由民主党、公明党的代表，以及各党的议员、青年组织的代表都先后访问过该所。各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人员也常去参观访问。

论述中国问题的著作

苏联远东研究所成立十五年来，编写和审定了大量论述中国的著作和论文。据粗略统计，仅政治、历史、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即有近百种。这些著作的作者大都站在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了极大的歪曲，特别是故意混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我党、我国制度的本质的区别，以偏概全；同时，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炫耀苏联的“功劳”。这显然不属于“研究成果”，只能说明是为推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的目的服务的。现将书目开列如下：

1.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1917—1967. М., “Наука”, 1968.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对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1917—1967)》。

2. Капица, М. С., Левее здравого смысла.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группы Мао.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8.

贾丕才：《左得异乎寻常。论毛集团的对外政策》。

3. Барышников, В. И., Тайв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9—1958). М., 1969.
巴雷什尼科夫: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49—1958)»。
4. Ковалев, Е. Ф., Китайск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1917—1934). М., 1968.
科瓦廖夫: «中国革命运动(1917—1934)»。
5. Коновалов, Е. 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Большого скачка” в КНР. М., 1969.
科诺瓦洛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跃进”的社会经济后果»。
6. Капица, М. С., КНР: Дв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две политики. М., 1969.
贾丕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个十年——两种政策»。
7.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 др., Анти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взглядов и полити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М., 1969.
斯拉德科夫斯基等编: «毛泽东的观点和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
8. Ревкомы—органы диктатуры Мао. М., 1969.
集体编写: «革命委员会是毛的专政机构»。
9. Кривцов, В. А., Маоизм глазам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Миров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и рабочая печать о политике группы Мао Цзэ-дуна. М., 1969.
克里夫佐夫编: «共产党人对毛主义的见解。世界共产主义报刊和工人报刊论毛泽东集团的政策»。
10. Ширяев, С. Л.,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КНР. М., 1969.
希里亚耶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铁路运输»。
11. Астафьев, Г. В.,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1949—1957). М., 1970.
阿斯塔菲耶夫: «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1949—1957)»。
12.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НР. М., 1970.
斯拉德科夫斯基: «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13. Китай и соседи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М., 1970.
集体编写: «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与邻国».
14.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Гл.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культура. М., «Наука», 1970.
斯拉德科夫斯基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国家与法、文化».
15.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М., «Наука», 1970.
尼基福罗夫: «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
16. Феоктистов, В. Ф.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Маоизм без маск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 советской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й печати. М., «Мысль», 1970.
费奥克季斯托夫编: «不加伪装的毛主义(苏联期刊论文集)».
17. Критик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й Мао Цзэ-дуна. М., 1970.
«毛泽东理论观点批判».
18.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Лен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М., 1971.
斯拉德科夫斯基: «列宁与当代中国问题».
19.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Китай и Япония. М., «Наука», 1971.
斯拉德科夫斯基: «中国与日本».
20. Дубинский, А. М.,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НР. О сущност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М., 1971.
杜宾斯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论当前中国领导集团对外方针的实质».
21. Волкова, Л. А., Измен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1949—1970. М., «Наука», 1972.

- 沃尔科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1949—1970)》。
22.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Гл. ред.),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 1972.
斯拉德科夫斯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
23.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и др., Ленинизм и поли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М., 1972.
斯拉德科夫斯基等编：《列宁主义和当代中国的政策》。
24.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Гл. ред.),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1917—1970). М., “Наука”, 1972.
斯拉德科夫斯基主编：《中国现代史(1917—1970)》。
25. Наумов, И. Н.,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73.
纳乌莫夫：《中国粮食问题》。
26. Астафьев, Г. В., Проблем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Т. 1—2. Сборник докладов Всесоюз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итаеведов, состоявшейся в ноябре 1971г. М., “Мысль”, 1973.
阿斯塔菲耶夫主编：《苏联的中国学问题。(1971年11月全苏中国学家会议报告集1—2卷)》。
27. Акимов, В. И., Анти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во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аоистов. М., 1973.
阿基莫夫：《毛分子的军事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
28.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НР. М., “Мысль”, 1974.
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
29. Астафьев, Г. В. и Дубинский, А. М. (Общ. ред.),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1949—1973). В 2-х кн. Кн. 1. 1949—1963. Кн. 2. 1963—1973. М., “Мысль”, 1974.
阿斯塔菲耶夫、杜宾斯基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1949—1973)》(两卷本，第一卷1949—1963年，第二卷1963—1973年)。

30.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1917). М., "Наука", 1974.
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 (截止1917年)»。
31. Маоизм—идейны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тивник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М., "Правда", 1974.
«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敌人»。
32. Гудошников, Л.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еханизм КНР. М., "Наука", 1974.
古多什尼科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机构»。
33. Боревская, Н., Школа в КНР (1957—1972). М., "Наука", 1974.
鲍列夫斯卡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1957—1972)»。
34. Юрков, С. Г.,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маоизма. М., "ИМО", 1975.
尤尔科夫: «毛主义的对外政策观点»。
35.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НР (1966—1973).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её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 "Наука", 1975.
集体编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 (1966—1973)。"文化革命"及其后果»。
36. Петров, А. И. и Молодцов, Л. И., Экономика КНР: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 "Наука", 1976.
彼得罗夫、莫洛德佐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 可能与现实»。
37. Карымов, В. Г.,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НР после "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76.
卡雷莫夫: «"文化革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倾向»。
38. Видные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учас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Наука", 1976.
集体编写: «参加中国革命的著名苏联共产党人»。
39. Акимов, В. И., 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Пекина. М., 1976.

阿基莫夫: «北京的军事经济部署»。

40.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 А., Ламаист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в Тибете и е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итай: традиц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1976.

鲍戈斯洛夫斯基: «西藏的喇嘛教及其现状. 中国: 传统和现实»。

41. Астафьев, Г. В.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Китай 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траны Европы. Сб. ст. М., 1976.

阿斯塔菲耶夫编: «中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论文集)»。

42.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 “Наука”, 1977.

斯拉德科夫斯基: «苏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1917—1974)»。

43. Круглов, А. М., Мел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КНР. М., 1976.

克鲁格洛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工业»。

44. Борисов, О. Б. и Колосков,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70). Изд. 2-е, Доп. М., “Наука”, 1977.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 «苏中关系(1945—1970)»(增订第二版)。

45. Кривцов, В. А., Маоизм: истоки и сущность. М., “Мысль”, 1977.

克里夫佐夫: «毛主义: 起源和实质»。

46. Яценко, Г. Н.,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КНР(1957—1964)». М., “Наука”, 1977.

雅辛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斗争(1957—1964)»。

47.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74 году.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деология. М., “Наука”, 1977.

集体编写: «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48. Борисов, О. Б.,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М., “Мысль”, 1977.

- 鲍里索夫：《苏联和东北革命基地(1945—1949)》。
49. Идеи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ущность маоизма. М., “Наука”, 1977.
集体编写：《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
50.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Отв. ред.),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Англии. М., “Наука”, 1977.
尼基福罗夫责任编辑：《英国的中国学》。
51. Колосков, Б. Т.,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1969—1976.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7.
科洛斯科夫：《中国的对外政策(1969—1976)》。
52. Треть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М., 1978.
《第三次中国现代历史问题科学讨论会。报告提纲》。
53.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НР (1949—1975). М., “Наука”, 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1949—1975)》。
54.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 А., Тибетский район КНР (1949—1976). М., “Наука”, 1978.
鲍戈斯洛夫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地区(1949—1976)》。
55. Барахта, Б. П.,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оль НОАК (1969—1975). М., 1978.
巴拉赫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社会政治作用(1969—1975)》。
56.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Отв. ред.),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НР. 1949—1974. М., “Наука”, 1978.
斯拉德科夫斯基责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1949—1974)》。
57. Сергеева, Э. 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К. М., “Наука”, 1978.
谢尔盖耶娃：《中共领导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政策宣传》。
58. Кривцов, В. А., Судьба культуры КНР (1949—1974). М., “Наука”, 1978.
克里夫佐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遭遇(1949—1974)》。

59.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76 году.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деология. М., "Наука", 1978.
集体编写: «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60. Кривцов, В. А. и Краснова, В. А., Ли Да-чжао: о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емократизма к марксизму-ленинизму. М., "Наука", 1978.
克里夫佐夫、克拉斯诺娃: «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61. Профсоюзы КНР (1953—1958). М., "Наука", 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会(1953—1958)»。
62.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Китая (1949—1974). М., "Наука". 1978.
«中国工人阶级(1949—1974)»。
63.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Китай: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деологии. М., "Наука", 1978.
斯拉德科夫斯基: «中国: 历史、经济、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
64.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КНР. 1949—1975. М., "Наука", 197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1949—1975)»。
65.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унь Ят-сен, октябрь 1896. М., "Наука", 1978.
尼基福罗夫: «孙中山在1896年10月»。
66.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е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 1979.
集体编写: «“文化革命”及其后果»。
67. Акимов, В. И. и Поляков, В. П., Машиностроение КНР. М., 1979.
阿基莫夫、波利亚科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器制造业»。
68. Опасный курс. Китай посл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Девятый сборник).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9.
«危险的方针。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第九集)»。
69. Титов, А. С.,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и раскол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ПК 1935—1936. М., "Наука", 1979.
季托夫: «略论1935—1936年中共领导内部斗争与分裂史»。
70. Москалев, А. А., Гуанси-Чжуанский и Нинся-Хуэйс-

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е районы КНР. М., "Наука", 1979.

莫斯卡廖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71. Марков, А. П.,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Японии в Азии и Китай. 1945—1977. М., "Мысль", 1979.

马尔科夫: «战后日本的亚洲政策与中国(1945—1977)»。

72. Экономика КНР: транспорт, торговля, финансы(1949—1975). М., "Наука", 1979.

集体编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 运输业、商业和财政(1949—1975)»。

73.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Анти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Пекина. М., "ИМО", 1979.

季塔连科: «北京的反社会主义方针»。

74. Посбелов, Б. В., Маоизм и миров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М., "Наука", 1979.

波斯别洛夫: «毛主义与世界革命运动»。

75.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ССР, США и 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М., "Наука", 1979.

列多夫斯基: «苏联、美国与中国的人民革命»。

76.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77 году.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деология. М., "Наука", 1979.

集体编写: «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77. Капица, М. С., КНР: 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 три политики.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9.

贾丕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个十年——三种政策»。

78. Степанов, Е. Д., Экспансия Китая на море. М., "ИМО", 1980.

斯捷潘诺夫: «中国在海上的扩张»。

79. Дубинский, А. М.,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937—1945.

М., "Мысль", 1980.

杜宾斯基: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

80. Ширендыбаб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Автономный район Внутренняя Монгол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 "Наука", 1980.
希连迪巴(蒙)和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
81. Козлов, А. А., Подрыв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аоистов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1960—1973.
科兹洛夫:《毛分子在东南亚的颠覆活动(1960—1973)》。
82. Манежев, С.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НР со странам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 "Наука", 1980.
马涅热夫:《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
83. Григорьева, Е. А. и Костиков, Е. Д., Спекуляция маоистов понятием "неравноправный договор".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5.1
格里格里耶娃等:《毛派对“不平等条约”概念的投机》
84. Капустин, Д. Т., Тайвань и Южная Корея в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69—1979. М., "Наука" 1980.
卡普斯京:《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和南朝鲜(1969—1979)》
85. КНР.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1949—1979).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0.
与保、匈、东德、波、捷、蒙、古学者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纲要(1949—1979)》。
86. Кривцов, В. А., Маоизм после Мао. М., 1980.
克里夫佐夫:《毛以后的毛主义》。
87. Антиповский, А. А. и др., Политика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КНР(1949—1979). М., "Наука", 1980.
安季波夫斯基等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政策(1949—1979)》。
88.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Пер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М., "Наука", 1980.

- 尼基福罗夫: «中国的早期革命家»。
89. Воронцов, В. Б., Китай и США в 60—70 годы. М., 1980.
沃隆佐夫: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与美国»。
90. Борисов, О. Б., и Колосков,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 “Мысль”, 1980.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 «苏中关系史 (1945—1980)» (增订第三版)。
91.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78 году.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деология. М., “Наука”, 1980.
集体编写: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92. Мосько, Г. Н., Армия Китая—орудие авантюрис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аоистов.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80.
莫西科: «中国军队——毛分子冒险政策的工具»。
93. Опасный курс. Китай посл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Десятый сборник). М., 1980.
«危险的方针。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第十集)»。
94. Китай и гон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М., 1980.
集体编写: «中国与军备竞赛»。
95. Юрков, С. Г., Азия в планах Пекина.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0.
尤尔科夫: «北京计划中的亚洲»。
96.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Китай и Англия. М., “Наука”, 1980.
斯拉德科夫斯基: «中国与英国»。
97.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Гегемонист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угроза народам Азии, Африки 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1.
斯拉德科夫斯基: «中国霸权主义政策是对亚非拉人民的威胁»。
98. Борисов, О. Б., Внешняя и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в 70-е годы.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1.

鲍里索夫：《七十年代的中国内外政策》。

99. Борисов, О. Б.,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50-х годах. (К дискуссии в КНР о Мао Цзэ-дуне). М., "ИМО", 1981.

鲍里索夫：《五十年代苏中关系史摘记（评中国关于毛泽东的争论）》。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

1. 斯拉德科夫斯基：《为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斗争》（载《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
2. 雅可夫列夫：《远东研究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研究》（载《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
3. 《远东问题》编辑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十五年来的对外联系》（载《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
4. 《远东问题》编辑部：《远东研究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载《远东问题》1981年第2期）。
5. 《远东问题》编辑部：《远东研究所对当代中国国内政策的研究》（载《远东问题》1981年第2期）。
6. 《远东问题》编辑部：《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敌人》（载《远东问题》1981年第4期）。
7. 暉峻象三：《苏联对日本的研究》（载日《历史学研究》1980年第1号）。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苏联社会科学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吴永清 1982.6.

稿 约

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刊物,目的在于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本刊欢迎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下列译稿:

1. 论文;
2. 专著择译;
3. 有重要价值的短篇资料和回忆录;
4. 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和情况综合评介;
5. 书评(译稿与撰写稿均可);
6. 其他。

二、来稿要求译文准确,经过详细校订。译稿中人名、地名、机构及官职名称等,务请查核清楚,翻译准确。标点符号、注释、数字、年月日等,请参照本刊规格,以求统一。

三、来稿请附原文。如决定采用,即行通知;一经发表立致稿酬;如不采用,妥为退稿。

四、来稿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请写明真实姓名(发表时署名听便)、工作单位及详细地址,以便联系。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四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八九九二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12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110 定价: 1.40元

限国内发行